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俄）索尔仁尼琴 著

牛犊顶橡树

陈淑贤 张大本 张晓强 译

А.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文集

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称这部作品为"文学生活随笔"。它在索氏的作品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它记叙了60年代至1974年作者15年间的主要经历。他的荣辱，"新星"浮出水面直至跌落，是他从"地下作家"到"英雄末日"的记录。本书从一个侧面，从索尔仁尼琴自身的特定视角，反映了前苏联当时文坛以及政坛的风云变幻，对于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前苏联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具有一定意义。浓郁的纪实性和史料性使本书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价值。

本书根据最新版本译出，并附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图片资料，均系首次披露。

A.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文集





ISBN 7-5014-2122-6/I·858 定价：28.00元



А.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文集

牛犊顶橡树

陈淑贤 张大本 张晓强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犊顶橡树：索尔仁尼琴文集/（俄）索尔仁尼琴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1

ISBN 7-5014-2122-6

Ⅰ.牛… Ⅱ.索… Ⅲ.索尔仁尼琴.A.Ⅰ 自传

Ⅳ.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305 号

索尔仁尼琴文集

牛犊顶橡树 陈淑贤 张大本 张晓强译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张晓光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25 印张 260 千字 插页 29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4000 册

ISBN 7-5014-2122-6/I·858 定价：28.00 元





1　后勤中尉索尔仁尼琴在掩蔽部创作《女性中篇》的手稿。



2 囚徒索尔仁尼琴在卡卢日斯卡亚哨卡。 莫斯科，1946年6月。

3 沙拉斯卡－玛尔菲诺—创作《第一圈》的地方。1947年至1950年、被关押的索尔仁尼琴曾经在这里工作。



4 被关押在沙拉斯卡－玛尔菲诺的亚·伊·索尔仁尼琴。穿着官方发给的服装、系着领带。1948 年 12 月。



5　从自己的寒舍的窗子向外眺望。科克－捷列克，1955年。



6　在科克－捷列克流放，1954年。



7　科克—捷列克边界的土房，少先队员街，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自1953年9月至1956年6月曾经居住在这里。



8　被流放的数学教师。科克－捷列克，1954年春。

9　亚·伊·索尔仁尼琴带领学生在野外进行测绘。科克－捷列克，1955年。



10　马特辽娜·瓦西里耶夫娜·扎哈洛娃在自己弗拉基米尔区的米利采沃的房前。自1956年8月到1957年6月，亚·伊·索尔仁尼琴在米利采沃度过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11　当教师的亚·伊·索尔仁尼琴在米利采沃的农村。1956年秋。



12　梁赞（卡西莫夫胡同）的房子。亚·伊·索尔仁尼琴从1957年7月至1966年2月在此居住。

13　在卡西莫夫斯基住房的院子里，在自制的小桌旁。在这里完成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写作。1958年5月。

14　安娜·萨莫伊洛夫娜·别尔捷尔在《新世界》编辑部自己的办公桌旁。



15　亚·伊·索尔仁尼琴。1962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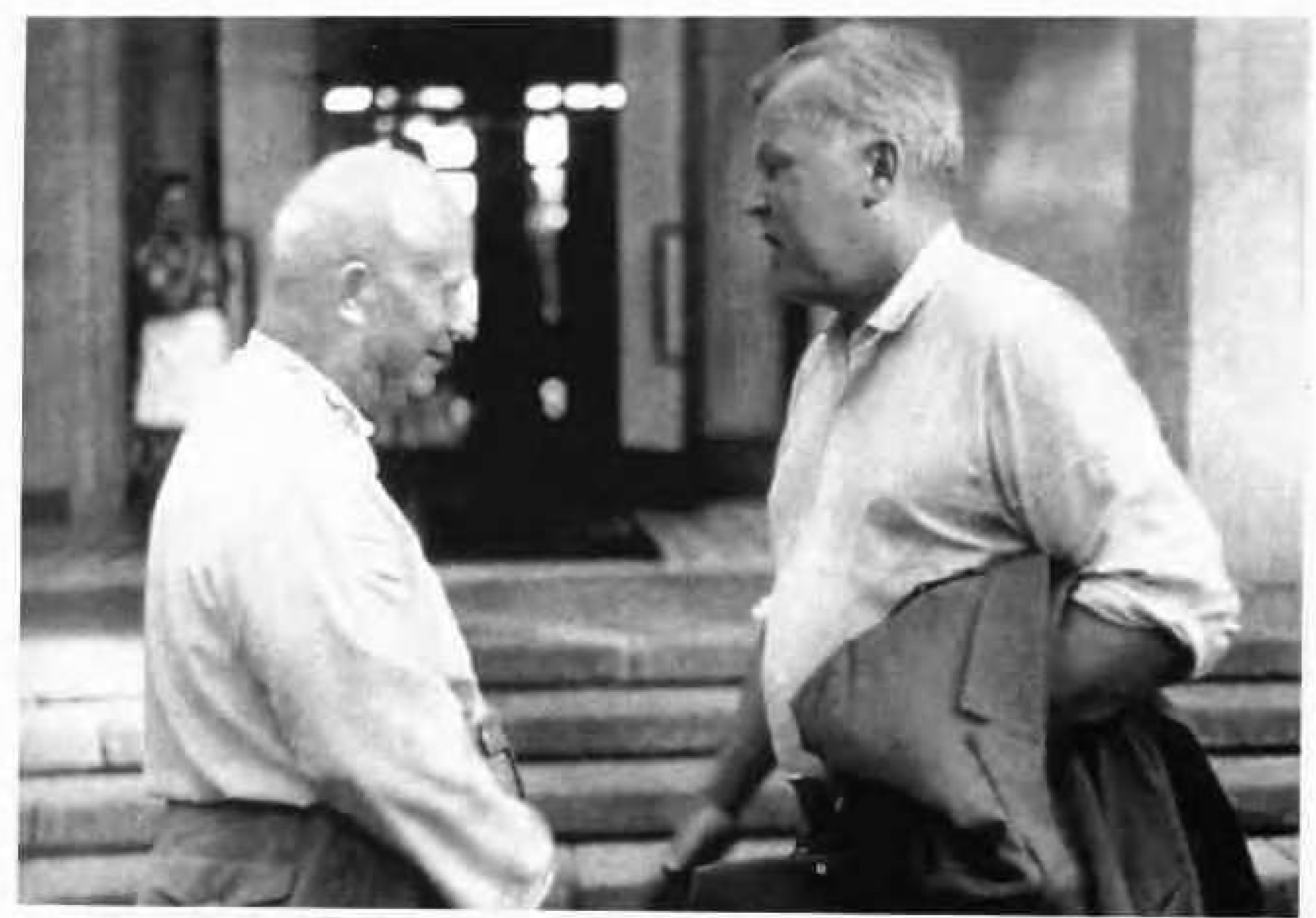


16　尼·阿·列舍托夫斯卡娅与亚·伊·索尔仁尼琴。1962年夏。



17　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
1964年2月。

弗·斯·列别杰夫摄



18　尼·谢·赫鲁晓夫与阿·特·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皮聪大。　列别杰夫摄



19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杰夫



20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于《新世界》发表的日子里。



21　亚·伊·索尔仁尼琴与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莫扎耶夫。索洛恰，1963年。



22　亚·伊·索尔仁尼琴，索洛恰，1963年。



23　自行车旅行。在休息。1963年。



24　在顿河上游，距叶皮凡不远处。1963。



25　与斯·科莫托（左数第二位）进行面对面的答记者问。莫斯科，1966年。

26　与卡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科夫斯基一起在他佩列杰尔基的别墅。





27　《新世界》编委会成员，前排（从左至右）：彼·格·扎克斯、阿·德·捷缅奇耶夫、阿·特·特瓦尔多夫斯基、阿·依·干得拉托维奇、阿·米·玛丽雅莫夫。后排：米·尼·希特罗夫、弗·雅·拉克申、依·雅·塔络什、依·依·维那格拉多夫、依·阿·萨兹。1970年2月。



28　白沙拉斯卡的朋友利沃夫·奇诺维耶维奇·卡别列夫（左）和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帕宁在一起。莫斯科近郊，1968年8月。



29　瓦切斯拉夫·福谢沃洛多维奇·依万诺夫与父亲福谢沃洛多夫·依万诺维奇。1963年。



30　罗列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梅德维杰夫在罗日杰斯特沃与亚·伊·索尔仁尼琴合影。1968年。



31　韦罗尼卡·瓦连京诺夫娜·图尔基娜与尤里·亨里霍维奇·什捷因。

32　　尤里·基多夫、亚·伊·索尔仁尼琴、奥·亚历山大·门。在兹韦尼哥罗德的斯科洛多沃。1968年。



33　在莫克尚(梁赞)，与费德罗·库兹金在一起。19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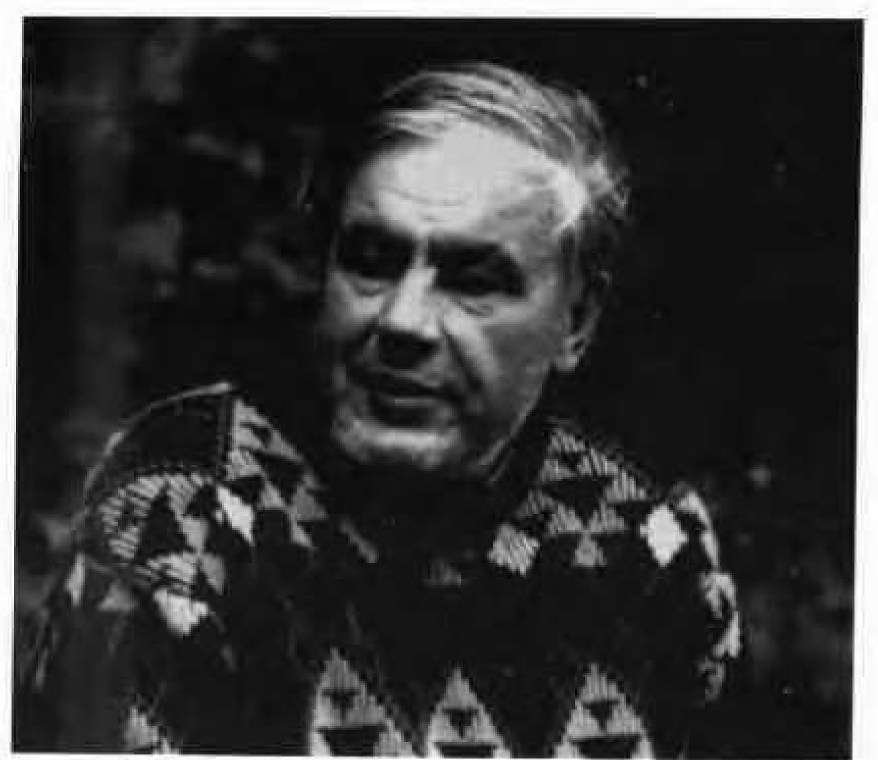
34　在维尔科尔·阿尔汗格尔斯基区的阿尔杰米·布拉维德诺夫小教堂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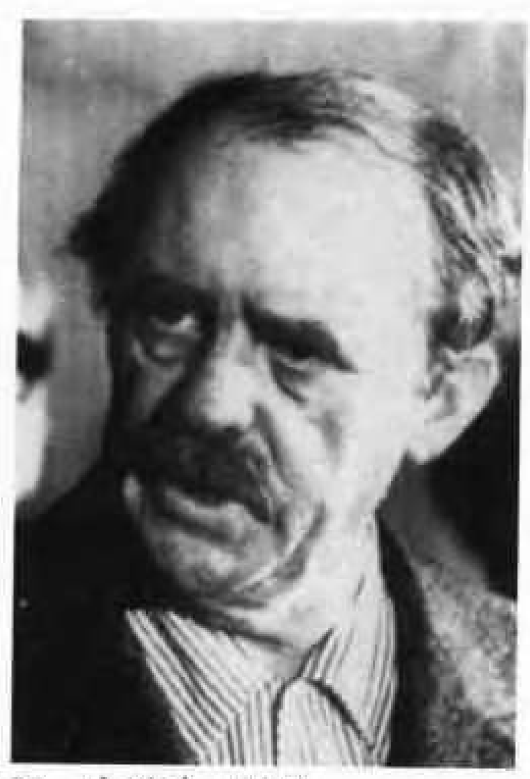
35　在沃洛格达州的火车站。1969年7月。



36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罗日杰斯特沃－纳－依斯奇娅的花园小屋。



37　伊格尔·罗斯基斯拉沃维奇·沙发列维奇



38　亨里希·贝里

39　门斯基斯拉夫·列奥波利多维奇·罗斯特罗博维奇在罗日杰斯特沃-纳-依斯奇娅与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一起。1969年夏。



40　姆·列·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近郊的茹科夫卡的别墅。



41　卡丽娜·鲍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雅与姆斯基斯拉夫·列奥波里多维奇·罗斯特波维奇。



42　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纽芬兰犬在一起。



43　姆·列·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别墅的厢房，在茹科夫卡，亚·伊·索尔仁尼琴从1969年底至1973年春曾住在这里。



44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1971年12月。



45 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上。玛丽雅·伊拉丽奥诺夫娜·特瓦尔多夫斯卡娅、尤里·施杰因、亚·伊·索尔仁尼琴。莫斯科，1971年12月。



46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47　亚·伊·索尔仁尼琴与妻子和儿子伊尔莫莱在一起。





48　叶莲娜·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祖博维在科克－捷列克，1956年。



49　亚·伊·索尔仁尼琴和尼·依·祖博维在梁赞。1958年。



50 阿纳托利·雅可夫列维奇·库克林



51 伊林娜·瓦列里雅诺夫娜·库克林娜



52 与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一起在梁赞。1957年。

5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波杰夫



54　苏姗娜·拉扎列夫娜与维尼阿民·里沃维奇。





55 格奥尔基·巴甫洛维奇·泰诺



56 娜塔丽娅·康斯坦金诺维奇·泰诺



57 阿尔诺尔德·苏奇



58 列姆彼特·阿萨拉



59　阿尔诺尔德·苏奇与女儿赫里。



60　玛尔达·玛尔蒂诺夫娜·波尔特



61　尼娜·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巴赫图索娃



62 伊丽萨维达·杰尼索夫娜·沃洛尼娅斯卡娅



63　娜塔丽雅·米里耶夫娜·阿尼契科娃



64 娜杰日达·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兹卡娅



65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万诺夫



66 瓦连京娜·帕夫洛夫娜·霍洛多娃



67 奥丽佳·亚历山大德罗夫娜·克雷让诺夫斯卡娅



68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克雷让诺夫斯基



69 米拉·格纳契耶夫娜·彼得洛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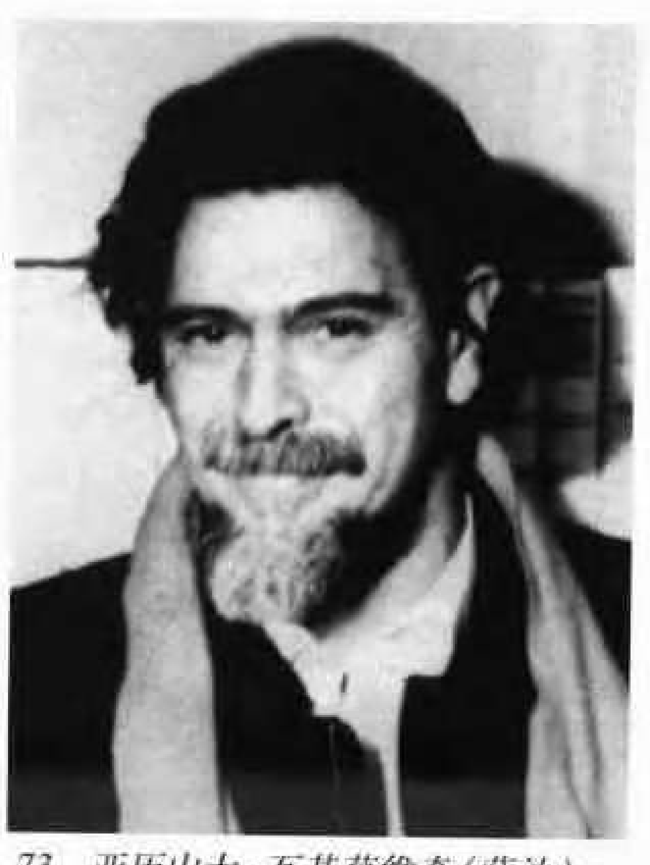
70 叶莲娜·采扎列夫娜（柳沙）·丘科夫斯卡娅



71　娜塔丽雅·伊万诺夫娜·斯托丽雅洛娃，"夏娃"。



72　瓦季姆·维达利耶维奇·阿发娜奇耶夫



73　亚历山大·瓦基莫维奇（萨沙）·安德烈耶夫



74　与娜塔利雅·伊万诺夫娜·斯塔利娅洛娃和阿列克桑德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乌格利莫夫在一起。罗日杰斯特沃－纳－伊斯契耶，1968年。



75　奥利加·维克托洛夫娜和瓦季姆·列奥尼托维奇·安德烈耶夫在佩列杰尔金与科·依·丘科夫斯基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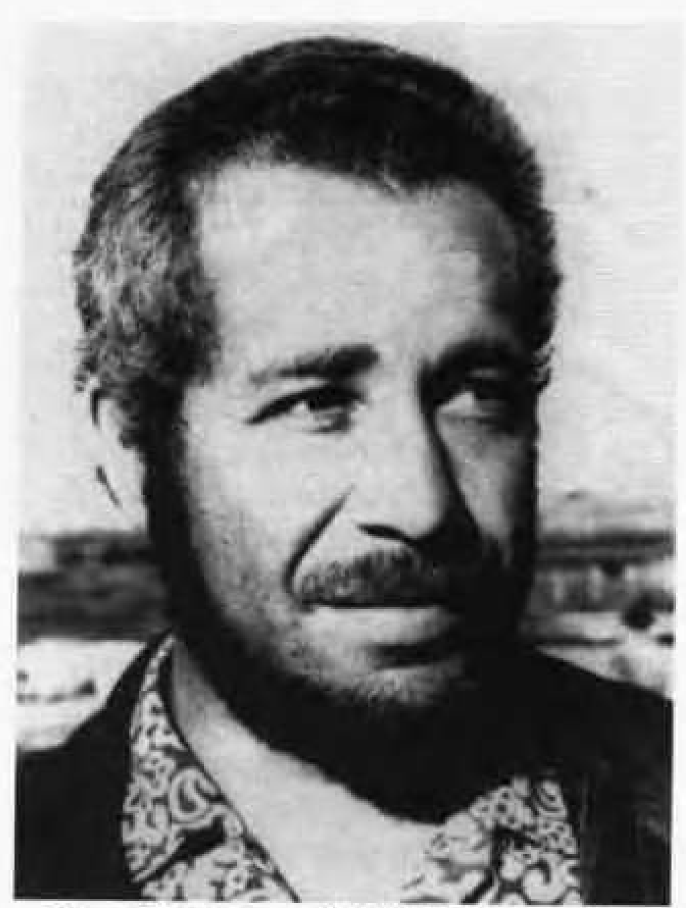


76　埃丽夫丽达·菲丽平



77　“命运的交叉口”，莫斯科斯·尼·塔基谢夫街的外观。

78　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塔基谢夫



79 亚历山大·莫依谢耶维奇·科尔洛夫



80 鲍里斯·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伊万诺夫（克格勃军官）



81 娜塔丽雅·弗拉基米洛夫娜·吉恩特



82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罗扎恩斯基



83　米哈伊尔·康斯坦金诺维奇·帕利瓦诺夫



84　列奥尼德·彼得洛维奇·克雷辛



85　尼古拉·维尼阿米诺维奇·卡韦林



86　因纳·彼得洛夫娜·鲍里索娃



87　在俄罗斯语言学院与拉玛拉·安德烈耶夫娜·卡巴纳泽在一起。1967年11月。



88　尤里·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斯杰发诺夫（“顿河人”）。



89　维利格米娜·格尔玛诺夫娜·斯拉乌兹卡娅



90　达奇雅娜·米哈伊洛夫娜·卡拉谢娃



91　娜塔利娅·叶甫盖尼耶夫娜·拉布吉娜



92　阿拉·谢苗诺夫娜·格列恰尼诺娃



93　安娜·阿列克桑德罗夫娜·萨克扬兹



94　卡林娜·安德烈耶夫娜·格拉瓦茨基赫



95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扎伊翁奇科夫斯基



96　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格尔舒尼



97　加布里埃里·加弗里洛维奇·苏别尔费恩



98　涅奥妮拉·格奥尔基耶夫娜·斯涅萨列娃



99　娜塔利雅·阿列克谢耶夫娜·克鲁奇尼娜



100　在列宁格勒与叶费玛·格里戈利耶维奇·埃克金达和叶卡捷琳娜·费德罗夫娜·兹沃雷金娜在一起。1960年底。



101　伊格尔·尼古拉耶维奇·霍赫鲁什金



102　玛尔卡丽塔·尼古拉耶夫娜·舍夫尔（古采洛娃）。



103　亚历山大·伊里奇·吉恩斯布尔克与儿子萨尼亚。塔鲁萨，1973年。

104　娜塔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丽雅）·索尔仁尼琴娜



105　娜捷日达·瓦西里耶夫娜·布哈林娜和叶尔莫莱、伊格纳特·索尔仁尼琴。莫斯科，1974年。





106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秋林



107　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古尔秋莫夫



108　卡林娜·尼古拉耶夫娜·秋里娜



109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士尔林



110　列奥娜拉·叶菲莫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111　瓦季姆·米哈伊洛维奇·鲍里索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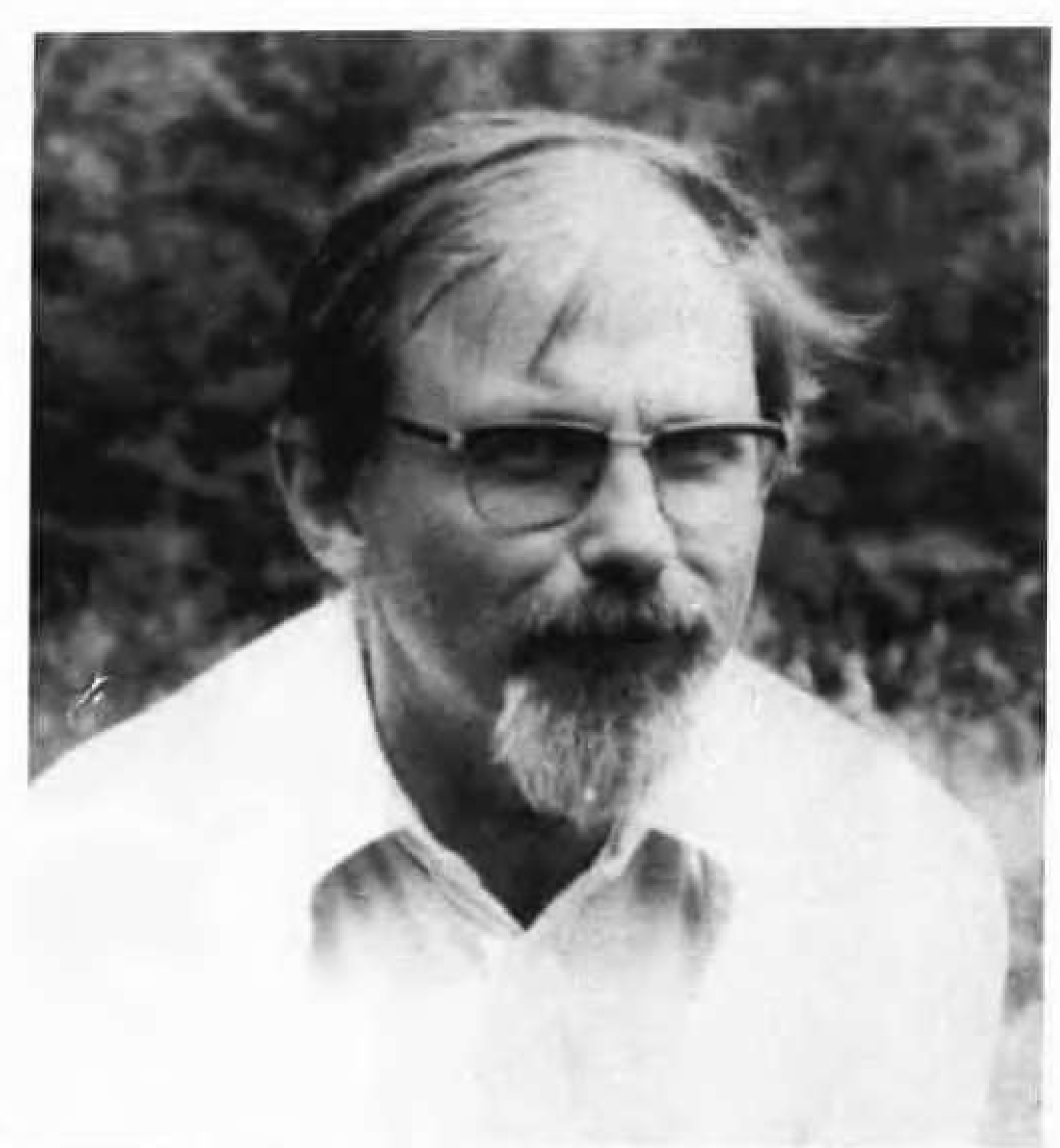


112　叶甫盖尼·维克托洛维奇·巴拉巴诺夫



113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捷姆什金

114　阿纳斯塔西娅·鲍里索夫娜·图洛娃



115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鲁维

116　德－埃尔·弗里兹·赫博



117　埃利扎别特·玛尔克什金



118　娜娅·拉扎列娃



119　尼·阿·斯特鲁维、亚·伊·索尔仁尼琴、赫博太太在丘里赫最初的日子里。1974年2月。



120　斯基格·弗列德里克松与儿子。莫斯科，1972年。



121　尼格里德·弗列德里克松与儿子。莫斯科，1973年。



122　与斯里斯·马尔捷恩·乌德科尔德在什捷尔涅别尔克。1974年夏。



123　弗兰克·克列博



124　斯蒂文·普罗乌尼恩克



125　杰姆斯·鲍依别尔特



126　罗德捷尔·列金格东

127　与尼·依·斯达丽雅洛娃在阿曼



128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维捷娃－达玛舍夫斯卡娅



129　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扎波罗兹卡娅





130 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夏天。与儿子叶尔莫莱在一起。费尔萨诺夫卡，1973年。



131 丘可夫斯基在佩列杰尔金。在这里，应丽·卡·丘科夫斯卡娅的邀请，亚·伊·索尔仁尼琴度过了自己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冬天，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



132　丽基雅·卡尔涅耶夫娜·丘科夫斯卡娅

133　亚·伊·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科金兹基的住所的院子里，1974年2月。

ПРЕЗРЕНИЕ И ГНЕВ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редакцию поступают письма советских людей, выражающих свою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с той оцен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личности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которая дана в статье «Пу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и других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Правды»,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 ПРОЩАЕТСЯ

Трудно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найти более мрачную и более мерзкую фигуру, чем Солженицын.

го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еопровержим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

«Г-н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АМ НАДОЕЛ»

ПОЩЕЧИНЫ АСКВИЛЯНТУ

Ю СТРАНИЦАМ ЗАРУБЕЖНОЙ ПРЕССЫ)

ВОЛЯ НАРОДА СВЕРШИЛАСЬ

КОНЕЦ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ВЛАСОВЦА

134 报刊的迫害，1974年1—2月。



135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别列杰尔金的办公桌。1974年2月11日，他到莫斯科家中探望归来之后，在这里被捕，并被驱逐。

136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故乡读的最后一本书(在别列杰尔金的桌子上)。

斯·普加洛娃摄





137　在科金兹基的房子的大门。亚·伊·索尔仁尼琴被抓进列法尔多夫斯基的监狱。　　列·门利雷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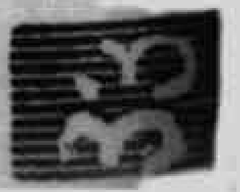
Сообщение ТАСС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з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ршение действий, не совместимых с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ю к гражданству СССР и наносящих ущерб Союзу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лишен гражданства СССР и 13 февраля 1974 года выдворен за предел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Семья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сможет выехать к нему, как только сочт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Б 03739. 50124.
Изд. № 378.—В.



138 塔斯社的消息，1974年2月14日，亚·伊·索尔仁尼琴被驱逐。

牛犊顶橡树——索尔仁尼琴文集

合同登记号：图备字01-1999-140号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1913年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系和莫斯科大学函授部语文系。同年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曾两次立功，不久因在与友人通讯中有不满最高当局的言论被逮捕，并判处8年监禁。1957年平反后住在梁赞市，在中学任物理教员，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长篇小说《癌症楼》《第一圈》《红轮》，长篇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自传《牛犊顶橡树》等。1970年10月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不满前苏联当局而被捕，并被逐出境。先到瑞士，后移居美国。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目　　录

一点说明

存在着一种派生文学，其数量不小。这是讨论文学的文学、围绕文学的文学、产生文学的文学（如果没有一种文学在先，也不会派生出另一种文学于后）。我因职业关系很喜欢阅读些这类文学作品，但是认为派生文学大大低于本体文学，而且这种文学作品洋洋洒洒、人们也难得有暇阅读，所以觉得：写起了回忆录，而且还是文学回忆录，不难为情吗？

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在4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拼凑这部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两个情况纠合到一起，促使我这样做。

第一，我们无情而怯懦的保密性，这是我们国家一切灾难之源。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这种保密性还将持续多久，殊难预料，或许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过早地死于斧下，未来得及讲出的话也就付之东流了。

第二个情况是：“绞索套在我的颈上已有两年，但还没有

拉紧。这个春日我想用生命作一次小小的冒险。是挣断绞索,还是被缢致死,也是难以预见的。

我正被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一块已经推开,在另一块巨石面前我感到卑怯,我争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

我于是想到也许到了诉说一些什么的时刻了,为的是预防不测。

1967 年 4 月

地下作家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如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生活条件非常优越的作家良心受到谴责，内心也十分痛苦。

说来说去，转入地下，不担心世人了解你，或者相反，希望老天爷知道你，这是我们祖国作家的造化，是纯俄国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造化！现已查明，拉季谢夫在死前不久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藏得无比之深，以致于今天还未能发现，无从了解。普希金曾经巧妙地用隐语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少有人了解恰达耶夫长时间地采用密写方法创作。他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己家大图书室的各种不同的书

页里。当然，对于卢布扬卡的搜查者这样并无效果，不论有多少书，检查人员总能从头到尾翻个遍，全都给你查出来(朋友们，不要往书里藏东西!)。然而沙皇的宪兵们竟没有发觉。恰达耶夫死去了，他的图书馆保存到革命时没有人动过，分散在各书页里不为人知的手稿一直在其中。20年代时手稿被发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终于在30年代由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准备出版。然而就在这时沙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从此再没有回来)。恰达耶夫的手稿直至今日仍然秘密地存放在普希金之家(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里：不准出版这些手稿，因为……其中有反动成分!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家作品被扼杀的记录——他逝世已经110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写了就写了，到此为止!

后来变得自由多了：俄国作家不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桌子里，只要愿意全都可以出版(只是批评家和政论家还需要选用些伊索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得以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革命之路，进行了革命。

然而，当文学跨过它自己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文学走进的并不是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天棚斜竖的小阁楼，四壁萧然，狭窄异常。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又经过大约10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作家们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还没有完全丧失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希望。

被捕之前我对此中许多奥妙全然不了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并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

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新鲜的题材而黯然神伤。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的监狱集中营生活，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使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出版著作，我今生今世也不敢想像，决不存此奢望。

于是，我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开始写诗、后来写剧本，最后又写散文作品。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了我自己。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有几万行之多。为此我想像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劳改期届满时，我相信记忆的力量，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后来竟能写下并记住整个一篇散文。记忆力还真不坏！进展顺利。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的东西重复一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

这时，开始流放，而且在流放之初又发现我得了癌症。1953年的秋天，好像我是在和生命最后诀别，活不上几个月了。12月间，医生们(也是被流放的伙伴)证实我最多还能活三个星期。

我的生命，连同我在劳改营中记诵的一切全都面临毁灭的危险。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临近解放时瘐死狱中和我写作的一切(这是我在此之前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功败垂成。我深知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特点，我不能向外间的任何人呼救：快来吧，拿走吧，快来拯救我的著作！而且根本不能求助于外人。朋友们，他们都是劳改营里的犯人。母亲已经谢世。妻子又嫁了别人。我终于还是邀请她来同我再见最后一面，也许她能把手稿顺便带走。但是，她并没有来。

在医生们许给我的这最后几个礼拜，我仍不能逃避不到学校工作，可是我连续许多个夜晚，在由于疼痛而彻夜不得安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我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1954年新年前夕，我去塔什干，准备在那里升天。

但是，我并没有死。(我得的是严重的恶性肿瘤，耽误了诊治，根本没有希望。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这一年春天，久病初愈，由于大难不死我如醉如痴(也许我只能再活二三年)，兴奋之中写完了《劳动共和国》。这部作品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记诵下来了。这是我领略到幸福的第一本书：我不再需要刚刚背会一段就把

它们烧掉;写到结尾时还可以参照没有毁掉的开头;可以通读全剧;可以誊清、修改、并且再抄好。

但是,销毁旧的草稿,又怎样保存最后的定稿呢?别人的侥幸的思想和别人的侥幸的帮助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应当掌握新的手艺,以使所有的手稿(包括写好的和正在写的)既不让偶然来造访的窃贼偷去,也能逃过流放地里泛泛的搜查。学校里我每周有 30 节课,还担任班主任,自己一个人做饭照料家务事(由于需要保守住写作的秘密,我不能够结婚)。已经够忙的了,地下的写作也还嫌不够,我还需要学会新的手艺——把写好的作品藏起来。

学了一种营生接着还要学另一种:自己把手稿拍成缩微胶片(没有灯光照明,只能在太阳不被云遮的条件下)。然后把缩微胶片藏进书籍封皮里,写好两个信封:美国、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托尔斯塔娅农场收。在西方我不认识什么人,连一个出版家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托尔斯泰之女不会不帮助我。

孩提时读战争故事或者地下工作者的勋绩,常常惊异不止:人们义无反顾的勇气来自何方呢?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经受住这样的磨难。30 年代读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时,我就曾经这样思考过,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确信,一切都简单得多,渐渐就会习惯,作品中描写的要比实际上可怕。

如果是冒冒失失地转入地下,红灯下,黑面罩,指天誓日,立下血书,这可能是很可怕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早已被家庭生活方式抛掷在一旁,没有基础(同时也已经没有愿望)再建立外部生活,只过着一种内在的生活,他找到一个又一个门

径，东躲而又西藏，结识一个人，又通过这个人去结交另外一个，信中或见面时使用暗语，有时又以代号相称，还有几个人的联络网，于是乎有朝一日早晨一觉醒来时便会说：天哪，我早就是地下工作者了！

当然，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仅仅是为了文学艺术而隐入地下，这是可悲的。

流年似水，我已经被解除流放，获得了自由，迁居俄罗斯中部，结了婚，恢复了名誉，过着相安无事而又卑微屈从的生活，但是对于我已经非常习惯，就如同是习惯了表面的学校生活的地下文学的背面生活一样。任何一个问题：为哪一个编辑部赶写的作品？大约在什么时候写完？印刷多少册？要印多大开本？使用什么机器？印好的书以后放到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像一个从容呼吸的作家那样来解决的——他们只求印完书，欣赏一番，随即走开了；还是地下工作者的那种永远紧张不安的盘算：这些书怎样保存？保存在哪里，用什么工具转运？写好和印好的东西逐渐增加，体积越来越大，应当想办法找些新的储存地点呢！

物品的体积确实最要紧，不是指创作手稿有多大，而是有多少立方厘米。一系列的因素帮助我摆脱了困境：视力还没有损坏，生就的一手小字（能写得如同葱籽一般），很薄很薄的纸（如果能从莫斯科弄来的话），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都消灭（我总是只作一件事：付之一炬），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是正反面全都写满，重写之后原来的清稿也要焚毁：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按照这样的程序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一圈》、剧本《坦克

了解真情》，这里还不包括早期的一些作品。[1]

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当然都是因为事怕万一，然而上帝保护小心人。安全委员会的人无缘无故就来造访我家的情况绝无仅有而且不可思议，虽然我是一个劳改营分子，可是劳改营分子又何止万千呢！[2]而现在还是一句谚语在起作用：

“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

我必须在生活中采取一切办法使自己更安全些。我不久前迁居梁赞，在这里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家里既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不出去做客，因为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年年月月，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没有一点儿闲暇时间。不能让隐藏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妻子严格地信守这项制度，我对此评价很高。工作中身处同事中间从来不表现出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是总装作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告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些事情、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从来不允许自己作出这样的事，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

---

① 把剧本的原稿烧掉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泪，它是用特殊方法写成的，但是在一个恐怖的夜晚我不得不把它投入火中。梁赞市的住所是靠火炉取暖的，这就方便多了，如果是暖气住房，要把书稿付之一炬就会忙乱得不可开交。

——作者原注

②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前来造访，处在当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等待我的起码是死亡。读者如果有机会读到我的《第一圈》原稿的全文(96章)肯定会确信这一点。

——作者原注

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永远心安理得。

俗话说：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身处逆境才能够穷面后工。

这是非常不易的！似乎流放并未结束，劳改营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的胸前还是挂着那样的号码，头不能抬，腰不能伸，每个戴肩章的人在我的面前都是首长。满腔怒火都只能在下一本书里发泄出来，实际上这样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诗歌的法则是：不可任自己的愤怒爆发，从永恒的角度领会理解现实。

但是对这一切我都平静地对待：我的工作仍然很好，很卖力气，甚至在没有闲暇时间，得不到真正安宁的时刻也是如此。那些生活有保障、闲适的名作家在广播里唠叨，说应当怎样在工作日一开始时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如何重要，使自己处于和谐的环境之中更是事关大局，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大惑不解。面我早在劳改营里就已学会了在押解队伍行进途中吟诗写作品；在酷寒的草原、在铸造车间、在吱吱作响的小木棚里我都能写作。如士兵只要往地上一蹲就可以打瞌睡，如一条狗在苦寒时节以自己的一身皮毛代替火炉一样，我已经学会了自然适应环境到处都会写作。虽然获得自由（压缩和舒缓人的心灵的法则！）之后，现在我变得有些好挑剔了——收音机、谈话妨碍我——即使是这样，甚至在直接冲向我梁赞住宅窗户的卡车发出来的经久不断的吼声中，我还是在写一部电影剧本时，掌握了我完全不知晓的手法。只需要有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上帝用创作上的危机、悲观失望和功败垂成的冲击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

在从事地下写作的这些年代，包括生病前5年的劳改营生活，包括流放和自由的7年，出人意料的病愈之后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时日，我的情绪非常平稳，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愉悦和洋洋得意的情感。现在大肆鼓噪的文学，它的10余种厚厚的杂志，两份文学报纸，它的无数的选集，还有单行本的长篇小说，还有作品全集，一年一度的种种奖金和对那些无聊透顶的作品的改编演出，统统都被我一概认为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所以我并不为此浪费时光。我也不为注意它们的存在而恼火：我早已知道其中不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那里不可能诞生天才——可能他们只是生在那里，而后又死在那里。因为他们播种的土地不适宜，我知道这样的土壤不会收获任何成果。他们刚一步入文坛，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小说家、热情奔放的剧作家、社会诗人，更不必说政治家和批评家了)就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绝口不谈主要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了。这种回避真理的誓言就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爱情诗人，甚至抒情诗人，那些为了安全堕入大自然或者优美的风流浪漫故事中去的人，他们也因没有勇气触及主要的真理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我熬过地下写作的那些岁月，还是因为我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而这个主要的真理并不只是由牢狱、枪决、劳改营和流放构成的，尽管如果完全不谈这些也不会道出这主要的真理来。我们有几十位这样的人，全都不能

轻松地呼吸,但是时辰不到我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彼此敞开心扉。那一天终会来到,我们会像神话中的33位勇士那样从海底走出,而我们伟大的文学将会兴衰断绝,这种文学是我们在伟大的转折时(也许还要早些)送入海底的。

第三个信念是:不论我们这些身披甲胄的武士将来怎样从海中出现,这只不过是死后的一种象征而已。这只是靠朋友们的披肝沥胆和随机应变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我们写的书籍,而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在此之前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我至今仍不相信文学会引起和开始社会震动(虽然,不正是俄国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我曾以为社会的震荡甚至更新来自于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出现了缝隙、自由的缺口,我们的地下文学马上乘虚而入——向迷惘和慌遽的人们说明:这一切为什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1917年起又是怎样顺延发展下来的。

岁月流逝,我开始倾向于认为,上述三个信念全都错了。

文学的土壤并不那样瘠薄。不论怎样烧毁给生物提供营养和水份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总还是成长起来。难道可以不承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有现实意义吗?怎么可以不承认舒克申、莫扎耶夫、田德里亚科夫、别洛夫以及索洛乌欣的名字是活生生的呢?如果卡扎科夫不回避主要的真理,他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写出更好作品的作家吧?我不可能历数所有人的名字,这是容纳不下的。要知道还是大有人在——有一些勇敢的年轻诗人……

我的第二个预见也错了,而且是错得很不幸:那些机敏的、坚贞的、幸福的人原来少得可怜。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文学,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超乎我的预

料。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是超凡人圣的天才被揉进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或许是他们比我们更顽强更机敏？——到今天仍然是在无声地写作，不露头角，他们了解自由的时刻还不可能来到？我想也许可能。因为要是在一年前也会有人在作品里这样提到我——他们就是会不相信吗？）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早春开始时就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相信了20大，当时就经由最早的地下印刷的小径发表了自己的诗作。1956年夏天我读了这些作品，激动得浑身战栗：这是个天才，是我了解的那些秘密写作的兄弟中的一员，我当时一点儿都不怀疑这一点。只要可能联系上，我一定会马上向他披肝沥胆，可是我比他还不轻易相信人，而且当时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出来，健康和年龄要求我忍耐，于是我缄默了，继续写作。

我的第三个信念也错了：相当早地，还在我们在人世的时候就开始了使我们从浑浊深渊里迈出上岸的第一步。我也活到了这一天，享受到了这种幸福——伸出头，把最初的几块石头掷向歌利亚扁平的额头。前额没有打破，石块纷纷蹦了回来，落到地上，长出了可以开启魔宝箱的仙草，人们或是欢呼雀跃，或是恨之人骨，没有谁处之泰然。

接下去，与预料相反，一切变得如蜗行牛步，像是寒意料峭的漫长的春天。历史变成了绞索，绞索甩了起来，将要套住并且缢死更多的人。一切都是在强人所难（这是早应当料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怎样使出最后的气力把最后的几块石头掷向这打不穿的额头。

是的，是的，当然没有人不知道用一根绢柳条儿是刺不穿

混凝土的塔楼墙的。有这样的猜想：也许这些墙壁只是画在粗席上的呢？

整整12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13年时才战栗了。这是在1960年的夏天。由于我写的许多东西完全没有出路，完全无人知晓，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在文学的地下状态我觉得空气太少了。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像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是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自己仅有少数的读者(我大约有十来个这样的读者，主要是过去的劳改营分子，即使是这些人也没有能够读到我的所有作品——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任何人都没有闲暇的时间、绰绰有余的路费和可以待客的多余住室)。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它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人微的艺术审美能力。这样地下作家就得不到熟知现代文学标准的严格的艺术批评。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需要的，每个作家都需要，即使是5年才一次，10年才轮到一次也好。还是普希金的忠告说得好：“求全责备的艺术家，你满意他吗？”忠告虽很切实，但并不完美。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写上10年、12年，会不知不觉地随心所欲，开始原谅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有时长篇大论空空洞洞而且过于尖酸；有时激昂慷慨声嘶力竭却又故弄玄虚；有

时候又由于搜尽枯肠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段使作品充满斧凿痕迹，竟用些粗俗的传统手法硬粘合到一起。

后来，我走出地下并且为外间的需要缓和了自己作品的格调，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同胞们最初还无论如何难以接受这些作品；这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减弱激烈程度之后作品更加博得好评甚至还强化了效果；有些过去没有发现的地方也发现了：我怎么这样放纵自己——应当砌一块完整的耐火砖的地方我竟放上了一块有裂缝的容易碎的砖。从一开始接触职业文学界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还应当奋进。

由于我非常浅陋和愚钝，在剧本创作方面我可谓完全砸了锅。先是在劳改营，后是在流放地，我写剧本的时候所想像的只是30年代我在省城罗斯托夫看过的剧院演出的情景，这种演出在当时已经远远赶不上世界的戏剧水平了。我确信创作中主要之点是真实和生活经验，我没有充分估计到形式已经老化，20世纪的鉴赏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作者是不应当对此予以轻视的。现在，浏览一下60年代的莫斯科剧院里的演出，我后悔我写了剧本[①]（天哪，剧院已不再是演员的剧院，甚至不是戏剧家的剧院，剧院成了演出惟一的创作者导演的剧院了）。

在60年代，我不能准确地说出和解释这一切现象，但是我感觉到了自己在发生僵化，我写好的那些不少的东西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想要绷紧身体活动活动。可是由于不能活

---

① 我以为沙拉莫夫的散文不足之处也恰是由于他多年闭塞的缘故。这些散文本来可以写得更完美——仍是那些材料，作家也仍是原来的观点。

——作者原注

动,甚至一点儿也动弹不得,我于是感到沮丧:我们有一切经过深思熟虑而编织成的文学构想,那些无声又无形的东西都陷入了绝境。

托尔斯泰在逝世前写道,作家在世的时候出版作品总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应当是写而后用,死后由人出版。这里姑且不谈托尔斯泰是在经过贪欲和罪恶的过程之后才产生高尚的思想的。即使对于慢吞吞的时代他也是错了,更不必说对我们这个飞速前进的时代了。贪求公众再度捧场会破坏作家的创作,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是正确的。可是最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有读者,苛求的、敌对的以及喝彩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用自己的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影响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的。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但同时也带来无为。托尔斯泰的见解未免失之偏颇。

在此之前只是令我发笑的现代文学出版物,现在又引得我大动肝火。正好是发表了爱伦堡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回忆录,我于是给编辑部寄去了措词尖刻的批评文章,当然是没有人会接受的,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从形式上看我的论文似乎是一概反对回忆录作品,实际上我是感到气愤:这些目睹过巨大阴暗年代的作家仍然想要一溜而过,不告诉我们主要之点。而只是说些鸡零狗碎,想要用舒缓的油膏粘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今后也不能够看到真理。他们,这些有地位的作家,不受威胁的作家,干吗这样胆小怕事?

这一年秋天,幽居在自己狭小阴暗的住所里,身心交瘁,我忽然想到:我能不能写一点东西,即使不能出版,能不能给人们演出呢?只要不再藏就行!于是我构思写《你心中的光明》,这是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材料没有民族性;讲的是近

10年内的一个安定的社会，说是东方社会也行，西方社会也无不可。

这个戏，是我创作中最不成功的一部作品，写得也最费劲。准确些说，我是第一次了解到重写了四五遍仍然不成样子，花了那么多时间，有那么多困难，很多场景删掉了，换了别的场面，还是不行，情节不自然。为了这个戏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以为写完了，实际上没有写完，不成样子。可是我是以莫斯科的一个家庭的真实故事作为剧本的基础的，没有任何一处昧良心，我写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真诚的，最讨人喜欢的，从第一幕起就拒绝满足书刊检查官们的愿望，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提到俄国的具体现实吗？(根本不是为了伪装，也不只是为了其他的“开放性”，而是为了表现更多的共性：写有温饱的西方世界比写我们更真实些)，离开了俄罗斯土壤我好像连俄语都应当不用了吧？可是别人可以随便用这种不指名的方法来写，他们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不行呢？就是说抽象的形式也和具体的形式一样，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不能抽象地迈出一步半，而其余的部分再具体地写。(当然，主要的失败显然是由于妇女形象之不可捉摸)。

1961年我又做了另外一次尝试，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产生不出任何腹稿，于是就随便地拿出了《854号劳改犯》，打印的时候做了一些缓和处理，删去了一些最激烈的地方和议论。我打印完了，就放下了，就大大方方地放到那里，不再到处藏。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被解放的状态——再不用煞费苦心地去想该把未完成的作品藏到哪里，而是就放在桌子里，这是许多作家没有好好珍惜的幸福。以前，不检

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停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叩门我该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

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这比写作本身还让我伤脑筋。可是不论从哪一方面都难以预见到会有什么轻松，我总在听西方广播（即使是在干扰时），它们也不知道地下深处会有地理学上的平移断层和裂缝，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在地表引起轰隆隆的回响。人们对一切全然无知，我不等待任何令人愉快的消息，开始重新加工和重新打字《第一圈》。毫无特色的21次代表大会开过了，它煞费苦心地用无言放弃了20次党代表大会光荣的创举，在21大之后再也不可能预见赫鲁晓夫说要在22大还要进行的对斯大林的猛烈激昂和突然的冲锋。我们这些消息闭塞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的!

但是,这次冲锋发生了,不是如20大那样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的进攻! 像22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样有趣的东西我已经许久没有读到了。我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读这些发言,在一所已经腐朽了的木屋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里藏着我多年来的全部手稿,一根不慎的火柴可以使它们全都毁掉。我读着,觉得我这内心世界的墙壁在摇动,如同是剧场后台的帷幕一样,动荡在加剧,我也晃动起来,心情激动不已:是不是梦寐以求的令人兴奋得可怕的时刻已经降临? 是不是已经到了我应当把头伸出水面的瞬间?

可不能出差错! 不能在时机不成熟时就翘首星空。可是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缘也不行!

在22次党代表大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发言中的调子包含有:早就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印

行一些作品，而“我们竟没有去做”；他还提到了《新世界》杂志上根本就没有刊载过比较大胆和比较尖锐的东西，它是可以刊载的。

我曾经把《春草国》时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同那些为谎言的香炉效劳的诗人都看作一路货色。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个别诗作，在流放中我浏览过1954年出版的他的两卷本，没有发现好作品。但是在前线时起，我发觉他写的《瓦西里·焦尔金》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它产生在有关战争的最早的一批真实的作品出世之前很久，在伴随着我们的射击声和炮击声中一片狂热的宣传鼓噪声中（从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这部中篇小说算起，好的作品寥寥可数，可能只有半打之多吧）。特瓦尔多夫斯基写出了超越时代的、气势恢宏的没有污染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有一种罕见的个人分寸感，也可能是一种一般性的农民的那种儒雅持重（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奇迹也恰是由此而产生。我这不是只讲自己的感受，战争中我细心地观察过自己炮兵连的战士们。根据我们的电讯服务条件，他们甚至在战时也有很多时间听作品朗诵节目（许多夜晚，他们聚在声测哨的扩音器旁，中央台在朗诵作品）。在提供给他们的许多作品当中他们最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和《瓦西里·焦尔金》。

后来是进劳改营、流放、教书，从事地下写作，不得空闲，我没有机会读《路旁人家》和他的其它作品（只有《焦尔金游地

府》我是在1956年阅读了手抄本，我始终偏爱和注意地下出版物）。我甚至不知道在《真理报》发表了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章，也不知道这一年该诗作获得了列宁奖金。全诗我很晚才读到，《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新世界》杂志上读的。

在当时，人人都还余悸未消，这首诗很大胆：写到了达丽娅大娘夜间的劳作，“万岁，他还会是正确的！”甚至像这样的诗句：“高高的莫斯科耸立着，像是一组奇怪的布景。”就是这时我第一次有过一闪念：我是不是应当把写的东西拿去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一看呢？该不该立即决定呢？

可是，就在一边翻阅一边思考这一章的时候，我也在诗行中遇到了以下一些词句：什么“严厉的父亲”，他那与不公正相伴为邻的所谓“公正”，“取得了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他，以及斯大林和战斗的钢铁属于同源的说法……

“……在我们金色的书里
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个逗号……
不是为护卫住我们的荣誉。
是的，我们已发生过的一切，
就让它们通通过去！”

这太软弱了：劳改营40年的耻辱，难道没有压倒我们的荣誉吗？这太含混了：“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们通通过去，”“这里去不掉也增加不了什么”——对所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这样说。这样似乎纽伦堡的审判也是不必要的了？……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们通通过去？这种宏论

苍白无力，不能拉来评说历史，[1]诗人的脚已经触及到了旁边铺砌的小径，但是他害怕走这条路。

我不了解：如同费劲地从泥塘里钻出来，伸出手对他说：来吧！他是走过来，还是执拗着不肯。

而且，对于《新世界》我的评价也不高：根据它主要篇幅上刊载的作品，对于我来说它和其它杂志没有多大区别。各杂志之间的对比对于我毫无意义，从长远历史观点衡量尤其没有意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些所有的杂志主要的术语一样，连它们的誓言和咒语也完全都一模一样——这一切一切我连一小口都咽不下去。

冲到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地下岩层的轰鸣总还是有些意义吧？……我作出了决定。在这里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和思想，"缓和"了的"854号劳改犯"起到了作用。我决定把它投给《新世界》杂志（不发生这件事，也一定会发生别的更糟的事情。已经整整一年了，困难的处境使我厌恶，迫使我寻找了一个突破口）。

我自己没有去《新世界》编辑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我是决意不会登门的。我已经43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在逆境中挣扎得好苦，我不能以一个初学写作的小孩子的身份到

---

① 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在《有关安娜·阿赫马托娃的笔记》里回忆说，5年前她曾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写的《童年之友》大加挞伐，说这是"用新的谎言代替用旧了的谎言。"

"国家？这和国家有何干？

人民吗？干吗提到人民！"

"和我使用同一张入场券，

像平等的客人到过克里姆林宫"

是的，对于1956年来说这是撒谎最方便的阶梯。——作者原注

编辑部去。我同监的一个难友列夫·科佩列夫自告奋勇替我去送手稿。尽管有 24 万个印刷符号之多,手稿却很薄:我是两面书写,没留边,每行的行距很小。

我的稿子送出去之后,我激动不安难以自持,不是一个贪图功名的年轻作者,而是一个不慎留下痕迹的老囚徒,被咬得浑身是伤的老囚徒。

这是 1961 年 11 月初的事情。我以前从未有幸登过莫斯科的旅馆的大门,这一次因为节日前旅客稀少,我才得到了一个铺位。在这里我又度过了最后犹豫不决的时光——还可以就此煞住,打道回府(我之所以在旅馆住了下来,不是为了再动摇下去,而是要抽空读完三天之前拿到手的秘密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此前我根本没有读过海明威的任何作品)。

旅馆在奥斯坦基诺,和特殊犯人收容所相邻,我的《第一圈》中描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我领略到劳改营的最初经验,开始认真从事写作也是在这里。读了一段海明威,作为一种休憩我又在自己住过的收容所围墙旁漫步。收容所面目依旧,还是那样的范围,还是围出来的那不大的地盘,这里曾经收容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这里我们的种种争论和设想泛起过。

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 10 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椴树,有 3 年的时间朝朝暮暮,每天每日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辉的自由——在另一种光明的年代,在天色大亮的国度。

而今,在这阴暗而又朦胧的日子里,踏着 11 月湿漉漉的泥水,我走在围墙另一侧的小径上,这里过去只有一班班的哨兵从这个瞭望台走向另一个瞭望台。我在想:我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我这不是又落到他们手里了吗?

没有人强迫我，可是我怎么能自己把自己供了出来呢？……

初露峥嵘

此后的整整一个月，在梁赞市我的日子过得很不踏实：现在我的命运之神一定在某个地方游荡，谁也看不见它，于是我更加确信：事情越来越糟。多年生活在劳改营中，我已经不习惯自己独立作出任何决定（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你都要托付命运摆布）。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什么也不决定、什么措施也不采取，那是最安全的：既然已经活了下来，那就好好地活下去吧。

可是我破坏了劳改营的这个法则，现在感到不寒而栗。我有了新的工作，这工作就在家里做。我和《新世界》打交道这件事情更加让我觉得是毁灭性的轻率行为。

虽然22大鼓噪一时，可是还不能相信已经到了可以讲出真理的时刻，真的，不能相信。我们的头脑、心灵和舌头已经不再灵活！我们已经俯首帖耳，永远不再说真话，也不再听真话。

没有料到12月初，科佩列夫打来了电报："亚历山大·特利丰诺维奇对论文倍加赞赏。"（"论文"是我们商量好的暗语，指的是我的作品，也可能是数学教学法的论文呢）。这份电报

的到来有如飞鸟扑打我的玻璃窗。多年的心神恬然的状态结束了。第二天(正是我生日的那一天)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发来了电报——召我去编辑部。第三天早晨我已动身赴莫斯科。横穿斯特拉斯广场去《新世界》编辑部时,我出于一种迷信故意在普希金纪念像前停留片刻——一部分是祈求支持,一部分是暗下保证:我认定了自己的道路,决不会走错。结果像是在做祷告。

我和科佩列夫踏着《新世界》编辑部宽阔而豪华的楼梯上了楼——在电影里曾以这个楼梯为背景拍摄舞会的场面。已经中午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没有来上班,而且编辑部也是刚刚开始准备工作,他们上班确实太迟了。我们到散文部作了自我介绍。散文部的编辑安娜·萨莫依洛夫娜·贝尔泽尔在把我的作品呈送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件事情上起了主要作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不是在那一年讲给我听的)我的那份珍藏了许久的原稿整整有一个星期放在贝尔泽尔的办公桌上,无遮无盖,甚至没有装进文件夹里,任何一个告密者或窃贼都可以顺手牵走——没有人告知安娜·萨莫依洛夫娜这份手稿的特殊之处。有一天她着手整理写字台,读了几句后她发现:手稿不能就这样放着,而且这里也不是读这样稿件的合适地点。她把稿子带到家中,晚间读完了它后很受感动,她又把稿子给自己的女友卡列丽娅·奥泽洛娃读,后者是评论部的编辑,看看有什么反应。她们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相同。安娜·萨莫依洛夫娜非常了解《新世界》的内部情况,她断定编委会的任何一个成员,为了和自己理解的杂志平安无事这种思想相一致,一定会截住这份手稿,压制它,把它一口吞掉,坚决不让这个手稿落到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就是说,应当使

出些谋略绕过所有这些人士把手稿掷出去,掷过卑怯和畏惧的泥塘,直接让它落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手里。可是要注意,最好不要因为这份手稿篇幅又小、又粘在一起的其貌不扬的样子引起他的厌恶感。安娜·萨莫依洛夫娜要求编辑部打印几份。这需要一些时间。更多的时间是等待,等待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狂饮发作后返回(这是不幸的狂饮症,后来我逐渐理解了,也许是拯救性的狂饮症)。然而主要的困难是如何绕过编辑部的成员,直接到达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那里,主编本人很少接见安娜,而且不喜欢她,这是不公正的(也许是不欣赏她的艺术审美能力、热爱劳动的态度和献身杂志利益的精神;也许是妒忌作者们都能和她相处得很融洽,而且常常挤坐在散文部)。由于她非常了解自己所有头头们的主要特点和弱点。她首先找到了散文部主任格拉西莫夫,问道:"有个写劳改营的东西。你要读读吗?"事事如意也写过不少散文作品的格拉西莫夫摆了摆手说:"可别拿这些劳改营来愚弄我了。"同样的问题又提给了第二副主编康德拉托维奇,这是个身材矮小的人,耳朵总是警觉地竖着,鼻子嗅来嗅去,完全是被书刊检查官吓得神经质的样子。康德拉托维奇回答说,有关劳改营的事情他完全都知道,不再需要了解什么,而且根本不可能出版这样的作品。于是贝尔泽尔又把手稿摆到责任书记扎克斯面前,而且诡谲地问道:"请看看吧,您要不要读一读这样的东西?"问得真是不能再圆滑了!扎克斯是个冷冰冰的乏味透顶的绅士,他对文学艺术根本无所追求,只求文学艺术不要断送他的前程,让他能平稳地生活到死,不影响他的工资,不影响他参加莫斯科冬季的高级音乐会。他读了我的小说的第一段,一声不响地把稿子放到那里,走开了。

那么现在贝尔泽尔就有了充分的权利去找特瓦尔多夫斯基了——要知道，别人都拒绝过目。她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当然，不是单独与主编会见，康德拉托维奇也在场。她对主编说，有两部特别的手稿，需要马上审读：一本是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索菲娅·彼得洛夫娜》，还有一本是"一个乡下人眼中的劳改营，很有一点民间意味"。这里要说，有这样三言两语，很难打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他马上就说：把这份手稿给我吧！[①]这时候康德拉托维奇忽然大梦初醒，跳过来说："今天先让我读一读，明天我把它还回来！"他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给主编当保险过滤器的机会呢！

康德拉托维奇拿走了稿子，读了几行他就发现，这篇劳改营题材小说的作者是个无名之辈，而且只是粗通文墨(我没有署上自己的姓氏，想以此缓解事件进程具有的敌对性质)，甚至不会正确地安排句子的基本成分，而且笔迹也是怪模怪样的。他不得不用铅笔勾掉了第1、2、5、8页，把主语、谓语和限定词配置到适当的地方。但是作品从头到尾都不通顺，所以康德拉托维奇不知从哪一页起放弃了这项营生。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意见，无从查考，我想大概是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好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自己拿走了稿子。

当我后来了解到编辑部的内情，我才确信，如果不是贝尔泽尔过关斩将直接找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且用这是一个乡

---

① 可是《索菲娅·彼得洛夫娜》又不得不等待许多年，等到完稿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和国外出版前。在我们这里很好理解，而在西方完全不能理解：同一个杂志为什么不敢发表第二部监狱题材的作品。这样做不是可以形成系列吗？……

——作者原注

下人的看法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伊万·杰尼索维奇是难见天日的。总编辑的三个保镖——杰缅季耶夫、扎克斯和康德拉托维奇会把我的杰尼索维奇活活给消灭掉的。

我不敢说这是精心安排的计划,我只是有一个可靠的预感:身居高位的乡下人亚力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最高当局的乡下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于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个乡下人不会无动于衷。预感得到了应验:甚至不是诗歌、甚至不是政治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命运,而是一种真正的乡下人精神,是伟大的转折以来或更早一些时候起,我们这里就有的被人嘲笑、践踏和责骂的乡下人精神。

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讲过,晚间他躺到了床上顺手拿起了这份手稿。可是读过两三页之后他就认定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能躺在床上阅读的。他起了身,穿上了衣服。家人都已经睡了,而他整夜不合眼读着我的作品,不时地去厨房喝一点茶。读了一遍,又重读第二遍(我后来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读过第二遍,而且一般地说一部作品他从来不读两遍,甚至是在作者作了让步之后,有时候他因此而出了差错)。就这样过了一夜,按照种田人的说法已经是早晨了,而对于作家们来说却还是难明的黑夜,还需要稍加等待。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再去睡觉。他打电话给康德拉托维奇,吩咐向贝尔泽尔了解(为什么不直接打给她呢?职务不对等)作者是谁?住在哪里?就这样找到了科佩列夫的线索,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又给他打了电话。他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这不是某位名家的假托之作(而且他确信这一点),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莫斯科人。

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了发现新人的幸福时光。他拿着小

说稿跑到朋友们那里，要求他们把酒摆到桌子上来庆贺一个新作家的诞生。应当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与众不同，他喜欢发现新的作者，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热，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去找朋友们，可是很奇怪：作为一个51岁的人，著名的诗人、最负盛名的杂志的主编、作家协会里的重要角色、党员当中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位特瓦尔多夫斯基竟然很少有知己，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至交：自己的第一副主编（心术不正的）杰缅季耶夫、酒友、胡里胡涂的萨茨，还有一个利弗希茨。这是一个很迂腐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听说一生中他作过许多次尝试要找到几个知音。他曾经与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卡扎凯维奇以及另外一个什么人过从甚密，可是后来这种友谊经历了坎坷，中途搁浅，最后只能是旧朋雨散、各奔东西了。就是说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有某种难以言传的东西：命里注定他是寂寂一身了。因为是重要人物，也因为性格，因为他的乡下人出身，还因为他具有苏维埃绅士的那种不真实的生活：他曾经以对法捷耶夫有好感而自豪，又对某某人表现轻忽。）

当他们正传杯递盏开怀痛饮，为我这份初稿发出赞叹的时候（我的草稿中一个个字母像蜷曲的绵羊挤在一起，没有留页边，以致于编辑加工难以落笔），在编辑部里，按照他们发生重大事情的常规，正在为手稿作书面结论。康德拉托维奇写的是：“……我们可能难以出版它……需要首先建议作者增加囚犯们等待痛苦结束的情节……文字也需要删改提炼。”杰缅季耶夫：“*角度：劳改营里可怕，劳改营外的一切也都可怕。情况复杂：不出版，说是害怕真理……出版又不可能，毕竟是仅*

从一个侧面反映生活。"(读者一定不会从此得出结论说杰缅季耶夫确实动摇不定过:是不是要出版,他非常了解不可能出版。出版有害,不会出版,但是既然头头为之心醉,备加推崇,自己也不能脱身过急)。

所有这一切一切我是以后才了解到和领悟到的。而在初次见面时,康德拉托维奇故意摆出一付彬彬有礼的样子(其实他那种不严肃和仰人鼻息的样子我一眼就看穿了),像问一个受宠若惊的作者那样意味深长地问我:

"您还有什么作品吗?"

多么轻松的问题!惟一的问题是他们要了解我的成功是多么偶然或者多么不偶然。而这恰恰是我主要的秘密。我才在劳改营的搜查中游刃有余地应付了5年,在流放中度过了3年自由之后,又隐姓埋名整整5年,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不是为了今天这场温文尔雅的谈话。我客气地杀了杀他的锐气:

"我不大希望以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相互认识的起点。"

特瓦尔多夫斯基来了,把我唤到他们编辑部的大房间里(杂志社的房间很挤,房间的一角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我是根据报纸上拍得很不好的照片才认出他的,我这个人记人面孔的能力很差,面对面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身材魁梧,可以说是虎背熊腰。这时又来了一个人,体态也很丰盈,而且非常讨人喜欢,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温厚。这个人就是杰缅季耶夫。而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时却是一付文雅谦恭的样子,透过这种谦和使他脸上特有的一种孩子似的表情马上感染了我——这是一种坦诚的孩童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柔弱的孩童的表情,是一种丝毫也没有因为长期身居高位甚至权欲的熏染而破坏的表情。

编辑部的所有头面人物全都围坐在旧式的椭圆形大桌四周,我坐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对面。他非常想克制一些,尽力表现得庄重些,但是他很难做到:他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现在成了他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桌旁这些人中受到重视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他。

他亲切地望着我,这种和蔼的样子几乎就快是一种怜爱的情感了。他不慌不忙地举出作品中的各种例子,有小小的例子,也有很重要的例子,都是信手拈来的。他举例时怀有一种满意、自豪和喜悦的心情,不是发现者和庇护者的满意,而是创造者的喜悦,他那种亲切的态度和激动的样子就像这一切他全经受过,而且是他所钟爱的(编辑部的其他各位不住地点头称是,随声附和总编辑,大概只有杰缅季耶夫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一天他一言未发)。

我坐在那里,比所有的人都更拘板,而且甚至有些颓唐。这个角色是我给自己摊派的,我在等待他们马上开始拆骨头剔肉,要求让步和删节,而我无论如何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手头拿的是已经经过琢磨推敲过的弱化了的东西。现在已是铺摊开、展平整,马上就要动剪子了——剪掉劳改营矛头所指的一切,剪掉所有的破烂,所有的花朵。我想用郁郁不乐的面孔提早向他们表示:我一点儿也没有被冲昏头脑,对这一次结交他们这些人我并不过分看重。

可是出现了意外的奇迹——并没有折断我的手。真没有想到!并没有拿出剪子来大杀大砍。我是不是疯了?难道编辑部真是郑重地认为可以出版吗?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意见只有两条,完全是客气的请求,口气非常谨慎:一点是伊万·杰尼索维奇不会因为别人干非法的

私活——给地毯染色——而眼红；另一点是他不能完全丧失有一天终会自由的信念。看来他说的很对，我很容易就同意改正。扎克斯发言说伊万·杰尼索维奇不会真正地相信上帝会把月亮捻碎之后做成星星，马利亚莫夫指出两三处乌克兰语词用错了。

简直如同是贴心的朋友，这些人真的可以与之合作了！我设想的编辑部不是这样的……

建议我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份量更重"一些。好吧，就叫它中篇小说也未尝不可。[1]特瓦尔多夫斯基还不容反驳地说，这部中篇如果叫《854号劳改犯》永远也不会出版。我不了解他们有缓和和冲淡作品标题的癖好，所以也没有坚持。隔着桌子交换了初步看法，在科佩列夫的参加之下，一起编了一个标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特瓦尔多夫斯基提醒我说，他不敢完全保证作品一定能出版，(上帝，我非常高兴，他们没有把书稿移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也不能说定出版日期，但是他将竭尽全力促成出版。

他们以一种好奇的心情给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写这部作品我花费了多少时间？(当心，别走嘴！)我写它用了两个月时间，那么人家会问其它岁月做什么了？要知道，很难计算，

---

① 我多余作这种让步。我国文学中体裁的界限正在悄悄地消失而且有忽视形式的现象。《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然是短篇小说，尽管它篇幅长，容量大。我倾向于认为小于短篇小说的是短篇故事，后者结构比较简单，情节和思想都很分明。中篇小说，这是我们经常企图称作长篇的作品：其中有几条情节线索甚至必须在时间上是延续的。长篇小说(一个讨厌的词！不能换个叫法吗？)和中篇小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容量方面和时间延续性方面(长篇甚至具有浓缩性和动态)，而且表现在包括许多人的命运，视野广阔和思路的纵向连贯上。

——作者原注

时有间断,要在下班之后……哪一年开始写的?哪一年脱稿的?在我手中放了多少时间?(所有的具体时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只要一说,人家马上就会明白了我有多少空闲时间)我有些不记得年代了……问我为什么写得那么密密麻麻,不留空白,而且两面书写?您们知道什么是立方毫米吗?……要知道只是因为梁赞买不到稿纸……(这当然也是事实)。

他们详详细细地了解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情况,当我乐观地回答说靠教书度日每月工资60个卢布而且可以维持的时候,在座的人都显得很局促,不再作声。(我也不想做全日的工作,不占整编制也可以有些空闲时间,妻子工资高,我可以不养家)这么一点数目的钱对于作家说来超出理解的范围之外。他们写几行评论文字就会拿这么多钱。我的穿戴和我的工资水平相一致。特瓦尔多夫斯基以一种权威的态度愉快地吩咐马上和我签订合同,付给我他们规定的最高稿酬(第一次预支稿费的数目就等于我两年的工资收入)。我坐在那里,像是吃了麻醉剂,努力使自己精力集中,千万不要说什么多余的话。

特瓦尔多夫斯基和编辑部刨根问底地追问:我还有些什么作品?还有吗?有什么?还有没有?我在粗略地回忆1948年起藏匿起来的东西,挑选应当说出那些书的名字。来首都时我没有准备向他们再公开任何东西,但是需要公开一些,要让他们相信《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我初试锋芒的处女作。

在一个寓言里狐狸对农夫说:你就让我把前腿放到你的车上就成,我自己会跳上车的。

我也是这样。

我答应他们说要回去翻翻看，下次带给他们，我说好像我还有短篇小说、几篇专论和几首诗(说到这里康德拉托维奇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头，他说那样可太好了，劳改营题材的作品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篇也就足够了，最好我写一些前线题材的作品。20年，千万张嘴和谐地演奏军事题材的调子，还没有文思枯尽！可是在流放和劳改营中死去的5000万人，我这短短的一篇东西就足够了！……)。

整个12月里我又不得不两次去莫斯科。作品中有10处从表达方面作了润色，但是贝尔泽尔正确地提醒我(我们已经很快地成了好朋友)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很难弄明白什么能够通过，什么会被卡住，最好以后也不要再修改什么。是的，我也再没有作让步的兴致了。我宁愿把小说索取回来也不愿意它被肢解。

这两次去首都时我带给特瓦尔多夫斯基几首写劳改营的诗、几篇无害的小品和一个短篇小说《没有守教规的人村子不复存在》，后者已经删去了难以通过的词句。他决定把小品暂存备用，他对这种风格完全没有体会。谈到诗，他认为"有几首可以发表，但是有枪声的发表不了，虽然希望有枪声。"(不安的人祈求风暴！不，他完全没有腐败！)1962年1月2日编辑部开会讨论了短篇小说。

(从这时起我预测到有一天这些文学会见的札记可能会派上用场，于是总是趁记忆清晰时把它们写下来，有时候就在开讨论会的时候写。有关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切全是这样写成的，而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翔实地全面地记述这些会见，尽管这样做会使这些"特写"负担过重，失去了我所希望的

简洁和明快)。

还是那张不久前许多人围坐过的椭圆形大桌子,特瓦尔多夫斯基未能集合起足够的人来,有人没有来得及读稿子,有人不在编辑部。杰缅季耶夫到会,(他的编制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到《新世界》编辑部来只是逡巡而已,他不在这里拿工资,而只是来完成重要使命)。特瓦尔多夫斯基请他就坐:“萨沙,快坐下!”但是他挥了挥手认为没有必要;“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他说这话时样子很难过(意思是反正出版不了),可是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大为恼火,责怪我拿来的作品一篇比一篇放肆,诱使特瓦尔多夫斯基脱离经过检验证明是可靠的康庄大道。当时我就觉察到了他们俩互相间几句抱怨的话当中包含的真实含义。后来,对这两人有了更深人的了解之后我确信:杰缅季耶夫读过作品,而且在家里(他们住在一幢楼房里)就劝说过特瓦尔多夫斯基出版的事情连想都不要想。而乐此不疲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屈服。

他们彼此称“你”,相处时从来不拘礼节,两人彼此都称对方是萨沙(亚历山大的爱称)。编辑部里没有人敢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意见相左,只有杰缅季耶夫认为自己的看法不依附于别人,而且可以随便同主编争论。通常认为,如果不与杰缅季耶夫协调好(或说服他,或向他让步),特瓦尔多夫斯基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特别是在家里,杰缅季耶夫很善于制服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对他大喊大叫,又敲桌子,可是却常常同意他的看法。就这样一个萨沙不知不觉地站在另一个萨沙的背后,操纵杂志的方向。据说杰缅季耶夫是小心翼翼地施加影响,斟酌再三。如果他总是限制主编的行动,特瓦尔多夫斯基未必能够忍受。有不少场合他甚至是

起推动作用,说什么:用不着胆怯(例如对格罗斯曼的几个短篇小说就是如此)。当特瓦尔多夫斯基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由于个人的好恶(这并不少见)而固执己见的时候,几乎总是杰缅季耶夫提出建议:“萨沙,你不对!这个作品我们应当发表!”杰缅季耶夫争论归争论,他能够掌握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让步、认输。他从来不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这使他本人和编辑部的成员们日子过得轻松些。每个编辑都不害怕同他打交道,不像特瓦尔多夫斯基,人们要看其情绪好坏来决定自己采取什么行动。杰缅季耶夫总是很干练,能够准确地抓住本质,哪一篇文章或者哪一段文字需要加把劲推动一下——润色一番、改动一些词句,他一定会助一臂之力。他和扎克斯不同,某期杂志质量如何他可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作出努力使杂志更新鲜些,更生动些,甚至更尖锐些,当然了这一切都应当是在合乎情理的范围之内!

他和作者们交谈起来也很随便,谈得很投机,他不表现出任何自负的态度,善于了解作者,知道怎样正确地同作者交往。他发的口音听起来很顺耳,笑起来很甜蜜,他心里明白谈话的对方肯定会对他有好感——一个胖脸盘的讨人喜欢的乡下人,快60岁了,一头卷发已经有些稀疏了。他会眯缝起眼睛,也会压低嗓音暗暗提醒,每个人都了解这是个平易近人的小老头儿。比如说他高兴地收下了您的手稿!“理所当然,让我们加加工吧,当然,我们会加加工的!”(也就是加以摧残,弄得面目全非!)他就是在您因胆怯而不敢去碰的主编面前也会替您说上几句好话:“萨沙,你是对的,这东西没什么价值,可是又不能把你的脑袋按到作者肩膀头上。我看我们应当支持他一下,稍加修改之后,给他发表了吧!”

可是，在冲破了紧箍，打碎了盖子的地方，杰缅季耶夫就不懂得该说些什么了。这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灵和观察力会起作用。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问题上，杰缅季耶夫就没有成功：彻夜不眠连读两遍给特瓦尔多夫斯基非常强烈的印象，杰缅季耶夫是没有勇气和他这种诗人和乡下人的感情突发相对抗的。

顺便说明一点，这一切我也是许多年之后才了解到、理解了的。而在当时我只感觉到杰缅季耶夫是冤家对头。我还不理解对《玛特辽娜一家》这部作品的主要的一次讨论已经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过了，那是在家里悄悄进行的，这个萨沙战胜了当主编的萨沙。他制服了主编，但是却没有压制住主编作为诗人的感情。所以注定要拒绝我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才心乱如麻，才喊上了这萨沙第二，让后者弄清他的慌乱情绪并且向我解释为什么《玛特辽娜一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表（就好像我建议他们非发表不可。其实我把这部小说拿来仅仅是免得他们追问起来没完没了）。可是杰缅季耶夫走掉了，他没有帮上忙，所以只好由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人来“讨论”，当着编辑部3名一言不发的工作人员，我对他的问话很少作出有力的回答。这次讨论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独白。

这是一席前言不搭后语的、心绪不佳的内心剖白（在座的贝尔泽尔后来对我说，她在《新世界》工作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过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讲话）。

他先是绕开小说，后来又在一般议论上兜圈子，然后又是绕开小说，后来又是一般议论。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他不能责怪我说我写的不是实情。但是，要承认这是完完全全的

真实，又违反他的政治信念和社会立场。

经历这样有害的心理冲撞在他来说不是第一次，显然已经有过许多次，只不过是没有遇到这样尖利的楔子就是了。他生活的惟一源泉是俄罗斯文学——从还是赤脚顽童时背诵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开始，从他13岁时创作的处女诗作开始。他忠于俄罗斯文学，忠于俄罗斯文学对生活的神圣态度。他只想效法普希金以及普希金以后的那些人。如果命里注定他会遭到像普希金那样的命运，他会慨然赴死，并感到无比幸福，会去重复叶赛宁所做的一切。然而时代不同了，人人处处都承认并且灌输另外一种更重要的真理——党的真理，对每个人都如此，对他这位总编辑更不待言。要组织好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帮助这种文学，他不可能在没有党证的情况下实现。而他又不能虚心假意地持有这张党证。他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这两种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为一。（所以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拉克申，并且和后者很接近；拉克申善于调和这两种真理，善于以很强的适应能力从一个真理过渡到另一个真理，而且不产生裂痕。）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任何一部手稿都先是用第一感觉去爱；又一定要再经过第二感觉去检验，然后再作为苏维埃的作品予以发表。

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不时地起身，利用座椅后面的一点点空间踱步。他说："全都是从侧面看我们的农村，真是很不像样子！哪怕是有一个从正面写也好……周围的一切人全都是蜕化变质分子、吸血鬼，可是要知道就是从这些农村里产生了将军、工厂厂长，他们还回到家乡来度假呢。"说到这里他自己扭转了话题："不，我不是让你们把《玛特辽娜一家》的女主角基拉写成共青团员。"他时而认为叙述者对生

活的态度"过于悲天悯人"。时而又围绕着一个思想说我们这里善良变成了财产，于是托尔斯泰跑来说："孩子们，老人们和你们讲过什么是'善'吗？"[1]他还夸奖我的这部小说和托尔斯泰的道德散文有共同之处。又责难我说这部小说比起《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艺术上比较弱"（要知道，如果艺术上比较弱，也就可以不予刊载了……），接下去又马上推崇民间用语或者对农村生活的观察。

后来发展到夸奖"没有形容词的现实主义"，他承认批判现实主义一点儿也不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差些。

后来，又谈了许多有关物质技术基础问题，他说在美国、在瑞典物质技术水平都很高，我们花20年时间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以嫌恶的心情利用人家的物质技术作为起点"。这时候他又回忆起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时保证"不剥夺农村"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他忽然缄口不语，像是被一束光线猛地射中，睁大诧异的眼睛扫视我们，问道："那么社会主义是剥夺谁才建成的呢？"但是我们并没有递给他稻草，我们都不作声。他又在富有弹性的镶木地板上踱步，议论起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脱节的现象。但是他坚持认为"宗教对粗野的本性有过微弱的节制作用（不明白，那是什么节制了这些坏的本性？……）"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不停顿的独白，忽而高尚的情操闪烁，忽而在教条主义的极限下不得不折腰，忽而又由于感觉

[1] 托尔斯泰在1891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孩子们有时候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

——译者注

到真理的存在而心灵震颤(这种感觉超过诗人的手指和眼睛的作用),忽而又像是推土机勉强地向前推进,俨如要扫除奥吉亚斯牲口棚的垃圾[①]

我们没有反驳,也没有表示同意。我们默然以对。反对他的是有关穷老太婆玛特辽娜的故事,是他已答应杰缅季耶夫不予发表的那部无声的手稿。他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人发言表示反对,但是却像是所有的论点都受到了驳斥,他以一种懊丧的语调提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看法:

"是的,总不能说十月革命白白进行了!"

我们谁也没有这么说过! 也没有人这样写过! 这场面真尴尬:现在也没有人认定这一点,没有人笑,没有人点头称是。我们不礼貌地沉默着。

怎么? 我们连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得吗?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大惑不解,好像仍然被灯光照得视物不清一样,他忧郁不快地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情绪低沉地说:

"假如没有革命,就发现不了伊萨科夫斯基! ……如果没有革命,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

这一瞬间刚好有这些随手拈来的诗坛盛事给他做了讲话的素材! (那么叶赛宁呢? 克留耶夫呢? 没有革命他们会成为什么人?)

"讨论"结果是:不,当然不,毫无疑问不,"这篇东西不能发表。"

---

① 奥吉亚斯牲口棚,源出希腊神话,据说其中有3000头牛,30年没有打扫过,后来由赫耳库勒斯引来两条河的水,一日之间冲洗干净。后来多指藏污纳垢之处。

——译者注

虽然在此之后自然而然地应当把手稿归还作者，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很抱歉地结巴着说：

“我还是请您把手稿暂时留在编辑部里。让一些人再读一读……”

反正它已被发现了，即使留下，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请求我(在说了以上那么许多话之后，这个词听起来让人吃惊)：

“只是请您不要变成一个思想上太纯的人！您不要写那些编辑同志不告诉我自己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带来的东西他一点儿也不能发表，可是还在请求我今后照这样写下去，不要写成别的样子！！

正是这一点我能很痛快地答应他的。

此外为了缓和由于拒绝发表造成的气氛，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谈论起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措施——现在还是幻想性的。他很固执。他自己也确实不知道要采取些什么措施？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什么时候采取？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对了，您不要催我们，请不要询问将刊登在哪一期上。”

我本来就没有想去催问。没有进卢布扬卡监狱，我已经感激不尽了。我只是输掉了根本不想再当作秘密的东西，现在应当三倍地小心谨慎藏好已经写完的东西和正在写的东西。我回答说：

“对于年轻人这很重要——看到自己的作品印行。我现在已经不关心这些了。”

就这样我们分手了，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我没有催促特瓦尔多夫斯基，而且认为这一年迟迟不发表我的作品没有

什么不当之处。迟与不迟和什么比较？用什么单位计量？难道我国文学当中发生过类似现象吗？

空口说白话，挑剔是很容易的事情。把鸡蛋小头立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鸡蛋可以立住。而在此之前谁也立不起来。苏联文学界的绅士们有谁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外又还有哪一位敢于把这样的有破坏作用的不好的作品提交给上头呢？1962年初时完全不能料想到：他想通过什么途径采取行动？他成功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几度春秋之后，我们了解到这部作品是延搁了11个月之后才发表的，现在要责怪他是很容易的，怪他不积极，办事拖拉，不能容忍。当我的小说刚刚送到编辑部的时候，尼基塔·赫鲁晓夫正在疾言厉色地反对斯大林，他正在考虑再用什么口实向斯大林开火，一本受过苦难的人的小说可能正中下怀！如果顺着22次党代表大会的惯性，立即发表我的小说，可能更密切围绕这部作品形成反对斯大林的声势，我想尼基塔·赫鲁晓夫出于他易激动的性格会把我的《第一圈》里《斯大林的一夜》等几章送到《真理报》去发表。《真理报》上如果能够刊载，就将印行500万份，我非常清楚地想象出来该是什么场面，就像真地看到了似的。

连现在我也不清楚：怎样作出正确评价？不是我本人把小说拿去送给这位尼基塔的。没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从中协助，什么样的22大也帮不上忙。然而同时也应当指出，特瓦尔多夫斯基错过了大好时机，错过了洪波百丈的时机，没有能够把我们这个木桶漂流到远方，越过斯大林一排排崖石，在那里展示开木桶里盛装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在那时发表，即在

代表大会闭幕后两至三个月内发表，再加几章关于斯大林的内容，我们就会更加无可挽回地揭露他的面目，也会使后来的涂脂抹粉要困难得多。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但是它没有加速。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在1962年7月的一天曾经很冲动地对我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兜了那么多的圈子？他搜集一些反应，然后才写信。他明明可以给那个人打电话的。就是说，可以操起话筒，直接与尼基塔·赫鲁晓夫通话！他害怕……”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性格确实如此。如果什么请求遭到拒绝他会感到很难堪。据说，人们求他帮帮谁的忙，为谁的住房问题去奔走一番，他常常有些像受罪似的为难：忽然人家拒绝他这个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央候补委员可又如何是好？多么屈辱……

可以作这样推测，他可能害怕过于直接和毫无准备地打扰赫鲁晓夫会对我的小说不利。可是我以为更多地是他长期身在其中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圈子里形成的一种习惯了的不慌不忙：这些人生活得懒散，并不急于去锻造正在逸去的历史，这究竟是因为历史不会溜走？还是因为反正也不是由他们来锻造？还有一个原因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有几个月的时间处于一种对自己的发现充分满足的感情之中，他喜欢小说就这样处于不发表的状态。他不慌不忙地把手稿给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看，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要利用他们的名声使手稿将来的“运动”得到加强，而且也是为了听到他们的评价，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己从中得到某种享受，他还把这些评价拿去读给编辑部的成员，给熟人展示（他只是没有给我看，怕破坏我的

情绪)。他也把手稿给费定看过(费定未置一言),甚至还给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和爱伦堡(他不大喜欢这两个人,不是亲自送去的)。他用了很长时间赶写小说的前言(其实有没有前言都无伤大雅:干吗要辩解呢?)。就这样他进行了几个月不慌不忙的准备工作,竟还没有决定怎样打通上边。直接付印并送交书刊检查机关,他觉得那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的确也是如此):书刊检查机关不仅会禁止出版发行,而且会马上汇报给党中央"文化部",文化部也会来得及采取敌对的预防性步骤。

又过去了几个月,22大冷却了下来,狂热已经逝去。尼基塔对自己所有的首创(更不必说建设)总是有始无终,他情绪忽高忽低,现在还需要支持纳赛尔,向卡斯特罗提供火箭,并且发明一种可以挽救农业使农业繁荣的彻底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还要在太空中赶超,还要加强一下贝利亚覆灭后变得松懈的劳改营。

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这种形式的阅读、推荐和有计划的准备工作还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危险:在我们这个使用打字机和照相机的时代手稿副本扩散得非常之快(有的人需要一昼夜,有的人20分钟就足够了)。在《新世界》的保险柜里几份原件严格保存,可是同时却有几十份(如果不是几百份的话)翻印本和复制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广为流传,也传布到了基辅、敖德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诺夫戈罗德。人们都确信这部书永远不会公开发表,这又刺激了手抄本、复制本的扩散。特瓦尔多夫斯基十分恼火,在编辑部里搜寻"背叛者",他不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与速度,不了解他手头搜集了许多口头赞许和书面评论,他本人就是一个主要的扩散者。他还是在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而岁月在飞逝。已经产生了

明显的危险：作品将会流传到西方世界，那里的人们干事情更麻利些，如果西方出版了这本书，我们就永远也出版不了了（这个逻辑苏联人完全能够理解，西方人士则完全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世界不是世界，是经常相互交战的"阵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认识）。看来这一情况才促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加快步伐。7月间他把我的手稿连同一卷推荐书之类的文字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亚历山大·谢笛诺维奇·列别捷夫。

这段时间里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次也没有召见我，我只能根据贝尔泽尔的讲述了解到一些编辑部里发生的事情。我还开始结交一些读过我作品的人。经过地下的孤寂之后，有20个这样的读者就给我创造了一种有群众、名声显赫的感觉。

我急于准备好迎接生活中的新的危险时期。一件事，只是沙丘中的一小粒砂时，我要藏好我的手稿。另一件事是：当我公开了身份之后卢布扬卡的人们会比《新世界》编辑部对我表现出更固执的殷勤，他们会派来自己的一群游手好闲的懒汉来寻找我还写了些什么东西。我重新查看了一下自己藏书稿的陋室，发现它过于简单，对于这些破门而人者它太容易暴露了。于是我自己先消灭掉了一些，让它们不见踪影，多余的稿子和草稿全都烧掉了。其他的东西我也决定不再放在家里。1962年新年前夕我和妻子把保存的材料全部送到莫斯科市妻子的熟人捷乌莎家里（3年半之后这些材料也被军警们掳走）。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一次材料转移行动，因为在节日的电气火车里，有一个喝醉了酒的流氓污辱嘲弄乘客。车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和他对抗：有的是因为已老朽无能，有的是因为胆小怕事。自然应当是我跳将起来仗义执言——我就

坐在不远的地方,而且我的脸盘儿也相当好看体面。可是我和妻子的脚下是装着我所有手稿的珍贵的小皮包,我不敢和流氓斗争:交手之后肯定要去民警局,虽然是作为证人出席,拿着小皮箱也罢,不拿也罢,都不会有好结果。由于这样的流氓而暴露出我绞尽脑汁安排的线索,那可真是一件动听的俄罗斯故事了。所以说,为了承担好对俄罗斯的义务,需要有非俄罗斯的韧性。我屈辱地、胆怯地坐在那里,妇女们责骂我们不是男子汉的时候我低着头不敢看人。

可能不是以这种受辱的形式,但同样已是多次使我成为负担,我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文学秘密活动已经使我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挺直腰杆的自由。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压迫,可是压得我直不起腰来的还有这地下的笨重的一层,文学夺走了许多精力,我浑身的筋骨酸痛,它们都在要求我伸直腰板！哪怕是死了也要伸直。

我把稿子藏了起来,可是1月间在《新世界》的又一次会见使我明白了还没有印行我的作品。在这种极易被发现的条件下,我还应当继续写作,把学校的工作与写作兼顾起来,挤零碎的时间写作。我需要再把《第一圈》最后重打一遍。从1962年的1月起我就玩起命来。整整4个月,一直到4月份,我什么其他事情也没有干,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命运,我也担心,希望这几个月不要有什么进展,不要发生什么变化,就让这件事情毫无起色也好,我只求安安稳稳地结束《第一圈》这部长篇小说。

根本用不着祷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确实毫无进展。利用5月各个节日期间我把几份打好的小说稿顺利地分别送到应送的地方,还作了一些加工。夏天快到了,应当让夏

天好好度过才是。《新世界》那里杳无音信(也许更好！我这样想,这样我会逐渐恢复到安全状态了),于是我想和妻子去叶尼塞河和贝加尔湖去度夏(我到过西伯利亚,但那是坐的囚车,而且只是到了新西伯利亚城)。事情刚好是这样发生的:不远不近正好到了伊尔库茨克,特瓦尔多夫斯基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副本正在那里等着我,他约我到编辑部去"一个短时期"。

"这个短时期"就是从伊尔库茨克起连续走了4天,贝加尔湖没有去成。

又召集了编辑部的全体会议,非正式地向我宣布:我的小说在一个重要部门里(这表明是列别捷夫)受到称赞。但是指出了一些不足,作品需要修改提高。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些希望并不过高,他特别恳切地请我满足这些希望,不要错过可能的契机。

他很克制,没有过于公开地表示出兴高采烈的情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难以熄灭的快活的火花,表现出了他的天真和稚气。他对自己已经成功了的这个经历了数月的计划感到满意,仅仅是由于编辑业务上的礼节才作出只提出几点补充看法的样子。他不要求我做其它事情,只要我接受列别捷夫的建议。但是他没有直言,只是严肃地主持着会议,希望所有与会者都提出怎样做必要修改的看法。

人们讲了一些话,但是没有人讲出任何一点实质性的看法,因为除了迎合总编辑之外,这些人没有其它的目的,他们甚至不愿意有与总编辑不同的个人意见。有朝一日文学史将惊奇地研究和了解到苏联的这家热爱自由的、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杂志编辑部,在痛骂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这些年代里,

在自己的内部仍然奉行着个人迷信的原则。(这并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制造的,杂志社里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如同任何局部都和整体相一致一样,每个机关,苏维埃制度的每一个环节全都是这样形成的。只不过是这里更醒目罢了,而特瓦尔多夫斯基缺乏朴素精神和幽默感来发现这些并给予制止。)

可是杰缅季耶夫这个人在座,是他正在注视着紧箍在破碎,盖子也掉了。亚历山大·格里高里耶维奇·杰缅季耶夫,这个在可怕的1949年在列宁格勒作家组织担任党的负责人兼刽子手的职务时没有踌躇过,而在赫鲁晓夫时期他又成了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杂志的政委,谁派他来的?为什么派他到这儿来?是来恢复自己的精力,还是来清洗?总之要把好关口!在派他来的那些人面前他只是兼职,不占完整的编制,但是他负有双倍的责任,他现在不能承认哪怕是赫鲁晓夫顾问的权威,不能屈服于整个编辑部的温情。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在1961年12月讨论时,他没有争论,那时人人都夸奖我,对我表示好感;而他当时知道,这部作品无论如何也不会发表。可是现在清楚地显露出事情正以歪曲的和非法的途径向前推进,小说将会问世,这时候他可要使出浑身解数来使作品得到修改。

在有白发衬托的愉快的脸庞上,那忽而装出来的友好表情,忽而又是发自内心的友好表情跑到哪里去了?那令人倾倒的北方乡音怎么忽然变得这样生硬!他面红耳赤,浑身发热,从头到脚!他只做一件事:不是从奥林波斯山的群神会上预言雷鸣,而是激动地争论,不想取胜,不想说服人,只是激动不已地争论。他振振有词谈的都是一些定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杰缅季耶夫说

话算数，他会把我的作品全都刨得平平展展，一个戗茬也不留。而现在需要击中核心，他指责我，说我玷污了苏维埃艺术的旗帜和象征《铁甲列车波将金号》，整个有关这一问题的议论应从作品中删掉。舒霍夫和阿列什卡谈上帝的一段也应删去，因为这一段艺术上完全缺乏表现力，思想上不正确，而且过于冗长，只能把一部好作品糟踏了。此外，作者还应当回避对宾杰里人从政治上作准确评价，甚至他们在劳改营中生活也不宜提及，因为他们身上沾满了我们苏维埃人的鲜血。还有……原来他在手稿上做了许多批注，他满可以具体地指给我，只是他把我的稿子放在家里忘记带来了。

在独白将近结束时，杰缅季耶夫看上去像一只被激怒了的野猪，如果现在把我那150页的作品放到他的面前，他肯定会用獠牙给撕得粉碎。

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在那里不发一言。怎么能说不对呢！政委讲得非常正确，他想把我的无定型的小说锻造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武器，主编能反驳他什么呢？他不能反驳他，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噤口不语。既不点头赞许，也不眉目传情。而且特瓦尔多夫斯基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我。如果我作出让步，他也就听其自然了。

但是，杰缅季耶夫丧失了分寸感！他尽管智谋过人、思路敏捷，可是他完全不了解劳改营分子——我们这些纯种的劳改营分子。如果他表现得慎重些，要求一些小的但是又是足以破坏整个作品的用心卑劣的让步，我会把这些全都记下来，然后同赫鲁晓夫顾问的要求一起，仔细认真加以考虑，这样作品大概会受到损害。可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凶恶的目光，我回答得毫不迟疑，毫不困难，根本不去考虑是否有好处……

"我已经等待了10年,"我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还可以再等待10年。我并不着急。我并不靠文学维持生活。把手稿还给我吧,我要离开这里。"

这时候吃惊非浅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介入了谈话。

"您可不要这样!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为您作参考。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手稿能够通过。"

于是,杰缅季耶夫不再争论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态度也温和一些了。他走到了不能再影响主编的极限,他不能再冒险了。

当时要求我去取回原稿……正是要去他家。他又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待我亲切极了!难道半个小时以前那样激烈地攻击我,跺着蹄子喊叫的人是他吗?他忽然建议我……用他的住房修改文稿。忽而,他完全忘记了那些嗡嗡叫的各种主义构成的术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暗示寻求我的理解。哎,这位政治委员可不是什么笨蛋……

于是我又见到了自己的小说稿。我知道的编辑部并不知道:这部稿子并不是初始的稿本,它被触动过、被修剪过,我的作品已经完全不是娇里娇气碰不得的孩子了。在哪里开始,也可以在哪里继续。删改之后弹药也还足够。我只是觉得文学道路这样开始有些令人不快:和所有的人一样,一再让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时刻最好是一字不改,见他们的鬼去吧,不发表就不发表。可是,根本不去做些尝试那是愚蠢的……

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列别捷夫的要求非常微不足道,简直使人吃惊。小说的要害他一点儿也没有要求改动。想要绕过他们的那些最冒险的部分似乎并未被发现;这些我也许会

作出让步，但是会非常心痛的。在上面，与中央第一书记朝夕相伴相随的这位神秘的自由思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怎样爬上去的？怎样保持了这样的地位？他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应当帮他一把吗？

列别捷夫要求的主要一点是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海军中校布依诺夫斯基作为喜剧人物出现的场面全都删掉，按照他的设想这样做是强调了海军中校的党性（应当有"正面主人公"么！），我觉得这个牺牲的代价是最小的。我删去了喜剧性的内容，似乎是保留了"英雄主义的"内容，可是这是"没有足够展开的"内容，后来批评家们正是这样的看法。中校在接班时的抗议现在看来有些显得过分（原来的意图——抗议是可笑的），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对劳改营的描写。还有应当少用"屁股"这个词，我把它从7处使用减少到了3处；谈到首长时尽量少用"畜牲"、"恶棍们"（我使用的次数很多）；还有要通过作家或者至少是海军中校谴责一下宾杰里骚乱分子（我让海军中校去讲这样的话，然而在出版单行本时我后来删掉了这些话：海军中校讲这样的话很自然，但是他即使不讲这样的话也已经够多了）……还有，对我最可笑的是仇人斯大林，哪怕有一次提到斯大林是灾难的祸首也好。（是的，作品当中没有任何人提到他的名字！我这样做当然不是偶然的。）我对此作了让步，有一次提到了"留胡子的老爹"……

做完修改后我离开了莫斯科，对于我来说完全孤独和黑暗的时期重又开始，重又堕入过去的那种停滞状态，似乎作品的运动从来没有开始过。似乎一切都只是春梦一场。只是到了9月底，而且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我从贝尔泽尔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的发展情况。在皮聪大的别墅列别捷夫给赫鲁晓

夫朗读了我的作品(尼基塔·赫鲁晓夫本人不喜欢读书,他尽量从影片中获取知识)。赫鲁晓夫仔细地听了这本有趣的小说,有时候放声大笑,有时啧啧嘴表示赞赏。听到一半时招呼米高扬一起来听。小说受到了毫无保留的称赞,特别喜欢的当然是劳动的场面"伊万·杰尼索维奇怎样保护了灰浆"(后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我时也提到了这一点)。米高扬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小说的命运就在这样的家庭式的阅读中决定了。然而,赫鲁晓夫希望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一切。

大约过了两星期,赫鲁晓夫已从疗养地返回莫斯科,《新世界》编辑部就在大白天里收到了党中央的指令:第二天上午提交不多不少整 23 份作品给中央。编辑部里仅仅只有 3 份。在打字机上打印吗? 来不及! 只好铅印。借用了《消息报》的几台排字机,给若干名排字工人每人一段小说稿,这些人在完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排印起来。《新世界》的校对员们也连夜分段校对稿子,许多冷僻的词、特异的用法使他们大受其苦,他们也为小说的内容吃惊不浅。后来装订工在凌晨这一班里装订好了 25 份《新世界》的那种蓝皮杂志。第二天早晨,就像是没有任何人付出什么艰辛劳动一样,把 23 份作品送交给了党中央。剩下的校样藏到专门的保险柜里,锁上了。赫鲁晓夫把我的书分发给各位负责的党的领袖人物,自己去处理中亚细亚的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过了大约两周,在对他来说是灾星高照的 10 月里返回。在政治局(当时称为"主席团")的例会上尼基塔要求委员们同意出版这部小书。我不知道准确消息,但是似乎政治局的委员们并没有表示同意。很多人避免直接回答而默不

作声，(赫鲁晓夫问："你们干吗不吭声?"有人鼓起勇气提问："这是向谁的磨盘里注水? 究竟对谁有利?")但是当时据说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一手遮天的时代，他可能也夸奖了伊万·杰尼索维奇诚实的劳动，砖砌得不错。总之作出了决定——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般来说，没有人提出坚决反对的意见。

10月20日，星期六这一天，赫鲁晓夫接见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决定。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单独的从容会见。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中，可能和所有俄罗斯人或同所有人的心灵中一样，相信人的渴望强烈。曾几何时，尽管农民大批死亡，尽管他自己家庭也饱经磨难，而他却无限忠于斯大林，后来又为斯大林的死去而痛不欲生。后来他又是尤比真诚地急忙躲开被揭露的斯大林，寻找可以相信的新的纯洁的真理和播扬这一真理的新的人物。经过这两个小时的会见之后，他认为赫鲁晓夫正是这样的人物。一个月后，在我们最亲近和投机的时刻，他对我说："这是一个多么诚恳和聪明的人！这样的人领导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那次接见特瓦尔多夫斯基时，赫鲁晓夫态度温和、冷静，甚至很深沉。可以相信这一点，反对他的那些敌意的灾星已经不构成重大威胁。这时他可能已经收到了葛罗米柯的电报，其中说到前一天他在白宫被问及："请老实地告诉我们，葛罗米柯先生，你们在古巴配置了火箭吗?"当时葛罗米柯曾经真诚而又肯定地回答："没有。"赫鲁晓夫在同特瓦尔多夫斯基心神恬然地谈论文学艺术问题时显然并不知道华盛顿正在做苏联在古巴安置火箭放大照片的拼版工作，这些照片将在星

期一展示给美洲国家的代表，肯尼迪将获准采取极为大胆的步骤：检查苏联船只。赫鲁晓夫刚刚度过他耻辱、可怕和投降的一周，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天，就在这个周末他给《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了"许可证"。

"我甚至打断了他的话头，"特瓦尔多夫斯基回忆起这次会见时对我说，他自己也有些吃惊。"我对他说：'只是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来的！您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一本书的手抄本已经流传，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赫鲁晓夫容忍地听着他讲话，特瓦尔多夫斯基觉得赫鲁晓夫本人接近于这种认识(经过对比他的转述，编辑部里可能认为他把自己讲的话说成是不置一词的赫鲁晓夫的思想)。

赫鲁晓夫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搜集了3大卷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材料，但是眼下还不能够公布。[①]"历史将会评说我们所采取的措施。"(这位尼基塔在谈起普遍死亡率、人类生命的局限时，总是变得高尚和温和。在公开讲演时他也常常如此。这是他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基督思想特征)这位尼基塔是个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本质和自己历史使命的沙皇，他总是使希望而且可能支持他的那些阶层受到损害，他不寻找，而且也没有一个才智过人的智囊人物(通权达变、机灵圆滑的女婿也不是个秀外慧中者，而是一个只能加速岳父垮台的冒险家)。赫鲁晓夫确信斯大林是杀害基洛夫的主谋，但是他也明白基洛夫本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① 赫鲁晓夫做任何事情都是虎头蛇尾，贬斥斯大林一事也是有始无终。如果他再做一些努力，不论什么人的嘴唇也难以张开再有气无力地讲他的"伟大功绩"了。
——作者原注

看来与小说有关的一切问题全都已经解决，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指挥将它刊登在第11期杂志上。就在这时，发生了与美国之间的火箭事件。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加勒比风暴导致的中央委员会走廊里的漩涡，也可能冲垮我的这部可怜的小说。

然而，一切都风平浪静了。11月将临时，正是我把小说稿投出去1年之后，我应召去初校。当我审读打印好的稿页时，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一切如同是神话。而当没有装订的毛边杂志页一张张地放在我面前时，我想像出我们劳改营生活的鳄鱼怪物终于浮向人间，为千百万不明白真相的人所见识。这时，我坐在旅馆豪华的房间里，面对着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①]

这时又向我转达了列别捷夫的请求：把丘林的话从原稿中删去。这段话是：我划了划十字并且对上帝说："造物主啊，还是因为有了你啊，在天上你能长久地忍耐，惩罚起人来你毫不留情。"检查来检查去，终于没有逃掉，恰恰在小说的这个主要部分里我向他们揭露和展现了1937年领导人被杀害的全部故事！编辑部的人劝我说："要知道列别捷夫非常富于同情

① 《新世界》和书刊检查机关开了一个浅雅的玩笑：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就将初校大样送给检查机关审查。检查机关由于闭塞还完全不知道党中央已经决定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为这项决定和我们这里的所有问题一样，也是由极少数人秘密决定的。收到书稿后，书刊检查机关因其"思想上的破坏性活动"而惊慌不已，打电话给编辑部，态度严厉地质问："是谁送来的小说？""是我们这里。"编辑部主任毕安基天真地回答说。"是谁个人支持这本小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毕安基小声说。那边说了些威胁的话，挂断了电话。半个小时后打来电话，语调十分和缓："请再送来两份大样。"（他们也想读）。赫鲁晓夫归赫鲁晓夫，书刊检查机关的批准图章反正应当打到每一页稿子上。

——作者原注

心！要知道这是他闯出的路子，安排了一切！现在应当向他作出让步才是。"这是对的，如果是为了自己和为了文学的利益，我会让步的。可是人们却建议我为了上帝和乡下人作出让步，我曾经发过誓，为了他们什么也不做。于是我拒绝了我还不熟悉的神话中的善人。

这就是滚动而来的石头的惯性作用，而赫鲁晓夫的谋士对此不能更改，也无法阻止！

阿朱别伊试图做这件事情：不是制止石头的滚动，而是让它再改变方向。也许是受正统派思想家们的压力，这些人总还想按照自己的想法首先表现劳改营的历史（把自己表现为主要的受难者和主要的英雄）；但是更可能的是他们的目的渺小得多：就是为了抢到首创权（"再插上一些导火索"），超过已经经历了困难路程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抢上一个头功。在《消息报》编辑部的聚会上阿朱别伊因为不是他的报纸"发现"了重要的主题而大为恼火。有人想起了赤塔有人写了个短篇小说寄来这里，小说写得很不像样子，给否定了。编辑们都去翻找存放稿子的小铁筐，短篇小说稿已经给毁掉了。向谢列斯特查问到了此人，让他从赤塔通过加急电话把名叫《浑金璞玉》的短篇小说口述给编辑部。在革命节这一天的《消息报》上刊载了这篇作品，刊载得极为"简单"，甚至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甚至连一点表示惊叹的话都没有，就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我们的报纸上已经刊登了40年，所有的人都已经读腻烦了。当时特瓦尔多夫斯基非常不愉快，而且很生阿朱别伊的气。我以为，《浑金璞玉》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我们的石块不可阻挡地滚动着，俄国读者注定正是以这种形式首先了解到劳改营的轮廓。

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胜利，作为一个有远见有经验的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放眼未来，就在11月节日期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我想以年长者的身份和从事文学工作的经验向您进几句忠言。现在有数不清的人到我们编辑部来打听您的地址，他们对您的兴趣是那样的强烈，有时候是一些非文学动机的激发。作品问世时会有什么呢？……会有被称作荣誉的一切……我之所以讲这些话是要强调我希望您能保持平静、遇事克制，保持个人尊严的崇高情感……您经历了众多的考验，我不能想像您在这一考验面前会韧性不足……相反，我有时觉得您的淡漠，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态度是否已经有些过分了……当我知道‘一切顺利’时，我和我编辑部的同志们……经历了胜利和成功的真正节日。您在给我的祝贺电发来的回电中表现的克制使我多少有些伤心，而您只用了‘很高兴’这样的普通词儿，在这种情况下，恕我直言，简直使我感到难过……但是现在我向您呼唤的正是您的克制和淡漠。是的，让它们深深扎根并成为您今后创作的忠实伴侣吧……会有人跑到您那里提出‘给我们写点东西吧’之类的令人厌烦的许多问题，哪怕是片断、一点点儿也好，会有人建议同您签订合同，给您金钱……我求您，坚持住……不要上当，您可以援引您对《新世界》承担的义务（我们有某种权利对此抱有希望），我们说过您写作的一切东西我们全都给您出版。”

他们过了“胜利的”“节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处境：

“您知道拆开您来信的信封时我想了些什么吗？妻子送来信并且神情紧张地说：‘《新世界》来的一封很厚的信。为什么这封信这样厚？’我摸了摸，对她说：‘很显然，这是有人要我

再做一些让步,可是我不能再作让步了,这一本书就这样了,不再改了……'我在梁赞的生活仍然完全一如往昔,所以莫斯科的议论和电报觉得是纯粹的梦……我仍然穿着劳改营里穿过的棉袄早晨去劈木柈,然后备课,上学校,学校当局批评我政治学习无故不到或者没有参加学生的课外活动……您的电报只使我明确了一点,那就是暂时已无禁令。因此,亲爱的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请不要再为我那个普通的词儿'很高兴'而感到难过了。如果我表示出更强烈的情感,那我是不真诚的,我当时没有领略到任何狂喜。一般来说整整一生都教我更多地面对逆境,我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有准备地相信恶劣的状态。早在劳改营中我已经深刻领悟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我已经学会了照这句格言生活,而且希望永远也不和它分离……当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肯定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我在去年的12月里已经领略到了'被承认'的最主要的愉快。"

但是,他要我"克制","不要上当"没有引起我的反应!

荣誉名声"不会吞噬掉我……我能够预感到名声的潮流肯定会寿命不长久,所以我想更为合理地(为了我已写好的东西[①])利用这种荣誉。"

我们彼此间已经很亲热了,尽管除了在编辑部里我们一次也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很快我就去他家造访……正好编辑部的通讯员(后来成了揭发我的告密人)给我们送来了第11期杂志的样本。我们互相拥抱了。特瓦尔多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移动着像熊一样的身体,口里说:"小

---

① 连《新世界》编辑部也不了解我还有什么作品…… ——作者原注

鸟飞出去了！小鸟飞出去了！……现在要想再困住它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几乎根本不可能了！"(几乎……到最后一刻他也仍然不完全确信。难道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把印好的所有书稿全部销毁？劳动、金钱对我们宝贵吗？思想对我们宝贵)。我祝贺说："这是胜利，更多的是您的胜利！"

"赶快到我这儿来，下车后直接来！"他给我打电话时就是以这种不寻常的语气说的，我于是又动身了。第11期杂志发行后马上召开中央全会，好像是讨论工业问题。有几千份杂志原来是准备在莫斯科零售的，现在全都运到了为全会服务的摊点。赫鲁晓夫在全会讲话时说，这是一本重要的和需要的书(他没有讲出我的姓氏，把作者也称作伊万·杰尼索维奇)。他甚至向全会说了自己政治局的坏话："我问他们：我们要不要发表？他们不吭声！"于是全会的参加者们从"书市上带回"来两本小书：小红书(全会材料)和蓝皮书(《新世界》杂志第11期)。特瓦尔多夫斯基开怀地笑着说，每个人腋下夹着一本红书一本蓝书。新西伯利亚州州委书记在赫鲁晓夫致闭幕词之前曾经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唉，真糟透了！……我们州里现在也还有这样的营，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干吗要写这些事情呢？"尼基塔的闭幕词之后这位州委书记又来找特瓦尔多夫斯基，为的是同后者握握手，冲淡自己说的那些错误的话。

普遍的称赞和众多的愿望，其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以致于那些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我说：现在我们把《玛特辽娜一家》发表出去！年初时杂志拒绝发表这个小说，认为"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出版"，而现在撞上了好运，被他送去发排，他甚至已经忘却了自己曾经拒绝过。

"第二部,这是最危险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提醒我说:"常言说:就连笨蛋也能写出一篇东西来,而第二部作品怎么样?那是要看一看呢!"

他紧张地望着我。第二部,他不是指《玛特辽娜一家》,而是我接下去要写的东西。我又把我写过的东西重新查看了一遍,竟找不出把哪一篇拿出来公诸于世:所有的作品都很尖锐。

幸好正是这个月我信手写了一篇《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专门为杂志写的短篇小说。特瓦尔多夫斯基拿到稿子时很激动,读这部稿子时他更加激动不安,担心失败,就像是为自己担心一样。作品中出现了特维里季诺夫之后他的担心更甚了:他认为这是一个爱国侦探,小说结尾时会捉住真正的特务。

确信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之后,他马上给我发了一封语气轻快的电报。《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和《玛特辽娜一家》按照他的设想,应当使我声名大震,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谈"通过,还是通不过"的政治上的看法,而是和我一起在弥漫的烟雾中干起了诚实的编辑劳动。[①]他的意见(针对我的自信)相当细致,特别是有关农村生活方面的材料:不能说"农村木匠",因为农村里每个人都是木匠;不可能有"薄板薄木条";如果小猪长得很胖,它就不贪吃;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采蘑菇,

---

① 设想"通过,还是通不过"弄昏了《新世界》编辑部成员们的头脑(所有其他的苏联杂志编辑们亦然),使得他们没有那种洞察力、鉴赏力和精力提出一些有份量的艺术方面的意见。我的在《新世界》没有引起艺术上挑剔的作品,一些主要的批评我是通过私人了解到的,而且通常是一些不在文学岗位上工作的人提出的意见。

——作者原注

这不是劳动，而是一种消遣（然而，他马上就让步了，说在现代农村中这已经是一种劳动了，因为采浆果、蘑菇赚的钱比在集体农庄田野上劳作要多）；还有车站前后生长山杨树不大可能，因为车站前后的树全是栽种的，可是不会有人栽山杨，“小伙子”比“后生”年龄要大一些。他还坚持认为民间语言中很少使用副动词……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们有些谚语还是有不少副动词的。

1962年秋天的这些频繁的会见看上去很随便也很亲切。那些日子里特瓦尔多夫斯基非常怜爱我，他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就像也是他自己取得的成功一样。他特别满意的是我的举止行为和他设想的他所发现的作者相吻合：我常常赶走记者、拒绝发表谈话，不同意拍照片和拍电影。他有一种感觉，认为是他创造了我，塑造了我，现在他将永远代替我做出最完美理想的决定，引导我在光彩夺目的大路上前进。他是这样理解的（尽管我一次也未向他保证过），从今以后不同他商量、不取得他们的赞许我不会采取任何重大的步骤。例如，他来亲自决定我可以允许哪一位照相师给我拍照（而这个照相师拍照水平很低，但我们还是发明了我的沉思、忧郁的表情，这正是所需要的）。到了必须写一份我的简历的时刻，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拿起笔来，代替我写简历。我认为需要在简历中说明我坐牢的原因：讲了否定斯大林的言论，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坚决反对，根本不允许这样写（他不了解，如果有一天苏联宣布我为祖国的叛徒时，这样写还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他的观点更多地是囊括当前，几乎从来不涉及未来。他外在动作的真正原因常常是多层次的。例如他曾经长时期相信过斯大林，任何一个在当时已经不信任斯大林的人

都好像是侮辱了今天的他。他于是否定了我的解释,我曾对他说特维里季诺夫仅仅就由于审美力细腻而不热爱斯大林。怎么他可以不热爱呢?那就是说他坐过牢,或者是他的亲戚坐过牢,否则特瓦尔多夫斯基难以接受。

我并没有急于闹事来反抗他的庇护,也不想过早证明我已经快44岁了,已经固定成型,旧习难改了。但是,缺少哪怕是承认了的平等,也不会有真正的友谊。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夸大了我们视野、目标和生活经历的对比。他认为熟知官场等级制度、会议、电话和幕后活动的种种进程就是自己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夸大了所有这一体系的概括性和长久性。他没有想到可以一直就不承认这一体系。他不能想像在文学或政治中我能够看到或了解到他没有看到和不了解的东西。

他爱好庇护年轻人,却没有能力与同龄人和谐共事。

同我相处使他萌生了新的希望,似乎真的寻觅到了知己。但我对此并未产生误解。我喜欢上了他的乡下人的根;他那诗意的童稚的种种显现(这是一种被绅士风度掩饰得不好的稚气)以及他在敌手面前(有时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生就的个人尊严(当然是面对面的,如果是打电话时常常会举止失措),这就使得他摆脱了可笑或可卑的处境。可是我和他的过去毕竟是天悬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云泥。我一次也不能,而且永远也不能同他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不能如同我和几十名曾在劳改营中生活过的难友那样。还有我们的性格不知为什么可以处熟、适应,但是没有男子汉之间的友谊,那种不需要观点相近,不需要对别人关心和照顾的友谊。

我们好比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曲线，在某一点上可能接近和重合，甚至可以有共同的切线、共同的导数，但是它们初始的原形不可避免地会很快把它们引向不同的方向。

浮出水面

深水鱼，已经习惯了固定的许多外界压力，一浮到水面上来，由于变得轻松，不能适应，它会由于气压不足而死去。我也像深水鱼，整整15年清醒地躲在劳改营、流放地和地下深处。从来没有暴露自己，在为人和处事方面从来没有敢犯任何一个明显的错误。现在浮到了突然成名、过分宣扬的荣誉这个表面上来(我们这里无论是咒骂，还是夸奖，全都太超出实际)，就接二连三地失误，完全不理解自己新的处境和新的潜力。

我不理解自己后天获得的力量的程度，也就是说不了解现在自己行事时应具有的果决程度。我还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惯性、隐蔽的惯性。这两种惯性都需要，这一点也不错，因为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上的偶然突破丝毫也没有把制度和我调和起来，也不能保证有任何一种轻松前进的可能。

不能保证前进，是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两个月，不，只有一个月，我可以不间断地行走：假惺惺地夸大其词，大肆宣扬在这个月里给我打开了所有编辑部、所有剧院的

门！

可是我并没有理解……我在别人制止我前进之前自己先急于停下脚步，想要重新隐居，装作我已再没有什么作品，我也不计划写些什么。就好像这种回归是可能的！好像人们会不再注意我！

还有，在小说印行这一偶然的胜利之后我没有正确地估计到，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不是乘时侥幸，而是战斗失利：错过了整整一年，那是22大提供间距的一年，我们是趁最后一个波浪来到的。我粗略计算，起码是半年，否则可能是两年，那时我面前所有的大门小门全是钉死的。我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从11月18日第一次赞扬性的评论到12月17日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当时赫鲁晓夫唆使人们反对现代派艺术家，当时曾设想范围更广泛些)。但是哪怕只有两个星期，我也能够占领几个进攻基地！可以宣布几篇我的作品的名称！

可是由于不正确的行为路线，我竟完全无所作为。我原准备"更合理地利用"给我荣誉的短暂时刻，可是我恰恰是没有做这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对《新世界》杂志和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态度上有一种虚假的义务感。

这一点应当做正确地说明。我当然要感谢特瓦尔多夫斯基，只是个人的感谢。但是我没有权利考虑在《新世界》人们有什么个人看法，怎样看待我，我应当经常有这样一个出发点：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有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暗哑的声音说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在劳改营中的发现。古城特洛亚的存在无论如何应当感谢发现

了它的德国考古学家什利曼,同样,我们的隐藏很深的劳改营文化也有着自己的传统。所以,从不能够让死人复活的世界返回之后我不能向《新世界》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宣誓效忠,不敢考虑他们是否相信我一点儿也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我正以冷静地思考占领滩头阵地。

尽管与过度地谨小慎微比较起来说,《新世界》套在我身上的枷锁是次要的,但是它们拉得很紧。

如特瓦尔多夫斯基所预言的那样,纷纷要求我提供"一些作品片断"给文学报纸,给电台作为朗诵之用(而我应当毫不迟疑地提供!),从已经写好的《第一圈》里,从几部写好的剧本里选出来,还要把选出的部分圈起来,标明用了什么标题,以防我以后把它们弄混。在由于小说爆炸造成的足有四个星期的令人惊诧的浪潮中,我毫无阻挡地经历了过去。可是我却说"不"。我自以为这样可以保住我的作品……我引为自豪的是我如此轻松地坚持住了,抵御了荣誉的冲击……

记者们破门而入跑到我的家和我住在莫斯科旅馆的房间里,驻莫斯科的一些大使馆把电话打到梁赞市我任教的中学,有的通讯社寄来了书面问题,有一些甚至是愚蠢透顶的要求:请为西方的读者作出评价——赫鲁晓夫是如何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古巴冲突。可是我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讲过一句话,虽然我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讲很多的话;可以讲得非常大胆,而我讲的一切将被这些发傻的记者们全都扩散到整个世界去。我害怕,如果我开始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收到苏联记者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先就决定了,要么立即造反,要么沮丧地效忠。我不希望说谎,我也没有勇气造反,我认为最好还是——沉默。

11月末，小说问世后10天，《现代人》艺术委员会听了我的剧本的朗诵（《鹿与小窝棚》，选自《劳动共和国》，已经修改润色过），他们坚持请求允许他们立即排演，剧组就在剧院里吃住；但是要在一个月内演出！这是可靠的承诺，我了解这个剧团。可是，我拒绝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首先，我感觉要想把作品公诸于世，还应当重新打印一遍，这需要整整七天纯工作时间，我一面在学校工作，一面还要回答那些无端拥来的使人心神不得安宁的信件，恐怕最少要一个月时间才能重新打印好。《现代人》剧团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让我在排练过程中把剧本改好，可是我又不能离开学校，放下工作去做这件事。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忽然成了一个自由人？忽然不承担每天都履行的沉重的义务了呢？还有，怎么可以不把学生们教到学期结束呢？谁给他们打分？而且就像故意找我的茬一样，最后这一个月刚好要有检查组到学校来检查工作。这么多年学校校长待我一直很好，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让他倒霉呢。只要用一周的时间我可以把改好的剧本给《现代人》剧团供他们排演；每周我可以有两次提供给他们“润色过”的小说片断；可以供电台里朗诵；我也可以对记者发表谈话。可是我却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忙碌，准备毫无意义的物理实验，制定授课计划，批改作业。我是宇宙飞船上的一条蛆……

其次，假如“上面的人”在首场演出之前看了这出戏，一定会大发雷霆的，这该如何是好？不仅会把戏给搞死，就连马上要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几部短篇小说也难幸免。《新世界》的发行量是10万份，而《现代人》的剧场里只能容纳700名观众。

再次，我是答应过把所有的新作品都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啊！《新世界》还没有看过，怎么能把剧本给《现代人》呢？就这样，我拖延着，没有把剧本交给战斗的《现代人》，而是交给了正在打瞌睡的《新世界》杂志。可是这里有的人没有打盹儿，这就是杰缅季耶夫，所以剧本并没有到达编辑部，剧本没有出卡切尔尼奇滨河街一所房子，没有离开两个亚历山大之手。他们两个人决定了一切，由特瓦尔多夫斯基向我作了宣布："没有艺术性"、"不是剧本"、"只不过是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表现的劳改营素材的重复耕种，没有任何新意。"（可是，我怎么能自己为自己写的东西作辩解呢？可以同意这不是戏剧，但它也不是重新耕种啊，因为真正的耕作还没有开始呢！）

诚然，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这个剧本显得有些平淡，因此上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喜欢也很自然。如果《新世界》否定了剧本，并且给我以行动的自由，倒也很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不这样理解我的允诺和我们现在的合作，而是今后永远、世世代代全都如此。是他在我43岁的时候发现了我，没有他我根本当不成作家，我不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拿来1篇，另外10篇放在背后），现在每篇作品都将由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有杰缅季耶夫）来审评：或者把这篇东西交给《新世界》去发表，或者把它藏起来，不要给任何人看。不许给别人。

《鹿与小窝棚》的命运正是如此：不能给别人，不能演出。"我猜想您肯定反对剧院的那些文痞！"特瓦尔多夫斯基非常严肃地告诫我。一个全国最自由的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谈论全国一个最年轻、最大胆的剧院！他语气这样肯定根据是什

么？他看过很多次《现代人》的演出吗？他一次也没有看过，没有迈进过这个剧场的门槛（为的是不降低自己的身份）。身居高位促使他从第二手（而且是肮脏的手）方面获得情报。在政府所属的某个疗养院里，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还有编辑部里的几个阿谀奉承的人，从他们这些人口里他了解到这个剧团很放肆、有破坏性，缺乏党性，所以说是“文痞”……

我的书发表仅仅才两周，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蜜月还没有结束，我并不认为公开造反是适当的和有益的，所以我就落到了恳求者的下场，我为了要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某人读而叩求别人，而特瓦尔多夫斯基不接受、不主张，表示反对，甚至闹到最后，已经因为我不听话而很恼火了。他勉强表示同意，让我把剧本不是交给《现代人》，而是给扎瓦茨基的不死不活的剧院（只因为它上演了《瓦西里·焦尔金》）。这个同意太迟了！我寄希望于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可怜的消息来源（远离和高于一般的文学团体和莫斯科变化多端的环境），我只好与《现代人》建立了联系。可是剧本迟了一个月——这是不可挽回的一个月！我在等待书刊检查机关签字同意放行《玛特辽娜一家》和《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我把剧本交给了《现代人》，而且完全依靠了他们，我丧失了时间，12月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之后对剧院已经施加了压力。《现代人》迟疑不决，甚至没有开始排练，于是这个剧一卡就卡了许多年。特瓦尔多夫斯基知道我的自行其事时已经迟了，他煞有介事地发了一通脾气，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一直指责我：既然他已经请求我不要与其它单位打交道，我干吗要去找《现代人》？……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信中称我是他“在文学界最亲近的朋友”，他衷心地无私地爱护我，而这种爱又是专横的：如雕塑家

爱自己的作品，如封建主爱自己忠实的仆从。他当然不可能感兴趣：对杂志或者对他个人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忠告、建议？他没有想到我的非文学的生活经验可以提出全新角度的看法。

其至在生活作风的频律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了差别。现在，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之后，为什么不坐在编辑部的大桌子旁边，就着粗面包圈喝杯茶，天南地北地神聊一阵呢？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开着玩笑，对我说："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做，例如，西蒙诺夫，正襟危坐，悠然自得地吸着烟。您老着急上哪儿去？"我急着干什么？是因为快50岁了，还有那么多没有写完的东西搅得我不得安生，泥做的，同时还有钢筋水泥做的谬误的腿，还是那样坚定地站立着。

关于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登载在《消息报》上的西蒙诺夫的评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以一种胜利的姿态把它摆到了我面前（报纸刚刚出版，我还没有见到），开头的几段就很枯燥乏味而且公式化，我没有读下去，把报纸放到一旁，请求继续有关《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的编辑部谈话。特瓦尔多夫斯基十分光火，也许认为我这是在故弄玄虚。他没有看到前面的路程有多么长多么严峻，这些不请自来的评论是多么可笑多么不自量。

此外，对于文学界现在需要什么，《新世界》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我们的看法也不相同。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自认为它无比大胆和先进——就杂志在祖国知识界取得的巨大成功、就西方舆论界的知名度而言。

这的确如此。但是《新世界》的崇拜者们不能让这本杂志首先具有其他的范围——比之我们的其它一系列杂志而

言,那是些内容含糊甚至令人作呕,艺术上马马虎虎极为贫乏的杂志。(如果这样一些杂志——我把《青春》排除在外——也刊登一些"引人注意"的新鲜货色,那么这要么是借死去作家们的名字投机,要么是刊载一些与文学相去甚远毫不相干的东西;所刊死去作家的作品也是困扰者的含混不清的喃喃自语,《莫斯科》杂志就是以干这类勾当而臭名昭著。)特瓦尔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严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丧地迷惑住了的时刻这种精神也没有失落,正是这种精神帮助他坚决不允许他的杂志出现直接的卑鄙(正确些说,这种卑鄙也滚滚而来流向这里,特别是如科涅夫元帅、叶麦利扬诺夫等首长大人们的回忆录等,然而应当说其数量是相当有限的),而是保持着有高度文明素养的杂志的那种认真的腔调,似乎这个杂志是超乎时间之上的。杂志的前一半常常是言之无物,渺不足道,然而后半部分即政论、评论和书刊介绍等栏目经常办得认真严肃,很有内容,令人感兴趣。

但是也有另外的范围:这个杂志应当办成什么样子,以使我们的文学极大地得到提高。为此,《新世界》应当在所有栏目里刊载些大胆地积极的材料,这是与以前有所不同的。为此,它的每一期的形成都应当不以上层今天的情绪为转移,不以恐惧和传言的摇来摆去为转移,不是囿于昨天批准的范围之内,每一期都应当多少超越一下这个范围,为此,当然要有一定的勇气,敢于跑着用额头去撞墙壁。

会有人反驳我说这是胡言乱语和痴心妄想,说这样的杂志在我们国家里连半年也存在不了。人们对我说,《新世界》在可能这样做时,也没有允许哪怕是安排半段这样的内容。不论杂志怎样尽力圆滑、隐晦、有分寸地表达,它由于发行量

多和知名度高而得到了补偿，它不倦地动摇着破墙的砖石。编辑部不能使劲地撞它一下，撞得它轰隆一声倒塌下来，然后杂志也结束自己的生存。杂志和剧院、电影制片厂一样，也是一种工业，这不是自由自在的单干户的意志。它们都和许多人的经常性劳动联系在一起，在有迫害的时代它们不可避免地需要随机应变。

也许这种反驳比我的看法更有道理。可是我总不能摆脱这样的感觉：《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做到力所能及——比如说22大之后最初的几个月，那是一去不再复返的自由的几个月，而《新世界》是怎样利用的呢？有多少期《新世界》杂志是在中间地带勉强挣扎？有多少期里除了两三篇可以看的东西之外，其它的全是难以下咽、索然无味的货色？以致于好坏作别的对比看有效系数大大低于最不顶用的热力发动机。这全是因为编辑部里积极的力量受压制，而披着迷彩伪装的傀儡上层（扎克斯、康德拉托维奇之流）却急于作出任何牺牲，只求保住安宁和宝座不要摇动。

年复一年，我们这份自由杂志热爱自由的精神并不是像以冲破阻力投向这惟一杂志的热爱自由的手稿为依托那样，从编辑委员会的热爱自由精神中得到发展。这个依托是很大的，不论怎样抛弃和摧残，其中总会残留一些宝贵的东西。认为有些作家可以接受，高傲地看着他们，向他们大喊大叫。自由的杂志内部保守主义的上层进行着僵硬的统治，向上报告只讲天官赐福万事顺遂，而不体面的东西早在人口处就给顺利地扼杀掉了，这和《莫斯科》杂志和《旗》杂志毫无二致，只不过是扼杀起来更具有友好气氛。这些否决大胆的手稿的事，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无所闻，仅能听到一些歪曲了的传言而已。

他曾这样对我说过类似的事情：

“常常偷偷给《新世界》塞来一些写反苏作品的挑衅作家。他们说，你们是惟一的一家自由杂志，不然往哪儿去投稿？”

他认为自己编辑部的功劳是及时的识破了这“挑衅”并且否定了它们。可是，这些“挑衅”就是自由，是俄罗斯文学这个母亲“偷偷”派遣了这些“挑衅者”。

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真相，而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特瓦尔多尔夫斯基则与我相反，他干一些无谓的事情，要把没有希望的事情向前推进）。我写这些涉及到几十部作品，它们都很接近于合法的规范，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的人不那么神经质地紧抓住圈椅的扶手，如果没有一种经常性的讨厌的恐惧禁锢着他们的话，《新世界》杂志本来可以为那几十部作品做更多的事情；这恐惧就是：“现在刚好是这样不合时宜”、“现在是这样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简直永不消失。

有一次我问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出于对杂志的关心，我可不可以向他推荐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他非常高兴地请求我推荐作品。我两次利用了我获得的这一权利——不仅很不成功，而且使我和杂志的关系产生了麻烦。

第一次，还是在我们的蜜月里——1962年12月，我说服沙拉莫夫从《科雷马河诗抄》和《小长诗诗集》选出一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好诗，送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装在一个密封公文袋里，经由秘书转交。

《新世界》虽然是由一位诗人领导的，而杂志的诗歌栏办得却很寒酸，没有发现一个杰出的诗人，有时发现了一些，但不是什么大家，很快便被人遗忘了。杂志对外交上的“民族礼

仪"过多注意，刊载一些加盟共和国诗人[①]所写的诗的译文，或者刊登已经成名的某个诗人的两三首小诗，从来没有拿出一组像样的诗，可以代表思想或形式方向的诗来。《新世界》刊登的诗作向来都不是艺术作品。

沙拉莫夫选出来的诗出自《小长诗诗集》，有《荷马》和《阿瓦库姆在普斯托捷尔斯克岛》[②]，还有约20首诗，其中包括：《在寒冷的夜里》《有如阿基米得》《葬礼》。在我看来，沙拉莫夫本人和他的诗，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仅仅是诗人诗作。这些诗来自新鲜的记忆和内心的痛苦；这是我的劳改营兄弟，以前我们天各一方彼此并不认识；他和我一样，写作的时候体力不支，勉强能够挪动脚步，要把写的诗背熟，最主要的是要藏好诗稿，不被搜走。由于要全面地消灭劳改营里从事写作的人，从那里爬出来的只有不到我们5个人。

我不认为自己在诗歌方面可以是裁判员。恰恰相反，我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具有细腻入微的诗歌鉴赏力。就算是我完全错了，在《新世界》诗歌栏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应当这样急急忙忙地否定这些诗吗？当我的这些随笔得以出版之时，读者会已经读到了沙拉莫夫的这些遭禁的诗歌。读者会肯定

---

① 有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学，也有世界文学（在各个高峰上环绕的文学）。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的"多民族的"文学（按比例的文学，如民族院的席位）。这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它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在过去几十年也影响了我国文学的发展。

——作者原注

② 阿瓦库姆（约1621—1682年）俄罗斯正教会大司祭、教会分裂派领袖，反对牧首尼康的改革，主张保持东正教的旧礼仪，把反对宗教改革同反对有权势者和教会上层的横行霸道结合起来，两度被流放，1667年第二次流放时被放逐到北方的普斯托捷尔斯克岛，在地牢里度过15年，1682年5月14日被沙皇下令处以火刑。

——译者注

这些诗的强有力的音调,感觉到它们血液的流动,这些都是年轻诗人们的经验难以企及的,读者们会自己作出判断,它们是否应当受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冷遇。

他对我说,他不仅不喜欢这些诗,因为他觉得"有太多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气味";他甚至还谈到了这样的细节:拆开我的信封时,他曾经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新鲜的东西。他给沙拉莫夫写信说《科雷马河诗抄》他完全不喜欢,这不是能够触动我国读者情怀的那种诗。

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了解释,说这不是沙拉莫夫的"阴谋",是我亲自建议他选一些诗,经过我来转交的,然而特瓦尔多夫斯基一点儿也不相信。他对于简单明了的解释的接受能力简直差得令人吃惊。他对沙拉莫夫搞阴谋诡计要弄我确信不疑。

第二次(已经是1964年秋天了),我有幸据理力争敦促编辑委员会印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遗传学史概论》。概论里对人民不完全了解的遗传学论战的本质作了通俗的阐述,书中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利用已经是完全合法的材料发出反对非正义的激情和呼唤,而且这种呼唤确实激起了社会公众的心灵。这本书得到了编辑部"一致的欣赏"(当然了,杰缅季耶夫反对),在编辑部会议上,特瓦尔多夫斯基请求我停止连续的论证,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确信无疑"。他们只是请作者"略作删减";然后再要求作"大的删减",然后"再稍微等待几个月",就这样还是出了故障。因为这本书表达出的自由思想已经超过了允许的限度。

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不可原谅的是就《鹿与小窝棚》剧本一事我竟敢去找《现代人》。他胸中的积怨没有平静,没有止

息,仍在"呼之欲出"。他有许多次毫无必要地回到这件事情上来,而且不只是否定这出戏,不只是谈起这出戏时心怀不满,而且预言这出戏肯定不会问世,也就是说他表示相信书刊检查粗桩防护作用的稳固性。不仅如此,他还对我说(1963年2月16日我们合作顶峰的3个月之后!):

"我不是要禁止这出戏,如果这由我定的话……我还要写反对它的文章……即使是禁止发行它我也要写。"

当他说并非善意的话时,眼睛闪出冷峻的光芒,甚至觉得是泛出白光,这时已经完全是另一副面孔,所谓的童稚气已经荡然无存了。(要知道为什么要禁止吗！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这是多么善意的动机呀……)

我提醒他说:

"可是您曾经亲自建议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取消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呢?"

他未置一词。但是心里并没有同意,肯定没有同意,只是心灵深处不知怎么作了相应的调整。既然他不喜欢这东西,干吗不可以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阻止它呢！……

特瓦尔多夫斯基作出的这些回答把我们的友谊在最初阶段就砍成了几段。

特瓦尔多夫斯基不仅是威胁要干扰剧本的种种活动,而且确实进行了干扰。就在1963年3月初的那几天,为了寻找解决剧本问题的途径,我自己把剧本寄给了列别捷夫——《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恩人。现在列别捷夫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读过它吗？他说了些什么?"我做了回答(语气缓和地)。他们俩又进行了接触。3月21日列别捷夫信心十足地拒绝了我:

"我深信不疑的一点是处于这样状态的剧本不适于在剧院排演。《现代人》剧院的活动家们(我不想指责他们或者向他们兴问罪之师)想要演出这个戏是为了吸引观众[1],既用您的大名,也用无疑会在舞台上响彻起来的主题来吸引观众。我毫不怀疑,观众会有的,他们会'挤满'剧场,他们需要了解……劳改营里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然而……剧团最终仍会不得不拒绝排演这出戏,因为会有'许多肥胖的大苍蝇'像乌云一样涌向剧场,关于这些苍蝇,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些肥苍蝇就是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我们的应有尽有的市侩和其他各色人等。"

特瓦尔多夫斯基与列别捷夫的关系不是仰人鼻息的编辑与御前顾问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似乎都把这种关系称为友谊,对于列别捷夫来说同国家的第一诗人交友是一种荣幸(按照官阶表不知从哪一年起这一点已被正式承认)。列别捷夫珍藏着他的(随后还有我的)亲笔签名(此公非常仔细,我想他会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当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列别捷夫送来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稿子时,外面裹着的是一批白发老作家的推荐信,列别捷夫很乐意把自己表现为鉴赏家,表现出他能出神入化地评定艺术品的质量,并且不忍心用粗糙的框子去触动柔弱的艺术品的结构。

他怎么来到了赫鲁晓夫身边?以前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始终没有了解到。这位神秘的最高级自由主义者自称自己的职业是新闻工作者。也许同伊利切夫个人之间互争高低在支配着他,而他只有骑上自由的小马才可能超过伊利切

---

[1] 试问哪一个剧院又有什么别的希望呢? ——作者原注

夫？……我和他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一次会见”时相识的，这是1962年12月17日。

这次会见我可以根据笔记描述得详尽具体，但是这样做离题太远，而且除了我之外其他一些人可能已经做过介绍或将作介绍。让我去参加第一次会见的通知来得突然，搞得我措手不及：星期六晚上州党委会通知学校说星期一我应召到中央委员会去见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文学艺术主要的扼杀者），将由州党委的汽车送我去莫斯科。根据从事地下写作时形成的情绪，我陷入了阴暗的猜测之中。我断定波利卡尔波夫未能禁止东西出版，现在他甚至有可能把我赶进牢里去。于是我故意穿起了在“工作服商店”买的学校制服，脚上登了一双修了又修的皮鞋，黑皮子上面打了许多红皮补丁，胡子拉碴，完全没有修边幅。这副模样抵赖、装胡涂都更容易一些。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头呆脑的乡巴佬，被送进了像大理石一样光滑闪亮的接见大厅，在这里我那件破得不能再破的大衣被身穿仆人制服一身笔挺的年轻人接了过去，穿燕尾服的招待员送上由七道菜组成的豪华的午宴。一大群摄影师、电影摄影师、电视摄影师的灯光照射着各位名人（用餐时被照的对象给遮起来）。

在休息时间，就像是出于偶然（实际上是有意安排）有一些人从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桌旁走过：忽而是不可一世的红脸颊的阿朱别伊、忽而是善于曲意奉承的小人萨丘柯夫（《真理报》总编辑），忽而又来了一位身材不高，颇有些文人风度，目光和举止全都很朴实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急忙把我介绍给了他。此人就是列别捷夫。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根本不

像党的活动家,倒像一个十足的文静的知识分子(他戴了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只见一个镜片闪光,给人的印象像是戴着夹鼻眼镜)。也许因为他是主要的恩人,并且看人态度和善,总之我认识的他就是这个样子。谈话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要我相信,我"已经进入了轨道,谁也不能强使您离开了",他夸奖我拒绝回答记者,要我送他一本有亲笔签名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个人是上帝派来照料理智不清的赫鲁晓夫的天使,是一个类似契诃夫的天使。

在这第一次的克里姆林宫会见时又大肆吹捧了我,一再给我鼓掌,给我拍照,可是,22大的激情正是利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斯大林主义者们一般性的反攻已经发动起来,而毫无远见的赫鲁晓夫竟然以一种慈悲心肠去支持这种反攻。我们听到了他大谈什么出版是远射程武器,它应当由党来检验,说什么他不是"自己活下去也让别人活"这个规则的支持者,说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和平共处乃是道德上的垃圾,而斗争不能容忍调和。

第二次克里姆林宫的会见——于1963年3月7日至8日举行,是赫鲁晓夫整个执政时期最可耻的一页。斯大林分子拉来的人从力量对比看大4倍(邀请了机关干部、州委干部),创造了一种疯狂叫嚣的气氛,一种对散发自由味道的一切横加摧毁的气氛(只是还没有涉及到我,他们迫使肖洛霍夫和科切托夫改变了准备好的发言:他们体谅了赫鲁晓夫"个人的艺术审美力")。有一阵子,大约几个小时(唉,时间这么少真还算幸运!),完全恢复了30年代的那种不容异见的偏执气氛,像是那个时候"完全一致"的会议,这种会议教育培养了无情无义的野兽,而注定要被折磨死的遍体鳞伤者们只能活到

夜里。还有最后一点，赫鲁晓夫看清了他在农业、行政、国际方面的各种创举的主要敌人是抽象派艺术家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于是这位尼基塔怀着满腔怒火大砍大杀，似乎是拳头发痒，眼睛被仇恨蒙住了。他喊道："喂，我说那边，在圆柱旁穿红色绒线衣的人，您为什么不鼓掌？来，到这儿来！来，让他发言！"于是斯大林分子疯狂地大喊大叫指责艺术家加利增："让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鼓掌？"他们一气之下辱骂忠心耿耿的罗日捷斯特文斯基和沃兹涅先斯基。"我不能心平气和地听给我们敌人拍马屁的人。"赫鲁晓夫敲打着桌子，就差一点儿动用皮鞋敲了，他是在扯着嗓子喊叫："不要碰青年人，不然你们会掉进党的磨盘里的！"

赫鲁晓夫用这样的会见不仅把我们推回到22大以前，而且推回到20大以前。他把自己头颅的这个台球送到了斯大林分子的球囊里——只需要轻轻一击。

这次会见时列别捷夫并不想同我见面，他满面愁容，急于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室走廊里的各个房间走进走出。表情呆板，一脸官气。两周后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谈到有关剧本问题。

而思想意识的旋转木马游戏继续加快旋转，现在已经很难让它停下来，就如同不能够让太阳停止转动一样。两次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刚刚收场，又想像出了最重要的花样：1963年6月举行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中央全会（在这荒唐而又疏于管理的强国里尼基塔没有更大的操心事儿）！而且按照赫鲁晓夫的气魄邀请了数千名州里选出的"工作者"参加全会。现在我不得不整整一个星期顶着酷热去开会，整整一周参加全会累得头脑发昏，就好像我是一个某某年人党的党员，

而不是一名劳改营分子，不是刚获得几个月自由的作家。我的倒霉的荣誉开始把我卷进宫廷圈子里。这已经败坏了我的经历。

我不得不去请求列别捷夫接见，劝说他免除我被邀请参加全会的崇高荣誉，宽恕我。这样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在党中央主楼梯（又称赫鲁晓夫楼梯）的第5层上。

我的要求很使他吃惊——别人在到处想办法要参加会见和全会的票，打电话求人想办法搞到，往往认为这是荣誉的尺度。我能对他直说吗？当然不能。我编了一套家里有困难之类的理由。[1]

列别捷夫又再次向我解释，为什么说我的剧本写得不好，因为在劳改营里人们改造好了，才从那里出来，而我的剧本里看不到这一点。还有（这很重要！）这出戏会惹恼知识分子阶层——有人在那里适应了环境、有人为幸福而奋斗，而我们这里已经习惯纪念那些在劳改营里牺牲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戏里不诚实的人取得胜利，诚实的人却注定要死去，这太不自然了。（关于这出戏的悄声细语已经成为过去，甚至尼基塔·赫鲁晓夫都过问过：剧本怎么样？如果是像《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的，可以让他们演出它。可是列别捷夫对他说："不必了。"）列别捷夫显然到了同我使用所有限制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服我："如果今天托尔斯泰仍然活在世上，写的东西仍和从前一样（也就是说反对国家吧），

[1] 特瓦尔多夫斯基后来批评了我："可是'十月党人'会想这是您不再受到重视，说您垮台了，无论如何您没有权利拒绝出席全会。"因为我已经不是我，贬低我也贬低了《新世界》……几十年来的文学就是由这样的政策所组成的……

——作者原注

那么他就不再是托尔斯泰了。”

……

他不时地举起手中的烟头，像是在同重要的中央委员们谈话（其实讲的全是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开开玩笑，谈谈足球，嘲弄一番《共青团真理报》上的几篇文章），他一动一动地像抽搐一样地笑着，看上去很不舒服。他不停地给我拍照，弄得我都头疼了，夸耀花了550卢布买来的西德“莱卡”照相机，“我们的书得了奖金”（这是指列宁奖金，是有关尼基塔访美情况的报道）。他以一种自豪的态度非常高兴地给我看了几本天鹅绒面的相册，里面赛璐珞的薄膜下面保存着许多彩色大照片，记录着尼基塔每一次出国游历的情况：伊利切夫时而身穿海神涅普顿的衣服[①]，时而头顶盘子作杂技表演；阿朱别伊和萨丘柯夫以丑角的滑稽表情贴近女神塑像，赫鲁晓夫正在亲吻漂亮的缅甸姑娘；葛罗米柯坐在飞机的沙发椅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们确实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幸福的社会里（顺便指出列别捷夫所有这些照片的洗印放大加工都由党中央的摄影实验室来完成，而列别捷夫本人只在工作时间仔细看一看，进行一番分类并且把底片和照片放到应当放的位置上）。

在一个照相本里，以一排书柜为背景（刚才他也给我取了这样的背景拍照）肖洛霍夫和米哈尔科夫正在那里微笑。也

① 据罗马时代的大理石像，海神波塞冬——涅普顿裸露上身，手持三叉戟。
——译者注

给了我位置……无论如何列别捷夫也没有想到，他把我看错了。

但是，我自己也失算了，我以为我会有两年或者哪怕仅仅是半年时间用来堵住所有的窟窿。我出版的机会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又错过去了。人们让圆滑的科热夫尼柯夫来试验一下皇家对我的保护究竟稳固到什么程度。在一篇八面玲珑的文章里他验证了是不是可以稍微碰一下《玛特辽娜一家》。原来是可以的，原来，无论是我还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都没有"来自上面的"保护（而列别捷夫胆怯了：为什么要和我们这样紧密地捆在一起呢！），于是就接二连三地放出了几篇文章，先是骂短篇小说，后来就连最上头肯定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遭起诅咒来，没有人出来保护。

说老实话，经过了劳改营的锻炼之后，这些攻击伤害不了我，也不能使我恼火。常言说，任他人破坏和捣乱，我们照旧玩乐不改变。相反，更使我感到惊奇和侮辱的倒是以前的那种毫无节制的吹捧。现在我完全乐意在打成平局的基础上讲和：随你们的便去在一旁小声吠叫吧，只是不要咬人，我会老实地呆在这里。现实考虑一下我的处境极佳：以火箭般的速度吸收我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且解除了学校的工作，学校曾占据了我很多时间；生平第一次我可以住在河湾旁或者秋天的树林里，我可以写作了，此外，我还被准许在公共图书馆的特藏部工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禁书。抱怨不刊载我的作品简直就是罪孽：没有人妨碍我写作，还要怎样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写作，还需要什么？

岁月在流逝，我写得很多，四大部分：为《古拉格群岛》搜集资料（向全国宣布我为劳改营份子，而劳改营份子们却在诉

说),搜集为1917年革命要写的一本我多年梦想写出来的主要小说(暂定名为《1917年革命》),开始写《癌症楼》,设想从《第一圈》里选出几章以备遇有机会时有一天突然抛出。

沉默!似乎我这样的处境之下沉默是最有力的武器。可是你和一个善意待人的编辑部有了瓜葛之后,要想沉默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心灵得到宽慰,我经常往编辑部那里送些东西,为的是不错过机会。有一次我把一部诗体中篇小说的几章送了去(《献身者的公路》,也是经过改写重抄变得和缓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理所当然地否定了它。"我理解,"他说:"应当写些劳改营的事,否则会长满青苔的。但是……"他有些激动:"我是不是生气了。"我安慰他说: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如果您一定否定我的10部作品,第11部我照样还是会给您送来的。"

他神采飞扬,由衷地表示满意。而我的许诺不幸而言中成了预言:不是10部或者几部,总之我一直给他送了许多稿子,直到最后弄清楚他对我已不感兴趣。

1963年春,我为杂志写了一部短篇小说,本来从我内心的愿望讲是可以不写的,小说的名字叫《为了事业的利益》,这个小说似乎攻击得也很够劲,然而在克里姆林宫几次会见后,在压缩空气的条件下似乎可以通过的。可是写得很吃力(失败的明显象征),而且开掘得不深。不仅如此,在《新世界》编辑部受到了广泛的称赞,这一次甚至是一致的称赞(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可巩固杂志的地位:看,他们把我带进了文学领域,并没有造成思想上的错误。

杂志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对我享有权利,当我外出的时候,扎克斯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向书刊检查部门作了让步,删掉

了我这部短篇小说中几处尖锐的地方。这是他们对很多作者经常采用的手法：应当拯救每一期杂志！应当让杂志存在下去！如果这样做作者方面不满意，那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外出回来之后我严厉地责怪了他们。特瓦尔多夫斯基站到扎克斯一边。他们简直不明白我干吗要大讲原则性？瞧，改坏了小说不高兴了！你是《新世界》的作者，有杂志才有了你，你应当为杂志作出牺牲。

由于印发这个短篇小说，我心头留下了反感，尽管在我们这里书刊检查很严格的情况下，小说还是引起了很大轰动。以这篇小说为起点，我开始脱离自己原来的立场，出现了趋炎附势的征候。

我并没有马上学会和掌握对待《新世界》也应当使用平常"抗上"的计谋：不要总出头露面，先要做些侦察，嗅一嗅是什么气氛。1963年7月这一次当我为书刊检查官的有意歪曲大发其火时，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极力想把自己的喜悦传达给我（尽管这是徒劳的）：

"刚提到您，您就来了。上头谈起过您！"

我说的是"喜悦"，可是喜悦的情况各不相同：当他不是纵酒豪饮时，他健康，神采奕奕，而现在他则是一双浑浊的眼睛，半死不活，让人可怜（昨天刚刚给他服药，强使他宿醉初醒，把他送去中央委员会见伊利切夫）。他还不停地抽烟，一点儿也不怜惜自己的身体！他的这一次喜悦是在伊利切夫处开会时感觉到有某种"新的精神微微袭来"，觉得有一些"温暖的气息"。（这只是宣传鼓动部的又一次摇摆，是手腕。但是，在一家失宠杂志主编的毫无权利可言的屈辱生活中，在真诚地触摸在胸前的小红书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注定要情绪低落，由于

二流中央检查员不客气地电话打扰他，而常常喝得大醉，由于主管文化工作的局长们居心不良的笑而赔着笑脸奉承。）

那里，老广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正在重新研究参加在列宁格勒召开的“欧洲作家联盟”有关长篇小说命运的讨论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特瓦尔多夫斯基费了很大劲才使他们同意把我列为代表团成员（所以伊利切夫才作了让步：讨论会也需要点缀。）

他还没有讲完，而我已经明白：我无论如何也不要去参加！浮在表面的作家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旋转木马似的生活组成的……代表团构成者们显然全都意见一致，稍有超出共同意见的表示不仅是对祖国的背叛，而且是对《新世界》这个亲爱的杂志的背叛。讲出自己心头所思所想，根本不可能。而且也为时过早。而作为一个被人摆布的长尾猴出国去，简直是耻辱。我已经拒绝了那么多西方的记者，我今后也应当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您为这事奔走太费心了。我根本不想去那里，而且让我去也不合适：我才从列宁格勒来，我也不习惯出去闲逛。”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鸿沟，在我们有文学交往的整个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被跨越过：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理解，也不能接受对方所想的东西（由于我的工作鲜为人知，我工作的目的也很少让外人了解，他就更加不能理解我）。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恼火（他经常不把全部的气恼一下子表现出来，可是随后多次在生活中提起。实际上我也如此）。

“我的任务是维护正义。您如果愿意，您可以拒绝，但是

为了苏维埃文学的利益您应当参加代表团。"

可是我并没有向苏联文学宣誓效忠啊。

这时,在3月的"会见"时被羞辱过的涅克拉索夫也跑出来劝我。他在基辅受到审查已有几个月之久,连他也劝我要出国!唉,他还有这么许多的事情不理解,而且解释不清……

内心里友好的激情吸引他们俩要去饭店,而我宁死也不愿意跨进饭店的门槛。由于决定不下来究竟去哪儿,我们先到了斯特拉斯街心花园。这时我才发现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过横道的时候脚步不稳而且跌跌撞撞(他说:"这些莫斯科的横街真够难走的了")。是的,他除了坐汽车过马路之外,已经不大会用别的方式了……乘车的人不可能理解步行者,甚至是在专题学术讨论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讨论会当然会是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的,没有几本可供争论的小说。而且一般说来,现在没有小说,实际上,"在我们的时代是否可能有长篇小说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已经开始写《癌症楼》了,《第一圈》已经脱稿一年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怎样把书稿给他,我还不敢。我将被捆着手、堵住嘴去参加讨论会,而且还要听人们冗长的像祈祷词一样的喋喋不休:长篇小说死亡了,长篇小说已经衰败!不可能再有什么长篇小说!……)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还颇具伤感情调地说起,西方认为他是一个先进的出版家,他因此而名扬海外,但是人们不了解他还是一位诗人。"可是我的诗节奏感很强,而且很有内容……"(不,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时髦,而在于怎样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优秀诗作的俄罗斯风格、乡土气息、农民格调译出来?)"是的,我的组诗《炉匠》全欧洲都知道。"他在自我安慰。

一切一切都不如人意:又是在基辅对维克多·涅克拉索夫

进行审查，还有我的冥顽不化，他们离我而去了，去找个地方喝点柠檬。我送走了这两个似乎是不可救药的人：现今时代讲求速度，而他们竟无处消磨时间。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为了逃避讨论会，我不得不乘自行车离家出走，而且走时不告诉家人我的去处。过去学校的校长经常召我赴命，今天作家协会也对我如此要求，或是电报，或派人来，总之我必须召之即来！这一次他们没有找到我。

（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很成功地利用了这次讨论会，他后来把与会者拉到了休养圣地皮聪大，造访了赫鲁晓夫的别墅。列别捷夫又一次提供了效劳的机会：有意安排了一次《焦尔金游地府》的朗诵会。外国人呆头呆脑，不知所云，赫鲁晓夫捧腹大笑。这就是说这首长诗被批准了，勉强通过了。[1]）

《焦尔金游地府》写好之后搁置了9年，有整整9年它束缚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手脚，在此之后，人们似乎得到了某种解脱而可以冒险了。于是在1963年秋天我从《第一圈》里选出了4章，把它们试着提交给《新世界》杂志，名义上叫“片断”。

他们拒绝了。因为是“片断”吗？不只是。又是：监狱题材……（这个题材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看来已经“耕耘多次”了？）

当时他们要印一下预告——明年刊些什么？我提出：中篇小说《癌症楼》，我正在创作中。书名不合适！给人感觉是

---

① 坏蛋阿朱别伊率先出版了这部长诗，但是加了一段序言，指出肖洛霍夫如何如何高兴地听了这部长诗的朗诵（?！……），阿朱别伊本人即如此，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自己30年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会听……

——作者原注

一种象征，而且，即使不是象征，“就这么叫也叫人害怕。通不过。”

特瓦尔多夫斯基习惯于对寄给《新世界》的所有作品都重新加以命名，这一次又马上确定：

“就叫《病人和医生》吧！印在书名预告里。”

真是乱弹琴！病人和医生！我拒绝了。恰到好处的书名，甚至短篇小说的名字，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得来的，书名是心灵的一部分，是本质，它是生来就有的，改变书名已经是伤害作品了。如果扎雷金的中篇小说取了一个不定型的名字《在额尔齐斯河上》；如果莫扎耶夫的《活人》忽然改名叫《费多尔·库兹金生活片断》，那么这将是不可救药的伤害。可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这是小事一桩，而编辑部奉承者和爱说甜言蜜语的朋友们却使他坚信他具有非凡的改换书名的本领，一眯眼睛马上就能想出来。他改的名字全是不显山不露水，比较缺乏表现力的，他指望这样易于通过书刊检查，真的是这样。

由于没有协商好，《癌症楼》未能被列入杂志 1964 年的出版计划。但是杂志参与了为我争取获得列宁奖金的活动……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于这场斗争，对于朝三暮四的阿朱别伊的每个狡猾的手段都非常注意。当然，初选时他宿醉未醒，是在他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第二轮竞争时他积极参加了，仔细地权衡过委员会内部的种种微妙关系（赞成谁，才能使自己有更多的支持者）。在文学组里表决的情况完全不是有什么偶然因素，甚至可以说有些先兆：所有各少数民族的评选委员和特瓦尔多夫斯基都赞成授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反对票的是其他所有的俄罗斯人。

反对票居多数。但是根据评选条例,还要考虑戏剧和电影组的投票结果,而那里赞成票占上风。于是提交秘密表决的名单中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违反了“俄罗斯”作家表决的愿望！这使敌人们很不安,在全体会议上共青团第一书记巴甫洛夫公然发言对我进行攻击污蔑,这是一系列不实之词中的第一个和最无害的:他宣称我不是由于政治性案件而被收入劳改营的。我是因有刑事犯罪的前科。特瓦尔多夫斯基虽然大喊了一声:“造谣!”却又有些惶惑:万一这种指责是事实又该当如何呢？这是很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已经有两年多了,我们在编辑部里见面或分手时总要相互亲吻,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或者岗位间的不同仍然很大、不可逾越,以致于他没有冲动发问,我也没有理由讲述为什么我坐牢。(是的,不论是我曾随便向什么人讲的有关监狱和劳改营生活的情况,以及前线生活的情况,我一次都没有向他讲过。而他对我也从来没有讲起过家庭被流放的事情,尽管我提起过这个话题,尽管我对他家庭被流放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他只向我说起过他自己的文学官场生活和“御前”生活的片断:赫鲁晓夫委托5位诗人和5位音乐家创作新国歌;《真理报》《消息报》《十月》杂志各位编辑的种种手段,他也讲到自己回敬的手段:经常看上去比较呆板,却总能维护住尊严)。现在,他只用了一昼夜的时间,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从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找到了为我平反的法院判决书副本(在自由突然降临的时代,这些文件自然应当汇编成册公之于众,可是它们对于被宣布无罪的被平反者本人都还保密,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同军事审判庭打交道才知道了找到这些文件的途径)。第二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列宁奖金委员会举行秘密表决前的一次会议

上,以动人的语调当众宣读了判决书副本。人们听到的是:早在战争年代我就是"个人崇拜"和我国伪文学的反对者。共青团中央书记不得不起立道歉。然而机器已经开动了。早晨出版的《真理报》在表决前两个小时宣称,根据迄今为止对于列宁奖金所提出的崇高的要求,关于集中营一天生活中的中篇小说当然不配获得这项奖金。在秘密表决之前,还专门责成奖金委员会的党组表决时反对对我的提名(特瓦尔多夫斯基毕竟还是告诉了我:没有人搜集投票结果。第二次召集委员会再投一次票。伊利切夫亲临督阵,吩咐当着他的面再投票——为冈察尔的《小铃铛》争取列宁奖金。冈察尔已经数度获奖,本人又是评奖委员会成员,他就坐在投票箱旁毫不羞耻地观察这次秘密投票)。

当时,也就是在 1964 年 4 月,在莫斯科就盛传这一次列宁奖金的投票是反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叛乱演习"。能不能够否定他本人亲自推崇的书? 40 年来没有人敢这样做。可见现在敢于这样做了,而且成功了。这表明,尼基塔本人地位并不稳固。

最后一次表决前的早晨,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斯特拉斯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特瓦尔多夫斯基手拿着《真理报》的那篇文章,态度沮丧极了,像是收到了去奔父丧的电报一样。"完蛋了!"他不知为什么用德文跟我这样说,这同捷文中的"我要死了!"很相近。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外语。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了替我争取列宁奖金而不遗余力地努力(真是怪事:失败了之后他甚至没有酗酒浇愁)。给我列宁奖金是为了提高杂志的威信,这就好比是描在杂志蓝色封

面上面的勋章一样①。拒绝授奖给我之后，他急于想要（这样急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退出奖金评选委员会，以示抗议。可是杂志的同仁们和亲人们劝阻了他。他们说：他的任务是保住杂志并且领导杂志。这当然是对的。这不是理由。

我自己简直不知道需要什么。如果能获得奖金当然不无小补——确定了地位但是害处也不少。而且主要之点在于：确定地位是为了什么？要知道这并不会帮助我出版我的作品。"确定了地位。就要求必须要效忠。要谢恩，这就是说从写字台里不要拿出什么忘恩负义的东西来，而我的写字台里这类货色是一应俱全的。

整个一个冬天我都是在为编辑部和公众可能接受而润色修改《第一圈》（第87章），终于改完了。作品倒是改得轻松多了，不那么尖刻了，可是把小说抛出去仍和两年前抛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样，会冒很大风险：要越过至今从未跨过的界限。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喘不过气来？会也使他变成敌人吗？

为了避免发生不快，整个冬季，当他为列宁奖金奋斗的时候，我没有去影响他的斗争，也没有把答应交给他的《第一圈》给他送去。春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到了该读我的作品的时候了。可是怎样才能使他在读小说时暂时脱离开他的那些狗头参谋，首先是杰缅季耶夫吗？我需要特瓦尔多夫斯基形成他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对他说：

① 确实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在拒绝授予我列宁奖金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抱怨说，杂志的日子很难过，书刊检查机关对任何一个枝节问题都是百般挑剔、吹毛求疵。为了不使杂志拖期，只好作出让步。 ——作者原注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小说我写好了。如果一个作家一辈子就只想写两部小说，你知道他把书稿交给编辑部时意味着什么吗？就像是给儿子娶媳妇一样。请您到梁赞市我家里来参加这样的婚礼吧。”

他同意了，而且是很乐意来造访。这大概是他编辑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事。

他刚好在复活节这一天抵达梁赞（但是他未必记住了这个节日），我们倾尽所能隆重地欢迎了他——请他坐我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然而，当他钻进对他来说的确显得小的汽车时，他有些踌躇：按其地位来说他不习惯乘坐次于“伏尔加”牌的汽车。他是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坐地方火车来的，票也是自己在昼夜售票处买的，并没有经过苏维埃代表服务处，也许从他是一个斯摩棱斯克少年时起，他就没有这样随便地旅行过。

抵达后第一顿晚餐时他就策略地事先向我打招呼说：每个作家都有写得不成功的作品，应当平静地承受一切。从第二天清早起他便开始读我的小说，开始精力并不太集中，但是从早饭到午饭全都用来读稿子，连抽烟都忘记了。我装作偶然去看看他，看他读不同章节时的情绪如何。他从桌旁站起身来说：“棒极了！”马上又改口说：“我什么也没有说！”（也就是说他并不保证最终是这样的评价）。根据我对工作的理解，他应当一直保持清醒头脑直至读完这本书，但是要尽地主之谊必须在午饭时摆上白兰地和伏特加酒。沾酒之后他很快就失去了自制力，眼睛变得直勾勾的、灰溜溜的，他产生了一种大声讲话的需要。他想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给莫斯科（就买一所新的别墅一事与妻子磋商）；我家离邮局只有 400 米左

右,可是我们俩往返一趟足足用了两个小时,他几乎每分钟都要停下脚步,堵住人行道大声讲话,全然不顾及我让他快点走,或者讲话声音低些。他说:一个人不欠任何人的情;“领导者钟爱自己这一点让人感动”;他还谈到了科涅夫元帅[①],他为了夸奖特瓦尔多夫斯基曾经想让他从退役上校晋升为少将;谈到莫斯科户籍委员会的神秘:它有权决定谁可以住在莫斯科,谁不可以住;他还说到有些秘密地点(北海的一些岛屿),把战争中的残废者秘密遣送到这些地方(我是第一次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口里听到这些,我不怀疑其真实性;除了苏联人外,其他人全然不能理解:抛弃这些曾经给我们带来胜利的人,这些共同的英雄和牺牲品,为的是使他们不致因缺胳膊短腿而破坏了苏维埃生活的和谐外观,也免得他们大声疾呼要求自己的权利);他还说到了勃列日涅夫成了“个人崇拜的牺牲品”(因斯大林而受到牵连,他自己在摩尔达维亚首都基什尼约夫把城市公园收归国有作自己的府邸);他说起了诗集的稿酬不合理,大众化的诗比非大众化的诗稿酬低(我指出,他这是根据自己出版的作品作了仔细计算,一方面称赞说印的不错,同时又补充说“钱也给的不少”。这不太贪婪,好比一个农民从集市返回,心怀一种劳动者的善良的自豪感);他议论了布尔加科夫(说他“光彩照人,清新已极”)和列昂诺夫(说“高尔基过于推崇他了,不合适宜地抬高了他”)以及马雅可夫斯基(“智慧平平;不具备民族性,尽管在用教堂斯拉夫语怪里怪气的言词方面造诣颇深,不配为他建立与普希金广场并列

① 我在编辑部里看见过这位身穿便服的元帅。看上去像一个愚钝的中等集体农庄生产队长。 ——作者原注

的广场")。

这一天晚上我试图向其说明他的一位副手是小人,而另一位副手对他的领导抱敌视态度,完全是另外营垒的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杰缅季耶夫最近这10年有很大的进步。""他嘴角冒着白沫反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这算什么演讲?""他太迷恋……"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般地谈到他希望编辑部里能有一位"高手"——一位知识渊博、处事果决的副主编,就像他自己亲自掌管杂志一样(这个未来的"高手"已在编辑部里并且被提拔了起来,他就是拉克申)。

第二天读稿时从头到尾都有白兰地相邻为伴。一天结束了,他又是两眼灰溜溜直勾勾地看着人。

"不,你不能把小说的下半部分弄坏了。"讲这话时他的希望与恐惧各参其半。

读过第64章后他说:

"现在小说接近结尾,你是不再能把它弄坏了。"

读完另一章后:

"您是一个可怕的人。如果我掌权,我一定会把您监禁起来的。"

"是的,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在其他的情况之下,我也可能落得这样的下场。"

"如果我不坐牢,我就给您送东西,甚至会给您送去一瓶白兰地……"

"监狱里不允许。"

"我把一瓶酒送给伏尔科夫,另一瓶送给您……"

他开着玩笑,而监狱的空气日益进人和感染着他的肺腑。

读完第72章之后：

"明天我们完全谈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和您想像的完全不同：我们更多的不是谈您的问题，而是要好好谈一谈我。"

（谈他有限的能力？……谈良心的义务？……谈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这样的谈话没有进行，我不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心头所想）。

他自己也可能甚至必定要坐牢（说得准确些，是有如晚年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心灵哀伤的震颤：可惜我没有坐牢，我好像应当去坐……），这种情绪此行中他曾数度产生。旅途中他随身带着一本雅库鲍维奇·麦利申的书《无权者的世界中》，是这本书使他萌发了这种情绪，他极为关心铁窗生活的细节，好奇地问："为什么那里要剃光头？""为什么不许带进玻璃器皿。"就小说中的一个情节他说："需要慷慨赴死，可以从容去死，但是要值得。"有好几次，几杯白兰地下肚，已经失去了玩笑的语调和感觉，他又谈起了给我往监狱里送东西的许诺，又说如果我在监外，我也要给他往监狱里送东西。第二天傍晚时读到小说中的人物伊诺肯第入狱已不可避免时（"失去了安全感"），又喝了几杯陈年烈性伏特加酒，他已经沉入醉乡，这时候他要求我同他玩"克格勃中尉的游戏"：要我大声对他喊叫，数落他的罪状，而他笔挺笔挺地站在那里。

阅读小说竟变成了一次惯常的毫无节制的狂饮，而且是在不喝酒的作者家中，真令人沮丧！然而他的现实危险感不是来自于饮酒，而是由于读我的小说。

我不得不帮助他脱掉衣服，服侍他就寝。不久大喊大叫的声音惊醒了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喊叫，并且一个人用几种声调讲话，装扮几个人。他打开了房间里所有的

灯(他一向喜欢房间里光线明亮些:“这样愉快”),并且只穿一条短裤,坐在没有摆酒瓶的大桌旁。他可怜巴巴地说:“我即将离去并且会不久于人世了!”忽而又吼叫:“闭嘴!站起来!”而他自己马上跳起来,手指紧紧贴在大腿两侧,规矩极了。忽而又唉声叹气:“就这样混日子吧,我无力改变自己……”(这是他没有勇气因为我这本极其有害的小说而去赴死!),忽而又陷入遐想:“淋湿诺夫斯基!这是个多么怪的姓!可是扮演起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来,演技比我高超……”

我只好来到他住的房间,同他一起又待了一个小时。他抽起了烟,脸孔变得温和些了,开始说笑了。很快我又安排他睡觉,他没有再闹事。

到第三天时他已经只剩为数不多的几章还没有读,但是一大早起他就提出要求说:“没有伏特加,您的小说是读不下去的!”读完“不,不是你!”这一章时,他两次擦干流出的眼泪说:“我真可怜西玛……她像是去参加圣祭礼……如果是我,我会安慰她的……”总而言之,在小说的许多地方他的感受不是编辑心理的反映,而完全是心地善良的读者产生的共鸣。他嘲笑小说里的普里扬契科夫或者为阿巴库莫夫而大发宏论:“是的,对于像巴贝宁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呢?”谈到苏联作家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和冷气设备,他说:“要知道那里也是有诚实的作家的。说到底,我在那里也有别墅呢。”

他读完了书稿后,我们一起去参观梁赞的内城,谈起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要谈谈他自己的许诺看来已为昨夜的自我对话所取代了。

“您已经有了这样一部长篇,您还去搜集材料写下一部吗?”

我说："我一定还要努力。不能在河当中停下，应当夺取桥头堡。"

他说："完全正确。不然，写完了一部，松了劲休息一通。再动笔写另一部，见鬼！写不出来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从不同的角度赞美这部小说，用了不少有分量的词儿。有一些艺术家的见解，我感到十分荣幸（他说："叙述强烈有力，继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结构严密，是一部名符其实的长篇小说……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页多余，甚至连一行多余的话也没有……自画像中的嘲讽恰到好处。孤芳自赏是写不成东西的……您只借鉴最主要的作家，而且不是亦步亦趋，是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小说，容括了整个世界，40—70个人物，完全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还称赞书中有关大自然和天气的描写简捷明快，不拖泥带水）。但是，也有一些编辑的正式看法："内在的乐观主义……捍卫道义上的准则，"主要的一点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写成（！）……因为小说里没有谴责十月革命……而处在犯人的地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这个"站在党的立场上"（竟是说我的小说！……）真是妙极了。这并不是想要"击穿"小说的编辑恬不知耻的辞令。这种把我的小说和"党的立场"掺合在一起的作法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惟一可能的途径，没有它，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为诗人、党员，不可能给自己提出印行这部书的目标。可是他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并且向我作了宣布。

……

他觉得斯皮里东这个人物过于阴险狡猾，刻画得"多少有些城市居民的概念"。一开始我吃惊非浅——难道我对这个

人物描述得不够好吗？可是我马上明白了：自20年代起关于乡下人说了过多的坏话，以至于不是讲乡下人好处的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就感到不舒服。这是一种反应，一种不太情愿的美化。

第4天的上午我们曾试图劝阻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再开始狂饮，可是做得很不成功，由于我们没有给他喝点解醒酒，他完全失去了吃早饭的能力、自己不会把食品送进嘴里。他笑着，以一种受委屈的孩子的谅解他人的态度说："当然了，车累米斯人[1]是不喝解醒酒的。可是他们过的叫什么生活？多么低下的发展水平啊！"他总算勉强同意早饭只喝啤酒。在火车站他急忙登上楼梯跑进车站饭店，在那里喝了半升酒，几乎是什么菜也没有吃，就处在这种飘飘欲仙的状态等待火车进站。他一再重复一句话："不要把我想得太坏。"

这些个人生活中的隐私的细节可能不应当公诸于世。可是这样就不会理解领导《新世界》的是一双怎样一曝十寒、周期性虚弱的手，不会理解这个人有一颗多么博大的、包容一切的心。

我的意图是在杰缅季耶夫不在场的情况下吸引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我的小说发生兴趣，这一点似乎达到了目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不仅称赞这部作品，他甚至准备为这本书经受困苦的考验。分手时他甚至催促我尽快把有关斯大林的那几页重新改写好，把最后的定稿交给他。

而这样的结果已经超乎我的预料。我不能相信《第一圈》能够在1964年出笼。可是我为什么要把它给特瓦尔多夫斯

① 马里人的旧称。——译者注

基呢？……我想要怎样？可能又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样：把对作品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他身上。使他了解：这本书是这样的。使自己不至自我谴责没有为推动它的出版而有所作为。现在我似乎是卷入了一种虚伪的毫无结果的操心事当中，而且脱离了真正的工作。

两周后我把修改过的小说送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我所有的洞穴式的打字稿一样，这部稿子也是打了两面，没有留间隔而且页边也留得很小。要想派什么用场，还是要把手稿再打一遍。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家里接待我。这一次他干干净净，像儿童一样招人喜欢，身上穿了一件天鹅绒上装，以至很难想像他曾经是个酒鬼，好像是一头只穿一条短裤的吼叫的水牛。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妻子去亲眼好好看看近日新购买的坐落在帕赫尔的别墅(旧别墅他给了已出嫁的长女)。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仅已经醒了酒，而且也从对小说的赞叹中清醒过来，变得相当慎重了：他已经缩小了送审的范围，杰缅季耶夫当然还是首席读者。

不出所料，拉克申在编辑部里很快取得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任，在那些年代拉克申的影响是与杰缅季耶夫的影响相抗衡的，他们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激战后拉克申说：

"我和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两个人都是文学史专家，我们应当理解现在真正的文学史正是在《新世界》编辑部里创造出来，而不是在所谓'世界文学研究所'"。

这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些时候情况是如此)。拉克申支持《第一圈》。

小说打印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把所有的稿本全部放到保

险柜里，并且密切注意只让编辑委员会成员阅读(他甚至没有让散文部的各位编辑，这些从来就是不可低估的勤快人阅读!):他最害怕小说像《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辗转流传出去。

就是这样凑巧:复活节第三天他在我家里读稿，而他的编辑委员会集合起来讨论我的小说已是升天节了——6月11日。会议进行了将近4小时。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在开始时宣布这部小说是一种“誓言”。他说在过去的40天里小说对于他来说是“内心生活的对象”，他曾不断地思考，“不仅考虑到从永恒地角度看待这部小说，而且考虑将要读这部作品并对作品作出决定的人会是怎样一种态度。”

……

特瓦尔多夫斯基“避开”副手们读这部书稿已经证明没有白白浪费!正如他所说，“第一次讨论”在这里当着我的面进行。主编就是以这样一种庄重的邀请开始了这次讨论。进入讨论会场时我就注意了打招呼的顺序，一心想要最后一个同杰缅季耶夫互致问候。我想今天他会发动完全否定这部作品的攻击。会议一开始他就没有坐在舒服的安乐椅里，不知为什么却坐在开着窗户的窗台上，窗外大街上嘈杂得很。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放过开玩笑的机会:

“你是怎么回事?为的是以后说:我没有听到议论些什么吗?”

杰缅季耶夫依旧坐在那里，两条腿耷拉着，很不舒服:

“天气热。”

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就此罢休:

“那么你是想得肺炎了?好躺倒几天?”

杰缅季耶夫不得不从窗台上下来和大家坐在一起，他的情绪低落得很，甚至没有开玩笑回敬他的主编。因为他早就正确地预见到这场与不声不响的梁赞作者一起进行的游戏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争论由康德拉托维奇发起。康德拉托维奇的面孔似乎已经适应了应当怎样表达早已存在、早已提出的意见，他当时已经学会了以一种过分激动的腔调讲话，声音忽高忽低，就好像是已经准备好为这种意见慷慨赴死一样，特别忠于职守。可是我想像不出在具有独立成熟的意见时他是什么模样。如果不是因为长年累月和书刊检查机构打交道，他的嗅觉已经和书刊检查员的嗅觉一样了的话，他要开始这场论争会是很难堪的。正如军用望远镜里面就已有了测角刻度，望远镜里见到的一切都因之标上了刻度一样，康德拉托维奇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危险红线上的读数。

使康德拉托维奇感到高兴的是“长篇小说体裁没有死亡”而且在运动着。同时他又轻声说到“结构的破坏”，“叙述的艺术力量愈强大，揭露转化为象征的现象就愈多”（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安慰他说：“不，这里谈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可是被解放了的书记，这不仅是一个个别的党的领导人斯杰潘诺夫，这是象征！康德拉托维奇建议把小说中这里那里许多地方的“引起人发怒的挖苦话删去”。他甚至认为有关大卢布扬卡的章节也有“余多”之处。他表示担心，30年来已使卢布扬卡监狱的梯级都磨平了这样的说法“会不会给捷尔任斯基脸上抹黑？”他作出的结论是模棱两可各方面全不得罪的，就如同过去讨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一模一样：“发表不大可能。可是不发表道义上也不可能。怎么可以

让这样的作品束之高阁,而读者读不到呢?"

接着发言的是身材矮小左顾右盼的乏味的人——扎克斯。他太胆战心惊了,以至使平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不知去向了。开始时他说还应当再读一遍(即争取一点时间)。他说他很高兴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情的极大的难度(而特瓦尔多夫斯基不明白!这真不幸!这就是他想暗示的东西)。他说实际上他提不出任何办法,他只能体会。他体会到的是"监狱以外的所有各章并不全都需要,也不全都有趣,不需要把这些扩散到社会上去。认为在战场上士兵遇到的危险一定比记者要多,这是不对的:也有不少记者被打死了(扎克斯自己在这样的报社工作过)。此外他还对秘密电话问题表示关切(他那书刊检查员的嗅觉没有出毛病!而特瓦尔多夫斯基憨直地反驳说:"这是纯粹幻想出来的东西!不过想法很奇妙!")。他还不喜欢阿戈尼娜的那些情节和表现出来的基督教精神。主人公们大发议论的一些地方也写得不够好。那么多的故障、毛病堆砌到一起也过于不寻常,好像作者千方百计地努力什么都不想放过。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

"我有这样一个习性。我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例如,欧洲问题,我干吗需要谈这个问题呢?可以比较安心地绕开它嘛!可是我不能绕开它。"

他们已经习惯于那种害怕触及哪怕是一个问题的文学;而那种害怕忽略了哪怕一个问题的文学像是在他们的脖颈上套着的枷锁。

扎克斯的建议表述得非常具有外交格调:

"过早地让它出台,我们会把东西给糟踏了。"

(他支持这个东西,支持!所以应当在这里,在编辑部里就把它扼杀掉!)

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编辑部里的这些作法了如指掌!

"应当控制一下自己的恐惧心理!"他在教训扎克斯。

拉克申的发言是很与人为善的。可是现在我重新翻阅我所做的讨论记录(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快地记下大家讲的一切),在我的大量的记载中我看不出能从拉克申的发言里摘录出些什么话来。他站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边,读了整个作品,也读了有关斯大林的各章,认为没有这些章节是不行的。但是当他正是以这一精神谈到尖锐的政论性似乎同小说的整个层次不协调时,特瓦尔多夫斯基马上打断了他:

"请注意!这正是作家风格的特点!"

瞧,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主编!

马利雅莫夫只说了几句赞许的话,附和了别人的看法,说作品写得很好,而且反对一些人的看法,他说他看不出有破坏社会基础准则之嫌。

"政委有什么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存有戒心地问。有许多次对待许多部手稿他在形成自己的看法之前总是和这位政委协商一致,而且是他俩一起形成看法!而今天他的语调已经在提醒杰缅季耶夫:要想争论是很困难的。

而杰缅季耶夫没有奋起迎接我所等待的那种肉搏战。由于他生性郁闷开始发言时甚至有些六神无主的样子:

"我不打算谈具体细节……很难形成什么思想……(瞧,他有多么滑头!……)给这样的大艺术家提出建议,搞不好会很尴尬的……有时候政论是处在抨击的边缘上,相当于讽刺

小品……"

特瓦尔多夫斯基问："托尔斯泰难道没有过类似情况吗？"

杰缅季耶夫："……那他写得当然是很恢宏……有关斯大林的几章应当压缩为一章……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丧失思考和感受的能力，那么小说也会造成怀疑和恐慌……这是痛苦的、沉重的、令人震惊的真理……这个真理开掘得很深，以致于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超出了个人崇拜的范围……艺术和文学是伟大的财富，但不是最伟大的（着重记号是我作的——索尔仁尼琴注。）……变得令人难以索解了：为什么进行革命？（瞧，来劲了！挺起腰板儿了！开始冲锋了！）从哲学角度看没有得到作者做出的回答：要做什么？只有一点——作个体面的人吗？"（他诱使我探出头来露出胸部！……）

特瓦尔多夫斯基："这连加缪[1]也这么说。我们这里谈的是俄罗斯人的小说。"

杰缅季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而索尔仁尼琴，不作出回答……"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的。可是肉和牛奶的供应又怎么办呢？"

杰缅季耶夫："我还正在思考……现在我还什么也不能理解。"

连这一位也不理解！…又躺倒了。主编给了他们一点厉害。这时候马利雅莫夫和扎克斯耳语了一阵。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马上嘟哝了一句："你们在那儿说什么悄悄话？

---

① 加缪（1913—1960年），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译者注

说我们最好绕道走吗?"杰缅季耶夫非常激动,以为是在说他:"我才没说悄悄话呢! ……"

接下去杰缅季耶夫令人惊奇地转变了态度:

"作者不能对人们和生活态度善良些吗?"

后来又多次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指责:您不善良,既然您对鲁萨诺夫们、马卡雷金们、伏尔科夫们不善良,对我们过去的错误、对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也就不会态度善良(而他们对我们是善良的! ……)。"可是他不爱人民!"1966年让一群宣传员在秘密的专题讨论会上攻击我时,他们就是这样愤怒声讨我的。

但是在更早些时候人们鞭挞我,鞭挞伊万·杰尼索维奇,尤其是鞭挞我的不幸的玛特辽娜,这时恰是说我们"太善良"、"盲目的善良",说不应当对周围的一切全都善良(瞧,他们对我们也不是善良的!),说以德报怨,用善良感化丑恶只能助长世界上的丑恶)。(《十月》杂志愚蠢已极,长时期一味空洞地攻击"勿以暴力抗恶主义者",以为这就是在批判我)。

这一切是什么呢?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叫作辩证法……

在编辑部成员讲完了之后,我作了发言,我表示吃惊,编辑部的某些成员似乎认为我的小说不是针对个人崇拜这个盘根错节的而又远未彻底根除的现象,而是针对正在日益强盛的我们这个社会,或者甚至是针对苏维埃政权本身。然而,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机会,是要编辑部作出抉择,而不是我面临抉择:我已经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可是编辑部如果两次至三次解决问题不适当,恕我直言,它也一定会变成什么《旗》或《莫斯科》杂志了。

我就这样讲了些失礼的话。可是对我宽宏大量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会儿也没有生气，而且也不准任何别人为此而恼火。他宣称我这是向他们讲了恭维话：他们的杂志高于那些杂志。

整个讨论过程中他都迫使编辑部同意发表我的小说。现在他特别满意地对讨论作出了总结：

“我非常愉快的一点是第一次(?)没有人置身事外；只有我这个可以说是小有聪明的人坐在这里，没有讲话(许多人也正是想要这样！……)……我作为读者提出一点不为过分的希望：最好让这种生活有所表现，哪怕就只有一线曙光也好！让天边晨曦微露就行了，只做到艺术家能够做到的程度就可以了……”

天哪，那里已经不必我去照亮了。我认为，我已经给他们完全照亮了地平线。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自己主编工作的顶峰时期的这一瞬间，也是没有对任何事情加以坚持：

“即使托尔斯泰真的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上，难道我们能够期望他给我们些什么更多的东西吗？”

那些日子里拉克申坚持要和我就小说签定合同(胆小怕事的扎克斯吓得脸发黑，全身蜷成一团竟想出办法来逃避责任：签字本来是他的经常职责，这一次推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①

---

① 那些日子里，里甫希茨，一个多年来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有巨大影响的正统分子，对我的小说提供了一份书面推荐。这份推荐书预先估计到了如果书出版可能遇到的批评的阴云，它可能多少动摇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决心。我不得不写信去为自己辩护。——作者原注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还要等待什么呢?排印出版这本书,如此而已。可是我们那里编辑部的决定等于零,什么也不算。现在才需要绞尽脑汁去考虑:应当怎么办?

可是除了按照常规把书交给书刊检查机关任人宰割之外,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能够想出什么来呢?还拿去给那位列别捷夫吗?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我认为,如果小说里写的东西对列别捷夫有什么不好,他是不会帮忙的……这对他自己不利……"

列别捷夫当然没有帮忙,小说的事也就毫无进展。……这时已是1964年8月,可能列别捷夫已经嗅到他头头脚下的土地有多么灼热。他可能已经不止一次懊悔过是因为我他才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只试探着给了他小说的四分之一,告诉他说:"这是上半部,其余的部分正在赶写中。"

这时候由于爱伦堡的事情,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列别捷夫之间发生了冲突。波利卡尔波夫(主管党中央"文化部")和列别捷夫希望由特瓦尔多夫斯基出面承担否定爱伦堡回忆录的最后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作品不是由"书刊检查机关禁止",而是由"编辑部拒绝"。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十分自尊自重地回答说:"不是我让他获奖,当最高苏维埃代表,成了和平战士。我根本不是他的崇拜者。可是既然他又是奖金获得者,又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又是世界知名人士,而且他又是过了古稀之年,那就是说,不论他写的是什么东西,都应当给他发表。"

由于我的这几章小说,彼此的怨恨更加深了。列别捷夫宣称这些章节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污蔑。亚·特瓦尔多夫斯基

要求作出解释。列别捷夫只抛出一个例子："难道我们的各个部夜间工作吗？而且还不只是这些，还下跳棋……"①他还建议："把小说藏得远一些，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态度坚定地说："弗拉基米尔·谢留诺维奇，我变得不能理解您了，不久前我和您是怎样对待类似的评论文字和作者的？"列别捷夫："哎，您还不知道谁现在很不满意而且后悔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了！"

（从其他来源证实：尼·谢·赫鲁晓夫向一位退休将军诉苦说："哎，您要是知道索尔仁尼琴让我们触了多大霉头就好了！不了，今后我可再不干预这些事了！"）

常言说，一条小路上不会出现两次奇迹。究竟是责难列别捷夫退缩了呢？还是应当为他第一次有那样的勇气而吃惊呢？

《第一圈》的"运动"暂时到此结束。当然，在 1965 年的杂志预告里特瓦尔多夫斯基早已大胆地宣布说我"正为杂志写

---

① 最近有人对我说列别捷夫是契卡分子……按时间推算，这是在斯大林时期。这样他当然玩的不是跳棋了。

赫鲁晓夫被推翻后，根据上层新的相互默契，列别捷夫只是失掉了职务，并没有被抛出显贵的圈子，也没有陷入贫困境地。1965 年楚科夫斯基曾在巴尔维赫疗养院遇到过他。这位过去的"御前大臣"正在写什么回忆录，并且对楚科夫斯基说他否定了我在写到斯大林生活细节时所有失实之处（我的这些章节害苦了他）。1966 年新年时他曾写信给我表示祝贺，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正处在被拘捕的边缘（也许他还不晓得吧？），他听说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吵了架，他要我讲和。我当时很烦闷，所以对他的可能是最无私的内心活动未予理睬。以后我大约有一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任何接触。不久之前我才知道，正是在 1966 年，列别捷夫逝世，享年不足 50 岁。这位过去曾具有无限权力的顾问的葬礼，任何一个党内同志、任何一个文学界同志都没有去参加，党中央没有人参加。只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人参加了。我能够想像出在瘦小的列别捷夫棺木前低头致哀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强壮宽阔的身躯。——作者原注

一部长篇巨制。”

我想过要沉默，继续写下去，我曾想对把我的作品踢来踢去持保留态度，可是我自己却常常做不到这些。因为很难弄清周围环境的实际意义和自己应当采取的正确立场：万一我忽略了什么呢？就这样我把自己写的剧本《你心中的光明》辗转地送给几个剧院，但是导演们都没有看中它，1964 年春天，一反过去的慎重态度，我出于一时冲动把自己的《小品集》交给了几个人，条件是可以把它“给好人们看，而不必藏起来”。

没有料到这个《小品集》竟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地有数百份在流传，甚至传到了外省。我感到意外的是知识界衷心地接受了这种对信仰的公开保护(在俄国这种耻辱的保护是由来已久了吗！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声望经受住了这种保护！)。萨姆伊兹达特(地下出版)为《小品集》的扩散作了大量工作，而且廓清了对被当局禁止的作家来说相当不坏的出路。《小品集》的扩散程度非常迅猛，以致于半年之后即 1964 年秋季已在格拉尼杂志社出版，这一点《新世界》和我是从一位俄国女侨民的来信中了解到的。

对我的哪怕是最不成气候的小作品(而且是被他否定了的)的这种非法的运动，特瓦尔多夫斯基有一种病态的反感情绪：这其中有妒忌——我的东西在没有他的编辑部的赞许之下竟出版了，这其中也有担忧，害怕这样会“损害”小说和我整个的合法文学活动。

……

这时发生了“小小的十月事件”——抛弃了尼基塔。这是一些人心惶惶的日子。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简直是政变”的形式，对于赫鲁晓夫可能有三长两短倒是早有准备。为一个

所提携，我是不是也靠他一个人才能维持生存？随着他的垮台，我是否应当从此销声匿迹？对于永世被迫害的劳改营分子来说产生这样的担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我是不可能正确估价自己所持立场的全部真实力量的。在撤消赫鲁晓夫之前我是无声无息的和无所作为的人，现在我愿意变得更加无声无息和无所作为。紧急去新别墅会见特瓦尔多夫斯基是我的第一件事。我情绪紧张，而他却乐观愉快。中央全会的决定他不仅从行政角度必须服从，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如此。既然中央全会认为撤掉赫鲁晓夫较为合适，那就是说继续容忍他的实验事实上已不可能。还是在两年前，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还对他钦佩之至，庆幸有“这样的人”来领导我们。他现在发现了新的领导很令人安心的方面(同他“在上面谈得很投机”)。的确也是应当承认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个月特瓦尔多夫斯基简直就难以生活下去。有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杂志怎样才可以维持下去。

……

我来时带了一个相当惊慌的方案：用一部小说来代替另一部小说。就是说我把只有失势的列别捷夫了解而其他任何人还不知道的《第一圈》从杂志社的保险柜里取回来，很快给他们一部《癌症楼》，这将被认为是经作者本人改名的“那部最好的小说”。我担心会有人突然来检查《新世界》的保险柜，拿走我的小说，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会跌落下来，堕人地狱的深层。现在我觉得把小说从“地下”抽出来交给编辑部阅读，这是疏忽和不明智行为。我眼下辗转不安；希望找到一个办法尽量不被人注意地贴近地面，并且重新同土地的灰色融为一体。我如果能和任何出版社告别，如过去那样潜心写作该

有多好呢!

但是,当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提供这种冒一定风险的有关劳改营生活的东西时,我对他还了解得很少。他过于钟爱自己的杂志、自己的岗位,要让他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是困难的。而且,如果小说里“没有任何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东西(这是在编辑部会议上大家都同意的一点),干吗要藏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后退:你们没有料到!这是非常危险的!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有一怕,他曾经紧张地追问过:是否有人辗转传抄书稿?他曾经先发制人地吓我说:“有传闻说有人在传阅手抄本。”他认为这在我来说是昧良心的叛卖行为。把小说的各条出路都堵塞住了,它可能许多年都不会有出头之日,可是我作为你说的作者无权让任何人读它。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理解了编辑部同我谈话的含义。

说句老实话,我担心受到镇压,根本无力顾及扩散书稿一事。

由于尼基塔被废黜我失去了自己书稿的另一全套原稿:这是我的另一处书稿保存地点,远离莫斯科。保存书稿的人得到过我的允许在遇到危险情况时可以将书稿尽行焚毁。赫鲁晓夫的覆灭他认为就是这种危险的到来(边远地区难以正确评价局势),他觉得这是一场政变,会开始挨户搜查和逮捕。于是他烧毁了书稿。值得庆幸的是我一般都有3或4个副本,只有《胜利者的欢宴》是两个稿本,现在只剩下莫斯科的一份了。

赫鲁晓夫的倒台促使我拯救自己的作品:要知道手稿全部集中在这里,他们会一次全都被摧残掉。就在这一年的10月,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同时也是成功地)把《第一圈》的书

稿送往西方。心里轻松多了。现在，就是枪毙我也不怕了。

然而，推翻赫鲁晓夫一事对我也有一点小小的轻松感，这是微不足道的轻松，几乎像是虚幻的，它不表现在当时，而是在很久的以后才呈现出来，但这种减轻确实存在：赫鲁晓夫的下野把我从荣誉的义务中解放了出来。我被赫鲁晓夫捧了起来，在他的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捷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这是十分可笑的；怀着一种朴素的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有过这种庇护吗?），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我相信美好时光终将来临，我会活到那一时刻，我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也会到来。而现时我为自己选择了再沉默多年和隐蔽着劳动的道路。尽可能地不迈出任何面向社会的步子，让自己学会忘却（唉，果真忘却了该多么好！……）。不作任何寻求出版作品的尝试，而自己就是写作、写作。难道这样不好吗？……我觉得这是英明的路线。可这是自我消灭。

此后半年我没有涉足《新世界》——因为无事可做。1964至1965年这个冬季工作进展得顺利，我全速创作《古拉格群岛》，劳改营里听来的材料现在派完了用场。我催促着命运，弥补失去的半个世纪，我急于奔赴坦波夫州去搜集有关农民起义情况的残余。

似乎没有增加对我的迫害。赫鲁晓夫时代是怎样掐住我的喉咙的，现在掐得更紧。

而我又松懈了，像一个不受威胁的人一样生活：想要迁居奥勃宁斯克，在这座城市附近伊斯捷河旁的圣诞村买了一幢

非常漂亮的夏季别墅。我全力以赴地写《古拉格群岛》,并且开始写作《1917年的革命》。

应当说新领导的特点是一般地更加谨慎,决定或改变什么问题非常缓慢。直到1965年4月"宣传鼓动部"才有了一个首长——焦米切夫。而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却好久都贵体欠安,住在医院和疗养院里(这是一种俄罗斯的方式!当出版工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紧张得不可开交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可以呆上两周、三周,而这一次他是根据这个不可理解的酒精的坐标轴有两个月时间去到对他来说是现实的世界中去;而对于他的职员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他从这个世界归来时尽管还是病体,心灵却是康复了)。只是到了7月份特瓦尔多夫斯基才第一次谒见焦米切夫。会见气氛友好,焦米切夫说他也希望见见这位索尔仁尼琴。到哪儿去找我,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知道,也没有许下诺言说能够找到我。可是就在这一天,忽然我特别想去一次《新世界》编辑部——说说看怎么没有思想和意志的内在传递呢。特瓦尔多夫斯基从编辑部当即打了电话,同我约定第2天即7月17日去面见焦米切夫。

几乎整个编辑部成员都坐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些人了,我觉得同他们在一起格格不入而且很枯燥乏味。头脑里想的是《古拉格群岛》和1922年的坦波夫州,可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要求我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的小说家",就像是经过两年间隔之后我"再发表一些东西(为了对新领导表示忠顺)"现在是"颇为重要"。

对于他们和对于忠顺的《新世界》来说,当然是这样的。而对我来说"可以通过的小说家"败坏名声,那是沙眼,是窟

窿,我的处境的威力就在于我处世清白不搞交易,应当维护这一点,哪怕是再沉默上10年。

还有,他们所有的人(当然是步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后尘;这在他们是特别明显的,他们能一致地支持头头的意见,哪怕是在任何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上)都坚持让我为了明白的造访剃掉刚刚留起来的胡子。作为一个不依附于人的非常俄国作家,前去谒见宣传鼓动部门的首长(究竟有什么必要?为了什么?),我竟一定要变成机关里习惯了的无特点的样子呢!人们是那样严肃地说服我,就像编辑部里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了。我三次、四次地岔开话头(当然不是直接谈机关的事),于是他们又要我去时不要穿不庄重的敞口衬衫,而应当穿黑色西装,系上领带,可这是炎热的7月天啊!

我想单独和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好好谈谈,结果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很兴奋,甚至受到了鼓舞,因为上面同他谈话时态度亲切,他对我明天的会见寄于非常多的期望,这一次见面将巩固我的和《新世界》杂志社的地位。

我去接受领导的约见抱有这样的目的:怎样才能向前推进这不分胜负的共处局面。我对你们一点也不构成危险。请让我安静些吧。我工作速度很慢,除了已经出版的和搁置在编辑部的书稿,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而且说到底我是一个数学家,如果文学不能养活我,我准备重返数学领域工作。

这是古已有之的习惯风格,是野营式的"散布胡言乱语";而且进行得十分顺利。焦米切夫开始时精神紧张而且具有不信任感,后来在整整两个小时的对话中对我态度温和些了,并且相信我说的一切。他平静的话语中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情,

在谈话将结束时甚至表现出了一种轻松。他的相貌很难看，语言陈腐。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讲坛上的污蔑"，在公开的社会是不会使用这种形式的，因为被指责者总可以作出回答，而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一种一发就中的致命的形式是：出版界沉默（这是做给西方看的，为的是对迫害不引起注意），而在不公开的会议上和作出指示时，讲话人根据统一的指挥，意味深长并且信心十足地对不合心意的人可以制造任何的谣言。被污蔑的人不仅没有权利参加这样一些会议以便回击，而且长时间里甚至不了解在哪里对他讲了些什么，只是使自己遇到暗箭中伤。

这种无中生有刚刚开始，其形式还没有完全廓清，可是人们已经散布了我背叛了祖国、当过俘虏、伪警察。向法院起诉吗？中伤者太多了，而且他们都是为官的人。

焦米切夫用一只眼睛（另一只不大正常）以严厉而又同情，同情而又略带指责的态度审视着我。

我自己调节谈话的内容，想起了要回答报纸对《玛特辽娜一家》的批评。报刊上的指责有多么愚蠢？他们问为什么我不跑到20公里以外去表现先进的农庄。[①]——可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是教员，我只能在派我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还要指出：《消息报》在大骂我时（1963年3月30日）自己承认不只是一个玛特辽娜式的农村而且一大片集体农庄，不只是1953年一年，而是在10年以后仍然收获不比播下的种子多?! 如

① 批评家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指出过："附近集体农庄的主席"，他是依靠木材投机活动使农庄富了起来。——作者原注

果是这样，我描绘的农庄图景有何阴暗可言呢?！经营良好的农业——只是让谷粒腐烂的机构！……而无私的妇女，无偿的劳动，或为本农庄，或为邻近农庄，不是一样的吗？难道我们想让所有的人都变成无私的吗?

他一直缄口不语，我提出了一个下对上不该提出的问题：

“您同意我的看法吗？或是您想反驳?”

我的呼唤可能太突然了，意见还没有选择好(而且也不可能由他一个人选择出来！)，我的论据无论如何也不适合他们确立的语言体系，于是他把我的问题远远地甩在了一旁：

“您是否总能理解您写的什么和为什么而写?”

且慢！我当然理解，为此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已经把我害得好苦。但是宣布这一点为时尚早。我在滑溜溜的地上行车还是谨慎为上。

“这要看写什么。《为了事业的利益》这篇东西是这样的。在青年中确立信仰的重要地位；提醒人们在用砖石建立共产主义之前首先应当在人们心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怀有明显的目的想要证明，不是极有限的怙恶不悛的坏蛋作恶，最纯洁最优秀的人也可能作恶，所以应当同自己身上的恶行作斗争。(顺便说明一下，后来焦米切夫说，不论是《为了事业的利益》，还是《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他都没有阅读过，而且对于同我谈话事先没有准备好。)而在《玛特辽娜一家》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创作中，我……只是跟随主人公前进。我没给自己提出什么目的。”

(这一点成了他在谈话中的关键所在。在几次公开讲话中他不厌其烦地用一样的话说他是怎样用“您为什么写作”这样一个问题使我陷入困境，而我除了重复陈旧的不适合的理

由——“跟随主人公前进”之外，讲不出任何别的货色。是应当引导主人公前进的……）

在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辩护时我连发两枪，攻击了吉亚科夫的小说（这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呢？为什么这五年里仅仅只干了半个小时的妇道人家的活儿——砍树枝呢？……），也攻击了谢列斯特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他的可爱的主人公可以拿从小孩子们那里偷来的面包和食品，同时做阅读列宁著作的笔记吗？），但是谢列斯特笔下的老共产党员的行为，焦米切夫并不认为是不体面的，相反，他马上就胸有成竹地反驳我说：

“难道伊万·杰尼索维奇没有多吃一份饭吗？”

“这就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嘛！他精神上还没有长成，他不读列宁著作并且记笔记！他被劳改营给毁坏了！我们可怜他的正是他仅仅为一份饭食而斗争。”

焦米切夫一本正经地说：“是的，我非常希望他能更多地听一听那里有觉悟的人们的看法，这些人可能向他解释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发生时你和你的解释在哪里？如果我对一切都作出解释，你们对那可怜的小说怎么处理呢？……）

我说：“为了囊括所有劳改营方面的问题，需要再写一本书。但是，（我讲得很有表情）我不知道是否需要？”

他说：“可不需要了！再不要写劳改营了！这太沉闷而且不愉快！”

我又重复说，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从不后悔，再写也还是那个样子，我在作品里注入了自己的意图；……我还说我有时不满意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毁掉写好的东西。

"我想毫不谦虚地对您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存在20、30、甚至50年。"

他原谅了我的狂妄,并且亲切地指出果戈里曾经烧毁了《死魂灵》的第2部。

"好极了! 我也会这样做的。"

他非常满意。

"您写《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共用了多少时间?"

"几年时间,"我叹了口气,"难以计算用了多少时间。"

我一直在等待已经在《新世界》杂志保险柜里受了一年罪的《第一圈》。我也等待已在西方出版的《小品集》。但是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当然不了解这些事情。

在互相坦诚相见的时刻我向他泄露了自己得意的创作计划:《癌症楼》。

"这个书名不太晦暗了吗?"

"眼下是假定的书名。将讲到医生的工作。心灵上与死亡的对立。有哈萨克人,也有乌兹别克人。"

"这是不是太悲观了呢?"他还是有些不安。

"不,一点儿也不!"

"一般来说您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

"我是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难道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看您没有发现这一点吗?"

接下去他向我表述了党不希望作品写成什么样子(讲得非常准确,这在头脑中已经是现成的了):

1.悲观情绪;

2.恶意中伤;

3.暗箭。

（我大吃一惊。这三点怎么说得那样明确，简直就像是对我而发。真该了解一下这三点是谁拟定的？……）

“暗箭”被我岔开了，可是“恶意中伤”我倒想确切一下。比如说，《战争与和平》里鲍古恰活沃村的农民不让玛丽娅公爵小姐撤离村庄（他们自己正等待着拿破仑到来），这是不是对爱国主义的战争进行了恶意的中伤呢？

看来，焦米切夫没有读过托翁的这部书，没有引起论战。谈话的气氛越来越好了。

“我喜欢您对批评不恼恨，也没有因此心情郁闷，”他讲这话时不无同情心，“我担心过，怕您会记恨他们。”

“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日，我也从不怨天尤人。”

随着谈话的深入他几次毫无必要地对我说：“您是个坚强的人物”、“您这个人很刚毅”、“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您的身上”。我惊诧不已：“您这说到哪儿去了！您这可是言过其实了！”（他确是夸大其词了：西方除了把我当成政治上的时髦之外，当时几乎根本不了解我。）

“是目光集中到了您身上，”他自己也有些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命运同您开了这样的玩笑。”

他越来越对我有好感了，于是开始安慰起我来：

“不是所有的作家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承认，甚至苏维埃政权时期也不例外，例如马雅可夫斯基。”

（是的，我也希望能这样，我们彼此谁也不来触动对方，把事情留待永恒去解决。）

“我看，你的确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俄罗斯人。”他高兴地说。

我毫不羞耻地点了点头。如果你们不把我们流放到“古

拉格群岛"上去，我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这45年来你们哪怕有一天不对我们说谎，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们哪怕有一天和我们以诚相见，废除秘密外交和秘密活动，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发现，您的确是个非常谦虚的人。您同雷马克[1]，毫无共同之处。"

……

我快活地认定说：

"和雷马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说到底，是我的所有的这些坦诚也博得了他的以诚相待：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我们的处境还很艰难。我们不仅要进行外部的斗争，而且要进行内部的斗争。年轻人容易产生虚无主义、吹毛求疵，而某些活动家(??)只是一个劲儿地怂恿他们走这些路。"

但这并不是我呀！我真诚地强调说，青年人的这种对生活中的公共事业和伟大事业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气愤。

这时弄清楚了我们俩同庚，于是他提议回忆一下我们那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火热的青春时代。

(是的，同志们，有过这样的年代……只是历史不会这样单调地重复，不会又是那样的岁月……历史毕竟有自己的喜爱。)

我们都很满意。

我没有求他，既没有求他帮助出版短篇小说集，也没有求

---

[1] 雷马克(1898--1970)，德国小说家(1947年加入美国籍)，主要作品有《西线无战事》等。
——译者注

他促成剧院演出我的戏。主要的成果是完全突然地,没花费任何力气和准备便在新领导面前巩固住了我的地位,现在我可以有几年安心写作的时间了。

"他们没有得到第二位帕斯捷尔纳克!"送我出来时这位鼓动部的书记说。

不,20世纪的中等水平的工程师或者数学家,永远也不会习惯于这种乌龟样的爬行速度,老广场就是以这样的速度从自己的机关里获得信息。《小品集》才在格拉尼出版社出版9个月,焦米切夫哪里会了解到呢?波利卡尔波夫刚刚在一个月之前才了解此事,他把杂志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了,并且问这是不是我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回答说,他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作品不是我的。

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他竟然相信不是我的手笔!他是那样的确信无疑,甚至让我去见焦米切夫时也没有提醒我,告诉我他们有过这样的谈话,要是我的话我会说:这全是我的作品!这里地位差距的逻辑就是如此:下级(我)不需要知道首长(他)了解的一切。而且下级(我)不能写出首长(他)所不了解的作品来。

忽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了解到《家庭与学校》杂志准备在国内印发这组作品的一部分。他这一次几乎可以说是慌了手脚:他可是向领导保证过,说《小品集》不是我写的!此外,妒忌之心也在啃噬着他:任何别人(也包括我本人)都无权刊印我的作品,只有《新世界》才有这种权利。《小品集》早在3年之前他们就断定只是"毛胚",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呢?还有,如果发生了书已在西方出版了这样可怕的不幸,这就意味着在国内无论何时也不可能再出版

了！（在我结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这许多年里，他一直是这样理解：一本书在国外出版等于作品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屈辱。他以同样厌恶的态度看待萨姆伊兹达特即地下出版物。他只承认官方的公开出版物，而在有些官方出版物上发表作品又是他的杂志的一些一般作者所难以企及的。）

于是乎他马上召见我。可能其他出版社也是如此，反正我根据《新世界》了解到了这一点，而且总是惊异不止：只要作者做了什么所谓“出格”的事，马上就要受到编辑部“召见”！看来是把书的作者看成了在自己杂志里任职的工作人员，和在其它服务机关一样，首长有权要求他召之即来。

然而，这一年的8月份特瓦尔多夫斯基不走运，没有能够找到我，于是他启程去新西伯利亚城（顺便说一句，那里的读者座谈会上已经有人提了条子：“索尔仁尼琴曾在德国盖世太保中服务，是真的吗？”）。

我只能大致地判断出1965年8、9月间我们国家里正在酝酿着一场什么样的大变动。等到我们活到公开历史的那一天时，会准确地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接近于确定无疑地说，以“铁腕人物”谢列平为首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变革正在准备之中。据说谢列平建议：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强化经济和管理，似乎在这一点上他与柯西金发生了争论，至于应当加强思想控制，他们谁也没有不同意见。……8月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工作会议，并且作出解释说：“为和平而斗争”将要继续下去，但是不能解除苏联人的武装（而是不停顿地唆使他们反对西方）；提高士气，反对和平主义；我们的总路线根本不是共处；斯大林的过错仅仅是取消了集体领导和不

合法地惩处了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更多的就不是他的过错了；不要怕行政手段这样的名词；是恢复“人民敌人”这个有益概念的时候了；日丹诺夫有关文学的几个决议的精神是正确的；应当注意《新世界》杂志，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大加吹捧。（也没有饶过我：说我歪曲了劳改营生活的真实情况，在那里只有共产党人受苦，而敌人坐在那里干事情。）

谢列平份子们计划的所有步骤至今仍不为外人所知。但是他们毕竟做到了一件事情：1965 年 9 月初逮捕了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谢米恰斯内[1]的打手们要求在莫斯科逮捕“1000 名知识分子”）。

在那令人惶惑不安的 9 月初，我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小说从《新世界》撤回来：因为要是有人去检查，一打开保险柜，就会……我早已计划好了应当尽快转入地下，以数学作为掩护。

9 月 6 日我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别墅造访，这时他刚刚开始酒劲发作，他没有估计到我会来。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下二楼，只穿了贴身汗衫，两眼浑浊。他现在即使是清醒的我都很难把话解释清楚，面对他醉醺醺的样子我就更是有口难开了。他只能记住自己最主要的委屈，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见，听不着，理会不了。

“我为您把脑袋都豁出去了，而您却……”

是的，可以理解他这么说。要知道我没有对他敞开心扉。我所有的计划、打算、行动步骤都对他保密，这一切都是突然

---

① 谢米恰斯内：1961 年至 1967 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译者注

提给他的。

在颠三倒四、毫无中心的谈话中，他说了以下一些话：

他说我没有权利“不商量”就自行其事（即未经允许就行动）；

他说我不应当允许《家庭与学校》杂志刊登《小品集》；

他还谈到了我蓄的这部大胡子！真有意思，还谈胡子……这胡子使他很吃惊。一个个王朝动摇，一个个人头落地，而他还谈什么胡子……这时候是酒后吐真情，他向我作了解释。

他说，听说您就要这副样子隐藏起来……

我问这是谁说的？您听信谁？

他说，谁说的我没有义务告诉您，他们说：他留起胡子不是平白无故的……这是穿越国境最便当的方法……

我问：“大胡子怎么能够帮助越境呢?!”

“剃掉之后就偷偷地溜掉。”

朦胧的醉眼眯缝着，忽而又代之以意味深长的一瞥，留下让人猜不透的谜……亚·特瓦尔多夫斯基抖出来了底细：在党中央的“文化部”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说我可能是自己把《小品集》交给了格拉尼出版社。

我很心痛。这并不是因为“文化部”里对我有这般议论，而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被牵扯进来了，而他又没有力气抵抗。

终于还是轮到了我说出自己的愿望：我想把《第一圈》拿回去。“要在句子结构方面做些修改。”

他不相信。

我开诚布公地说出了心头所想：我不认为他们的保险柜是可靠的。

在他看来这真是千古奇闻:还有比在苏维埃官方机关的保险柜里更保险的地方吗?!我虽说是作者,但受着合同的约束,杂志有权不把小说还给我。而且我坚持要把小说的四个副本一起全部给我。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大好人,他相信我,尽管他非常遗憾,还是答应第二天打个电话给编辑部,让他们把书稿还给我。

看来一切顺利。我只要比"铁腕人物"谢列平多有一点耐心就可以了!我爬出来得太早了……早了……

9月7日我花费很大气力才从编辑部打听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别墅的电话号码。他说话的声音微弱,但头脑比昨天清晰。他亲切地请求我:不要把书稿拿回去,这样不好!我们这儿很可靠,不会出问题!好吧,你拿回去3份,留下来一份。

他真像是一个放儿子们离家出走的母亲。您就留下一个给我吧!……

可是我寸步不让:我需要全部书稿!(我看得清楚!我看得更远!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记得格罗斯曼的小说正是从《新世界》编辑部的保险柜里给抄走的。)

我的这种无谓的穷忙!永远促使我、支持我预见20个棋步。

我把4份书稿全部拿了回来。按照出版社规格打印的稿子撑破了大皮包,连关都关不上了。

如果是带着其他别的秘密的材料,我会倍加小心,左顾右盼,消灭留下的踪迹。可是这是准备出版的公开的东西。我只把它们从受到威胁的《新世界》这里取出,我拿着它们,甚至根本不打算把它们再藏起来。

不错，我是把书稿带到一个危险而重要的住宅去，那里不久之前还保存着我最主要的材料——也就是新年之夜从梁赞运走的那批材料。可是我已经把其中的主要部分，全部精华，在不久前从那里取走了，留下了一些次要的、半公开的东西，而住宅的主人捷乌莎是一位退休的人智学家，他夏天外出疗养时，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自己的信徒、年轻的人智学家济尔贝堡。

有些时候，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会理智不清。那时我们多余的远见会变成极大的盲目性，审慎的计划会变成无所适从、坚强的意志会变成毫无特性(没有这些失败我们就会忘乎所以了)。捷乌莎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可是他做事马虎，丢三落四，在保密方面很不注意，他的这个特点我早就有所了解，但是3年多一切都顺利地过来了，尽管他打起电话来唠唠叨叨，而且自己还写了一篇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性文章。我们甚至听到传言说他的作品已经在中央那里了。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过分注意！从这样一个材料保存者手中我拿出装着我书稿的可携式箱包时并没有检查一下里面的情况，没有仔细看一看捷乌莎处公开存放的是不是全属于次要材料。而他破坏了我们原先商定的条件，经常抽出些材料来自己读并且给别人读：或是《胜利者的欢宴》(这可是最后一份稿子了！)，或是《劳动共和国》，或是劳改营诗歌，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不读其他的作品。而且由于疏忽大意所有这些材料都没有再放回去！他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找到了所有这些书稿，不慌不忙地把它们寄给济尔贝堡用一个夏天，而后者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经过我来考察一下。

于是乎现在我竟认为捷乌莎的住宅比《新世界》编辑部的

保险柜更为可靠。我把4份《第一圈》的副本全都装在了提包里锁了起来(我提着它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觉得自己像是会被扼死了的被跟踪的人:这可能是猫头鹰眼睛的"聚光灯"正对着我的后背)。

我的理智是这样的不清,竟达到了可笑的程度:我像大丈夫一样决定深入到地心,可是却又像小孩子一样相信了卡里亚金的荒谬的诱惑,他说他的一位非常具有自由思想的头头,今日的《真理报》主编鲁勉采夫准备从《第一圈》中选登一二章无足轻重的部分。于是我把另外3份留在捷乌莎那里,把第4份稿子送到了《真理报》。我真是丧失了理智。

9月11日晚,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间歇之时,安全委员会的人去捷乌莎家中抄走了《第一圈》,同时在他的所有朋友当中只去了年轻的人智学信徒家里,抄走了我的其他书稿。

在我要深入河底的最后时刻,在我浮在表面上的最后时刻,我被打伤了。

我被打伤了。

我被打伤了……

受伤的鸟

这件事情过去了大约两年，我对这次新的打击一直不能忘怀，它使我感到比上一次被捕还要沉重得多，要知道自从22年前被捕以来我的感情早已麻木了。那一次被捕觉得不那么可怕，是因为我是在战场上给抓走的，当时我还在打仗；因为当时我只有26岁；因为除了我孑然一身之外，被捕时我的任何作品都没有受到损失（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作品）；因为我的遭遇有些趣味，甚至很吸引人，而且当时模模糊糊地有一种预感（是远见的预感，是预见），似乎恰恰会经过这一次身陷囹圄，我才有可能对我的祖国的命运产生某种影响。（我的幻想是天真的：莫斯科会非常关心我的下述思想，那就是被斯大林扭弯的东西可以拉直。）

而1965年9月间我的失败是我47年生涯中最大的不幸。我一连数月把它看作是久不愈合的体力上的真正的创伤——那是胸口中了一梭标，扎得很深，标尖都给卡住了。我只要稍微一动（回忆起被人抄走的作品的字字句句）就如同被针刺了一样疼痛。

主要的打击是：虽然我经过了劳改营生活的全面考验，我还是一个愚笨的人，还完全没有防卫能力；18年来我一直在编织自己的地下文学作品，随时检验每一根织线的牢固程度；只要是认错一个人，我就会和自己写的全部作品一起跌进狼穴。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失败过，一次也没有出过差错。为了预防出纰漏，花费了多么大的努力！为了写作，做出了多少牺牲！我的意图是宏大的，再过上十来年，我将带着写好的一切走向大世界。为了爆炸这一颗文学炸弹我毫不吝惜把自己也炸成粉末；可是稍一疏忽，脚下滑了一下，我所有的思想，一生的全部工作都给断送掉了。不仅仅是我一生的作品，而且是千百万牺牲者的梦想，那些在劳改营简陋住屋地板上没有来得及诉说完自己的心曲而不幸死去的人的梦想；他们的嘱托我没有完成，没有表达出来，我辜负了他们。我几乎是得以爬出来的惟一的幸存者，埋葬在劳改营乱尸坑里的无数颗头颅曾对我寄予厚望，而我却垮了，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望。

一直处于心情抑郁状态。洒满阳光的时刻难以确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心灵受到损伤，还是预感到又会有新的忧患袭来。痛苦，却又不能解脱。喉咙里总是干得发紧。紧张的状态想松弛又松弛不下来。在梦里寻求解脱(如同曾在狱中那样)：一睡了之，最好是长眠不醒！去做那些一去不返的无忧无虑的梦，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心灵的护卫板将会消失，灼热的钻头将会拧动使你重新苏醒。每一天都努力发掘自己内心的力量，激励自己行动、工作，并且做出样子来，好像对于心灵来说这是需要的和必要的，而事实上每五分钟思想都跑到一边去：为什么？现在还有什么用？……你的一生都像是在做戏：因为你知道事实上一切都已破灭。印象停留在

平静无事的时刻。想到了自杀，这是生平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的一次。（有一点使我坚强些：我的微缩胶片已经在西方！我的全部工作并不是都付之东流了！）

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过了三个月，当然了间或有些内心活动，有时也比较清醒安详。我也出于冲动采取了一些防范行动，那是些最急需的和最明显的措施，有时候是些不恰当的措施，我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和正确的选择自己的行动。我经常等待着来逮捕我，几乎是每夜都如此。是的，为了对付被捕，我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强硬的对策：我将拒绝作任何供词；我要宣布他们不配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侦讯和审判；我要求提供给我作"亲笔供词"的纸张，我要写："我意识到自己在伟大俄国文学的我的许多先行者面前负有责任，因此我不能承认和接受对伟大的俄国文学所进行的宪兵式的监督。对调查和审讯中的任何问题我将一概不予回答。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声明。"（他们哪里也不会送交，把它订进卷宗里了事！）也就是说，无论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我都做好了准备。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是我工作的中断。而且应当说这种中断已经发生了：正好是在创作《古拉格群岛》的高潮时发生了上面说到的事情。许多十分珍贵的材料和一部分已经写好的初稿都只有一份，它们都有被没收的危险。在忠实的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为了防止跟踪追寻的极大威胁，不得不把这些东西都藏到远处去，难以预料什么时候才能回过头来再写这本书。

工作反正已经停了下来，这在被捕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发生不幸的消息不是一次突然传到我这里的，而是分为两次。一开始我只知道小说被搜走了，仅仅这一件事就如同

被蜜蜂蜇了一样使我万分痛苦: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我没有听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劝告,把书稿取了回来,自己把它断送了!接着又告知我西尼亚夫斯基被捕的消息。我的小说不是提供了更多的口实吗?也许这两天我没有被捉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在我的圣诞村里没有找到我?可是梁赞的住宅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生活飘忽不定。也许他们已经去搜捕过了?!

已近傍晚时分。我们匆忙地把一些随身携带的东西和手头全部原稿扔进汽车里(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也许一小时以后他们会光顾此地进行搜查),我们经过莫斯科郊区的大道,在莫斯科一分钟也没有停留,直奔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别墅而去:我要赶紧告诉他我暂时还没有被逮捕。

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现了我的一本小说稿,我当时竟认为是大难临头,最主要的灾祸我还没有领略呢。小说落到卢布扬卡的人们手中,按照拉丁谚语的说法,只不过是小说的"命运"罢了——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文学运动已经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是来搜查小说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附带的礼品,为此可能有人会获得勋章,他们各级机关都会兴高采烈。然而过几年后将会证明,他们是空欢喜一场。小说就像山里没有移动的冰川一样,在他们手里更安全一些……)

俗话说祸不单行,车开到最后一公里时没有汽油了,我只好提着空汽油桶向巴赫拉作家村走去。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家里,正在同给他的新别墅加固围墙和移动大门的工匠们闲谈。工匠们要求付给足够多的订金。正是这时我到了,我把特瓦尔多夫斯基叫到一旁,低声对他说:

"坏消息:小说给抄走了。"

他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

“哪儿来的消息?”

……

这一天晚上他的举止行为非常得当，比我好得多。一周之前，也是在这些房间里为了一件区区小事他懊恼，激动，横加指责，而现在却恰恰相反，尽管证明了他是正确的，他也一点儿没有数落我。今天他表现得英勇而且沉着，甚至没有急于发问：这一切是在哪儿和怎样发生的，也没有马上讨论这事。在他那色调灰暗的城堡一样的别墅里，他不停地把干木柈投进样式考究的壁炉里，我们就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他的第一次发作是他说明天就亲自去找焦米切夫告状。一小时后经过一阵考虑他认为最好由我自己去申诉。

我当即开始起草稿件。这时候第一次产生了后来应当发生的轻度的分歧。特瓦尔多夫斯基坚持要使用最缓和的语词，甚至也可用恳求的词句。他特别不让我使用“非法没收”这样的字眼。特瓦尔多夫斯基坚持让我一定要删掉这个词，因为他们那些人的行为不可能是“非法的”。我的反抗很无力(第二天在莫斯科他又通过电话单独检查过，看我是否已经换掉了这个词)。我感到可耻的是自己作了让步，用了一个奴性十足的词“不适当的没收”，当时胡里胡涂找不出恰当的表达方式来。

这一夜我们倍受折磨，谁也没有睡觉，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启程去莫斯科。几小时后，我在莫斯科又知道了一个更倒霉的消息：9月11日晚上被抄走的作品还有《胜利者的欢宴》《劳动共和国》和劳改营题材的诗歌！这才是真正的大难临

头，而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小小的不幸而已。踏在脚下的一座座桥全都毁坏并且坍塌了，可耻地同时又是过早地垮掉了。

但我写给焦米切夫的声明里故意装作只知道一部小说被查抄的事。我度过了阳光和煦、人群熙来攘往、完全不现实的莫斯科的白天；经过透视检查又一次进入党中央富丽堂皇的大楼，这里不久之前曾经盛情地接待过我。我穿过宽阔的走廊，它们像房间一样整齐排列，走廊上很少有人走动，房间门上并不标明职务，因为应当知道每个人是做什么的，上面只写了名字——那是一些不出众的、不知名的和陈旧的名字；我把声明交给了我已认识了的和蔼可亲的秘书。

交完声明之后我就直接来到了《新世界》杂志社：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就"非法没收行为"一事还放心不下，他想再从我口里证实一下我是否已经改动了措词。他还要求我答应一些重要的事情：有关小说被抄走一事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否则，发生不合时宜的宣扬，会使处境更加不利。

我们间的裂缝扩大了。谁的处境？……是上层人士的处境？还是我的处境？不合时宜的？还有宣扬！快饶了我吧！我会对每个遇到的人讲起这件事！我将捕捉和寻找：还要对谁诉说吗？谁会把这些扩散得更广？……（抄走《第一圈》和谋反的《胜利者的欢宴》不是加重了我的负担，而是使我得到了减轻：我可以更加大声疾呼没收的事情了。）

如果现在就把这些想法告知特瓦尔多夫斯基，他一定会肝肠寸断！属于党的《新世界》发现培养的作者头脑里怎么可以包藏着这样不可思议的放肆呢?！那《新世界》该怎么办呢？……不，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于这样可怕的念头还全然没有思想准备。我就另外的事情向他打了招呼：

“现在弄明白了，搜走的不只是一部小说。还有《鹿与小窝棚》的旧稿和劳改营题材的诗。”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面色更加阴郁了。

“还有诗吗？不是写家务事的吧？……”

他显得萎靡不振。但是还有一个副本保存了下来，而且甚至是保存在《真理报》的保险柜里，这一点使他很高兴。（我曾经想在《真理报》上刊登小说的部分章节！……）

这些日子里一切都很不平静。鲁勉采夫被撤掉了《真理报》总编辑的职务，我的恩人卡里亚金应当乘混乱之机把小说从《真理报》里抽回来。

这时已是9月20日。过去的一周里，在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后，人们说“整个莫斯科”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之中，他们把地下出版物和受到谴责的外国作品到处隐藏，或是一包一捆地从这一家里拿到另一家，以为这样会更安全些。

只进行了两三次搜查——就引起了如此多的惊慌失措、自责忏悔甚至还有变节叛卖！赫鲁晓夫时代恩赐的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原来是这样脆弱和不可靠。

我请求卡里亚金，让他把小说副本从《真理报》拿出来送到《新世界》。由于对克格勃的查验和到处伸手估计过高，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能否办成功没有把握。但是小说副本还是顺利地拿来了。我把它放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办公室的小沙发上，等待这位大人物的归来。我毫不怀疑，特瓦尔多夫斯基见到这份被抢救出来的书稿一定会心情激动，他会很高兴地立刻把这部稿子放回到保险柜里。我清楚地想像出他那惊喜的样子。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到了，开始了谈话，一个厚厚的熟

悉的公文袋斜放在小沙发上。他看见之后走了过去，用手摸了摸，然后警觉地问："这是什么？"

我告诉了他。他那阴郁而严厉的样子一下子就把我推出千里之外，我竟认不出他是谁了：

"您凭什么把它拿到这里来？尤其是现在，在已经被查抄了之后。(瞧，他认为查抄是合法的！)我们编辑部不能接受它。现在，你不能躲藏在我们背后了。"

他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为这份副本担心，我还有其他的副本(而且还有一份已在西方)，但是他却认为这是最后的一份！这真是可以载入俄国文学史的一场小戏！……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喜欢人们把他的杂志和《现代人》杂志两相比较。但是，如果让普希金拯救一本被班肯多夫[①]追踪的小说，普希金难道会不全力以赴吗？他未必会这样退避三舍，说什么："我出身于名门世家，我是宫廷侍从，宫廷里会怎么说呢！"

诗人在国家里的地位改变了，诗人们自己也发生了蜕变。

不仅如此，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拒绝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登我写的反驳对我个人历史横加污蔑的辟谣声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员们已在全国散布说我曾"替德国人服务"，"当过警察"，"是盖世太保分子")。两个星期以前特瓦尔多夫斯基亲自建议我写这样一封辟谣的信件(而且故作神秘地说："有人建议我……")，现在发生了麻烦事：我把我的信的第一份副

① 班肯多夫(1783—1844年)，俄国将军、伯爵、宪兵首脑和"第三厅"的厅长，参加镇压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受沙皇尼古拉的委托负责监护和审查普希金的创作和其他活动。

——译者注

本寄给了《真理报》,曾经指望现在刚刚垮台的鲁勉采夫能够关照,把第二份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我听到的回答是:

"我可不习惯收到人家寄来的第二份副本,并且据此采取行动。"

诗人们变得太厉害了……

"而且小说给没收了,我们辟谣、驳斥又有什么用呢? 人们会说:这意味着欲盖弥彰! ……"

这真是在打官腔。瞧,这是什么逻辑! 如果1965年小说被查抄了,那怎么可以肯定作者在1943年时没有当过伪警察呢?(当然,这不是原因! 而是他没有勇气刊载我的辟谣声明,同时还要冠冕堂皇地解释拒绝的理由,说似乎这是坚定不移的见解。)

我十分窘迫地坐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回答他的问题,而特瓦尔多夫斯基长时间地不厌其烦地指责我:

1. 我怎么可以在这些天里把3份申诉信寄给了3位中央书记,要知道这样做是侮辱了彼得·尼雷奇·焦米切夫,使得他帮助我的愿望减弱了许多。

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有人求我一个人解决房子问题,我会努力帮助他解决;如果信上写的是'费定、特瓦尔多夫斯基收',那么我就会想:好吧,那你就请费定去帮忙好了!"

他认为此中有相似之处吗? 似乎事件的规模可以使人考虑到所谓"侮辱"问题,考虑到中央书记们的某些个人感情。就算焦米切夫是我的生身父亲,对推动这件事上他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国家和文学发生了冲突,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却在这里看到的是某种个人请求……我之所以急于发出另外3

封信(分别写给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①]),是因为我担心焦米切夫这个人不可靠,他有可能是谢列平那一派的人,他会把信掩盖起来,对人说我没有申诉,这证明我认为自己有过错。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宽恕了我因性格软弱所做的张扬,说我禁不住向别人谈了小说被没收的事。(好一个禁不住!……我专门到音乐学院去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在那里大谈特谈了自己的倒霉事。)但是:

2.如果我和他商量还应当向谁投诉,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会建议我直接向谢米恰斯内本人申诉(谢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干吗要绕过他呢?

我心中为之一震: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去求谢米恰斯内,无异于承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文学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而且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不能理解:

3.我怎么可以在过去无视他的劝告把剧本交给了《现代人》杂志?……

特别重要的恰恰是现在他要清算这些"舞台上的强盗"!重要的是正好在我迷惘时指责我!还有:

4.他责怪我怎么能把神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激烈的劳改营题材的剧本放在一起来保存?(这样做不仅给《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下阴影,而且影响《新世界》杂志!)还有:

5.为什么"可以得到独家住宅的时候",我没有领莫斯科

---

① 我竟没有料到后来安德罗波夫成了什么样的人!……作者原注。译者按:这里索尔仁尼琴指的是两年后即1967年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的住宅?

6.为什么我竟允许《家庭与学校》杂志刊印我的《小品集》?还有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和非常新奇的(令人沉闷,难以笑出声音来而且处于完全清醒状态):

7.为什么我留起了胡子?是不是为了在必要时穿越困境方便?(也没有忘记转达给我某位高级人士的怀疑:为什么我一直申请要迁居奥勃宁斯克市的原子能中心去?……)

这些指责翻来覆去,鸡零狗碎,真像是婆娘的唠叨。

我没有反驳。我没有指望地位牢固,现在出了漏洞,落入这样可怜的境遇之中也是应当的。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这样的时刻也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他提出要给我一些钱。可是我并不是由于贫困而濒临绝境!……

我把这部被人拒绝无人照料的小说夹在腋下,下楼到《新世界》编辑部的收发室给装书稿的文件袋打火漆印(这也是愚人之见:万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来搜查,会让他们看到这部稿子没有被人传阅过)。然而过了一夜,我又决定把它送到官方机构去保存——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过去的一个星期,尽管愁肠百结,我仍奋力挣扎:我一方而忙于拯救主要的手稿和所有尚未被抄走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也随之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他们不要再写信给我。这些麻烦事情做完之后,最迫切和最必须的工作已经完成,我痛苦已极难以自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本书这一章的创作。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将怎样生活,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我强打精神,迫使自己一天集中精力工作两三个小时。

这时候,楚科夫斯基把他的住宅提供给我居住(为此需要

有大无畏的精神），这给我很大的帮助，激励我振作起来。我害怕住在梁赞：在那里很容易控制我的行踪，在那里可以不引起任何惊扰地、甚至不负责任地把我拘捕起来——总可以推说地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滥用职权，发生"错捕"现象。在楚科夫斯基的别列捷尔金诺别墅执行者们不可能发生这类"错误"。我在楚科夫斯基别墅针叶林木苍郁的树荫下漫步，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怀着一颗绝望的心努力对自己的境遇做徒劳的思索，更重要的是我试图发现落到我头上的灾难最根本的意义何在。

对俄国历史的了解可能早就打消了寻找某种正义的愿望，打消了寻求在俄国灾难的链条中寻求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的愿望。尽管如此，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在监狱中服刑时起我就已经习惯于感受这具有指挥作用的正义之手和这个非常明确的不以我为转移的宇宙意义。我并不总能及时地理解我生活中的种种冲刺，经常由于肉体上和心灵上的软弱而对于其真正的意义和远见的意义作了相反的理解。但是事过境迁之后真正的理智又必然向我做清楚的解释，而这时我只能惊诧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生活中我做的许多事是与我既定的主要目标相对立的，做的时候并不理解真正的道理何在，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纠正我。这对于我已然形成习惯，变得十分可靠，以致使我只需要完成一个任务：更正确和更迅速地理解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

（维·弗·伊凡诺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尽管他的生活素材与我迥然不同。他的概括是："许多人的生命中都有神秘的意义，这一点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地理解。这种神秘的含义经常以密码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由于不能破译它

们而陷于绝望，觉得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伟人的成功往往在于他能够破译出提给他的密码，理解和学会了正确的行动。”)

对于我的失败，我没有理解！我气恼过、我反抗过，但是我没有能够理解：为什么工作会垮台？这不是我个人的工作，但是它又几乎是为了真理得以留存惟一的工作。为什么偏偏要让后代人尽可能少地了解真理，几乎任何真理都不了解？(因为我身后每个人都更难于探寻我到底要做什么，而先我而在的人们已不在人世，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他们写的东西完全不是俄罗斯许久以来渴望了解的一切。)我的被捕，以及我身患的不治之症和许多个人经历的事件全都得到了补偿，然而这一次失败我依然不能理解消化！这一次失败使过去生活的一切意义顿然全部消失。

(没有信心的我是这样感觉的！两个秋天之后，到了今年冬季，我觉得我对一切都已豁然开朗。所以我才坐下来写这些回忆录。)

9月末，在我仍客居于楚科夫斯基的别墅之中时，遇到了两件不大不小的政治上令人欣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几乎在同一天传来，几乎是与一些星辰联系着的。第一件事是印度尼西亚的政变失败，第二件是谢列平的企图没有得逞。这位人称“铁腕人物舒利克”的谢列平从8月开始就在上层机关发动攻势，但却未能推翻任何一个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半年前指定了23大的报告人，而谢列平未获此殊荣。

谢列平如果得势意味着我会马上呜呼哀哉。现在我得以有半年的缓冲时期。当然，这种缓刑目前还没有什么可靠的保障，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是朦胧的希望。如果西方电台能够

报道我的小说被抄走一事,我也许会认为是可靠的保障。这当然不是逮捕大活人,如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但是不管怎么说(哪怕是被狗熊撕成碎片),如果把一位俄国作家10年创作的心血抄走,那么希腊民主学说的忠心捍卫者完全有可能对这一事件哪怕是给一行字的报道。也许他们会完全无动于衷?也许他们不知道?

给我延长了时间,我现在做些什么才是正确的呢?我不能决断。我做出了不正确的决定:现在就出版作品,随便出些什么。

我把剧本《你心中的光明》寄给了《新世界》杂志,在此之前,他们全然不晓得这部作品。人们都读过之后,我便去了编辑部。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已有一个月没有见面,这段时间里他的面色更加灰暗,心情压抑,觉得自己被包围、孤立无援,甚至是被打垮了——这都是因为他吃了上头的训斥(焦米切夫曾严厉地批评他在需要他的关键时刻他却沉醉不起——应当去罗马出任欧洲联盟副主席——那里既不喜欢苏尔科夫,也不喜欢西蒙诺夫)。

尽管如此,他还两次向焦米切夫问起过我的小说,虽然仅仅是通过电话了解。考虑到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无比痛苦,对于他的努力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第一次焦米切夫回答说:"好的,我已经做出了安排,叫他们把书稿还给他。"(这当然是撒谎)第二次他说:"好的,我已经指令他们好好研究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完全不懂应当做什么,而我并不比他高明许多。我竟同意了一个荒谬的主张:请求焦米切夫接见。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对剧本的评价并没有使我获

得多少快慰。我知道这个剧本不够活泼、台词过多,可是他却认为它很富于“戏剧性”(可怜的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他由于身居高位不可能经常去莫斯科的剧院看戏,不能了解现代戏剧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出版剧本呢?

“您假托一个不知其名的某国,而实际上这是指我们国家,非常清楚,通过剧本可以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

我万分诚意地说:“我这里写的是整个现代人类的缺点,特别是那些富有的人们。您承认可能有共同的现代弊病吗?”

他说:“不,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不能不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也不能同意您对生与死的看法。我告诉您,如果所有的一切完全都取决于我,我会做什么。现在我会写一篇跋,而不是给您写序(我琢磨不透,这里面有什么贬低),我会说我们不能对读者隐瞒作家的作品,(哈哈!50年来第一次!……)但是我们不支持这里讲出的观点,而且应当反驳。”

我说:“果真如此,那可太好了。我根本没有更大的奢望。”

他说:“但是这并不取决于我。”

我说:“请您听我说,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如果这是西方作家写的又该当如何呢?如果是我们的人写肯定会抓起来,马上就会说:‘瞧,他在怎样鞭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他说:“是的,如果这是某个美国的阿尔图尔·米勒写的就好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他的反面人物也会是反共的。”

难道问题仅仅在于一个剧本吗?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对待我本人的态度也恶化了而且存有戒心:我并不是他希望介绍给老广场和整个进步人类的那种透明的结晶体。

但是，我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于是把《右手》这篇小说拿给了他，过去没有给是因为有些犹豫。

他兴高采烈地张着一双颤抖的手接过了小说稿。亲身经历过的题材，我的散文，能够忽然一下子就通过吗？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

“描写的部分写得非常出色，但是总的说来这比你以前写的内容都更可怕。”接下去又补充说：“我可是没有提供给你什么条件。”

是的，当然是没有！杂志当然没有提供方便！提供条件的是我：我拿着自己的东西东奔西走。但是我还要受到多少次拒绝并仍然继续自称是《新世界》分子呢？……

这几个月里每天读些俄罗斯谚语，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把它们看作是念祈祷词一样。一开始有：

“忧愁不会送命，但是会把人打倒。”
“这样的灾祸不会睡过一觉就不存在了。”
“命运之神来到，手脚会被缚住。”
“时间如爬山：跌下来时才知回头。”

（这里谈的是我的错误，当把我捧上天的时候，我疏忽了，过于谦虚了，失去了机会……）接下去还有：

“别因为倒了霉就把头伸进绞索。”
“我们忧愁，而上帝怜悯。”
“万事皆如过眼烟云，惟有真理永存。”

最后一句特别使人心宽，只是它说得不明确：这个真理将怎样援救我。要知道：

“忧伤时不可以渡海。”

还有一句有明显的暗示：

“有人因恐惧而死，也有人因恐惧得救。”

也有令人难以索解的：

“灾难临头，讨厌它也没有用。”（是祸躲不过）

看来我应当“因恐惧而得救”。看来我应当利用灾难谋求幸福。甚至是谋求胜利。但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呢？谜仍没有解开。

10月20日在文学家中央俱乐部庆祝斯米尔诺夫50岁寿辰，科佩列夫夫妇劝我出席这次酒会，这是我成为作家协会会员以来第一遭露面——事在于说明我日子过得不坏，而且面带微笑。总的说来我是第一次坐在庆祝会场上聆听人们怎样互相吹捧。我不知道斯米尔诺夫是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协会会员会籍那次会议的主席，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来参加了。他写《布列斯特要塞》似乎是为了美好的意图而耕耘。只有我另有评价：如果不许他去参观要塞废墟，不许他在全苏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发表讲话，报纸、杂志连一行消息也不报

道，一次也不能公开演说，甚至在信中也不可以公开谈论，遇到过去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时，他们只能秘密地交谈，离偷听者远一些，躲开监视，而且不能出差去收集资料，已经掌握的资料和写好的手稿都不能放在家里……如果一切如上面所述，他会怎么样？他能完成《布列斯特要塞》这本书吗？能写得如此丰满吗？……这些条件都不是杜撰出来的。我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古拉格群岛》一书收集了227份证词。[1]

正式的庆祝活动之后，在俱乐部的前厅里人们知道我来参加庆祝会。有十余名莫斯科作家、随后还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同我打招呼，他们热情的样子就好像我并不是小说被查抄的受威胁的作家，而是一个受人敬仰的有权威的得奖作家。周围人们在窃窃私语，不时投来陌生的目光。这是什么？是对哪怕是失宠的荣耀通常表现出的向往吗？也许是时来运转的先兆？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参加了庆祝会，由于镁光灯的闪烁不得不眯起眼睛，他早早地离开不讨人喜欢的主席团躲到舞台后面去，也许也去过餐厅，然后又出现在大厅里。不是他领我第一次来到文学家俱乐部，这一点使他有些妒忌（有关这次来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和他商量！），他马上把我拉到一旁，躲开了我的朋友和正在进行的演出，这时他的两个保镖杰缅季耶

---

① 顺便指出，这个晚会上主要“受祝贺的人”不知为什么竟是朱可夫元帅，他作为客人坐在主席团里。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竟有5—6次之多）大厅里就爆发出真挚的掌声。莫斯科的作家们示威似地欢迎这位落魄的元帅！这是社会气氛的表现……但是这种气息未必有好结果吧？这位功败垂成的我们的戴高乐身穿黑色西服，和气地微笑着。和气倒是很和气，只不过是和所有元帅和所有将军一样，都是居于人下者。我们的民族性实在太低下了：甚至连对军事首长也只崇拜一个人。

——作者原注

夫和康德拉托维奇也走了过来。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前天的那股酸溜溜的劲头跑到哪里去了?“你的胡须已经不再是海明威式的了,更像是杜勃罗留波夫式了。”那两个人当然是乐于随声附和加以确认。仅仅两天,在他们看来胡须都变了。这是因为准许我明天去见焦米切夫。

“胜利!这是一大胜利!”精神焕发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欢呼。“……不论上面说些什么,不论他们是否把搜走的书稿还回来,既然他们已经接见你,那就已经算是胜利了!明天您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整天都守在电话机旁。”

可怜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他一步也不离开我,继续在精神上关照我,我自己也真该醒悟了,不要再顶撞领导,应该表现得温顺些。

但是在第二天焦米切夫拒绝接见我,这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是失望。应当说不是干脆拒绝,焦米切夫的“助手”接见了我,准确说是我会见了文化问题专员弗罗洛夫,这不能被说成是“接见”。专员只有36岁[①]。他脸庞清秀,人很聪明,非常熟练和努力地在两种情况下保持中立路线:一种是自己的当然是内在的民主主义,另一种是对他们尊重的作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此外还有自己对高级政治家忠贞不二的那种经常性的尊重感情。

我只能向这位专员重复一下我致焦米切夫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在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自己被抄走的文件书稿,同时我还写道,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不会希望现在重复他们在苏共20大

① 他是卡里亚金少时的朋友,他们一起毕业于大学哲学系,但是卡里亚金选择了谋反的道路,而这一位弗罗洛夫走的却是一条为官的道路。——作者原注

以前说的话，并且为这些话承担责任。我在信中毫无顾忌地表示，我在梁赞有的居住条件很坏，我请求最好能够在莫斯科给我分配一套住房，而现在大概卢布扬卡的监狱正在给我准备一块安身之地呢！[①]

由于没有正事可谈，我和专员谈论起一般文化问题。看他说了些什么！他说整个现代苏联文学都非常乏味（他们的那些作品！他们的那种书刊检查制度！但是专员却认为原因在于人民中一时缺乏天才。我责备他说："我看问题比您乐观些！""天才是有的，只不过是被你们给压制住了"）。他认为因此绝对没有人可以与我相媲美，甚至连肖洛霍夫也在我之下，人们肯定会喜欢读我的作品，而与我相提并论的那些人的书不会有人读。所以我们那些悲剧性主题的作品才不能出版；还有一点也非常有趣：他认为饱经磨难的劳改营分子的个人主义表现在我们这些人喜欢把我们对过去岁月的体验感受强加给青年人。

申诉信交上去10天之后，经过梁赞市执行委员会给了答复，说我的申诉"已转交苏联最高检察院处理"。

这可真是在绕圈子！最高检察院接到了过去的劳改营分子、小人物索尔仁尼琴的控告信（看来他还没有坐够牢），而被告竟是有无上全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一个法制国家来说这是惟一正确的程序：如果不是检察院，还有谁能保护公民不受警察不公正行为的迫害呢？可是这一次我们遇到的情况

---

① 在整个苏联社会都承认我的那个短暂的月份里，莫斯科有现成的一套住房等待我去住，可是我没有要，我担心陷入"首都文学界的忙乱之中"去。后来，梁赞也不再分配给我住房。而现在在最有危险和最绝望的时刻又建议我们在梁赞选择，就是不让我住在莫斯科！——作者原注

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表明中央委员会拒绝做出政治性的决定，拒绝做对我有利的决定。检察院只有一条路好走：让我的控告反转过来控告我自己。我想像得出，他们忐忑不安地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回答说："你们来一下吧，读一读再说。"读了书稿，他们的头发梢儿都竖了起来，就是在斯大林的清平盛世写这样下流的东西也是要枪毙的，而这个可耻之徒竟还敢控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党中央想要让我坐牢，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这项工作交给检察院，加重他们的负担：只要允许谢米恰斯内采取行动就足够了。然而，党中央回避做出决定。总检察长会怎样做呢？也回避。（果真如此。一年后我了解到我的小说被放进总检察长鲁坚科的保险柜里，连渴望读到小说的庭长们也没有读到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些可怕："您的案子已经移交最高检察院处理。"但是在当时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使人振奋的信息。

从抄走我的小说和其他手稿到现在，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并没有被逮捕。他们对我提起刑事诉讼不仅理由很充分，而且绰绰有余，要比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指控的理由多10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逮捕我，为什么呢？啊，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

"勇敢，是得救的一半。"一本谚语集里有这样的说法。所有情况都告诉我，我应当勇敢一些，甚至要毅然决然一些！但是在哪些方面表现勇气？我应当怎样做？不应当厌恶灾难，应当利用灾难，可是应当怎么做呢？

唉，如果这个秋天我能够理解这些就好了！全都理解并且全都做了，事情会简单得多。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弄懂。

而且,西方如果对我的小说被没收一事喧嚷一番,如果这件事传遍整个世界,我可能就不会担惊受怕了,我会自由自在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西方一直沉默!

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而且我们永远也不应当心存此种期望。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成为了自由人,那也仅仅是依靠了我们自己。如果20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由于事事如意西方人的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1]

我毕竟是开始行动了。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时的行动不正确。行动与自己的一般风格和爱好相矛盾。我急于通过某种方式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对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在《文学报》上发表的言不及义的文章横加挑剔。我的确早就收集了一些有关文学语言的材料,但是当时对于这些材料我利用得很草率,写得匆促、发掘不深,论证也不充分,而且是以与人论战的形

① 半年后,那位多方奔走使肖洛霍夫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因而极大地侮辱了俄国文学的人——让·保罗·萨特访问莫斯科时,经过女译员表示了要求和我会见的愿望。我和女译员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会面,而"萨特夫妇在旅馆里备晚餐恭候"。初看起来我同他见面十分有利:这是法国和欧洲的"思想主宰",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和独立性格的作家,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们在10分钟之后围桌而坐,我向他诉说我所遭遇的一切,而这位人道主义的吹鼓手将会唤起整个欧洲。但是他如果不是萨特就好了。萨特之所以需要见我有一些是好奇心驱使,有些是为了获得一个以后谈起与我会见的权利,也许是为了要谴责我,而我以后却会无法自我辩解。我对女译员说:"两位作家会见时,如果其中的一个人被堵住嘴,被反绑着手,这算是什么样的会见呢?""您对这次会见不感兴趣吗?""这样的会见是苦涩的,难以忍受。我现在只有耳朵还露出水面。让他首先帮助我们出版作品吧。"我举出《癌病房》中的那位身体扭曲的小男孩作为例子。如果从欧洲来看,俄国文学就是这样扭歪变形。我国伟大文学具有的未发展的可能性在那里完全无人知晓。在我拒绝会面的这一席话中萨特是否理解了其中深刻的含义呢?我们是非常不喜欢、不接受他的。 ——作者原注

式，使用的是报刊文章的文体，而以前我曾经发过誓不这样做的。

……

办事机灵、嗅觉敏锐的《文学报》主编恰可夫斯基跑去同焦米切夫“商量”：我的名字可以在报刊上出现吗？看来，焦米切夫马上就允许了。

他做得对。

而我做得完全不对，我乱了方寸。

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美好而又有头脑的《新苏黎世时报》刊载一条消息说我遭到搜查，作品被没收。这刚好是过去两个月里我一直期待发生的事情！现在这条消息有可能扩散开来，被予以证实。就在这时《文学报》会传送到西方去，我的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将会把一切推翻。那是在叫喊：“瞧，我活得好好的，照样发表文章，我什么都不怕！”只是这不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叫喊，而是对《新苏黎世时报》叫喊，使报纸的准确的情报员难堪。

但是有关我的情况刊载的这寥寥几行字，对于我本人却是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我的信心。我的过错并不是马上就体会到了。当时我认为《文学报》上的文章也使我的信心得到了加强。

当时科佩列夫曾经开玩笑说我完成了“哈泽·穆拉特的改换门庭”[①]，我手里捧着四个短篇小说走遍了与《新世界》有敌意的杂志营垒中的几家杂志社。的确，从《新世界》的观点看，

①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哈泽·穆拉特》的主人公。先参加反俄运动后又归顺沙俄驻高加索的驻军，未获信任，出逃时遇害。 ——译者注

特别是从特瓦尔多夫斯基个人的观点看我这是一种极大的背叛。(顺便说一下,由于对非官方事件通常消息很不灵通,特瓦尔多夫斯基最终也没有了解到这一背叛的全部内涵:他以为被他藏起来连自己可靠的助手都不准阅读的《右手》,被我漫不经心地给了敌手们,而且我也没有去妨碍信差们和女秘书们复制这篇小说。)

我又恢复了工作的平衡状态,完成了几篇早已开始动笔的短篇小说:《何等可惜》《钱袋子扎哈尔》和另外一篇。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把这三篇连同有一定危险性的《右手》合成一个集子,一共四篇作为一组拿出去出版。交给谁家都可以,只是不交给《新世界》杂志出版。要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拒绝了我的半打作品,拒绝的比刊用的要多。要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刚刚被《右手》吓了个半死,他甚至没有敢给编辑部成员看这部小说。(他对我讲这一情况时是当作自己的一件功劳,他说这是保护我,保护我"可亲"的名字……这样的名字早在卢布扬卡挂了号!他是在有意无意地保护自己、保护他的声望:这个人是他发现的,他没有错。)

……

现在人们制止我,为的是我不要再亵渎神明,今后不敢再进行比较。人们对我说,多年来,对于俄国知识界的公众来说,《新世界》曾经是接触纯洁世界的小窗口。是的,曾经是这样。是的,只是个小窗口。但是这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窗口,用朽木凿成,上面不仅钉着书刊检查的铁栏,而且还有自己自愿加上去的思想意识上的防护罩——样子像是经过强化处理的不透明的装甲玻璃……(对刚才讲过的我要作一些修正:在同《十月》杂志的这些人谈话过程中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对《新世

界》的仇恨，而是还有对《新世界》批评栏的恐惧和对这一栏目隐蔽的尊重。他们无数印刷页广泛扩散，到处是一片赞美声，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他们会根本不在乎惟一的一本永远不及时的杂志的低声的批评的吧？不，这些滑头，对批评时时怀恨在心，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他们不可避免地认为，只有《新世界》的印记能够打上并且留存在，而他们打上去的印记，会被第一场春雨冲刷掉。《新世界》在苏联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裁判员，它对作品的艺术评价和道德评价是令人信服的，也是作家洗刷不掉的。顺便说一句，最好叶夫图申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新世界》里得到这样的评价，如果不是西尼亚夫斯基被捕有所妨碍的话，他的已经排印好的严斥自满自负的《布拉茨克水电站》的论文肯定会问世。）

我只是想要选择一种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万一机缘巧合该有多好：把《右手》等一组短篇小说给臭名昭著的"保守派"（我们出版界这只被打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没有其它"翼"、其它派了，他们将会怎样受折磨？如果发生另外的情况又当如何呢？他们同《新世界》的文学分歧使他们大恼其火，于是他们无视自己思想意识上应有的忠顺，使我的作品偷偷通过沾亲带故的书刊检查人员的审查，其目的只是为了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这样可能吗？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是我以为应当利用这微小的自由，哪怕仅仅是为了日后不抱憾终生。就是在宪兵印刷厂里把《右手》刊印出来我也不以为耻）。

……

"哈泽·穆拉特改换门庭"的最初时日真的引起了一片慌乱。一步也不让我步行——只让我乘汽车，小轿车拉着我来来去去。在《星火》杂志社，全体人员都来欢迎我。索福洛诺

夫刚从城外来到社里，他高兴地提醒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罗斯托夫大学的校友，又搜尽枯肠地急于告诉我他曾经写过一篇称赞《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书评（当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写这类东西）；斯塔德纽克手里拿着没读完的手稿像祈祷似的说："上帝保佑，但愿这些作品能适于我们刊用。"阿列克谢耶夫以赞许的态度说："是的，您应当迁到莫斯科来居住。应当参加文学界的社会活动。"《文学俄罗斯》的总编辑波兹德尼亚耶夫的谈话也表现出了一种弹性的愿望，他提到了已被忘却的一件事，他曾有幸给我写过一封信，接下去又抢先说明，他们的出版速度极快，可以在出版前两天把一期杂志全部重新排好。

通过这种令人兴奋的会见我重新又看到了时代的象征：不论是他们的对"上头"的忠诚，也不论是宪兵的威胁都不如布尔加科夫[①]时代那么绝对，文学家的名字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

然而，他们欢快的情绪只是在读完第一遍作品之前。《文学俄罗斯》编辑部里读了两个小时之后，波兹德尼亚耶夫就打来了电话：

"您明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是来不及'商量'的。（仅从这一点证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跑去打小报告！）坦率地讲，最近几次党的会议上我们听到的一切还都'言犹在耳'。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只能发表《钱袋子扎哈尔》这一篇。"

他马上说出了出版日期，甚至还谈到了稿费。他身上真

① 布尔加科夫（1891—1940年），苏联作家。著有《白卫军》《逃亡》《大师和玛格丽特》等作品。
——译者注

是体现了塞金[1]的风格，尽管党的会议上的种种说法还在耳边回响！……我请求把全部4篇短篇小说都还给我。他还不停地劝我三思。

《星火》杂志心急火燎地想要刊载我的作品，最初他们只说不要《右手》，其余3篇留下备用。后来又打来电话说《何等可惜》也不适合。这里也遇到了阻力。

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要比让参加过意识形态会议的出版者们安排刊印一篇短篇小说还要容易。我的全部想法，我为出版这几篇小说的多方奔走，仅仅只两三天就已经使我厌烦透了，于是我没有再去令人乏味的《莫斯科》杂志社，也没有打电话，稿子是通过朋友转去的。杂志社一声不响地把稿子搁置了许多天，搅得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我想也许主编波波夫金会拿起《右手》到卢布扬卡去请功——在已被没收的书稿之外再加上一些。

12月2日这一天我去了《新世界》编辑部，想趁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在的机会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因为我的东西特瓦尔多夫斯基既不给他们看，也不和他们商量决定。我向杰缅季耶夫和拉克申作了解释，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连串的拒绝推动我采取独立行动的，我甚至去求助于“那些人”（要知道不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商量我甚至没有权利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而这位杰缅季耶夫，我在《新世界》里经常的敌人，好像豁然开朗一般，对我的行动给予赞许：

---

[1] 塞金（1851—1934年），俄国出版家、教育家，以出版普及版书籍而受到欢迎，成为十月革命前俄国最大的出版家。十月革命后曾任国家出版局顾问。——译者注

既包括我独立采取的种种步骤,也包括去求助于"那些人",他说我在别的杂志,而不是在《新世界》发表作品甚至非常之好,他还说没有什么"宗派主义",他的观点十分开明。

讲这番话的原因在哪里,我当时没有马上体会出来。"自由派分子"杰缅季耶夫比所有那些"保守派分子"(包括阿列克谢耶夫、索福洛诺夫、波兹德尼亚耶夫)都更有谋略;他认为完全不准刊登我的作品(不论是已通过的还是未被审查通过的)的时刻已经临近,存在着查禁我的实际威胁,《新世界》最好是也甩掉这个负担。我把《钱袋子扎哈尔》给了他们(如果只刊登一篇,那么就在《新世界》上刊登)。杰缅季耶夫和拉克申很高兴地把书稿接了过去,但是却又莫名其妙地提出不要在《新世界》上登载,而应当在别处发表。拉克申建议给《消息报》,杰缅季耶夫挥了挥手说要送到更高一级的《真理报》去!在这个大有教益的夜晚(说它大有教益是因为进行这一切活动都没有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场),我的这位敌手对我表现出了少有的关心。他长时间的打电话找《真理报》文化部主任、臭名昭著的蒙昧主义者阿巴尔金;他嗲声嗲气地(还有甜腻腻的"O"音)向阿巴尔金报告说,索尔仁尼琴有一篇写得很好的爱国主义题材的短篇小说,反映重大事件,很适合在报纸上刊登,所以"我们把它让给你们。"而且当场派一位散文部的年轻编辑在下班后步行把装着这篇小说稿的公文袋送到《真理报》去。(在其他杂志编辑部里连信差都乘坐伏尔加牌轿车。特瓦尔多夫斯基从来不费神为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争取这样的特权。他觉得为下属争得如此普通的方便实在是琐碎。"当年契诃夫也是步行的。"《新世界》的人这样自我解嘲说,然而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却总是要乘豪华的黑色大轿车。)

简直是在荡秋千！第二天整整一天我的这个短篇小说在《真理报》编辑部里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不停地荡来荡去。

……

这一天我第一次发觉到，由于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长时间的不在岗位上，他已经开始失去杂志的坚强领导地位：杂志不能像它的主编大人那样有两三周停止活动、半死不活。一天前编辑部成员反对他的意见，提出了他们自己对涅克拉索夫一组短篇小说的看法（刊用），昨天毫无顾忌地同我的小说争论，而今天甚至没有给他读《钱袋子扎哈尔》，因为只有一份。应当想办法处理这部稿子，[①]特瓦尔多夫斯基心不在焉地坐在一旁，像是一个局外人。

我们相互致问候时态度冷淡。杰缅季耶夫已经向他谈了我昨天对《新世界》的看法和意见，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这无异于平地一声雷鸣，因为他不能设想牛犊会对母牛不满。我不想当着编辑部一些人的面和亚·特瓦尔多夫斯基争吵，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别人也参加进来，掀起了轩然大波。我根本没有想责怪特瓦尔多夫斯基（我本来可以怪罪他的，他已经拒绝了我那么多作品，他拒绝留劫后仅存的小说稿，他拒绝刊登我反击污蔑中伤的辩护词），我只想证明我的义务已经履行到了极限，该结束了。但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倾尽全力接连反驳我的所有论点，他大发雷霆打断我的话，我也打断他的话头，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混乱的互相攻讦。他抱怨我忘恩负义，我抱怨他的这种笨拙的庇护。这种庇护不是以世界观

---

① 拉克申还会把它寄给《消息报》，让那里排印，只是等到那里拆了版，《新世界》才不得不接受这一出版事实。——作者原注

的优势地位为根据的。

整个秋天他一直在责备我，现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起劲了：

——我怎么可以不同他商量就把自己的作品拿去交给“吃素食的人智学家”保存(亚·特瓦尔多夫斯基根本一点儿不了解他，只因为他的信仰才称他为“吃素食的”。这有些像普希金呢？还是像科切托夫？……)；

——我怎么敢于和“神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并列，等等(不论任何人对我提到9月2日发生的搜查，提到我当时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对于我来说都是经常性的脓肿，让人窒息的脓肿，可是他却要故意触痛它)；

——我怎么可以不听话，把稿子从编辑部里撤回来；

——我怎么可以把《小品集》偷偷塞给《家庭与学校》；

——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怎么可以把控告信写给4位中央书记，而不是只向焦米切夫投诉？(历史的铁轮在转动，而他却只看到了办公桌的等级高低！)；

——又旧话重提：干吗留起了长长的胡子？为什么？……

在一连串的重复的指责当中也夹杂着一些新的抱怨：

——是我发现了您！！

——不是吗？当小说被没收的时候，首先找的是我。我安慰了他，让他住了下来，给了他温暖！(换一个说法：深夜里他没有把我赶到大街上去)。

这一切编辑部的人全听到了。

最后，他又穷追不舍：

——我怎么可以去向阿列克谢耶夫“献媚”？对这个人下

一期的《新世界》要好好揭露呢!

我本来可以狠狠地回敬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尽管整个谈话都是侮辱人的,我一点儿也没有生他的气:因为我明白这不是什么个人间的争吵,不是个人的分歧,而是我们共同的道路太短,不得不到此中止了,我们不能够再像没有相互抓破脸、没有因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而互相嫌弃的文学同盟者那样一道前进了。我们的分歧是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文学的分歧,根本不是个人间的不和。

我只是就事实本身反驳了他:

"我什么时候同您商量?我到莫斯科来,待上两三天,而您经常不在。"

就是在这样非常具有悲剧性的谈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充满自尊感,他说:

"我在塞纳河畔住了两周嘛!"

他没有说是在巴黎。

这不仅是矫揉造作!他这样惟惟否否是因为在塞纳河畔他讲了我的坏话,而现在又对我隐瞒。作为自己党的儿子他又消息闭塞,又学会了守口如瓶!可是已经有人把法国《世界报》上他答记者问的报道给我翻译过来了。在《新苏黎世时报》发出警报之后,记者们理所当然地会向他问起我的情况。如果对于他来说已经喝了一口咸海水,只有嘴还露在水面的艺术家的命运对他还是重要的话(此其一),如果他还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话(此其二),他将会以无可挑剔的分寸感,毫无危险地作些避实就虚的和不完整的回答,也可以在某些问题上略作停顿,这样世界会明白我的处境不妙,我处在危险之中。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对记者们说,我

这个人过分谦虚(这一点他十分赞赏!……),我的苦行僧主义的行为甚至连他这样一个我的出版人和朋友也不能了解创作计划和个人生活的情况。但是他向记者们保证说,他们将会读到我写的很多"佳作"。

这就是说他向他们保证我仍在平平安安地工作。仍在从事写作,除了我的超乎寻常的谦虚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也就是说,他驳斥了《新苏黎世时报》的报道。

我由于嘴里灌满了海水一时没有可能呼救,可是他却乘机用大钓竿打了我一下,"帮助"我落入水底。

这是因为他对我心怀叵测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上头"使诗人们变成了这副样子……(他希望我好,他希望我顺从些,以便得到焦米切夫的怜悯!……)

……

我们冷冷地相互握手告别。

离火车开出还有一个小时,我还应当……剃掉胡子。是的,就干这件事!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了解到这一点,他一定会跳起来的!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不是去梁赞,也不是"穿越国境",而是到一个遥远的荒凉之地,去过隐居生活,我要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和任何人不通信,我藏起来的没有被没收的《古拉格群岛》的书稿就在那里。这个秋天里我已经倾尽所能争吵过了、活动过了、表现过了——这许多毫无结果的忙碌也该收场了。我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被捉走。我怀着一颗解放了的心重新恢复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打断了和搅散了的工作。

我的愿望实现了!在隐居的地方我通过晶体管收音机一直注视着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审讯。我们国家多年

来发生过比这坏上一百倍的嘲弄人的事件,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也超过千百万倍,但是西方对于这一切都似乎并未在意,或许是没有留心,或许是虽然发现了但因为有斯大林格勒血战的功勋而宽恕了我们。而现在,又是一种时代的征兆,"进步的西方"激动了。

我曾经私下里想到过,先兵们由于这两个人的审讯案有可能为我选择另一条路。他们正在踌躇不决。后来有人对我说,12 月末和 1 月间,他们的头头们宣布过说他们没收的我的书稿是我"集中起来准备送到国外去的"。他们放弃了这种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从捷乌涉的住宅并没有通向国外的途径(这些人是伪造的能手,他们是乐于信口开河、添枝加叶的),而是因为在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讯之后接着又再进行一次审讯未必适宜。

当年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寄往意大利,后来因受迫害而不得不表示忏悔,现在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由于作家内心的矛盾和分化毫不低头地接受了惩罚,他们为文学开辟了道路,为文学的敌人关闭了道路。蒙昧主义者们的天地更小了,文学的天地更广阔了。

在列宁格勒,在克格勃的官员与作家们会见时(多么接近的专业:前者和后者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格拉宁问:"没收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以契卡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无比天真烂漫的语气回答说:"小说吗?没有,没有没收过。而且他也没有向我们提出控诉!我们这里有一本叫作《第一圈》的小说,不知道是谁的作品。"(书名扉页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

这只不过说明了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后来他们终于拿定了主意——决定十分荒唐：决定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刊印我的那些被没收的书稿！看来他们指望这些书稿会引起任何一个诚实的人的反感和愤懑。

1966年3月当我重又恢复公开的生活时，我看到了印行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人，不是在保密室里，也没有办理借阅手续，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汽车里把我的小说拿给梅热莱伊齐斯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玩火，难道上帝真的夺走了他们的理智吗？不消多久，就是戴着耐火手套也难以控制住这火，它会燎原的！而且，阅读我的小说并不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小说会从我的敌人那里，会从那些花岗岩头脑中夺走一部分信念，它会使那些昏头昏脑的人更清醒些。

可是到了1966年的春天，月复一月，从不同的人口中传来消息说：长篇小说《第一圈》也印行了，《胜利者的欢宴》也印行了！而且提供给一些人阅读！谁提供？当然是中央委员会，一切材料都是安全部门提供给中央的。提供给什么人阅读？给党内的要人（而这些人不爱读书、懒惰、求知欲极差）和各创作协会的高级头头们。比如说赫连尼科夫[1]读过，并且在作曲家参加的会议上莫名其妙地威胁说："你们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剧本吗？要是在过去，写这样的剧本是会被枪毙的！"又比如说苏尔科夫读过，并且到处散布说我是个阶级敌人（与哪个阶级敌对？）。还有，柯切托夫坐下来研究起我的小说来了，也许他会偷去几招。

---

① 赫连尼科夫，（1913年生）苏联作曲家。1946年起任苏联音乐家协会第一书记。曾获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 ——译者注

真的，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并不是笨蛋：在没有公开性的国家里，为了扼杀一个人不让他讲话，并不直接使用秘密警察，而是利用有控制的小规模的公开性——即所谓上级来安排公开性。不必动用镣铐捉人，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把人折磨致死，不过使用的是舒缓的方法。

但是他们毕竟是失算了！剽窃者的投机勾当！背着我出版我的书来反对我！甚至在我们这个违法的和没有法律规范的国家(在这里内部印行书刊并不认为是“出版”，甚至不能向法院控告他们违犯了著作权！)，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化，由于国际上舆论也还有微弱的反应，也认为他们的手伸得太长、太肆无忌惮了。当心，会给卡住的。有朝一日这种方式会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的。

这种秘密出版也推动我有所作为，但是我生来愚钝，还是不能理解我应当怎样行动。我只看到了他们的这种作法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危险，我甚至喜欢上这种作法了。唆使官员们来反对我吗？不这样挑唆，他们也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但是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并不想马上逮捕我。

瞧，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出乎意外和令人为之愕然。当年抓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坐牢的时候或不问缘由、或仅仅是因为说了半句话、有四分之一的谋反思想。现在克格勃手中有充分的理由和罪名反对我(当然是按照他们的法典了)，而这只能是松开我被捆绑的手脚，使我在思想意识上享受到了“治外法权”！我的书稿被没收后半年才弄清楚，这场灾祸带给我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不仅仅是我、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协会的会员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任何政治思想的信仰。因为不论我现在想些什么，都不会比我写在劳改

营题材戏剧里的东西更坏更尖锐。如果没有因为写了这样的剧本而坐牢，那么也不会因为现在有什么信仰而再把我抓走。不论我怎样公开地在信中回答我的那些记者，不论我向交谈的对方讲些什么，都不会比那个剧本更苦涩！只要愿意，我现在可以在日记里随便写什么，我现在没有必要再使用暗语，再东躲西藏。我现在正接近前所未有的边缘：不需要再口是心非了！永远不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再需要了！

……

1966年春天我在认定给予了我一个相当长的暂缓期之后，我还意识到需要一种公开的、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东西，让它先来宣布我还活着，还在工作，让它在社会意识中占据因没收我的作品而出现的空间。

《癌病房》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我3年前开始写的一部作品。我现在又开始继续写下去。

克格勃不会等待，不会打盹，策略要求我快些写好《癌病房》，可是怎样才能写得快呢？这时候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可以先出小说的第一部，暂时不用第二部。中篇小说[①]本身并不需要分部刊印，但是策略驱使我这样做。

我是多么喜欢从容不迫地工作啊！多么想每天把写作同不慌不忙无忧无虑的语言练习结合起来交替进行啊！多么想把稿子重抄10遍，先搁置在一旁，几年之后再重新拿出来修改，长时间地推敲，看一看在空白的地方选用哪些词句更合

---

① 最初我把《癌病房》叫作中篇小说，惟一的原因是使人们不把它和被没收的长篇小说混同起来，我不想让人们说：哇，把书稿发还给他了，是吗？后来才清楚，就其实质来说，把它叫作中篇小说更为合适些。——作者原注

适。可是我的一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忙忙乱乱,安排得过于紧张,就这样也只能做些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定的框框里草草地进行!也许连这一点也不需要做……

有多少作家都是终日奔波!通常是由于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交稿期限逼得人无奈。可是我有什么可着急的呢?磨炼再磨炼!不!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或是必须把书稿藏起来,疏散开来,或是利用别人的帮助,避开其他的任务,就这样没有一部稿子不是匆忙脱手的,没有一部稿子进行过仔细推敲。

写完《癌病房》的第一部时,我当然发现不会有人出版它。我主要的目标是地下出版,后来朋友们又出主意让我拿出来供讨论用,给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散文部,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用这种方法使作品不经过检查而扩散,并使这种扩散合法化。然而为此需要对处理自己的作品有无可指责的权利——而我是有责任必须首先把作品送到《新世界》编辑部去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我的作品作了一连串的否定之后,我无论如何不能指望由他来出版《癌病房》。但是为此丧失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可避免的。

上次争吵之后我们没有再见面。我写了一封措词客气的信(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我很快会提供一部中篇小说的上半部分,我非常希望编辑部尽快作出决定,不要过于延搁。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显然颤动了一下。他大概没有放弃我们在文学事业上重修和好的希望。他把我们之间的龃龉归结为我性格乖戾、行为急躁、知错不改,但是他准备宽大为怀饶恕我的这些乃至更多的缺点。

其实我们之中谁也不存在宽恕或不宽恕的问题。我们中有人应当头脑清醒起来。入狱的最初几年已经使我头脑清醒了。赫鲁晓夫在20大发言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有了这方面的长进。但是和全党一样,这种发展很快就放慢了速度,开始就地兜圈子,甚至后退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和赫鲁晓夫一样,是通行的意识形态的永世忠顺的俘虏。他们两个人天赋的智慧下意识地同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如果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做出的事情就比他们本人更好更高尚。乡下人赫鲁晓夫的一个高峰就是他拒绝经过战争来实现世界革命。

在《新世界》编辑部里,从拿到《癌病房》手稿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把这份手稿列为秘密文件。这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的。他们担心手稿会失落,会不胫而走,采取的防范措施达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甚至连散文部本身也……不让读!而从我这里小说已经流传出去,在莫斯科争相传阅,地下出版者的队伍行动了起来!

6月18日(这是过去作出讨论我的小说的许诺之后的两年)召开了对《癌病房》第一部的讨论会。意见有分歧而且很尖锐。只是善于表达的温和的职业风度弥合了这种裂缝。可以这样说,编辑部的年轻人或职务低的部分人极力主张出版,而年老的或上层的一部分人(杰缅季耶夫、扎克斯、康德拉托维奇)极力表示反对。刚刚参加编辑部工作的非常诚恳的维诺格拉多夫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出版,那么真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有什么必要。"贝尔泽尔说:"可怕的癌症成了艺术的合法对象。"马利雅莫夫说:"我们道义上的义务是把书送到读者面前。"拉克申说:"我国文学很久没有见到过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正面人物。让这部中篇小说与读者隔绝,我的良心不能允许

这样做。"这时候扎克斯开始故意把水搅浑:"作者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非常拙劣地宣扬托尔斯泰主义……一触即发的'易爆易燃'材料过多,而且有特殊移民这一敏感题材,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有呢?……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康德拉托维奇信心十足地支持扎克斯的看法:"根本没有写完!……有关列宁格勒被围困的议论和其他一些令人气恼的地方即是如此。"杰缅季耶夫慢条斯理地说:"当然了,很想发表(他会这样吗?)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在表现作家的才力方面它不如那部长篇小说(可是正是他不接受那部长篇小说!现在长篇已经不会让他们出版了,对他没有威胁了,又可以夸起长篇小说了。)……客观的信念忽然让位于露骨的倾向性……"接下去他又激动而且愤懑地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东西时都有其内在的主题,而这部作品当中没有,从内在主题看小说没有完成!(每一次他都是同一种伎俩:他促使我说出一切,然后再打击我就比较容易了。这是办不到的!……)只是说'人们啊,想一想你们是怎样生活的'这还不够。没有完整性,就是说这样拿出去出版是不可以的。"(就好像刊印出来的许许多多的破烂在完整性方面超过了我的作品!……)他更加气愤地说:"作品中写列宁格勒,表现出作者太没有远见了。面对有的问题表现出的先见之明又超过了界限——竟把芬兰国界向后移了!"

瞧,这就是所谓的文学上的亲密合作!这就是和《新世界》的友谊!多么奇怪的论据:芬兰的国界早就推移了!可是我却给打垮了,竟是我在中篇小说里无中生有。我不能彻底地揭示"内在的主题":"进攻芬兰本身就是侵略!"不仅是杰缅季耶夫,就是下面的谈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打断我的话头

说：

“不存在从您那方面做什么原则性的让步问题！因为您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否则我们是不会同您谈话的。”

这就是那个自由主义的杂志，自由思想的火炬！他们已经把“苏维埃政权”这个词儿说俗了，甚至其中没有人明白过来真正苏维埃的政权从很久以前就没有了。

这些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结成一体：一致谴责《癌病房》的女主角，小说的小品文文体以及这部作品中所有对苏维埃文学发表的议论。他们说：“这里不是刊载这些东西的地方。”(那么哪里是地方呢？这一大堆弥天的谎言有谁能一下子回答出来呢？)《新世界》的人们共有的毫无气节(或许是胆小如鼠，或许是软骨头)使我惊诧：1954 年他们有过一段艰难时日，当时因为发表了波麦兰采夫的《论真诚》一文特瓦尔多夫斯基被撤了职，我现在以一个旁观的史学家的看法来为他们复仇，而他们大家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为首却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不需要！”提出把杂志办得“变通些”，也是“不需要！”让他们保护我们一下，还是“不需要！”

我原以为他们那个时候表示忏悔是为了报纸，为了给中央看，为了应付一下。可是他们却是诚心诚意地悔过了，承认不该谈“真诚”。

还讨论了一个按我们的条件来说堪称重要的问题：“这个中篇没有写完，只有第一部，这该怎样处理？一些人说，没关系，就这么写上。但是深知自己官场保护人脾性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却不许就这个问题再议论下去：“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小说的第一部。他们会对我们说：让他把第二部写完一起提交给我们之后再作决定。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作品当作一部写完

的小说来发表。"

小说没有写好。所有情节线索都悬在那里！……没有办法，条件如此。

这样，对于是否印行我的这部小说"下层"编辑和"上层"编辑意见分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看法应当起拍板的作用。

他这个人可是此其一时彼其一时——今天和昨天不一样，甚至一天里不同时辰也不一样。他这一次是以一个艺术家身份发言，提出了一些与编辑宗旨南辕北辙的看法和建议，这些看法对于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来说是不允许的：

"世界上的艺术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存在的。一旦艺术了解到自己是一种武器，它这个武器就打不响了。在议论这部作品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议论行还是不行……我们不是用编辑的眼光来读您的作品，而是以读者的眼光。想要尽快读完它，这是一个编辑具有的幸福的状态……一部作品的现代性表现在被唤醒了的人民的意识必然会提出道德上的'账单'……说没有完整性吗？伟大的作品往往总具有未完成的种种特征：《复活》《恶魔》，哪里没有完整性不足的问题？这篇作品我们想发表。如果作者能够对他再稍作些加工，我们就把它印出去而且要尽全力甚至付出更大的努力支持这部作品。"

这样他突然改变了决定——支持了"年轻的"编辑们（这些人慷慨激昂的发言感动了他，反对了自己的副手们，虽然他显然向他们做过另外的保证）。

就在这次会上他也讲了些完全不同的话：忽而谈起苏维埃政权；忽而又根本不征求有没有不同的看法，说什么"标题将取消"。忽而颐指气使地即兴插话，打断我的回答，不论在

政治问题上还是在艺术问题上完全是一种保护人的腔调。他绝对地确信，对讨论的所有问题他都比与会的所有其他人要明白得多，只有他才了解文学发展的途径。(他那高谈阔论的本事可高超呢！就连今天也没有忍住，又唠叨起什么留起胡子以便越境之类的话……他不知道这部胡子已经是剃了之后又留起来的……这不是简单的饶舌，而是他的个人意见服从于权威机关的意见。)

我得心应手地反驳了他们所有的人，这只是因为我把他们所有的发言全都记了下来，这些发言都记在一张纸上摆在我眼前。只在一个小地方我情绪有些激动：需要我做什么样的让步？《癌病房》里写的鲁萨诺夫之类的人有千百万个，司法部门没有审判他们，但是应当有文学的和社会的法庭。没有这样的审判，我就根本不需要文学，我也不会再写作。

……

在其他方面我还发现，整个讨论过程中我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好像不是在谈我的书，不论怎样决定我都无所谓。

这里事出有因：地下出版者的队伍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而我已经不再相信可能合法出版。但是只要地下出版者队伍的进行曲没有传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里来，就应当试试看。而且我还已经预见到第二部恐怕更难“通过”。

……

又过了一周，举行了另一次编辑部的讨论会。也许是事出偶然，也许是存心安排，拉克申和马利雅莫夫都没有到会；前者认为让这篇小说不见天日是一种罪孽，后者觉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一定要把书奉献给读者。然而对手们却全体出席，一个也不少。今天他们都很沉着冷静，没有人怒气冲冲；

他们已经在幕后制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

首先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言，他惶惑，语气也不坚定。一开始他很没有把握地指责我只作了一些“涂脂抹粉式的”表面上的修改（这时杰缅季耶夫却用非常镇静的语气替我辩护，啊，真是个狡猾的狐狸！他说我的修改都是根本性的，作品也完整了……删掉了一节！）。现在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求把已经缓和多了的有关列宁格勒被围困的议论也全部删掉，有关真诚的议论也要删除。他完全不再拐弯抹角，而是很激动地说：

“现在不具备出版这本书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可能冒险出版它，最起码今年是如此。（好像明年建国50周年时将会好些似的！……）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稿子，即使把它分解成若干个部分，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立得住。（这样的要求过于苛刻繁重：作者一点儿也不能和编辑部相左吗？而且还要事先试着适应编辑部吗？）是啊，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的人……”

甚至集中营题材俯临《癌病房》一事，上一次他还宣布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一次却又被他说成是“有如格罗斯曼写劳改题材，也是道听途说”。（我写劳改营，竟也是“道听途说”！）接下去又说，“编辑部需要把没有出路的作品全部退掉。”（这里指的是贝科夫有关切沃夏诺村的长篇小说和西蒙诺夫的《日记》。杰缅季耶夫和扎克斯答应《日记》将会出版。但是这本书也被禁止了。）与所说的自相矛盾的是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宣布：编辑部认为小说“基本上是好的”，可以马上签订合同预付百分之二十五的稿费，如果我手头拮据，也可以先付百分之六十。“您写第二部吧！我们等待着，看您写得怎样。”

不用他们催促，我也在赶写第二部。而现在却让我先拿到稿酬以便于他们能够把第一部塞进保险柜这样的棺材里并且就此了事。按照《新世界》的规定，按照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我的个人要求，他会不再给任何人看一行或一个字，《癌病房》因之也就难以再见天日，直到在一个风狂雨骤的日子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来搜走时为止。

编辑部的这一决定使我从心底里感到轻松：所有已经修改过的地方都可以马上改过来，作品可以恢复原来的面貌，它已经在打字机上打印，正在被传阅。我可以不必担心一旦特瓦尔多夫斯基了解到作品不胫而走怎样应付他再次大发脾气了。我们彼此都是自由的！

但是，我并没有戏剧性地宣布这一切，因为在劳改营所受的教育不允许我事先宣布自己的打算，而是要求马上默默地行动。我只说先不必签订合同，手稿我要拿回来。

不签合同和索回原稿这两个行动相结合，编辑部本来有可能理解其原因！但是他们没有理解。他们理解成我屈服了，认错了，以为我认为还不配签订合同，愿意继续工作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我又是《新世界》的顺民了。

然而还没有过一个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就通过我妻子的亲戚图尔金紧急召见我。和过去一样，他们起先"没有找到"我，但是8月3日我刚好在莫斯科，而且了解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听说我的《癌病房》在流传，他愤怒已极，他只想确认一下当然不是我干的这种勾当（我有那么大的胆量吗?!），这样他就知道了该把谁驱逐出编辑部了！（热爱劳动的贝尔泽尔受到了怀疑，这是一个卖劲为《新世界》拉套的最忠诚的马儿。）

他是个诗人，也是个从国家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央委员：不适于出版，甚至不适合提交书刊检查机关的“有危险性的书籍”，尽管是在苏维埃的晴空下写出来的，也应当认为已经是国有财产了！它不应当由着愚蠢的作家的性子任意胡来，随随便便地给人们阅读！

我的想法恰巧相反！从我上次被抄算起已经过去了一年，甚至我的这个不开窍的脑壳里也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我的处境：那就是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那就是公开地、不加隐瞒、不加否认地把《癌病房》四处送出去出版，对于我来说丝毫也不比在大卢布扬卡遭了整一年罪的那部劳改营题材的戏剧更加危险。您在扩散自己的作品吗？是的，我在扩散。我创作了，我也在扩散！你们所有的出版社都滚开吧！人们竞相传阅我的书，夜里偷偷翻印它，我的书在你们吃惊地张开大嘴之前就已经成了一种文学事实！让你们的列宁文学奖金获得者也试试看好了，他们敢于这样扩散自己的手稿吗！

这就是俗话说的“灾祸降临，嫌弃也没有用！”灾祸可以给我们带来自由！只要善于利用灾祸。

过去焦米切夫曾对我谈到过我的耐受力，当时我没有很好地理解。现在他们这一年难以有所作为，他们以此真正地证明了我的耐受力。

我当然没有去接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挑战，给他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如果这部中篇小说也为《新世界》以外知晓，这一点使您心神不宁的话，那么……我应当表示惊奇……这是任何一个作者的权利，如果您想剥夺我的这一权利，那将是非常令

人奇怪的。除此之外，我还不愿意看到《癌病房》重蹈长篇小说的覆辙：先是遥遥无期的久久的等待，要求作者不向除编辑部以外的任何人展示这部作品，后来对于我本人和读者来说作品失落不可复得了，然而却在秘密选定的人中流传……”

我写了这封信，而且没有考虑到写得过于尖刻。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这的确太过分了。据说读完这封信他流了泪。是为失去了的儿时的信念？是为失去了的友谊？是为现在已经落入强盗编辑手中的不可复得的这部中篇吗？

从那时起我便再未涉足《新世界》编辑部，也没有再打电话给他们，我有采取行动的自由，我在绞尽脑汁地努力探索我还应当做些什么。为了对付深深咬住我的小说、我的书稿不放的敌人，斩断他们无耻的爪子我还应当采取些什么样的行动？法庭抗议的形式毫无希望。需要求助于社会的抗议。

过去，当我从远处观察作家协会时，我觉得它十足地是一个文学殿堂里专门嘲弄人的场所，只配用长鞭子抽打。但是生命力极强的草正在悄悄地生长，缠绕着到处堆放的钢梁，如果这些草不被人践踏，连这些钢梁都能被覆盖起来。茁壮的枝叶、完全没有被污染的枝叶不事喧嚷地在这个腐烂的病体上生长起来。赫鲁晓夫开展揭露运动以来，它们的发展更快了。我加入了作家协会后，我惊奇而又欣喜地发现这里有许多有生气的热爱自由的人——或是天生如此，或是尚未来得及堕落，或是给甩掉的垃圾（再一次证明不可以笼而统之地加以评说）。

现在我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百个乃至二百个作家，写信给他们，但是他们通常在作家协会里不占据任何领导岗位，

如果我不是按照职务特征而是按照精神特征而把他们划分开来，我会使他们遭到打击，而且丝毫不会有助于我达到自己的目的：体现反抗的公开性。把抗议信寄给人数众多却又极端平庸的全苏和全俄作家协会理事会既令人不快又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作家代表大会预定在1966年12月召开，这是从6月份推迟至12月的一次代表大会，是我参加作协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可是一个机会！召开大会期间旧的领导已经不再执行权力，新的领导还没有选举出来。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随自己的意愿去识别出公正的代表。向代表大会上诉，谁说这不是列宁的策略？他正是这样教导的：抓住时机，只要还不迟……和……

但是离召开代表大会的12月还有一段时日，有一种力量怂恿我一定要抗议没收我的书稿。我决定先要上告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不是党员，但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可以随意向这个机关提出自己的祈祷，向他诉苦。有人向我转达说中央那里甚至在等待着我的信，当然是真诚的信，亦即表示忏悔的信，恳求给我一个机会痛骂过去的自己，并且要证明我是一个“十足的苏维埃人”。

一开始我想把信写得措词尖锐些：说他们自己已经不再重复他们在20大之前讲过的话，为说过的话感到害羞了，放弃了先前的看法。艾·亨利说服了我不这样做：除了使关系紧张之外，这样的信事实上不会有任何好处——既不能赢得时间，也不能争来共处。我重新改写了信，指责针对文学家，而不再是针对党的领导人了。在其他方面我尽量讲得实事求是，但在表达时体现出了自主精神。大概我做得并不成功：在我们国家里还没有用这样语气讲话的传统，创造这种传统，谈

何容易！

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在1966年7月底发出。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和反应。对我的作品所进行的秘密阅读活动没有停止，来自上头的指导体系的迫害没有减弱，也许只是暂时缓和一些。但是这封信毕竟帮助我争得了几个月的时间，延缓了所有事件的进程，而利用这段时间我写完了《古拉格群岛》。这封信大概还促使他们准许在文学家中央俱乐部举办《癌病房》第一部的讨论会（不然的话，这部书有两个月一直放在莫斯科作家协会书记、克格勃中将伊里英的手中，像是被没收了一样）。

这次讨论是在中央俱乐部的通知广告手册上公布的，就这样第一次违背了《新世界》的旨意在印刷厂里排好了这个不可更改的书名：《癌病房》。然而发现了有太多的人希望参加讨论会，作家协会的领导吓破了胆，改变了会期，决定在白天召开，而且不是公开宣布，同时在入口处检查散文作家的请帖时特别严格。

这是11月16日。这三个月里许多敌人也读了我的书，有的人不仅在杂志上写文章攻击我贫乏的哲学观点和平庸的艺术手法，而且甚至有人（潘科夫）已在课本里用整章整章的篇幅攻击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那一伙人中除了凯德琳娜（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公共公诉人”）和劳改营的正统分子（也许是告密者）阿萨诺夫，没有人敢于在会上露面。这是一种双重的象征：表现了已经壮大了的社会舆论的力量（没有论据也要争论一番，而且不再怕人打小报告）和对自己还有信心的官僚阶级的力量（他们干吗要来这儿叫喊一通呢？不这样做他们也能不动声色地压制住这本书，不叫它出版）

于是讨论会并没有酿成原来料想的那种战斗，而是变成了某种新式文学的重大成功的展示和宣告，这种文学还没有人给它定名，没有人进行过认真分析，但它又是被所有的人贪婪地期待着的。正如卡维林在他大胆而杰出的发言里所宣称的那样，这种文学必然要代替迎合当局口味的文学（他们早就可以大胆发言，他们等什么！）。没有让凯德琳娜讲话：他们尾随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示威似地一起涌出会场。①

这一年的11月对我来说是充满不平凡事件的月份，不是按照事先安排合理的计划，而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结果。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这样奇妙的时刻，这时各种不同的外在的突发力量一下子都开始运转起来发挥作用。我就是全身心地卷入了这种运转之中，从中了解到了我应当怎样行动：应当更泼辣地摆脱掉所有各种有意识的限制。过去我不是一向拒绝发表公开的演讲吗？现在我接受所有的邀请。过去我总是拒绝答记者问。现在谁来提问我都愿回答。

因为，这样做我无所失。比他们对我想的还要坏，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再想了。

我自己的书稿本来保存得好好的，不是我第一个损伤了它，搬动了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它抓走了。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未能预见到这些东西的秘密含义、事件发展的潜在力量。在他们的转轮游戏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我都只是执行者而已。

我的第一次公开讲演是突然谈妥的：大街上偶然相遇，边

①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禁止《新世界》编辑部的人参加讨论会！奶牛走开了，牛奶桶也踢翻了。

——作者原注

走边问我要不要到某个“邮政信箱”去作一次讲演。为什么不去呢？我去。一切都很快安排妥当了，保卫机关还没有来得及探明情况，库尔恰托夫院士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那里已经组织起了一次有600人之多的会见(应当说其中100多人是外来人，是“应党委会之请”而来的没有人认识的重要角色)，当然也会有不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区委和市委的人。

我去参加第一次会见，并没有准备发言，只想朗诵作品——我朗读了三个半小时，只回答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而且说得模棱两可。我从《癌病房》中选了几个重要章节，读了《你心中的光明》的一幕(谈到了科学的宗旨，触动了科学界的听众)，接下去我放肆起来，宣布要读几章《第一圈》(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的会见)，就是卢布扬卡抄走的《第一圈》：如果他们能把它拿给上级任命的坏蛋们读，为什么作家不可以给人民读呢？(首先打开禁令的结子的人似乎不是我，这对我的在劳改营里形成的宿命论思想是一种安慰。)

不，这不再是过去了，我们也不是从前的我们了！我的声音没有被压倒、我的话没有被打断，我的手没有被反扭过去，甚至也没有把我传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做解释或者听训斥。发生了这样的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谢米恰斯内主席竟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了！公开地和不公开地。在这个岗位上他在非洲和欧洲的颠覆网和间谍网连连被破获，可是他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进行思想斗争上来，他特别把作家当作这个制度的主要敌人来加以反对。他经常在意识形态会议上、在宣传鼓动员的研讨班上讲话。这一年的11月份里他在多次讲话中对我的放肆无礼表示不满，说我在讲坛上当众朗诵被没收的小说。克格勃的回答如此而已！

他们的每一个步骤都向我证明我过去的作为远远不够。

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回敬谢米恰斯内。我在库尔恰托夫院士研究所里讲演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要我讲演的邀请接踵而来，有的邀请没有确定日期，另一些邀请定下来日期，而且安排得很紧，只要时间不冲突，我毫无例外地一概表示同意。这些机关里似乎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经过了领导批准、挂出了通知、印发了请柬。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有关方面并没有打瞌睡。临到会前最后几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会前几分钟常常从莫斯科党的市党委打来电话说："你们要安排同索尔仁尼琴的会见，那就先交出党证来吧！"虽然会见主办单位都不是小机关(涅斯米扬诺夫的研究所、卡尔波夫的研究所、谢留诺夫的研究所、莫斯科大学的数学力学系、鲍曼高等工业学院、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却没有一个人有力量表示抗议，主持此事的院士们也缺乏勇气。在卡尔波夫的研究所，我已被他们拉到会场时刚好赶上宣布取消这一活动，挂出的通知写的是："作家生病，活动取消。"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的馆长由于吓慌了手脚自行宣布取消了讲演会：给他打来的电话说，一位克格勃的将军将微服前去查访，应当准备接待。

当我理解到我在库尔恰托夫院士研究所时表现过于克制时已经迟了，现在我要到处寻找机会回击谢米恰斯内，可是所有的门都关闭了：错过了机会，亲爱的！只要再讲一次，我只再需要一次机会以便狠狠地回击，可是已经迟了！一生我都没有这样尖锐地感受到失去讲话自由的苦痛！

忽然有一天拉扎列夫东方学研究所坚持请我去讲演，他们说："决不会再取消了，原来已经禁止过一次了(后来所有官

员全都拒绝承认是他们禁止的)。"我从梁赞乘火车后直接去参加会见,真的没有被取消(11月30日)。

这一次我可是来说话的!这一次我带来了准备好的讲演稿,只是要找个理由,看怎样讲合适。我朗读了《癌病房》的两章,收到了几十张纸条,抓住了其中的某一点,我趁着还未被赶下讲台的机会,急如星火地把在其他9个地方禁止讲的话全都和盘托出了。讲台上和我并排坐着几个人,他们是党委会的。他们来做什么?如果不满言论太多,他们会不会关掉麦克风,阻止我再讲下去?但是他们未能采取什么行动:大厅里坐的都是一些具有很高素养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对于他们来说语焉不详、意在言外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超过界限追求痛快淋漓。我感受到这里有克格勃的某位大人物在场,他甚至可能随身带着轻便录音机。拉扎列夫东方学研究所古老墙壁上的雕饰,在我看来好像是宪兵司令的高浮雕像,而他现在不能反驳我,我却可以反击他!我以宏亮的声音、胜利者的感情,简直可以说是兴高采烈的感情向听众诉说(而且是向在座的克格勃高官),供出我的一切。我过去是劳改营里微不足道的囚徒,将来也可能还是,在关进新的单人囚室之前,在进行新的秘密审讯之前,我获得了有500人之多的听众和讲话的自由!

我应当向你们解释明白,为什么过去我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拒绝公开发表演说,而现在却又接见记者、又站在你们面前讲演。和过去一样,我认为作家的事情是写作,而不是在讲坛上摇来晃去,不是向报界频频作出解释。但是人们给我上了一课:不,作家不应当只写,他还应当自卫。我接受了这一教训!我来到这里在你们面前进行自卫。有这样一个组

织，根本不需要他来监护文学创作，它根本不应当来领导文学艺术，可是这个组织却在干这件事。这个组织夺走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没收了我从未想要拿去出版的许多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保持沉默，继续不声不响地工作。但是人们利用从抄走的我的材料中摘出来的不全面的片言只语，开始对我污蔑攻击，一种新形式的污蔑——在不公开的发出指示的讲坛上的攻击。我能做些什么呢？自卫！所以我才来了！看一看吧：我还活着！看一看吧：这个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摇晃了一下），而且不让我知道，违背我的意愿，把我的小说秘密出版并且在经过挑选的人当中散发——其中包括像《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这样的人。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作为原书作者不可以今天给你们朗读同一本书的几章呢？（喊声："读吧！"）

应当一辈子总过奴隶的生活，从童年起就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对所有的人都要跳将起来违心地鼓掌，对明摆着的谎话点头称是，从来无权表示反对的意见，而这一切只是奴隶公民。如果是奴隶劳改犯，那还要反背着手，不许东张西望，不准走出队列。为了对在讲台上对500名也因自由而失去理智的听众自由地讲上1个小时的话做出评价，就应当这样地生活。

我似乎觉得，这是第一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看到怎样锻造历史。我有选择地读了揭露告密者的章节（《祖国应当了解告密者》）、揭露刑侦人员的卑微和虚伪的章节。几乎每段对话都像火药一样在大厅里燃烧。这些人士是怎样了解真情的啊！我的上帝，他们太需要了解真情了！递过来一张纸条：请解释一下您读过的一章中的这样一句话："斯大

林不允许红十字会接近苏联战俘"。现代人和波及到所有人的不幸战争的参加者们也不很了解这一情况。在任何一个牢房里任何一个笨人都掌握了这些情况。可是有500名才智过人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坐在这里,他们不了解。同志们,我可以解释,很遗憾这段历史鲜为人知。遵照斯大林的决定,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拒绝在有关战俘问题的海牙公约上签字,拒绝向国际红十字会支付费用。所以我们的被俘人员是世界惟一被自己祖国抛弃的战俘,是惟一注定因喝德国人的稀菜汤而被饿死的战俘……①

啊,看来我开始喜欢上了文稿被没收之后自己这个新的地位!喜欢这种公开而自豪的对抗,这种表述自己思想的公认的权利!让我重新回到过去的那种平静状态中去,我会很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苦难的最高含义和隐秘含义开始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能证明这苦难是应该的),当我们小人物难以预见"至高无上的智慧"的火花表现出它的最高含义和隐秘含义的时候,为了打消我躲藏和沉默的可能,为了让我在绝望中开口说话和有所做为,就让致命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吧!

因为——日期临近了……

我写这些随笔是从回忆我怎样逐渐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地下作家开始的:一个障碍接着一个障碍,不知不觉就到了清晨该起床的时候了:喂,我已经……同样,由于一次痛苦的失误,我几乎濒临被捕或自杀的边缘。后来,一步又一步,一

① 在下一次"回答"提问时谢米恰斯内肯定会宣称我在造谣污蔑,说似乎我们让德国战俘挨饿。

——作者原注

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终于理解了、领悟了、豁然开朗了：能够最快理解天文数字的人是幸福的。我慢慢地，经过一个长久的过程，终于在一天早晨一觉醒来了，我已经成为自由国家里的自由人了！！！

我就这样以自己的第二次演说敲响了锣鼓。我在叫阵，叫他们上阵来战斗，似乎我从现在起除了演说，别的事情不再做了；就在那些天里，我又消声匿迹了，虽然没有剃掉胡子，但是这一次我又钻到遥远的隐居之地了，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处所去工作，去工作！因为期限已经临近，而我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它，我还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指望自己能有3个月的平静时日，一直到明年春天。真的如愿以偿了。12月到2月我把《古拉格群岛》最后修改了一遍，重新打印了70个字数印张，一共用了73天，一面还要生病、生炉子、自己烧饭。这不是我在做，是我的手在做！

我还指望1967年新年伊始时还有一颗小小的手榴弹爆炸——我对日本记者河本清次发表的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在1月中旬举行的。应当在新年时见报。但是已经是11月份了，在我这边远的洞穴里晶体管收音机没有收听到任何一个电台对这次谈话的报道，日本电台、西欧电台，甚至自由广播电台都没有报道。

11月的这次答记者问纯属临时安排，按照官方的标准是目无法纪胡作非为。有一些规定，外国记者也要遵守，如果他们不想丢掉在莫斯科的工作的话，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更是如此。作家应当得到作家协会对外委员会的同意（所有机关的所有对外部都是克格勃的分支机构）。过去我不了解这些规

矩，现在根本不想再了解。我现在的新角色是享有治外法权和不受法律制裁。

河本清次按照一般的方式提出了要我对他发表谈话的请求。一份给我，一份致送对外委员会。委员会并没有感到不安，他们知道我很早以来就拒绝回答所有记者的提问。我呢，我想接见记者已经有一年多了，从被查抄时开始，我就想告诉记者我所遭遇的一切。现在意外的支援来到了：日本记者（似乎不是西方记者，同时又是纯粹的西方记者）向我提出5个问题。如果我不愿意见面可以以书面的形式回答他。他给了我他在莫斯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甚至就仅仅这5个问题已经使我感到满意了：这里已经提到了有关《癌病房》的问题（就是说消息传得很快），也有关于我的"创作计划"问题。我准备了书面答复。我还不能下决心来一次彻底的爆发：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小说和文稿被查抄。但是我一一列举了自己的几部作品，并且写道我不能为他们找到出版者。如果3年前一位作家的作品就成了抢手货，用各种语言出版，而现在他在自己的祖国竟"不能找到出版者"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吗？

但是我怎样才能把回答交给这位日本记者呢？通过邮局寄吗？他们肯定会截获，而我甚至难以知道信有没有寄到。让某一位朋友把信投进楼梯上的信箱里？他们的特别住所里楼梯上一定有监视器和秘密拍照装置（我当时不知道还有民警，他们根本不放人进去）。这就是说需要见面，而既然要见面，干吗不口头答记者问呢？但是在哪里见面呢？梁赞不许外国人去，在莫斯科我又不能让任何一所私人住宅遭到危险。于是我选择了最狂妄的方案：在文学家中央俱乐部。在那里讨论《癌病房》的那一天，我相当仔细地了解了会场的情况，我

通过自动电话和日本记者通了话，约他明天中午在文学家中央俱乐部回答他的问题。这样的邀请听起来很正式，他大概会以为我已经安排好了在那里会面。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女译员（当然是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过的）。女译员在新闻社约好了摄影师，请他来为在中央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拍照，这听起来也很正式，新闻社也不可能产生怀疑。

我比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来到中央俱乐部。这是一个工作日，已经看不见一个作家了，昨天的热闹景象和严肃气氛都已荡然无存，工人们经过大敞四开的大门把椅子拿出去。进来的不是皮肤黝黑的日本人而是一个白净净的俄国姑娘，她径直向行政负责人的办公室走去，我听到了她在喊我的名字，我就赶上去抓住了她，请她把日本人唤来（他们来了两个人，都坐在汽车里等候）。看门的还是那些人，他们昨天在前厅里见过我，我当时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因此，当我说"这些人是找我的"时，他们是感到很有权威性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外国人进入中央俱乐部每一次都需要行政当局特别许可。）我请他们来到一间有地毯和沙发的安静的休息室里，并且对他们说希望简陋的环境不会给我们公务上的会见带来不方便。这时新闻社的摄影记者气喘吁吁地跑了来，还把中央俱乐部的大闪光灯也拖了来。俱乐部的行政领导人发现了这一计划外的活动，但是这个记者一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样子，想必是得到了允许，是不容怀疑的。

河本的俄语讲得相当不坏，所以女译员成了多余的人，什么也没有翻译。会见结束时还弄清了一个情况：河本说他有三年是在我们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度过的。太好了，既然他也是个劳改营分子，他也许会很好地理解我们这次会见的荒

唐之处！他尤其应当理解所有的未尽之言。我们亲切告别。

新年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晶体管收音机没给我这孤独的居所带来哪怕是有关我的答记者问的片言只语。难道全白费力气了吗？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去干扰河本，威胁他了？还是报纸的主编不想破坏日苏关系有所缓和的一般状况呢？（他们的俄语电台广播肉麻地奉承。）只有一点我不能理解：答记者问按期全文发表在四家报纸（发行量500万份）上，占据四分之一版面，就算是用日文吧，怎么在西方竟没有一个人发现它呢？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上的电台每天都援引日本记者的报道，这就是说他们浏览日本报纸，可是竟然谁也没有发现我的答记者问！是因为知名度不够？还是因为西方对随便一个什么俄国作家已经不屑一顾？一本有关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译得很糟的畅销书，一共才时兴了两个星期，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报上随便登一条消息（哪怕是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或者是非洲的几内亚）说希腊的某位左翼作家找不到希腊的出版者刊载他的某一段作品，那么罗素[①]、萨特和所有的左翼工党党员都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对英国首相表示不满，寄抗议书给美国总统，也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痛斥希腊的刽子手们。可是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被斩尽杀绝的俄国作家，现在在专制领导的时代继续受到摧残，而且很快就会永诀人世了，这却丝毫不能侮辱这些人的左翼世界观：如果在苏维埃的国家里摧残什么人，那肯定是为进步所必需的！

有许多月份完全离群索居，对工作和思索都是极大的好

---

① 罗素（1872—1970年），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译者注

事！事物和问题的真正规模、份量和对比安排得如此和谐。在不停地工作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这个冬天，我发现在49岁的时候我结束了自己的头号工作。除了最主要的最后一部作品《1917年的革命》之外，我已经把一生中准备写的作品全部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构思了30年，从10年级结束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反复考虑、留存起来备用、不断积累材料，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动笔，总有什么事情妨碍，不得不一拖再拖。只是到了1967年春季，我才终于有这种可能着手写这多年梦寐以求的作品。当我刚一开始翻阅一些书和一些笔记时，我的手掌都发热了。

此时此刻，在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寂静之中，望着严寒里覆盖着沉重的白雪的枞树，我应当做出一个最重要的生活选择。有一条路——相信这种表面的中立的平安无事（没有人打扰），会给我很多个不平静的年份，我将继续尽可能规矩地坐在那里写作，写下迄今为止没有允许任何人写的自己的主要的历史。谁还能写呢？做这一件工作我需要7或10年。

还有第二条路：理会到可以这样拖上它1年，2年，但不是7年。这种表面上的不真实的平安无事自己也会打破。把鸵鸟的头从小石堆里伸出来。要知道铁腕人物谢列平也并没有睡大觉，仍在偷偷活动，在僻静的角落里活动，准备攫取权力，而他最先采取的行动就是砍掉我的头。于是，就在最喜爱的工作之前要放下笔杆、要冒险。要冒着失掉笔、手、喉咙和脑袋的危险。或者，无可挽回地、公开地和当局搞坏关系，并且以此来站住脚吗？命运是在促使我这样做吗？不应当迫使它重复警告。几十年来我们由于有个人的打算和许多重要的

私事,过于保护了自己的喉咙,没有大声疾呼,而到了把我们装进麻袋里的时候再喊叫就已经迟了。

……

我听电台广播说作家代表大会改在5月举行。时机真太好了!既然答记者问没有帮上什么忙,就只能靠给代表大会写信了。现在只能是指名道姓而且大声疾呼。

……

不是劫运在寻找人的头颅,而是头颅去迎接劫运。

我近期的打算是把《癌病房》的第二部最后定稿并且把它扩散开来。我离开此地去过冬时已经接近完稿了。回到喧闹的世界后应当把书最后写完。

但是荣誉感要求我在把第二部交付地下出版之前还要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一看,虽然我事先就预见到这只是白白浪费一个月的时间,而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时间是十分紧迫的。为了争取时间,我请我的好朋友们提前一个月,把没有完全定稿的那一份稿子带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同时附有一封很像是从梁赞森林写的信:

"亲爱的亚历山大·特利丰诺维奇!

我觉得请您作为我的第二部的第一个读者是公正的,如果您愿意的话……作品的文学还需要再润色,我暂时还不能提供这本书的全部手稿……我要趁此机会使您确信,作品第一部我们未能实现的合作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对《新世界》的态度。我仍一如既往饱含同情的情感注视着杂志的立场和活动……(这里说得显然有些穿凿附会。)……但是一般文学状况对于我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我不能允许自己像在过去的4年

里那样站在消极的立场上……”

也就是说我甚至没有请求审议有关出版的问题。经过上次争吵之后，经过半年中断联系之后，我只让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上一读。

时间安排得很好。当我1967年3月间回来赶写完第二部时，在《新世界》编辑部里不仅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而且所有的人均已读过了，我只能等待他们的拒绝，让我不要心存任何可能出版的指望。这一年里，有5个苏联杂志社拒绝刊印我第一部中的哪怕是最无害的章节：《治病的权利》（塔什干的一家杂志甚至在将稿酬用作救济慈善活动的一期上也不予刊载）；接着《辽阔》杂志和《星》杂志又拒绝了第一部整个一部（说“给鲁萨诺夫倾注的仇恨心理多于传授给他的手艺，要知道这在苏联出版的书刊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回顾过去，给人一种感受似乎个人迷信把苏联人民所做的所有好事也全都一笔勾销了。要知道一座座高炉完全能够补偿千百万人的死亡和普遍的腐化堕落”；他们很想“看到作者的立场与托尔斯泰主义的立场有明显不同”，果真如此大概托尔斯泰的作品他们连一行也不会出版了！）。

每一次这样的拒绝都是在拴我作品的气球的绳索上再砍一刀。我还要从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里得到最后的一刀，恐怕任何讨厌的拉力都不能制止我的这部作品迫切要求的腾飞。

3月16日我们举行了会见。我走进他的房间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而他迎接我时却情绪压抑，信心不足。我们自然要谈到小说的第二部，但是在面对面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对这一问题谈得最少。

我应该走小路已经秘密地决定了。我迎着自己的劫运走去，而且情绪高昂。我发现了亚·特瓦尔多夫斯基意志消沉，就想鼓励他一下。这一段时间里他在党和行政工作方面连续遭到了几次失败：在第23次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再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不久前又没有被选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焦米切夫解释说："人民抛弃了他。")。由于失掉了这些官衔使得他在粗暴无礼的书刊检查人员面前显得更加孤立无援了，这些人，只要愿意就可以随便毁坏他的杂志已经排好的字版。给讽刺剧院上演的《焦尔金游地府》套上的绞索也拉得更紧了：演出场次越来越少，甚至准备完全停演；而且不久前中央委员会越过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没有告诉他就突然下达了命令，谁也不清楚其意图何在，把他手下两名最忠实的助手的职务给免除了：杰缅季耶夫和扎克斯。就如同过去人们走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门是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一样，今天这两个人离开中央委员会之后已不可能再回去干过去的工作了。[①]从行政上讲，这显然是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轻慢，而且是对整个编辑部的侮辱，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也是砍断绳索，是一种腾飞，因为撤掉的人也是两个削弱特瓦尔多夫斯基能力的最忠实的内部保卫者。然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非常习惯于事事托付杰缅季耶夫，已经特别相信扎克斯的办事才能和外交手段，他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撤职的形式对于整个编辑部的所有成员也是粗暴的，所以差一点儿酿

---

① 当然了，杰缅季耶夫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到编辑部来，很可怜的样子，说话哭丧调，他在这里从来不是为工资工作的，他是在完成社会委托，现在他会无偿地干这种事。

——作者原注

成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亚·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比任何时候都倾向于放弃编辑部的工作。(就是说敌手的盘算很精明。也许还有别的设想:《新世界》的全部射击部分在没有内部制动装置的情况下自动失灵,发射的次数太多了,自身毁坏了。)

我对杰缅季耶夫和扎克斯去职的看法有所不同:只能使杂志更加净化。但是让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工作人员们相信这一点是徒劳的。在其他方面我努力用自己的看法影响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当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不是他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一种解脱,这样他和他的杂志的地位就更接近普希金时期的杂志了:您是一位领导独立杂志的自由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远远配不上这样的比喻。但是杂志内部形成的谈话习惯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温度。如果我想在某些方面提醒他。我也不能回避使用这样的形式。)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马上做出了反应,他说他根本不对落选一事惋惜,相反甚至有些高兴。(这样说就不错了,尽管明显地看出并不真诚。在这些日子里,就在他住的斯托列什尼克胡同,他酩酊大醉,拦住一位素昧平生的上校,对他诉说自己自尊心受到很大损伤。)

我说:"太好了,我很高兴您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解,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有了内在的自由!"(啊! 果真如此就好了!)

他说(没有经过我启发):"……比方说没有颁给我奖章!(在一个月之前授给了肖洛霍夫、费定、列昂诺夫、蒂奇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金星奖章,而他这个俄国第一诗人——按照等级排列是这样认定的——却没有得到,是由于他有某些过于大胆的社会步骤而破坏了等级排列的常规。)索波列夫为这事哭天抹泪痛不欲生,我却庆幸没有获奖。真要

是得奖那对我会是一种耻辱。"(言不由衷)。

我说:"和这些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耻辱。"

于是,尽管我们已经有 8 个月没有见面,像是断绝了来往,尽管刚才他见到我时郁郁寡欢,而我们相互间都担心发生新的龃龉,担心话不投机,现在却自由地交谈起来了,话题是他和我都感兴趣的:我的宗旨一向是希望他们摘掉哪怕是自愿戴上去的笼头。

特瓦尔多夫斯基详细地讲了为什么他没有因杰缅季耶夫和扎克斯去职而提出辞呈;谈到这些人是怎样说服了他;上头对他说:"他的辞职将会被认为是反党行动。"他还心平气和地讲到他已经利落而稳练地重新改组了杂志编辑部,德洛什、艾特玛托夫、希德洛夫在接受参加编辑部的邀请时全都说的是同样的话:"非常荣幸"。还有前一天在作协书记处讨论了杂志的工作(在《真理报》上发表骂街的文章之后):与预料相反会议开得体面而且顺利。

这样回顾以后感到不全是痛苦,还有愉快:杂志已不止一次表现出了自己永不沉没的特性!否则呢!否则会恶浪滔天,明灯也会熄灭。

在这玫瑰色的晴天里还有一件事搅得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安宁:昨天在作协书记处马尔科夫说《癌病房》已经在西方出版,这位主编大人威严地盯视着我。(又留起了胡子……是不是自己把《小品集》交给了国外的人?……一切都针对着我。)这时亚·特瓦尔多夫斯基以长者身份提醒我说,甚至某个(知名度很低的)资产阶级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按我这非党人士的理解具有更有根据的权威性)登载文章说,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所做所为的形象当然配不上索尔仁尼

琴。

我回答说:“我本人不准备向国外投寄任何东西。但是我也不会把书藏起来不让自己的同胞看。我让他们读了,现在和今后还要让他们读我的书!”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吁了一口气。但是通情达理地承认说:

“说到底,这是作者的权利。”

传言的发端在何处呢?我试图向他解释。被许多苏联杂志拒绝了的《癌病房》的一章确实已在国外发表,具体说是由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的。而且时机恰到好处!前几天我回答了斯洛伐克记者们的问题,对您说吗?是的,我在11月份曾经答日本记者问,我没有告诉您……(“我听说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脸色沉郁地点了点头,“您把一些非法的东西提供给了日本大使馆……”)是的!可是我们已经有8个月没有见面了,而明天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要出访意大利,应当让他了解我的新的行为方式:现在我要以完全不同的姿态行事!……

……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手稿提交散文部讨论……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摇头:不要提交手稿讨论。

我说:“……以后我要公开讲演……”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皱起眉头,说:“这很不好。白费劲。您做措词尖刻的演说将使《新世界》受到打击。会谴责我们说:瞧,你们教育出的是什么样的人,您们把什么样的人拖了出来。”

(我的上帝!不仅仅是我,而且整个俄罗斯文学都应当缄

口不语并且自我谴责，只求得人们不要责难和整治《新世界》杂志，是这样吗？……）

“我也在保卫您。我要在讲坛上大声疾呼，为什么您的杂志往往拖延两三个月才出刊，那是书刊检查机关的过错！”

“不要解释！”他的脸色更加阴郁了。“有人对我说，您发言是反对我的……”

“反对您？您能相信吗？”

我回答说：“随他的便好了！反正我是不会去反对他的。”

（他相信了！马上就相信了，这个可怜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然而他自己的行为是比较高尚的……这就是友谊。）

在这一次谈话中《癌病房》在哪里呢？终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两句话，两行字。

对《癌病房》的第二部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夸奖说比第一部要高出两倍（有这样的计算仪器吗？），但是……

（我知道，现在，正是现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形势……亲爱的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要求发表！您还是保护住杂志吧！我把小说交给您读就是为了怕您生气！我不是没有交给编辑部嘛！）

“但是，我要说：甚至如果能否发表一事只取决于我一个人，我也不会同意发表。”

“听到这样的话我很伤心，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为什么呢？”

“书里有否认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您对苏维埃政权什么也不想宽恕。”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苏维埃政权’这个名词使用得不够准确了。这个词的意思是：劳动人民代表的政权，是惟

一的劳动人民的政权，是劳动人民自由选举和自由监督的政权。我举双手抬双脚拥护这样的政权！……可是，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您不愿意同他们坐在一起的书记处……也是苏维埃政权吗？"

"是的，"他怀着悲戚的自尊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苏维埃政权，所以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支持他们……您什么也不愿意忘记！您的记忆力极强！"

"但是，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艺术记忆，这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没有这种记忆书籍会残败，会变成谎言！"

"您并不真正关心人民！（可以说我对上层没有好感！）产生一种印象，你并不希望集体农庄生活好起来。"

"是的，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全书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集体农庄（应当说，不是我故意所为，我为什么要关心集体农庄呢？……）。小说实际面临的是什么？应当说是集中营体系。是的，如果一个国家身上有这样的肿物，这个国家不可能是健康的！您知道吗，1954－1955年刚刚要解体的这种集中营体系又被赫鲁晓夫加固了，正是在20大至22大期间。而且，当尼基塔·赫鲁晓夫为我们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哭泣时，正是他刚刚确立了新的集中营体制，就其严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斯大林时代。"

我向他讲述。

他认真的聆听，不过仍然说：

"可是除了集体农庄你能提出什么来代替它呢？（"分析"《玛特辽娜一家》时不也是这样一套吗？……）总应当相信点什么。您那儿没有任何一点神圣的东西。应当在某个方面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让步。用皮鞭抽不断斧背，胳膊是拧不过大

腿的。"

……

"我担心您的《癌病房》也会像前一部小说那样被没收。"

"晚了，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已经不见了！已经逃走了！"

（还没有飞去。为了第二部我还要老老实实地忍耐两个月。离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刚好还有两个月）。

"您的愤世嫉俗已经在危害您的艺术（那为什么又说这第二部比他曾经想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要"好上两倍"呢?），您指望得到什么？谁也不会出版您的作品。"

（是的，我的这些表现，"比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要更值得赞许"。多么好的圈套！……）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那些作品哪儿也去不了。一旦我死去，每个字都会被人原封不动地接受，不会有人改动它!"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

"这简直是孤芳自赏了。自封为'只有我是最勇敢者？而所有别人都是小人，都寻求妥协，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您干吗要扯得那么远？这是不可以比较的。我是一个人，自己当家做主，而您是一家大杂志的主编……"

保护杂志！保护杂志……没有您文学也会……

这不是我们这次交谈时的最后的话，交谈没有酿成口角和对骂。我们分手时态度都很矜持（他已经是心不在焉了），对观点之不调和和彼此所受的教育之不同表示遗憾。这样的收场是最为体面的了。我很高兴正是这样结束了一切：我们分手了，不是性格之不合，也不是人格有高下。一位苏联的主

编和一位俄国的散文家，我们今后不能够再手挽手了，因为我们的文学大相径庭，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了。

第二天他动身去意大利，很快在那里举行了有许多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又指望我不会了解有关情况吗？）。有人向他问起过我的情况：我的一部分作品被辗转传递争相阅读却又不予出版发行，此事可当真？说还有一些从写字台里拿出来的作品，这属实吗？

"我没有把手伸到他的书桌里，"这位有名望的主编回答说。（事实上有安全委员会的人干这种事情。）"但是我要说他的一般情况正常。动身来意大利之前我刚好见到过他（证实我们过从甚密和他的这番话可信！），他已结束了一部长篇巨制的第一部（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莫斯科的作家们愉快地接受了这部作品（可是他却说："不要提交给他们……"不是吗？），现在他正在继续写作（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可是第二部丢掉了，是吗？您不是还说我"记忆力极强"吗？"没有任何一点神圣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可以对信天主教的人说："索尔仁尼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呢？）。"

这些月份他自己就被人掐得透不过气来，可他还帮助别人把我也掐住……

诗人这么多年在党内而不受惩罚，不会是这样便宜的。

※　※　※

我只是不停地写，因为再过几天我的信就会在代表大会上分发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还活下去。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想到以后不会有人明了是非曲直，不会有人做出解释，我感到痛苦。

这条路不是我想像出来的和有意选择的，是有人替我想像出来，做出了安排。

我只是自卫而已。

猎人们全都知道：伤兽尤其危险。

1967年4月7日—5月7日
伊斯基耶河上的圣诞村

补记之一(1967 年 11 月)

绞索断裂

瞧，原来回忆录这东西是一个多么粘乎乎的面团：不把面和好了，你是难以脱手的。要知道不断有新的事件，所以需要补记。自己也诅咒这乏味的事由，浪费读者和自己的时间。

由于说完了该说的话而感到轻松，这种状态我不能与任何其他东西相比较。几乎有半个世纪一直要低头、低头、再低头，沉默、沉默、再沉默，而现在挺直了腰杆，大声讲话，不是在小屋顶上，不是对着广场讲话，而是向全世界，为的是感受到整个安谧和规整的宇宙都回到了你的胸中。没有迟疑、没有奔波、没有悔恨，完全是愉悦的洁净世界！真该如此！早该如此！对世界的一切感受是那样的明朗，甚至心头也都充满温情，尽管还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

怎么，为什么说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呢？要知道大约有 100 名作家对我表示了支持——84 个人集体上书代表大会，另外 15 人在私人电报和信件中作了此种表示(我只算上了我

手头有他们的信电副本的人)。这不令人惊奇吗？我根本没敢存此奢望！……

在支持我的人当中，也有人只是表面上装装样子，有的人胆小如鼠，有的人犹疑不定，有些人实际上不是自由人，也有的人有自己的小算盘，总之，是有这样一些人！有100人签名呢！签名最后是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写的一篇语气豪迈无所畏惧的信，他比我走的还要远，竟为地下出版物唱赞歌。

我脖颈上的球状的匣子又一次没能预见到最近的后果！我写了并且分发了这封信——像是自觉自愿地登上了断头台。我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前进，为迎接死亡而低垂着头颅。我认为这是自己尚未崩溃和尚未分化的生活的结束，是一种最一般的生活的最后一小部分的断裂，而连这种生活都没有，我们所有的人就全都是孤儿了。我去迎接牺牲，这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根本不是快慰的和明智的。几天之后，维·亚·卡维林对我说："您的信，这是多么漂亮的一招棋啊！"我惊奇地看到：是的，不错！真是始料不及！原来根本不是牺牲，而是一招棋，是棋局，是经过两年的迫害之后把我固定在悬崖上的棋局。

多么怡然自得的状态！我终于占据了自己的、自己天生的立场！我终于可以不再忙碌，不再追寻，不再卑躬屈膝，不再当面说谎，可以自主独立地生活了！

好像——我并不理解我们文学的头领和意识形态的头领们吧？归根结底，我还是对他们的卑微和踌躇估计不足：我害怕过早地把信分发下去，让他们得以准备反击。于是我只是

在最后的5天里才把信散发出去。[①]即使是在一个月以前发出，他们这些笨蛋也不会想出来怎么回答我，也找不出办法来。但是许多正直的作家收到信时却已经很迟了，在路上没有收到信(有三分之一的信被检查部门扣下了)[②]，这样，就没能征集到尽可能多的签名，没有达到足以捅破代表大会大厅天棚的程度。

但是在莫斯科我的信却像大火一样飞快地传送。在西方这封信也发表得十分及时，简直让人吃惊——5月31日《世界报》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发表了此信，当时对于这一次恶行人们记忆犹新。接着在欧洲这封信广泛传播、声名大振，又一次超出了我的预料(这和那次不成功的答日本记者问不同。我现在明白了，任何一次答记者问意义都不很大。而致代表大会的信是我们内部生活的事件)。甚至信中为西方经验辩解的那一方面在一些地方也被人理解了，而我们这一方面被强调和掌握了。整整有10天时间，即6月上旬，与有关阿以六天战争的激烈报道相交替，有几家世界性的电台对我的信做了引用、转述、逐字逐字朗诵并且作了说明。

而那些头领们，却像死一样的沉默。

于是我形成了一种感觉似乎是获得了意料不到的决定性的胜利。

---

① 我长时间地编制发信的名单，对每一个名字反复琢磨。应当把信发往所有民族共和国，而且尽可能地不要给那些最大的恶棍们(应当说我想指望各民族机关提供帮助的打算破灭了——找不到合适的人手)；要把信寄给所有真正的作家，作家协会所有的有社会地位的会员。最后，为了使这份名单看上去不像是告密——加上了一些头头和告密者作为点缀。 ——作者原注

② 当时估计到了这一点，把信投入莫斯科的各个区，各个信箱里，一次不超过两封，有几个人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作者原注

这时有人告诉我说特瓦尔多夫斯基急于要见到我。这是在6月8日，在基辅站，离电气火车开往纳罗佛明斯克还有几分钟。我两只手提着食品袋，里面装了60个便宜鸡蛋。这时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讲得不太响的声音，他很友善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应当立即放下一切，马上去编辑部，有要事相商。重新做出安排，错过这一趟电气火车，拿着许多东西去编辑部，这样做我感到很懊恼(他们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世俗生活？他们的一切都是人们奉献的！)。但是我很快地领悟到，他为什么要找我、见我，只是为了《新世界》的利益表示某种忏悔，然而这是用不着讨论的。假如错过了夏日，而是沿着雪面冰层去采蘑菇，如果经过这么许多年之后决定要刊载我的作品，那就让他们等到星期一好了，就让他们等待几天，等英国广播公司向那些头头们把我的信广播三遍(时间已经宣布)。这是多么强烈的愿望！

我回答了亚·特瓦尔多夫斯基，不能马上去，我将在12日去见他。他很失望，说话声音都有气无力了。有人告诉我后来他在编辑部里来回踱步，一副受辱和伤心的样子。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总是如此——马上就显露出来，根本等不得。如果干扰来自上级，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往往屈从，如果干扰来自下属，他就不能容忍。现在呢？他想了办法，想出了对我有利的办法，而我自己推开了他支援的手。

我们的轨迹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相撞击……

然而，这一天我偶而听说了一件事，而且非常吃惊：简直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我那封致代

表大会的信一点也没有生气，甚至还感到满意！不，我不能理解这个人了！我在回忆录里用4章的篇幅写了他，可是我还是理解不了他。我曾设想他会气得大喊大叫，永世诅咒我不听话(经过思考之后我顿开茅塞：我不是向西方控诉，而是向西方寻求保护——我还在这里，在国内，在打耳光。根据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理解，这是允许的。按照打交手仗的性质，这样做很简单：别人排挤我们，《新世界》杂志，一年来屡遭惨败，我们就从另外的角度，打他们的耳光！)。

6月12日，是经过3月的谈话后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次谈话一般被认为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交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握手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拘谨，但是他的眼睛里却跳跃着愉快的火花。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我很高兴您对我的行动没有持否定态度。”

他说(故意装作严厉，但不成功)：“谁对您说我不持否定态度？我不赞赏您的行为。但是，失之东隅，可以收之桑榆。也许您走运，会很顺利。希望是有的。”

接下去他便转而用诅咒的语气对我说教，我于是再也见不到我们恢复友情的希望了：

“您要好自为之，以便让您得以出头的地方不要熄灭，那是还在燃烧的惟一处所。”

这是对我来说最困难的论据，这是他可以责难我的最有力的理由……朋友们，我是有赖于您才得以出头的，是吗？难道真的哪儿也不再燃烧了吗？……在大肆鼓吹之后，难道我会倒退着走开吗？怎么可能不理解呢？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仍然以特别严肃的态度问，“听

说您的信已经为西方所了解，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了？"

"在一般信息飞速传递的时代您要怎么样呢？只要民主发挥作用，国外就什么也不会知道吗？在英国并没有谴责罗素，说他的论文在苏联印行了！"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摆了摆他的大手，露出胖乎乎的手掌：

"您可不要到作家协会书记处上去胡说八道！请您告诉我：您是只向代表大会写信，还是指望在西方掀起风浪？"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我当然是只向代表大会发出了呼吁。"

"那么我们一起去书记处吧，您向他们去证实这一点。告诉他们，西方的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您本人的遗憾。"

（我的救星，我为他而兴高采烈吗？！）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我现在对信中的每一个字都不反悔，不改变看法。如果他们要我再写些什么，表示道歉……"

"不，不！"他又摇了摇手，"谁也不会要求您写任何东西！您只需要向他们证实您现在对我说的一切，别无其他！可是您不要对他们说您为反对苏联政权而斗争！"他笑了起来，结束了他最喜欢的笑话。

结果是这样的：作协的上层人士把我的信看成是"打在腰部以下的一拳"（规则在他们手里，他们知道），并且号召亲信们"予以反击"。但是很快他们和上层的决心都减弱了，这是由于有100名作家支持我，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外反应强烈，呼声不绝（他们对此没有料及！）。特瓦尔多夫斯基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外交毅力。他已来得及在沙马拉（代替

波利卡尔波夫领导“文化部”)那里说出自己的想法(“您认为首屈一指的俄罗斯作家是谁?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吗?您错了!”),让作家协会书记处了解到这样做不成,对他们自己不利:陷害了我,他们也就断送了自己。他还说服他们制订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确认我的军旅生活无可挑剔;承认我的信中有某些东西值得仔细研究;“严厉”地谴责我采取行动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因为作协书记处的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更聪明的建议,这些想法在他们看来相当可以救他们摆脱困境,再沉默下去已不可能(预见到国际间的旅游和种种问题),所以他们也倾向于向上级提出这样的决定方案。而在这样的时刻,我出现了,这就给特瓦尔多夫斯基造成了麻烦,没有让他完成他最好的作战计划!……(应当说,这一战役终归难以完成:上头忙于处理阿拉伯人毁灭性的战败一事,他们的头脑里只能装下不超过一个以上的问题。)

为什么作协书记处根本没有召见我?因为在我发出信件之后他们不敢确认我是否会同意到会。万一我不到会,而上头又没有指示把我赶走,那时候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我逐渐分析出了,他们要看一看我,以便确信我是同他们讲话的。否则,他们的公报也就丧失了意义。

这就是我走了“一步好棋”,自己跳上了一个悬崖!

我们乘车到达了波瓦尔大街上的著名的圆柱形独家宅院,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领着我去会见书记处的成员们。……开始了一般性的社交谈话:谈到了这是罗斯托夫家族的住宅,对它备加保护;奥尔舒菲耶娃伯爵夫人从国外到这里时曾经要求好好参观一下这所住宅!(沃伦科夫说“伯爵夫人”这个词时津津有味,我能够想像出他在这位夫人面前转来

转去，就好像是1917年他跑来抢毙这位夫人似的）；谈到了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编织肖像装饰着这个大厅的墙壁（托氏的肖像竟织了1800万针）。从我的背后到在这炎热的无风天气里开着的窗户大约有6米远，但是保护我宝贵生命一事竟使沃伦科夫十分激动，以致于他偷偷地问起我是否被风吹着了，他们的房间是“招火惹祸”的房间。

在他胡说八道的这段时间里，我把自己写过的两三封旧信放到了桌子上，这是给勃列日涅夫和《真理报》的信。一张张白纸页上面打了字，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它们无辜地放在褐色的桌面上，这使坐在另一面的马尔科夫激动得难以按捺。他可能做了这样的理解：我放到桌子上的是一颗新式炸弹，现在就要爆炸。他急不可耐，不能够等到炸响：他应当马上读到这些信。他破坏了整个谈话具有的那种彬彬有礼的气氛，脖颈扭来扭去，眼睛滴溜乱转。

索波列夫终于来了，于是马尔科夫开始了自己的发言：在代表大会上不可能审议我的信，大会有“自己的紧张的议程”。遗憾的是这封信竟成了不是具有内部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并且触及到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应当审议清楚并且找到解决办法（愈往后这一点就愈成为主弦律：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困境？请帮助我们找到出路吧！）。

他讲得很简捷并且以不安的心情望着我。我也报以同样官腔，就好像我们是在谈论罗斯托夫家的别墅一样。我问他们是否对“了解此信的由来”感兴趣。原来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我花费很长的时间讲了对我的种种污蔑是怎样发生的，我是怎样表示了反对，怎样发出了一封封信（他们感到吃惊，马尔科夫倒是安心了），后来就是突然袭击，使我失去了小说稿

和其他书稿。

索波列夫问："什么突然袭击？"

我（客客气气地）说："来自安全委员会的。"

接下去是我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几封上诉信，全都杳无音信。接下去：开始"秘密出版"我的作品，全都属于剽窃行为。诬蔑更加扩大了。（我充满激情地说）能向谁去求救呢？当然是向我们作家协会的最高机构——代表大会！难道这是非法的吗？（马尔科夫和沃伦科夫异口同声地说：完全合法。萨尔塔科夫和索波列夫在那里生气。）代表大会定于1966年6月召开，我准备好了一封信（我这是在说谎话，当时还没有形成思想呢）。但是，正如在座各位了解的那样，代表大会推迟到12月举行（他们点头）。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决定把信直接寄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信中我已经谈到了我们社会中作家的处境和怎样能够及时地制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怎么样了呢！对于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他们几个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像是在排练得很好的群众场面中那样很快地做出反应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收到信……这封信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收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当然没有收到！……"）我于是开始等待12月份，以便致信代表大会（我又在说谎，我去了隐居的地点，赶着写完《古拉格群岛》）。可是代表大会又改期了——推迟到下一年的5月（又都点头）。好吧，我又在等待5月份。如果再改期，我还会再等待下去（他们可能内心深处在遗憾：干吗没有再推迟一次呢？）。

萨尔塔科夫问道："可是干吗印发了400份呢（这个数字是英国广播电台提供的）？"

我说:"哪儿来的400份这个数字? 是250份。正因为一份两份寄出的信件被束之高阁,有如石沉大海,我才不得不成百份地寄。"

他们说:"可是,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行为方式啊!"

我说:"难道在作者还活着的时候就秘密出版他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行为方式吗?"

索波列夫追问道:"这是什么逻辑呢? 既然已经寄给了大会主席团,为什么还要分送给大会代表?"

我说:"得到有影响的作家们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我得到100名作家的支持,感到非常满意。"

马尔科夫:"那为什么又投寄给什么《格鲁吉亚文学报》呢?"

我回答:"为什么兄弟共和国的机关报不应当知道我的信呢?"

马尔科夫:"各处都把您的信件给我们寄来了。您不要以为都是支持您的。许多人坚决反对您。"

我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公开地加以讨论。"

马尔科夫(可怜巴巴地):"如果不是我们的敌人已经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公开讨论也是可以的(在他们来说,为了"共处"没有什么别的名词:周围都是敌人!)。"

我说:"我很抱歉。但是这是你们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们三周没有答复我的信! 干吗要丧失那么多时间? 我倒是一直在等待,以为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主席团就会召见我,使我有可能宣读我的信,或者至少是能安排一次讨论。"

马尔科夫(痛苦地):"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种责难吧,

最主要的是谈现在该怎么办?”

(于是大家都低声地重复说:怎么办?)

马尔科夫:“您处于政策的中心,出出主意吧!”

我(吃惊地)说:“什么政策? 我是文艺家!”

沃伦科夫:“要知道是怎样广播的吗! 一次广播节目里播放两遍!(他这是说谎,但是我不能反驳他,因为我对他们说过我是不听西方广播的)以色列! 那里在广播您的信。以色列广播您的信! 知道怎么广播吗? 请朗诵专家朗诵!”

马尔科夫(恶毒地):“不管怎么说,您的信中有小小的失实之处。”

一处失实,而且是小小的吗?

什么样的失实之处?

马尔科夫说:“说《新世界》杂志拒绝刊载《癌病房》,可是《新世界》并没有拒绝呀!”

这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回答他们的。他记得是这样的。他真诚地是这样记得的。关于这件事我和他今天已在编辑部里谈过了。他问我:“我什么时候拒绝过?”我回答说:“您把小说的第二部拿在手里,举了举之后说:‘即使一切都取决于我一个人,也不见得……’”“不,不记得了! 也许是谈的那一段落,那一页吧? 整个第二部我没有拒绝过……”

现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坐在一旁,一脸严肃的表情,一面抽烟,一面观察我们的这一幕戏。大家也都看着他。

特瓦尔多夫斯基:“激动的时候,两个人什么话都能说! 这只是说说而已,编辑部没有拒绝刊登您的小说。”

好一个说说而已,这场谈话差一点儿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编辑部里一致同意印行《癌病房》全书。我们同作者的分歧仅仅是在一两页的处理上，不值得谈……"

好一个一两页。我记得是有好几章，有好些个人物都给删掉了……可是一切都改变了。胜利者不受审。生平我第一次可以把这句谚语应用到自己身上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发现了谈话忽然中断，忽然以一种长者的严肃语调，郑重地说了下面这一段话。他可真了不起，不知他的这股机灵劲儿和这样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他说的是：

"可是在编辑部里我忘记提给您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告诉我，您怎样看《癌病房》和《第一圈》可不可能被送到欧洲并且在西方出版？"

这样的时候竟提这类问题！

我回答说："是的，《癌病房》流传很广。如果在国外出现，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有人(以同情的语调)说："肯定会错误百出，把书搞得面目全非的！"

(不会超过你们的书刊检查机关的！)

索波列夫(害怕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他们还宣布甚至接受经过第三者之手转来的手稿，并加以印行，还给作者本人保留稿酬！"

有人问："《癌病房》流传如此之广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说："这个问题我提交给作家们、还有几个编辑部和我请求帮助的所有的人加以讨论。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作品印给自己的乡亲们看呢？"

谁也不敢反驳我！时代不同了……

……

我又说："我很长时间把《第一圈》放在自己手里。当我了解到有人不经过我把它印出来给人看时，我意识到作家对自己作品拥有比这样做更大的权利。于是谁来要这本书我便不再拒绝了。所以，《第一圈》也在流传，但是远不及《癌病房》。"

特瓦尔多夫斯基(激动地站立起来，开始踱步)："所以我才说：应当立即出版《癌病房》！这会马上制止住西方的胡闹并且使在西方出版此书成为不可能。应当在两天之内把有关流放的片断交给《文学报》以便使小说得以全文刊出……(稍作停顿)……在作者选择的他认为合适的杂志上刊出。"

没有任何人反对！只是在讨论：两天的时间《文学报》是否来得及，也许应当让《文学俄罗斯报》干这件事？

这一天说他们这些人惊慌失措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简直被击昏了。不是这次会见，而是在会见之前的广播轰炸击昏了他们的头。看来他们最感到处境尴尬的一点是这一次要由他们自己来摆脱困境(中央委员会回避，信是给作家协会的嘛！)，而自己摆脱这件事他们却不会做，因为一生一世他们自己没有独立解决过哪怕是一个问题。于是，一向迟钝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利用了他们的无能和僵硬，竟获得了主动权。

马尔科夫和沃伦科夫连声向我表示感谢，谢什么呢？感谢我来见了他们！……(眼下连我也缓和了，我也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终于过问起我的信来了。)

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过去仅仅略知一二的东西：什么是显示力量。他们对于这种语言的理解真是深刻极了！只是这种语言，从降生到人间开始只有这种语言。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乘坐《消息报》的黑色大轿车返回。

他对于事情的进展非常满意，认为这些书记们已经商量过了，不然怎么会那样顺从？哪里会让我们“接二连三地进攻”？……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想好了选哪一章给《文学报》摘要刊登，并且亲自题标题：《长篇小说〈癌病房〉片断》

他的记性不好，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这个标题他在一年之前宣布为不可接受的和不可能的。还在任何一种正式出版之前所有的人已经简简单单地承认了《癌病房》。

事物本身的进程。

但是，真要是注定如此敢情会一切顺利了。接下去当然会事事都卡壳：上头有人设置障碍，首先是焦米切夫。（在一个房间里，我不乏挖苦意味地讲述过在会见时我是怎样惹他生了气，当时放着一个克格勃的录音机。在焦米切夫面前放着这次录音的磁带……他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个人的复仇心理许多年来对于这一巨大冲突也产生了影响。所谓的领导集体以他为代表惟一的一次试图同我交友，于是……）

显然，无论是书记处的公报，无论是《文学报》的片断都未能问世：来自西方的电台轰击停止了，于是老板们决定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活下去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得到消息说，6 月 30 日上头讨论了我的问题，但是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焦米切夫设计了一个方案：为了使作家协会的书记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应当把我的几卷作品，包括《第一圈》《癌病房》，当然了首先是《胜利者的欢宴》全都读给所有 42 名书记（特瓦尔多夫斯基说：“33 位壮士，42 位书记。”），他们大概很不情愿从这匹驯顺的马背上跳下来！如果考虑到，这些书记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写作，而且有的人连读稿

子都结结巴巴，这样，把这件事情有意地压制下去起码需要半年，而当革命节周年大庆之后，可以语气严厉些谈论时，再把这件事向前推进一步。

这一切我都是在7月初的一天偶然涉足编辑部时从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里了解到的。他当时情绪灰溜溜的，脸色很难看。他每一个月都要同起阻碍作用的愚钝的力量打交道，但是已经过了150个月份，他还是不能习惯。书刊检查机关甚至不准许他刊载最温和的作品。不久前我看到的沃伦科夫曾经是那样的左右逢源，现在也变得不是每一次都甘心情愿地接电话，而且答话时态度也很傲慢。由于我的到来，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了一次努力，又叫沃伦科夫来一次。沃伦科夫屈尊前来说书记们还正在阅读我的作品，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能搞到《癌病房》(因为契卡没有没收它，而中央委员会里没有这本书……)。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忽然兴高采烈起来：我给你们送来！

这可真是一线生机！他想把我不久之前给他的那份书稿拿来，那是惟一的一份定稿，已经校订过的、没有被弄得面目全非的稿子。我气愤地加以反对："我不想把它给这些狗东西！他们会弄得一塌胡涂的！"他也生气了："谈的是生死问题，你却说什么一塌胡涂！"他只是劝我"删掉有关新气象的几页"，这显然是指所谓的"几页"有争议的内容。他似乎记得编辑部里有人告诉过他，也许是杰缅季耶夫在离职前说过，似乎书中有一段冗长的议论，说劳改营的存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种新气象(就好像这样的话值得在书里大书特书似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想摆脱初始的错误看法实在很困难。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不相信。我给他看了有类似句

子的段落，对他说我可以删去它，总可以了吧？不，不要整页整页的议论！这时候，康德拉托维奇从门缝里挤进来，煞有介事地伸着脖子翻找有关的章节：找舒鲁宾的话，就是要找舒鲁宾的话！我于是当着他们的面找到了小说中舒鲁宾的话，并且把康德拉托维奇当作自己人那样毫不避讳地让他知道他搞错了。可是他的眼睛熠熠发亮，这不是他的眼睛，而是镶进去的新换上的书刊检查官的眼睛，鼻子也不是他的，而是装上了书刊检查官的嗅觉器官，于是他满怀信心地高兴地说：

“瞧，找到了！这不是！”

“在哪儿？”

“就在这儿：

对于自然力来说，

人是暴君、叛徒或囚徒！”

“这是新的兆头吗？”

“和新兆头一样。更坏！”

我这里讲的不是康德拉托维奇的事，而是在谈杂志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担惊受怕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俯首帖耳的听从康德拉托维奇的警告：

“结果会是这样的：虽然谈的是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实际上也指的是我们，不是吗？……”

“不，不是谈尼古拉一世的俄国，而是谈的准备出卖十二月党人屠格涅夫的英国。”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许是为自己不了解普希金诗歌的基调很感到羞耻，也许是要针对普希金而发难，总之，他屈服了：

“好吧，把有关的句子删去吧！”

这就是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等待。此外，人们对于这部

书将做出何等评价，还要看看再说：从哪一处切下的皮子，皮子又怎样加长接起来成了一根鞭子，鞭子又怎样打人的脸。

为了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心灵宁静，我删掉了上面的这句话。他一下子变得高兴了，于是开始“安慰”我，说叶戈雷切夫（一位看不起勃列日涅夫的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刚刚被撤掉了，而我还没有被撤下来；他还说在书记处我的表现极佳：没有找茬儿，也没有任何忏悔的表示。

他完全不希望我现在就忏悔。他对于我围绕着致代表大会信件所做的种种事情表示了一定的赞赏，好像我们结识这些年来他第一次相信我自己会独立迈步行走。

我们谈起了《胜利者的欢宴》：怎样才能使它避免在书记处讨论。他谈到了西蒙诺夫也仿效特瓦尔多夫斯基拒绝读它。

“您可以把它给我吗？”他这样请求说。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剩下的惟一的一份给抄走了。我手头一份也没有了。”

“说到底，”他宽容而又冷静地分析说，“蒲宁有《倒霉的岁月》，您的这个剧本并不更反苏！他的这些其他作品我们是印了的……”

是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变了！而且变得十分迅速。曾几何时他还在责问我怎么可以把一些劳改营题材的烂剧同圣洁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放在一起？曾几何时，《癌病房》他一连几章完全都不能接受？而现在他令人心安地写道：

　　我自己会认识，会找到
　　我所有的一切失误。

他只要求：

不要只对灵魂发难，

别在耳边吹风！

他还十分朴实地说：

“我也允许自己说些反对苏联政权的话，只不过是在最狭义的范围之内。(应当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反对苏联政权”含义是什么，是一种并无恶意的嘲讽。这不是指报章上的激烈反对的意思，这里不涉及本质和党的意图，这只是说并不是事事全都同意，有自己的观点，鬼知道！)例如，我出国去一看，那里一切都与我们说的相反。”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教育的。

又度过了一个半月，一切如故，既没有呼喊，也没有叹息。其实，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也根本不需要有所企及——我现在是站立在悬崖上！但是我有一种不安，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一个什么机会，这种情绪促使我建议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来签订一个有关《癌病房》的合同：我们似乎又重归于好了。在毫无生气的不稳定的平衡当中，没有人说“是”，也没有人说“非”，大家都回避做出决定，这时只要稍加推动，就可能大功告成，是吗？所以我们才这样做。有人反对签这种合同，随他的便！不反对，也可以用手稿促进其发生。总该试一试！

这个小小的计划使特瓦尔多夫斯基慌了手脚：我首先谈起合同的事他感到突然，这是在促使他造反，无异于自己违背领导的意志。我觉得他内心深处一下子就做出了反应：不能、不敢，绝对不走这一步。但是，生硬的人会把自己闪现出来的感受马上说出来，而有应变能力的人却不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于是他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几处需要再确切一下，过了几天，由于他不能来(别墅正在修煤气管道)，他打来电话说：“在我

没有得到允许之前,我反正不能同您签订合同。"

从什么时候起编辑部甚至签订合同也需要批准？特瓦尔多夫斯基又表现出了意志薄弱。在这些起起落落当中,在他的言行和心灵之间,在所有这些黯然失色和光彩照人的时刻,都反映出了他破碎的生活。他既不是同他害怕的人站在一起,也不是同义无反顾奋力向前的人并肩前进。他比任何人的日子都难过。

对于我来说,他的拒绝具有解除约束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萌生了一项新的计划,这是一项很大的推动,而不是微不足道的推动,签订合同只能束缚我的手脚。

我得到了消息(后来证明是误传),说意大利已经准备出版《癌病房》。可是我们这里还在拖延！于是我想好了一个预防性措施,一个信号,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今后要由你们负责了！难道在我们这样的书刊检查制度之下,在我们处于无权地位的条件下,在国家拒绝国际版权法的情况下,在西方出了什么书不应当由我们的头头来承担责任吗？为什么会让作者负责呢？……

我按照第一封信的模式决定再写一封信,投出它150份,只是给各民族共和国的份数有所减少。然而人们让我不要一下子就大张旗鼓,不要大声地扯破衣服,只要做出类似的响动就可以了。我以为这样做是很明智的。于是我决意把第二封信只寄给"42位书记"和书记处,不直接交到他们的手里而是投寄,为的是不被地下出版物得到,不流传到国外。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还是要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商量"一下,因为我们又言归于好了。可是难道他能够支持我的这一步骤吗？……而我又能够从计划好的事情上退却下来罢手不

干吗？……

我选定了一个日期，那一天我将去编辑部。特瓦尔多夫斯基答应过要来，可是他失约了。他以为我会问起签订合同的事，因而感到苦恼，于是他回避和我见面。我极力寻求同他会面商议，而他却不露面！9月12日傍晚时43封信已经全都投进莫斯科的信箱里。我们不见面，这对他对我都是好事。

现在他会怎样呢？我这一次新的挑衅会使他大发雷霆吗？书记们可是像被踩住了尾巴一样大发其火，米哈尔科夫在打给《新世界》的电话里喊叫不停，而且在9月15日就在召开的书记们的预备会议上狂吠了一番，连速记员都没有来得及等待。当天就传唤我于22日去书记处。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在当天派专人来找我。

我于18日去见他，而且有些怀疑，是不是我过于匆忙了呢？我为什么要这样逼近黄蜂群呢？要知道我变得坚强了，而且我有的是时间，完全可以平平静静地工作嘛！难道厮杀比工作还重要吗？

当天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谈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他却说：这是应该的！！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请进行到底吧！

他又使我大吃一惊，又突然冒出了始料不及的事情，他的颓废、含混不清、疲惫不堪都跑到哪儿去了？他现在又是机敏而精神抖擞，我的第二封信像发起进攻的号角呼唤起他投入了战斗，而且他在这场战斗中经住了考验。他说萨雷恩斯基和巴让支持他（出版《癌病房》）。

我抱怨说，他找我来谈这些事情，纯属浪费工作时间。“也许很快就没有任何时间了！”他严肃地说。这就是他所担心的事，他找来了老成世故的拉克申和他一起来说服我，让我

去书记处时要克制,不要一触即跳,不要强辩,不要发脾气,要知道他们会突然发起反击的,那时我就会倒霉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些老奸巨猾的人。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相识多年,可是我们彼此还是完全不了解!

……

我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安静一下,但是在想像中我已处在战斗当中了。可能对我说的,可能向我发问的,会怎样进攻,从周围各个方向向我袭来,提前给我打招呼,要求我做出答复。我写下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对话,并用这些对话形成了一篇发言。我生平以来从不一字一句地准备书面发言稿,我蔑视发言稿,认为这无异于考试作弊,可现在我却写了发言稿。当然,我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所有各种问题,可是在我们的会议上人们也已经习惯每次发言并不一律经常言不及义,各取所需,这是谁也不感到奇怪的。

准备这第一次肉搏战(我为此付出了30年的代价!)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困难:所以我已经非常清晰地想像出了自己对他们脑壳里想出来的一切一切的观点,因为事实上现在的书记处并不是决定我作品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不论他们是允许《癌病房》刊出还是不允许,反正他们已经输了。作为听众对象来说,这个书记处对我来说也是多余的:试图真正说服他们也会是徒劳的。我只需要面对面地和敌手相对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要记录下来。说到底,他们不可能不仇恨我!要知道我不仅是对他们的谎言的否定,而且否定了他们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全部狡诈的生活。

然而,在准备这一场交手仗的最后,我终于疲倦了,很想

摆脱掉这种多余的、非创造性的、我完全不需要的紧张。用什么呢？服药吗？一个简单的想法：晚上少喝一点伏特加酒。马上便松弛了下来，没有什么力量再唆使我去反击和拼杀，睡了一夜安稳的觉。现在我又深入一层地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了：如果不是伏特加酒，这35年来他用什么来摆脱这种令人生厌的、使人坐立不安的、可耻的和无望的紧张呢？……这是在谴责他（他很不愿意谈起自己的酗酒。如果对他说："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您应当保重自己！"他会不满地扭过身去。我还试图不停地谈他的吸烟，用癌病房来吓他，他总是挥挥手不予理睬）。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对会议的惟一要求是要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这样在四面八方向我发起责问时我就可以不必抬头了，他们会连连发问："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您是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对它?!""照直说：您支持作家协会的纲领吗?"我这样说不可能不使他们胆战心惊：我在那里低头写呀记呀的要干什么？这是要送到什么地方去吗？他们将会稍许谨慎些来选择表达方式：他们还不习惯把自己含糊不清的话拿到公开性的阳光下去。

我准备了一些白纸，标上了页码，留出了页边，在指定的时间即9月22日13时走进了有女像柱的那间不大不小的厅里。那里充满了烟味、有许多人呼出的气味，大白天里点着电灯，喝空了茶的茶碗，抛光桌面上到处是灰屑。在我来到之前他们已经开过了两个小时的会议。并不是42位书记全部都到场了：让肖洛霍夫来那简直是屈尊了。列昂诺夫在后代人面前让人捉摸不定，他指望永垂不朽。恶毒的恰可夫斯基也没有到场（可能也是由于谨慎的缘故），态度激烈的格里巴乔

大也不在。但是总有30多位书记出席,3名女速记员也在自己的小桌旁就座。我矜持地向各方面打招呼,并且找座位,正好有一个位子空着。旁边恰好是特瓦尔多夫斯基。

我耐心地听了费定令人蒙受侮辱的发言;抓住他吞口水和准备同意谁发言时的难得的5秒钟的间歇,我甜腻地请求说:

"康斯坦丁·亚历山大洛维奇,您能允许我就我们讨论的题目说两句话吗?"

不是声明!不是宣言!只是两句并非要害而且不伤害人的话!而且是就讨论的题目……讲出这些有多么重要!我的请求又是那样的天真无邪。费定彬彬有礼地允许我发言。

于是我庄严地起立,打开了文件夹,拿出一页打印的纸,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情,嗓音像是向历史宣告重大事件,就这样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声明,这是一篇撤销《胜利者的欢宴》的声明,不是忏悔,而是谴责,我谴责他们所有的人多年以来出卖人民!!!

事后我了解到,他们本来已经做了安排,谁在谁之后发言,怎样开始对我污蔑。他们已经处于战斗状态,但是在他们约定的信号之前,我用144门大炮向他们开了火,而且在一片硝烟缭绕中谦恭地坐了下来(同时把宣言的副本传递给了女速记员)。

我坐在那里,准备记录他们的发言,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人讲话。我把他们手中的主要武器——攻击《胜利者的欢宴》给打掉了。他们在那里交头接耳,终于还是清醒过来了。于是考涅楚克提了一个问题。

"我不是小学生,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站起来回答。"我回答

得很有分寸，“我将要做一个发言”。

又提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形式：用一连串的问题把我缠住，搅乱我，把我变成一个受审者！他们是善于这样的，这帮骗子！

我一概拒绝回答问题：我将要做一个发言。

真不错，就是说他们上钩了！他们吵嚷、他们不满，他们吼叫：“在您不做出一系列回答之前书记处不能开始讨论！”“您可以根本拒绝讲话，但是您要做出声明！”

我们规整的队伍也被挤乱了，他们也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怎么能够平心静气地记录呢！真是一群废物，一群庸才！你们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我早都知道了呢？为什么针对你们的这些口头提出来的问题我都有详尽具体的书面答复呢？只有一种牺牲品：把我的讲话撕成碎片，用这些碎片打退你们。

我起立，拿出一页页纸，不是用与历史隔绝的冷漠语调，而是用戏剧演员的自如的声音向他们宣读我的回答。

同时把回答交给速记员。

他们一个个大惊失色。大概是他们丑恶的协会成立35年来破天荒第一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是预备队又冒了出来，又冒出来了第二梯队，邪恶的力量！又给我提了3个问题。

好在他们所有的问题我都有现成的回答。我起立，又接着抽出几页纸。现在，我已经更加自由更加坚决地行事，我自行确定战斗的界限，已经不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在整个博罗金诺①血战的战场追赶他们，

① 指1812年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金诺库图佐夫领导的俄军同拿破仑的侵俄军队的一次重大战役。 ——译者注

把他们赶到最远的尖顶堡里去。

空间里是一片寂静、慌遽、六神无主和不知所措。侧翼又有队伍过来,但这不完全是敌人,这是些半个我们的人。萨雷恩斯基和西蒙诺夫做了发言,他们虽然根本不是替我们说话,但是,是替《癌病房》说话。敌人乱了阵脚,没有人再要求发言,再也不提什么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胜利呢?特瓦尔多夫斯基像一队重龙骑兵开始行动并且在战场上搜索:好了,我们来通过决定吧!印行《癌病房》!马上在《文学报》上刊登其片断!是的,我们还没有通过公报,公报在哪里,沃伦科夫?

但是善于逢迎的沃伦科夫并没有急着做什么。准确些说他正在找公报,在寻找,却不能立刻找到。他们要多少再坚持一会儿!皇家预备队在哪里?……铁蹄之下有人在说:“干吗要表决?不是还没有决定吗?还有人反对嘛!”

瞧,就是这些黑色的近卫军!——考涅楚克!科热夫尼柯夫!还有骑白马的人——苏尔科夫的倒戈的骑兵!还有,还有,从大后方来的一批又一批新的死硬派分子:奥泽洛夫、留利科夫、有些像冰球队员的巴鲁兹金。

(巴鲁兹金和我坐在一起,我向他了解每个发言者的姓名:这是谁?就是那一位叫什么?他说了旁边的人,不是,是另一位。他又说了另一边的人。不是,是他们中间的那个人!脸像保养得很好的胖屁股,戴着一副亮闪闪的眼镜。啊,这是党中央“文化部”的麦连季耶夫。秘密的指挥!坐在那里记个不停。随你记录!认识一下过去的劳改营分子吧!)

……

他们有多少人啊!简直数不清!只有波罗的海各国来的

书记们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们看到了自己失去的机会。敌人已经占据了所有地盘，全部土地、所有空间！战争在他们一边。我们似乎更勇敢，不停地进攻，可是战场在他们一边……

博罗金诺需要时间仔细分析有关方面，看这一天谁占了上风。

费定的妥协、背叛、卑鄙，多年来已是路人皆知（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首先由他发难，审讯西尼亚夫斯基是迫害的继续）。他荒谬地建议，让我攻击西方，让我愉快地承受东方的迫害和侮辱……

而我早已走上了轨道——我在不停地写，作记录。我的脸色沉稳温和。豺狼们，你们还不了解劳改营分子！你们将来会为自己不慎重的发言而追悔莫及的！

在我最后一次即第4次的发言中，我斗胆对中央的文化部进行了威吓（我说：有一个组织……要对《胜利者的欢宴》负责……），并且同费定开了个玩笑——我当然欢迎他的建议！（一般的微笑！我屈服！……）当然了，我拥护公开！我们不必再把速记稿和发言稿藏起来了！……把我的信印出来吧，让大家看一看！……

不满和吼叫。留利科夫站了起来，悲哀地皱起自己教条主义的前额：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您简直不能想像西方舆论界把您写得多么可怕。您的头发肯定会竖起来。明天请到《外国文学》编辑部来吧，我们可以给您一些选篇和剪报材料。"

我看了看表，然后说：

"我想提醒一下，我不是莫斯科的居民。现在我要去赶火车，我难以再利用你们各位的盛情了。"

又是不满和吼叫。因受骗而大怒的费定宣布持续了5个小时的讨论会结束。我彬彬有礼地向周围的人咕哝两句"再见"就离开了。

战场在他们那里。他们没有在任何一处做任何一点让步。

这是谁的胜利呢?

这一天我没有来得及会见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他给我写来一封信:

"我简直欣赏您,并且为您和我们高兴……真理对各式各样的骗局和'政治'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并没有向前推进……而事实上毫无疑问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进展……我事实上的结论是我们准备同您签订合同,这是很有可能的。"

更使我吃惊的是英国广播公司(其程度超过特瓦尔多夫斯基)。会议是星期五傍晚结束的。过了一个周末,到了星期一白天英国人已经报道了召我去书记处和会议的内容,而且报道相当准确。

不再是草垛中的一根针了,现在我丢不掉了。

文学家中央俱乐部里传言不胫而走。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我的那些作家,现在要求书记处做出解释。

几天后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上宣读了肖洛霍夫的一封信:他要求不允许我从事写作(不是不允许印行,而是不许写作!像当年禁止塔拉斯·谢甫琴柯写作一样!)!他不能再和像我这样的"反苏分子"同时处在一个创作协会里!俄罗斯作家兄弟们在理事会上大肆叫嚷:"我们也不能容忍!通过

决议吧!"索波列夫吓得非同小可(要知道没有指示啊!),他说:同志们,把这个问题交付表决是不正确的。谁不能容忍,请你们写个别声明。

这些俄罗斯弟兄们胆怯了。没有一个人写出声明。

莫斯科的作家们呢?也许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不能容忍呢!

是的,难道能够拧进花岗石里吗?难道有那样的钻头吗?有谁能说在我们的社会可以高声呼喊真理并且坚持它呢?

瞧,结果会如何呢?……

劳改营记忆的缰绳扼制住了我的嘴唇:要说这一天很好,需要等到傍晚,要评说生活如何,得在死后。

1967年11月

于梁赞

补记之二(1971年2月)

正在造就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始料不及的,也是不一定写成的: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有三年没有触动它了,深藏了起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够重新再写作,会不会写成。几位知己读过之后认为:写得很带劲,一定要写下去。于是在完成主要作品的间隙时间我又干起这件事了。

我首先观察到的是最好不继续写下去,只需要把鲜为人知的隐秘写出来,详细地解释清楚这一奇迹:我自由自在地在沼泽地里行走,站在泥潭里,越过一个个深渊,毫无支撑地待在空中。从远处看去,我,一个被国家诅咒的人,一个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团团包围的人,怎么没有屈服?我一个人怎样孤军苦斗,而且完成巨大的工作?究竟是利用什么样的时间,竟来得及翻阅档案资料、跑图书馆、搜集情况、复核引文、访问老人、写作、重抄、计数、装订、地下出版机构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我的书?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什么样的奇迹?

回避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不行,指名道姓地讲出来,更不行。上帝保佑,有朝一日安全了,我会写出来的。而现在我甚

至害怕把这种解释的计划写在纸上备考:这样的纸头万一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可该如何是好!

可是在读过去写过的东西时,我已经看到了过去这几年里我变得坚强了,敢于更多地探出头来,于是我今天决定把三年前认为是冒死也不敢写的东西写出来。我的行动越来越明显地受到监视,或是胜利,或是灭亡。

这个东西之所以奇奇怪怪是因为对于任何一部其他的作品来说都要有一个结构性计划,虽然没有写完,但是总体上可以看得出来,而每一个局部都为整体服务。而这部作品有些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如何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可以甩掉它,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但我认为很有可能。

发　作

是的，同博罗金诺战役相似之处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战斗结束两个月了，双方几乎未再发一枪——报纸上也没有提起，也没有在讲坛上有非同一般的辱骂。是的，十月革命50周年慢慢临近，他们要求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尽可能顺顺利利。我亦如此，我生性好妥协，并没有把自己有关战斗进程的《书面说明》发表出来，为的是保存力量以后给予综合性的打击，也不知这样做是对是错。文学群众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重新布署，战场还是在敌人方面，他们掌握着莫斯科，可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在这种宁静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悄悄地蠕动，血染的大地是不是在呼唤我们不经任何拼杀返回到大地上来呢？

我怀着这样的感受来到了莫斯科，这时已是伟大的纪念日之后了，我是想在整个冬天陷入无声的境地之前表现出少许行动来。为了行动，需要特瓦尔多夫斯基，但是已经很久见不到他了，他已经有整整一个月处于他通常的那种不清醒状态，又犯了老毛病，并且在这样的状态之前不知不觉地度过了

喧闹无比的纪念日(对于革命节,天真已极的西方等待着哪怕是大赦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但是节日的宴席上当然是连一小块残渣也没有丢给任何人)。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就是这个样子:他需要见到我的时候,找不到我,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无法接近他。

我一天又一天地在编辑部里等着他,用电话和别墅联系,终于决定11月24日我要去帕赫尔别墅见他,拉克申将与我同行。我们清晨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乘《消息报》的伏尔加牌轿车出发。我本来要在路上读一些必须马上看的材料,但是未能如愿,同路人一路上跟我攀谈。许多人会觉得这太无礼,而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工作的惯性,这种惯性促使人一定要把事情按计划进行到底,何况同拉克申一席谈这可能是惟一的一次机会,以前不知为什么总没有谈成。而且守着一个可能是告密者的司机能够谈些什么呢?有许多是言之无物的东西,不过在轿车的后排座里他还是低声向我讲了点有趣的事情:1954年,讨论决定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从《新世界》总编辑的位置上撤掉的问题,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戒掉酒,这项撤职可能不会发生。已经让他清醒过来了,但是在举行会议的这一天他甩掉了守着他的马尔夏克又喝了个酩酊大醉。党中央的会议结果对于《新世界》很有利;波斯别洛夫大丢其人,赫鲁晓夫说,根本就没有很好地向知识界解释清楚与个人迷信有关的问题,于是编辑部没有被解散,但是甚至敢于不参加党中央会议的主编,怎么能够不撤掉呢?

有的时候好感是一种拯救性的缓解,而有的时候则是灭亡。

长了斑点的英国种大猛犬在栅栏旁迎着我们。我们毫无

阻挡地走进房子里并且呼唤主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缓步走下楼梯。此时此刻他一脸病容，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援，看上去叫人害怕（后来，在谈话过程中恢复了许多，精神好多了）。下眼睑下垂得很厉害。蔚蓝又有些苍白的眼睛看上去特别没有依靠。他莫名其妙地（不是单独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非常伤感地说：

“你看，我这副模样。”

于是他流出了眼泪。拉克申像是支持他打起精神来，抱了抱他的肩膀。

我们在大厅里落座，由于大雪纷飞大厅一侧的玻璃窗外一片晦暗。我们在壁炉旁就坐，炉里木柈在燃烧，在为不得问世的小说燃烧。特瓦尔多夫斯基神经质地来回踱步，步子迈得很大。一段时间里我们相对无言，为的是让他能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这是很难受的。他终于开口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说完他浑身颤抖，连他的一双手也抖个不停，这不仅仅是因为身体虚弱，也是因为害怕。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急着对他大声说，“真的没有。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多么令人晦气吗？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他稍许安定些了，双手几乎不再哆嗦，揉着烟卷，却没有点燃。坐在沙发上之后他又心有余悸地问：

“说说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我的心像是被刺痛了。我回忆起了小学生时代，逃了两三天学，我常常心情特别紧张，像是犯了什么过失，心想：我不在学校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似乎觉得这可怕的外部世界在这些天里肯定会对我构成更大的威胁。他现在显然也是经受

着这种思想的折磨，他已经整整一个月不仅同杂志完全隔绝，而且也同整个外部世界隔绝了。

"您说的是您的《新世界》还是其他'世界'?"我开着玩笑说。

"全都包括在内。"他低声说。

拉克申的说法是革命节庆典之后形势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我甚至想使他相信局势有所改善：在英国电视播放了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讯的专题片，掀起了保卫这两位作家的新的浪潮，所以说情况不坏……但是我的这个论据没有完全得到在座的两个人的理解：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在他们看来是不存在的。

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开始谈自己的事情，我说我感到敌手变得软弱了。应当试验一下他们的力量：不请示任何人，就印发几章《癌病房》，即使办不到，那么在国外出版了《癌病房》之后，我也有可能理所当然地谴责作家协会。不然的话，我警告说，瞧着吧，国外马上就会出版《癌病房》，不可避免，而他们却把责任推到我和您的身上。他们会说，这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做出努力，我们没能达成协议。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这要考虑一下，不能马上回答。"

他的语调我已经熟悉了：这是拒绝。我试图说服他：不论是不准还是放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胜利者。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若无其事地去申请，这是在发生了上述一切事情之后的一种鲁莽行为。应当先去说一下，可是我已经不能去了，请理解我!"

(拉克申后来向我做了一番解释，最后一次在党中央"文化部"沙乌拉又一次迫使特瓦尔多夫斯基读《胜利者的欢宴》，

而特瓦尔多夫斯基维护了尊严和坚定的态度；偷来的作品、违反作者意志而广为流传的作品他不能拿！因为他向沙乌拉讲了些骂人的粗话，他已经不能再去那里了。）

我说："可是并不需要前去请求啊！用通常的方式呈送，然后就等待回音。为什么不可以呢？"

拉克申（态度严肃，作沉思状）说："在路上我没有对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说……"

（为什么没有对我说呢？没有时间吗？可是他是专门为此而与我同行的呀！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应当当着头头的面说。）

"……有这样一种方案。在沙乌拉的部里有一位希德洛夫，有一次闲谈起来，讲到了索尔仁尼琴。部里的人感到奇怪，已经24位作家告诉他写一篇反对西方的发言，他怎么敢不写？让他写吧，写了就没事了。也不一定非要在《真理报》或者《文学报》上刊登……就在《新世界》上发表也可以……"

（是吗？他们已经后退，已经改变主意了。他们不习惯碰硬！）

于是，拉克申建议："就这样办，排印《癌病房》的若干章，在同一期上，"例如就在来函照登的栏目里……刊登一篇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的声明，说对西方掀起的鼓噪表示吃惊……"

真是个慎之又慎的小孩子（他35岁了）！他和我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颠簸，装着投降书，却不露声色……可以看出，敌军已经败阵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拉克申，我想让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示出他的态度，他无精打采地咕哝着：

"他能够写什么呢？如果--切都被压制下去了，能写什么呢？给作家代表大会写过一封信，那是改变不了的！"

拉克申缄口不语了，再也没有什么论据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意见对于他来说比党中央的意见更重要些。他不作声了，尽管内心深处并不赞同。

算了，我也不再坚持。我们东拉西扯谈了些别的。我们喝着浓茶。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几次起身，踱步，然后再坐下，他脸色好多了，不再那么衰弱。这时拉克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些新书放到桌子上。我急忙把钢笔递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

"请您为我的藏书签名留念。"

他甚至没有去接钢笔，没有这样的愿望。手在抖。抱歉似的说：

"我现在不能签名……以后我再签……"

为了使他不丧失对印行《癌病房》的兴趣，我不准备过早地向他谈起《1914 年 8 月》。可是他的状态实在让人难过，我想让他高兴一下，于是告诉他说，我正在写萨姆索诺夫惨案，可能在明年夏天脱稿。

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转而使用嘲讽了：

"没发生过任何惨案，而且也不可能发生。现在已经确定，革命前的俄国完全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不久前我读过一篇经济方面的论文，连 1861 年以前农奴的境遇也描绘得相当好：简直可以说就是地主养活他们，他们年老伤残时生活都有保障……"

（最令人可笑的是官方的新说法要比过去的"革命的"说法更可靠！……）

我们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汽车等在外面(《消息报》的司机们总是非常任性,而且催促《新世界》的编辑们),我们准备上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忽然想起要出去散散步,穿起了一件很普通的短呢外衣,戴上了帽子,拿起手杖,是作支撑用的,不太粗,他冒着小雪把我们送出栅栏之外,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农夫,而且是一个不怎么识字的农夫。他摘掉了帽子,雪落在他光秃的大脑壳上,这脑袋也像是农夫的。但他的脸色苍白,一副病态。我的心中一阵苦楚。告别时我第一个吻了他。这个场面将长久地压过我们之间的争吵和种种发作。汽车开动了,他,像个拄着手杖的农夫,就那样伫立在雪中。

在编辑部里我亲自把有关列宁格勒围困的那一段谈话润色过了,为的是不使他们留下严重的保留。

我离开了。刚到梁赞,就收到了沃伦科夫的信。完全是探听的语调:我将在何时最终和西方的宣传划清界限?他们行动起来了,是吗?我没有考虑很久,就回敬了他十来个反问:他们什么时候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也在等待回答!!

稍感轻松之后,我又向腹地前进了,来到了索罗特恰村阿嘉菲娅寒冷阴暗的小房里,解冻时这里可以烧到摄氏 15 度,而在寒冷的天气我常常在 2—3 度时被冻醒。根据近来数月的计划我应当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我把萨姆索诺夫事件将军们的照片摆了出来,准备开始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是对创作这本书的胆怯束缚住了我,我迟疑了。怀疑自己能不能跳过去。一行行呆板的字挂在那里,写字的手也没有了气力。这时候我又发现《古拉格群岛》一书有许多遗漏,还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并且写好几次公开审讯的经过,这

是当务之急,因为未完成的作品就如同没有动笔写的作品一样,是不堪一击的。刚好我又收到了一封令人担心的信,说是有人把《癌病房》卖给了英国人,而且是以我的名义。这是不可思议的,是我全力防备不使之发生的!工作乱了套。几天之后又冒出来一条消息,已经康复了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拉动了传呼铃铛的长绳:快到我这儿来!紧急需要!为什么这么紧急,没有说明,显然不是臆造的。林妖和您玩够了之后,就扒掉您的皮!我很不情愿地慢吞吞地抱怨着准备上路。外部环境破坏我的计划。这样的情况我是不能容忍的。

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奇怪的是我没有马上就奔到他那里:召他和我去苏联作协书记处,就是去谈一谈;沃伦科夫给他打了电话,表示不安,不知《新世界》是否已为《癌病房》向索尔仁尼琴预付了稿酬。"人总应当吃喝嘛!"(吃喝,这是谈到作者需要时他们通常使用的术语)

唉,真是一群帮凶,一点不错!!我根本不感到吃惊:既然我不屈不挠,那么要动摇的就是你们。我为另一种情况吃惊:活了大半辈子没有发现这一最简单的道理:他们只害怕力量和坚韧,如果有谁向他们微笑,给他们屈膝敬礼,这样的人就会给碾死。

12月18日我在编辑部里看到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他已经喝得飘飘欲仙了。他也没有准确的消息,他根据许多微小的次要的特征准确无误地得出结论说,上面某个人,也许就是最高级头头(勃列日涅夫),或者是直接指示要印行《癌病房》,不,大概不会是这样,反正是顺口说了一句话,其含义是"难道需要禁止印行吗?"这句话还没有落到地上,在半空中就被感受到了,虽然没有一个人把他记录下来,却马上

被接住了，经过一个个人的手、肩、耳朵传了出来，可谓不胫而走。焦米切夫的机关听到之后目瞪口呆，所有文学界的傀儡们，像沃伦科夫这样更积极卖劲更趋炎附势的人们，在这句话面前东奔西走顶礼膜拜了。于是，尽管一切还未决定，也发生了自 9 月以来巨大的转折，连坐在《消息报》的伏尔加牌轿车(车拉着我们去沃罗夫斯基大街)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又像半年前那样浮想联翩了，他不仅想到要在杂志上刊载，还想一定要马上在《文学报》上刊登几章以巩固地位。于是他又计划着应当把哪一章送去，哪一块又是“精肉”。处在宽容的让步状态中他已经提出了要把最后一章之前的那一章送去(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城市和动物园中漫游)，但是很快又反悔了：

“不，我不会把初夜权给恰可夫斯基。”

我们是在新的书刊检查奇迹的门槛上吗？官僚主义世界之所以令人惊异，就是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里在自己的内部取消一切物理法则：沉重的物体可以升天……但是这一次我不期待会出现奇迹，而且并不希望出现奇迹：要知道他们又会对作品大砍大删，讨厌死了。而地下出版机构出版的《癌病房》却可以不受阻挡地不受肢解地传遍各处！我更多地喜欢这种已经开辟了的有独立性的道路。然而我不想阻碍特瓦尔多夫斯基享受短暂的幸福，没有表示反对。

身材粗壮、宽额头的变色龙沃伦科夫又变得周到殷勤了。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像是在打牌：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面对面，萨尔塔科夫坐在沃伦科夫对面，只是我们三个人坐在一个小桌旁，而沃伦科夫离我们稍远一些，隔着一个写字台，而他自己这个大块头就坐在一个沉重的安乐椅里，当然了，他显得相当灵活。我只在最必要时说上一两句话，一点儿也不紧张，

并没有感受到全部游戏的现实性，阴郁而又认真的萨尔塔科夫也很少发言，远未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决斗是在沃伦科夫和不断发起攻势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进行的。沃伦科夫想要不做任何允诺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掌握操纵这次谈话。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苏联文学界混了35年，对所有这些手段了如指掌，他想对沃伦科夫施加压力，让后者哪怕只是口头上同意出版《癌病房》。

"这是杂志的事，"沃伦科夫很吃惊，"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是您至少是不反对吧？"

"这和作家协会又有什么关系呢？"沃伦科夫更加疑惑不解了。

（难道我们有人对出版一事施加压力吗？）

"不，不，我可不习惯乘电车不买票！"特瓦尔多夫斯基反驳说。这样的话是从作家协会里学来的……

……

谈了一个半小时，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胖手终于还是没有捉住又滑又油的沃伦科夫：这人虚与委蛇，什么也没有答应，什么也没有解决。我们回到了《新世界》编辑部，特瓦尔多夫斯基吩咐召集编辑部会议，对我说得很慎重又很庄严：

"我们排印《癌病房》！要印多少章？"

谈妥了印七章。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真的"不买票就坐进了电车"！

……然而，很快在中央委员会里人们就清醒过来了，恢复了元气（谁说了那句不买票之类的不慎之言，现在也无从查考，也许谁也没有讲出去；谁现在发布了禁令，也无从查考，也

许又是勃列日涅夫),于是一切又从根上就枯萎了。

上帝剥夺了他们的任何一点灵活性——生动的创造的特征。

对于我来说更轻松些,重又延伸出一条未经踏勘的路,不是笔直的,却是正确的。书未能印行引出的遗憾没有使我分心。

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他这次变故像是一次巨大的悲痛事件。他的确相信了。他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勇气,受到过鼓舞,但是……这些天里他本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他急于想要同我交换看法,于是他往梁赞给我发了电报,说他非常想马上见到我(看样子是让我润色作品)。可是我不想再润色,而且最不想再跑路,到梁赞两个小时,到莫斯科还要3个小时,而且怎样向这位健忘的庄稼人解释呢?新年前夕有10个省份因食品匮乏,都去莫斯科采购食品,买火车票要排大队,行路十分艰难,我不想坐车受罪。我回电表示不能从命。他又换了花样:新年之后马上来!新年之后我也不去,这样频频地召之即去,我可在什么时候工作?他不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斗争,为什么我这样冷漠?"他到哪儿去了?我给他派架直升飞机吧?!"拉克申和康德拉托维奇特别恼火:"如果是在排印作品,那么它的作者应当就近住在这里,哪怕是两周也好啊!"

我没有去,算是做对了。党中央文化部又来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施加压力,要我哪怕是写一个简单的、语所缓和的放弃原先观点的信件。"对他采取欢迎态度,给他出版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是怎么表示感谢的?写了一个《胜利者的欢宴》……"

又过了两天，我们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写了一封信！不是公开信，是只写给费定的，洋洋洒洒竟有数万字之多。他写了整整三个星期，在别墅里利用工作时间写成，扫雪时构思、遣词造句。

我这时正在索罗特恰对《古拉格群岛》进行最后的加工，晚上常常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作为享受，2月份我惊奇地听到了我11月份写给沃伦科夫的信，之所以吃惊是因为这封信还一直在我的手里，连想都没有敢想……

复活节时我从梁赞顺路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当然不能不去拜访《新世界》，去向特瓦尔多夫斯基问好。现在问什么好呢？过去的事情早已过去，已不再被关心了。给费定的信已经发出3个月了，费定怎样了？他已经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亲吻过了。“谢谢您的来信，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我的心情很沉重！……“康斯坦丁·亚历山大洛维奇，您见过勃列日涅夫吗？”“是的，周围的同志们决定，我们应当见一次面。”“谈到过索尔仁尼琴吗？”(费定吁了一口气说)“谈过。”“您说了些什么？”“您会理解，我是不能说什么好话的。(发觉有失言之后马上又说)当然也没有说什么坏话(大可以划个问号！那么说了些什么呢？)。”

我如同每次去《新世界》那样，更多地是出于礼貌地谛听，不争论。特瓦尔多夫斯基发出这样一封信当然不坏(如果是我，我就砍掉四分之三的篇幅)，信已经公开流传了，这就更好……

对了，还有一件不痛快的事，可以说是新的创伤：为什么莫斯科流传我的一部什么新作，而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被冷落了，全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带给他？为什

么没有告诉他？有些不起眼的作家在帕赫尔别墅竟然放肆地让他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一读，他说："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唉，这一切我可怎样解释呢？因为我如果带来，你就一定会给滞留住，你会说不需要。可是我却需要。于是我说："这是人们在读《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里以前的一章，最后加工定稿时拿掉了，我有点舍不得放弃，就拿出来了……"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这不是我的作品，所以没有带来，我不是作者，而只是一个编纂者，书里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内容是引了读者的话。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它会扩散，会获得什么成功。我只给了两位在劳改营待过的老太婆，让她们读了读。"

"这两个老太婆在哪儿？"他威严地冒出来一句，"现在我们就要一辆车，去找她们，把她们接来。怎么可以从她们手中流传开呢？"

"那您给费定的信怎么会流传呢？您也是没有给过任何别人的！"

这句话他很意外。他确实知道没有给过别人。

"您现在应当乖乖地坐着。"他教训我说。

现在，是的，我同意。但是我要诚心诚意地提醒您，如果《癌病房》在国外出版，我要向作家们分发我的说明。

我就这样离开了，乖乖地待着。这是3月8日……星期六3月13日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里我听到了作为《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这真是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开始了！我在小径里不停地踱步，迎着春雪。终于开始了！我在等待，也没有等待，不论怎样等

待,这样的事件总是出人意料地发生。

这部《癌病房》我可是从来没有向西方传递过。不止一次向我提议,而且也有传递的渠道,可是我不知为什么拒绝了,没有任何打算。是自己流传出去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只好顺从。会有什么结果呢?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讯已有一年之久又出现了这样的出格的行为。但是预感引导着我在棒打不回的路上前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妻子在我冒着4月的春雪散步时找到了我,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很激动。她还不知道消息,因为刚刚广播。她带来了另一件消息: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找了我3天,大发脾气,上哪儿能找到我?梁赞没有,莫斯科的亲属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保留圣诞村这个地方正是为了向《新世界》保密,只有这样才会建立一个保护层,不然的话他们会打扰我无数次)。星期一才见过面,到了星期三就大发脾气吗?又是"从来没有如此重要"吗?他们总是"从来没有过",总是"特别的时刻","万分重要"。只需要稍微等待一下,没有狼的时候,不必总喊"狼来了"!这样人家才能相信你。我不能在外部条件稍一变化时就随便被扯动。好了,三天以后我去,让特瓦尔多夫斯基先忍受一下吧。我对他们不人道吗?可是他们对我也不是更关怀备至的:这些年来如果我是召之即去,我可能就不再会是作家了。

《癌病房》在西方出版了,他们不会有比我得到的消息更新鲜的消息!……我希望安宁,可是却要行动,要向他们发起进攻。

"……我曾不止一次地坚持提醒书记处,说存在着我的作品流出国外的危险性,因为一些著作早已广为流传被争相传

阅……白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责任在书记处这是非常清楚的。”

在最后的关头莫斯科的朋友们还劝阻我，说应当稍加等待！现在这个时刻，专制统治、压制人的意志……不应当惹恼上层……

正是因为现在才要向前推进呢！！！

正因为如此，我才来到了莫斯科。我还要看一看，《新世界》里是不是一片慌乱？

紧张已极！拉克申和康德拉托维奇一脸怒气而又苦不堪言，他们什么正经话也说不出来：职位高低和纪律性是第一位的，不经过特瓦尔多夫斯基什么也不能说！而主编从别墅里出发未能准时到这里来：在路上车胎放炮了，而《消息报》的早已习惯了拈轻怕重的司机连钥匙也找不到，不能把车轮拧下来。3个小时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走了进来。他内心很紧张，而且很沮丧，这是被我弄的如此垂头丧气。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编辑部主要人物的会议，像是一个侦讯委员会，一个个虎视眈眈，态度严厉。他们放到我眼前的是由叛卖性的可恶的格拉尼出版社发表的倒霉电报，电报已经很脏了，他们躲躲闪闪，生怕弄脏了手。

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4月9日电告《新世界》

现通告如下：安全委员会通过维克多·路易又将一份《癌病房》的稿本运来西方，企图以此阻止在《新世界》发表。因此我们决定立即出版该书。

格拉尼出版社编辑部

这是突如其来的事，这里面有多少矛盾甚至是不解之谜啊！我不能理解，接受不了！但是也并不要求我理解！这是挑衅行为！作为一个苏维埃人，我应当……

我的主要弱点是《新世界》！唉，这是我最薄弱的环节！和任何别人谈话我都不感到困难，只是和你们谈话困难。我早就不欠任何一个苏维埃机构的债了，只欠你们一家杂志的债。就是经过你们，这纠缠不休的整个体系抓住我不放，使我东奔西跑；你欠债、欠债！欠我们的债、欠我们的债！

特瓦尔多夫斯基相当认真，甚至是庄重地说："好了，到了您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的时刻了，证明我们发现的这个人是我们的人，《新世界》没有错。你应当考虑到整个苏维埃文学，您应当考虑到同志们！您如果行动上有所闪失，我们的杂志就有可能关门……"

经常性的威胁——可能关门……而且我也不再仅仅是我，我要么是《新世界》脖颈上的磨盘，要么是气球……

博罗金诺战役之后，我狂妄地认为是一个自由人。不，不，一点儿也不是！双脚粘住了，抬腿很困难！我试图推托，说：

"格拉尼出版社晚了一步。《泰晤士报》已经出版了……"

"《泰晤士报》不重要，重要的是格拉尼出版社！反击和苏维埃的原则性最重要！……"

我把我的附件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副本给了拉克申（我没有给康德拉托维奇，他可以躲在拉克申身后看）。这不会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有什么作用？在别人（看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眼色）身上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

"《泰晤士报》，不是用俄文刊登的……"

拉克申报告："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这在历史面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索引当中总是记录用本国语言第一次刊载的情况。如果记录的是格拉尼出版社首次发表，那可是耻辱！……"

特瓦尔多夫斯基忽然警觉起来，对这个附件说：

"您准备散发它吗?！时机不对！时机不好！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情绪吗？……可能掉脑袋哩！……刑法典里补充了新的条款。"

我说："刑法典的那一套对我早都没有关系了，我不怕。"

特瓦尔多夫斯基问："那么您已经开始散发了吗？"

我还没有开始散发，但是我撒谎说："是的。"(为的是让他感到不可阻挡。)

不赞成，不赞成。甚至连这张错误的轻率的纸他也不愿意拿起来放到桌子里。现在这不是主要的事情！我的周围又统一意志地聚集了一批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简直是在向我口述：

"我坚决禁止您的这种新流亡主义的、公开敌对的杂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

哪些措施?！政府不保护我们的权利，但是要求我们自己保卫自己。这就是我们的规矩！

"否则，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我们就不再是您的同志了！"

拉克申、希德洛夫、康德拉托维奇脸上的表情是冷酷的、一副模样：是的，我们不再是您的同志。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唉，不向朋友们让步可太困难了！而且我的确不愿意格拉尼出版社印发《癌病房》，这只能把一切搞坏，特别是在欧洲

已经出版了之后。有什么办法呢，行，我可以拟个电报稿。我想把文稿拟成，可是一时拿不出合适的措词来。让我再考虑一下吧！他们把我领到了拉克申的办公室。我像是被捕了似的：没有写出抗议电报之前，编辑部不放我走。

凡事总应当考虑考虑！总要小心谨慎。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电报的背面有几行铅笔字。这是什么？是一份草稿：

“尊敬的彼得·尼洛维奇！

我以为索尔仁尼琴应当写信或打电报给这家新流亡主义的、公开反对我们国家的杂志……我试图紧急召索尔仁尼琴来莫斯科，但是他现在在何处我全然无从了解。等待您的回答。特瓦尔多夫斯基，4月11日”

有许多的谜：

1. 这样的电报怎么会送到？或者是有关机构失灵了，或者这是克格勃的挑衅。

2. 路易是何许人？

3. “又一份”？那么第一份是谁送到的？（两份都是要花钱的！我的《癌病房》的稿费已经用来巩固国家安全的阵地了！）

曾经同所谓的路易在卡拉干金劳改营一起改造过的一位女劳改犯送来了一份很令人奇怪的纸卷。原来不是什么路易，而是维塔利·列文，他被关进劳改营时大学还没有读完，据说和外国旅游者有过什么勾搭，在劳改营里是个臭名昭著的告密者，从劳改营出来后，不仅没有失掉在莫斯科的居留权，反而成了一些相当“左”的英国报纸的记者，娶了一个英国富

翁的女儿为妻,可以自由出国,有用不完的外汇,和童话般美丽的别墅——在巴科夫卡的将军村与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为邻。把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的信件带到国外去的也是他。

一切都清楚了。电报是真的。安全委员会在拿我的《癌病房》作交易……

几天以后,《古拉格群岛》已经完成,拍成了微缩片,底片也密封了起来,就在这一天,7月2日又传来了一条新消息:

西方出版了我的《第一圈》! 暂时还是俄文版,而且印数很少,是预订的"复印本"。英文版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后问世;有这样的建议:现在已有可能把《古拉格群岛》送出国外了!

把书稿送出去是很冒险的行为,但是不冒险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就是说,我将把书稿送出去……刚刚从惶恐中解脱出来的一颗心,现在又陷入了新的惶恐之中。没有喘息机会。

可是,一下子就在西方出版两本我的小说,这不是双重胜利吗?!

沉郁的令人压抑的一周过去了。全是一些不顺利的偶然性,影响了把书稿寄出去。6月9日前,即正教的三一节之前一切都紧张起来了。或是失败或者成功,我都只能在几天之后才能了解到。我已经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对真正的"圈"加工定稿,是由96章构成的,它的情节还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西方只出版了87章的"圈"),但是很不顺手,没有办法工作。当你感到不够坚强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求助于上帝是最好的办法。在娇柔的白桦林里采些树枝,装饰心爱的木房别墅。几天以后将会怎样? 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

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我祈祷。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那会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我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

如果是失败，可能争得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可以再做些事情，最后完成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只是应当离家出逃。三一节前夕的傍晚，我从别墅里跑了出来（急急忙忙地打点行装，我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不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有多少人从家里出走参加国内战争，多么痛苦?!），住在隐蔽的房间里，没有电话。

过了一整天，又一整天，又过了第三天，整个三一节都无所事事。工作泡汤了。空气不足，空间不足。甚至走到窗户跟前去也不成，怕被人看见。我已经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只是没有带上"兜嘴"，饮食也不受限制。我是多么不愿意住进卢布扬卡监狱啊！……一般地说我的地位还算牢固，对我的很多事情都高抬贵手了。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原谅《古拉格群岛》！如果他们在书稿送出时捉到它，肯定会把这部书稿和我一起扼死。

只是到了三一节的第三天才得到了好消息。多么自由！多么让人心情愉快！拥抱整个世界吧！我难道带起了镣铐吗？我是一个被压垮的作家吗？我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全是畅通的！我比所有被鼓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都更自由。现在，我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第一圈》（96章），然后再完成一些不大重要的委托，接下去就甩掉多年来一直压抑着我的一切，开辟天地用于写我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1917年的革命》。

再没有比那个夏天更幸福的了，我竟能那样心情轻松地以很快的速度写完我的小说。如果不是因为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会更加幸福。

我由于以为我们的人还不是彻头彻尾的疯子，以为他们不会去占领这个国家。在离我的别墅只有100米的公路上日日夜夜地有坦克、卡车、特种车辆向南开去，可是我总觉得我们这只不过是吓唬人，是一种手段而已。可是他们真的侵人了人家的国度，摧毁了这个国家。而且按照20世纪的概念，他们这是对的。

8月21、22日这几天对于我至关重要，不，我们不必追逐天命，我们生活中的主要方向毕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些天里我又重新选定了自己的命运。

心里只祈求一件事：写一句简单的话，把赫尔岑的那句话稍加修改一下：作一个苏联人是耻辱！这几个字里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来的全部结论，是我整个50年来的结论！纸张马上就叠了起来，脚掌在燃烧：要跑，要走！我已经要去开车了。

我想到：各类名流，如加皮察院士，[1]如肖斯塔科维奇都寻求同我会见，约请我去做客，同我调情，而我甚至并不感到荣耀，这种沙龙的荣幸使我作呕，这是浅薄的，毫无意义的交往，是虚度时光。好了，坐上汽车到他们各家去一遭，还有列昂托维奇[2]，他与萨哈罗夫过从甚密（而当时我还未与萨哈罗

---

① 加皮察（生于1894年），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在低温物理方面有卓越建树。
——译者注

② 列昂托维奇（生于1903年），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在等离子物理方面有卓越建树。
——译者注

夫谋面),还有罗斯特洛波维奇[1](他去年来到梁赞,旋风似地来到我家,见过两次面之后就约请我去他家住)。最后,还要去找特瓦尔多夫斯基,我将在他们每个人面前提交我这几个字的文稿,这几个字的结论:作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然后对他们说:不要左右逢源了!这是你们生命的选择:签名还是不签?

就这样,收集7个人的签名之后我就把它送到地下出版机构去!两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就会广播!……

我紧张地操纵着自己不驯服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这时我实际上感受到了我不会发动起这7个人,不会拉起他们来:他们不会签名的!他们受的不是这样的教育,思维方式也不是这样的!被束缚住的天才肖斯塔科维奇会像伤员那样辗转不安,扭动着弯曲的手,手指连钢笔都夹不住了。辩证的实用主义者加皮察会巧妙地说出,这样做我们只会伤害捷克和斯洛伐克,当然也会伤害我们的祖国;极言之,在经过一百处修改,经过一个月之后,他也可能写上4页:"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当然也有一定的阴暗面……承认兄弟党的社会主义愿望的真诚……"亦即:扼杀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只是最好不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的兄弟。另外那四位的想法也会大体相似,他们会一起动手把我的声明搞得不伦不类。这样的声明,我肯定不会签名的。

汽车已经发动了起来,但是我并没有出发去找他们。

如果要签名发表声明,就我一个人来做。又真诚又得体。

---

[1] 罗斯特洛波维奇(生于1927年),前苏联大提琴家、乐队指挥。1974年出国。
——译者注

在这样的时刻，我是善于呼喊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呼喊重要吗？现在就这样大声疾呼，然后就中断呼喊，这意味着这一辈子我没有见到过如此可怕的事情。而我见到过的了解的一切远比这些要更可怕，整个一部《古拉格群岛》都是这些更可怕的事，为这些我为什么不呼喊呢？现在呼喊，等于是否认祖国的历史，等于是帮助美化祖国的历史。应当为了主要的打击而保护好自己的喉咙。时间不会太久了，人们已经开始把《古拉格群岛》译成英语了……

是为怯懦辩解？还是有明智的理由？

我沉默了。从这一瞬间开始，我的肩上又有了多余的负担。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无权呼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缄口不语。我感到更加可耻的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我还有特殊的个人责任：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的事业是从作家代表大会开始的，而代表大会又以由科霍乌特宣读的我的信件开始的。

我的材料被安全委员会搜走已经整整三周年了。我的两部小说正在欧洲传播，而且看来颇获好评。铁幕被砸破了！而我在森林中漫步，没有人押解，不戴镣铐。魔鬼的血口没有来得及及时地咬掉我的脑袋。伤鸟医好了，又站稳了脚跟。

12月是我50周岁生日。在生日到来前一周就有电报打到梁赞来，随后是大批信件，极少数是转来的，多数是经邮局寄到的，极少是匿名的，大多是具名的。最后几天送电报的邮递员一次就送来50份至70份，一天送来几次！电报总共有500余份，信件200封，有1500多份个别的个人题词，这是些无所畏惧的题词，很少粉饰。

"上帝保佑您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困难的时刻请您记住在作家协会的那一次讨论……"

"让我们永远永远地成为您的读者,而不必要成为您的书的出版者……"

"每个人都为自己选择道路,我相信您不会离开您选择的道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饱经忧患之后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女。"

"愿您健康地活下去,气死那些畜牲们;愿您像过去一样继续写作下去,随他们怎样打饱嗝。"

"……请不要搁笔。请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只爱逝去的人们。"

"……今后也要成为为人签名时不感到耻辱的那些作品的作者。"

"……我的良心就是您。"

"……您所做的一切是精神惶遽道路上的希望,而整个国家都因惶遽而停滞了……"

"……与您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又痛苦又愉快。"

"上帝保佑,这一天里您不会听到半句不真诚的、虚伪的话……"

"……我们读您的书是用卷烟纸印的,所以我们觉得它们更可宝贵。如果俄罗斯已为弥天大罪付出了昂贵代价,那么为了巨大的痛苦,它付出的更多,为了使我们不致于因羞辱而完全丧失信心,您降生到了俄国……"

"当我考虑在工作中应当怎样自处时,我想到的是您的行为……当我处于心力交瘁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您的生活……"

"面对自己的良知,痛苦地承认不能沉默的时候你沉默

了……"

"我不喜欢卖国贼。您庆贺了自己的生日，而在 10 天以后我们将要庆贺斯大林同志的诞辰。我们将为这一天痛饮几杯!!! 历史定将让一切和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您获得了西方的承认，却受到自己人民的藐视。向尼基塔——你的朋友致意。"(用打字机打印而成，没有署名，是投进门缝的信插里的①。)

"沉默本身表现了您的声音的威力。我不知道比您更令人期待、更必不可少的作家。言语没有死亡的地方，未来才能得救。您的一本本痛苦的书让人的心灵受伤，同时又医治这些创伤。您把无与伦比的伟力还给了俄罗斯文学。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

"愿您再活 50 岁，不要失去您天才的迷人的力量。一切都将转瞬即逝，只有真理永存。永远属于您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我毫不造作地说，那一周我感到自豪。我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就受到褒奖。在 12 月 11 日，面对千百件信件和电报，我答谢的词句开始在头脑中形成，尽管我无处送去发表，只能给救人一命的地下出版机构。这时我寄给了《文学报》:

① 经地下出版机构转来的祝贺中还有:"为您有能力活到 50 岁并且宣扬真理而折服。请您在我报上介绍经验。"　　《真理报》编辑部

"在您 50 诞辰之际，在出版您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我们希望能在今后的 50 年里同您再协作。"　　萨姆伊兹达特

"亲爱的! 为您对我杰出的一生若干个别细节所做的确切表示衷心的感谢。不坏，非常不坏，我表示祝贺。"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

——作者原注

"……我惟一的理想是满足喜爱读书的俄国的希望。"

我还不知晓,这一誓言绊住我的时日已经临近。

扼　杀

1968年疾风暴雨的春天过后,不知为什么让我处于非常安静的状态,很久没有触动我,没有攻击我。

我获得了法国的"年度最佳作品奖"(双重的:既指《癌病房》,也指《第一圈》)。我们的人一声未吭。美国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选举我为院士,我们的人满不在乎。另一个美国科学院选举我为艺术与科学院士(波士顿),我回信表示同意,我们的人又是声色不动。闲暇时我毫无阻碍地振作了起来,我急于赶写《1917年的革命》,甚至在历史博物馆里,在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我工作着。他们正式表示同意这样做,只是不时有安全委员会分子来,用眼睛睃巡我,看看我在这儿做什么。我也在国内游历,没有任何阻碍。如此长久的宁静,甚至使人感到窒息。不错,夏天我曾得到情报(我的同情者并不比他们雇佣的探子少),说正在准备把我开除出作家协会,但不知为什么踌躇了,电报也很怪:"会议推迟至10月底举行"。真有远见!作协梁赞分会也是消息闭塞得很,他们不知道在准备开除我的前一周对我曾经是一个关键的时

刻。10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宣布了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奖，这次没有奖给我！他们就是害怕颁奖给我。而现在他们已经被松了绑。莫斯科的索波列夫行动了，把我们的萨丰诺夫召到首都。忙碌起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整个1969年我没有住在梁赞，刚好这时候我回来了，我要在这个阴雨连绵的月份里在家里好好工作一番，要使用阅览室，对我作品中的最尖锐的角色进行一些加工。正好这时候也替我安排了一个“角色”：就在街上，我窗前不远的地方……

替我安排的这个角色是不会打瞌睡的，从来也不打瞌睡。11点时门铃响了，作协的女秘书跑来了，她急匆匆的，眼睛不敢看人，把一张打印的纸塞给了我，文件上通知说今天3点钟举行有关作家思想教育的会议。她走了，我还可以再工作3个半小时，但是，为什么要急若星火地开会？而且还是什么思想教育问题……不，我想这里面的问题一定与我有关系。我试着再平心静气地工作下去，不，不行了，松了劲了，心里全松了，我感受到了危险。我扔下手中正写的小说，拿起来叫作“我与作协”的材料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件，有斗争用的、有相互指责的、还有不同的读者向我提供的情况：谁在什么地方的讲坛上说了我的什么坏话。这些材料全都是杂乱无章的。我以为应当好好准备一下。

我特别就这个思想教育做了准备，要直截了当地和他们理论一番。我要这样说（有点像狄德罗）：“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毫不谦逊地宣布他要教育别人并且利用书籍做这项工作。对作家进行思想教育？真是双倍的狂妄！不要这样地提出问题！也别举行什么会议！还

是写本书吧，我们会感激涕零的，会使我们顿开茅塞：噢，原来应当这样写作，而我们这些笨蛋，却在黑暗中东奔西突！……”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5—6分钟来到了作家协会，为的是不要落到在膝盖上写字的地步，如果需要写，应当在那里惟一的一张圆桌占一隅之地，应当在桌上摆好我的各种彩色笔。我早就等待把我开除，而且准备带一部速记用的录音机来参加会议。可今天不是开除我的会议，只是“思想教育”。……房间是空的，只有临时代行分会职务的瓦西里·玛图什金坐在窗台上（萨丰诺夫忽然病倒了，等待手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生阑尾炎的机会，这样才不至于在会上丢丑）。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长了一张慈祥的俄罗斯人的圆脸，已经退休了，就是他在赫鲁晓夫红极一时的日子里亲自找到了我，亲自拖着我填写了加入作协的表格，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拍手叫好，说这本书对于他来说是重要的语言课。我握了握他的手：

“您好，瓦西里·谢留诺维奇！会不开了吗？”

他板着脸，没有从窗台上下来：

“为什么？会开的。”

“什么时候人才能来齐呢？”

“会来齐的。”

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眼睛不看我。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没有任何人，他是否有什么悄悄话要对我说呢？没有，这狗崽子一句话也不说。我和他客客气气地拉家常：听人说您写了一个新剧本，而且在州剧院上演……看来桌子对我不会有什么用处了，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占了个位置。

可是，谁也不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忽然间所有的人

(甚至多于应到会的所有的人)都以极快的速度走了进来,而且我也没有发现他们都脱掉了大衣,谁也没有戴帽子,而在平时是在这个会议厅里宽衣脱帽的。他们鱼贯而人,虽然本来可以绕过我的桌子,可是所有的作家都走过来和我握手:有罗金(他脸色苍白,病得很重,超过38度,我问他,表示吃惊:您干吗要来呢?),有巴兰诺夫,一只狐狸(不久前还说:"可以代表您向罗斯托夫的人致意吗?那里的人们羡慕我同您的会见。");有列甫琴柯,此人性格开朗,头脑简单,尽管有些平庸乏味;有热尼亚·马尔金,是个年轻人,对于梁赞来说是一位过于左倾和过于先进的诗人。还有塔乌林,俄罗斯联邦作协的代表,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彬彬有礼地同我握手。不,不会有什么开除的事情发生。还有位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吃得胖胖的恶棍,他走到我的跟前,高兴地摇着我的手,今天是他的一个特殊的节日!我也握握他的手。他是谁,我不知道。其他人没有打招呼。大家都落座了。吓,竟有12个人,而作协成员只有6个人,其他都是无关的外人。

我安排好了一切,但是看来可能并不需要写什么东西。有一个人已经在写什么,就在膝头上铺着纸写,这人是不是穿便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呢?塔乌林做报告,又枯燥,又呆板,说到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叛逃了,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件。俄罗斯联邦作协作出了决定,土拉的作协组织对他进行了批判,所有的人深表愤慨(此时脸部无任何表情),决定在各个组织中进行批判。当然了会加强对出国作家的监督措施,加强教育手段……

……还有莫斯科的作协组织,在高层次当中举行了会议,

对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列夫·科佩列夫、布拉塔·奥库扎瓦[1]提出了认真严肃的指控……

（回避不了了，应当为他们辩护。然而也闪过怯懦的念头：也许可以沉默？这里可不是莫斯科，而是梁赞，这里很少有人有什么瓜葛……如果不是知己，如果只是一些自由派作家，我也许就屈服了，平心静气地忍受了。然而涉及到这几位作家，我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我要说话！……）

这位塔乌林态度缓和地向外铺展，哀怨地，像是讲些微不足道的事：

"……还有，对你们的会员也讲了一些……谈到了索尔仁尼琴同志……"

完了。报告结束。"讲了一些"。显然，不算严重。

谁发言？玛图什金。老人从窗户台上爬了下来，迟迟疑疑。给了他10分钟的发言时间。我预见到了对我也需要限定时间，于是说："多给他点时间，干吗那么少！"所有的人也预见到了我会需要更多的发言时间，异口同声地说："不，10分钟够了，就10分钟。"

玛图什金一面走着，慢慢地转着弯，一面开始攻击我。我一面记着，一面感到吃惊：他们是怎么下的决心？我几乎确信他们下不了手，由于没有受到惩罚而变得大胆了。不，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样对他们不利，干吗自讨苦吃？凶狠剥夺了他们的理智。

作家兄弟们纷纷发言，一个接一个毫不迟疑：有彬彬有礼的巴兰诺夫、有老实人列甫琴柯，有纯洁的罗金、有惊魂未定

---

① 奥库扎瓦（生于1924年），前苏联作家，诗人。　　——译者注

的大胡子马尔金。马尔金的动摇在其发言中也有所表现:“我不想参与这类摇来摆去的事情——现在我们开除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然后又吸收他,然后再开除,又再吸收他人会……”话虽这样说,他还是投票赞成开除我(……他要房子要了两年,答应他明天给他住房证。列甫琴柯,也是许多年没有分到住房。罗金也是不知多少年请求搬到梁赞来,也没有给房子。经验证明:这对人很有作用)。

我说:“请允许我提个问题。”

不允许。他们说:“不,不行。”

我说:“没有速记员。不做记录!”

没关系,他们不需要!

这位大腹便便的人谈锋甚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活像是拿破仑。我问他:

“请原谅,您是什么人,干吗在这里参加作家们的会议……”

他甚至由于吃惊而笑了起来:

“怎么,问我是谁?哈哈!您不知道吗?州委的代表!”

“是代表又怎么样?具体说是什么人?”

“州委书记。”

“什么书记?”我不甘示弱。

这甚至使他打了胜仗的喜悦蒙上一层阴影:如果敌人连你是何许人都不了解,那你算是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呢?

“主管宣传鼓动的书记。”

“请问尊姓大名?”

“嗯,您不知道我的姓名?”显然他受到了轻慢,甚至是侮辱,“我是科热夫尼科夫!!!”

嘿！实在是可笑！我真想开怀大笑一阵，只是没有时间。按照苏维埃的尺度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怪事：他是梁赞市所有意识形态界人士的亲爹，他是梁赞市不可代替的人物，而我这位在梁赞当作家已经7年之久的人竟还问他是何许人！……他生气了……

"是的，我们从未见过面。"

"不，见过面，"我说，"只不过我这个人不善于记人的面孔……我们见过面，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讲赫鲁晓夫的接见情况时，您来听过我的发言。"

我是多么有名望啊！他打电话到学校来约我去见他，我回答说：我累了，不能去。慑于赫鲁晓夫时代我的名声，他驯顺地自己来了，坐在一个角落里。后来，他对作家们做过多少说教啊！我从来没有理睬过（把我开除，他们是做对了；事实上我算是什么苏联作家呢？算是什么样的党的助手呢？）。一年前他打电话到我家里来，问我："《苏维埃俄罗斯报》对您反应不好，您将如何对待？""我还没有读到。"他很吃惊，说："请听一下，我通过电话读给您听。""不，我不想听。""请到我这儿来谈谈吧。""到办公室去，秘密交谈吗？我不去。您把所有的作家都召集到一起吧，我们公开谈。""不，我们不会举行群众大会。"

瞧，他等到了好时刻，像是过节了，因此才如此容光焕发。

开除，就这样决定了，可是我怎么能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呢？给我发言的机会，我的发言稿还没有准备好，马马虎虎地拼凑成了，一遍还没有读过。我刚一谈开，他们马上就喊：

"10分钟到了！快结束吧！！"

"什么叫10分钟？这是生死问题！我需要多少时间，你

们就应当给我多少时间。”

玛图什金拿出老者的那种甜腻腻的态度说:“给他3分钟吧!”

我又争得了10分钟。我像打机关枪那样急着说。没有关系,20分钟可以讲很多。我发现马尔金听我使劲地敲打他们简直感到幸福,而罗金,虽然生病发烧也很得意:有人反抗他们觉得高兴。

表决时,一个个全都服服帖帖。

而我满意地反对整个决议。

人们高高兴兴地散去了,边走边闲谈。我收拾好了一把铅笔,准备尽快离开,塔乌林拉住了我,客气而又充满同情心地对我说:

“我劝您现在就去作协书记处,明天刚好所有书记全都来,我这是为您考虑!”

我说:“作协章程没有任何一处谈到在24小时之内开除一个人,可以多少从容些嘛!”

(我暗自想到:最好让我来得及把消息发出去,最好让我把《申诉》尽快发出去,到那时候再看你们怎样开会。我仍然相信,我不参加,他们不会开除我。实际上会的,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

“请听我说,”塔乌林拉住我的衣袖说,“谁也不愿意开除您! 您只要写一份材料就行了,这是对您的惟一的要求,您就写您对西方的……表示愤怒……”

也许他们的设想是对的? 对十月革命周年的献礼? ……不这样,开除我就没有任何意思了,只是一种复仇而已。只要他们不开除我,形势似乎对他们有利……而如果开除了,我却

完好无损,那该如何是好呢?

在走廊里,马尔金又拦住了我,大声地请求原谅(按照善良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设计,他还会数次忏悔,痛哭流涕,跪地祈求宽恕,然后又变卦。他也真是很为难:他心灵是支持我的,然而罪恶的肉体不允许)。我又尽快地到电话间去。在梁赞市,我是落进了捕兽器,在梁赞市要掐死我是不困难的,应当让消息传到莫斯科,拼着命也要传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得救。我们梁赞市只有一台城市间的自动长途电话,如果它没有损坏……不,没有损坏,连排队的人也没有。我拨了号,没有人接。又拨了另外的号,还是没有人接电话。往哪儿打呢?《新世界》! 还不到下午 5 点钟,人们还没有离去。我给他们打了电话……

安静下来之后,我回到家里,坐下来写《申诉》。早晨 6 点醒来之后,我和平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没有任何其他思想。忽然间像针刺一样播送了以下的消息:

"据来自莫斯科的非官方消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城市梁赞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组织!"

我跳了起来! 瞧,真是信息时代! 这么快的速度,我没有料到!!

在简明新闻中播送 4 次,在详细的新闻节目中也播送 4 次。太好了! 我到街心公园去恢复精力,街上还没有行人,我看到一台卡车已被大雪覆盖,卡车有一个车篷,我早已注意到它是在监视我,在黑暗的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我从驾驶室近处走过,看了看,他们没有收音机,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表的消息。

然而我也心有余悸:他们会不会把我捉起来? 只要稍稍

-离开莫斯科，就是闭塞的井，而不是国家，把惟一的通道堵住是不值得的。

梁赞的州委会里闹翻了天！原来如此："英国广播公司已经广播了索尔仁尼琴被开除的消息。很明显，他们在梁赞有间谍机构，他们监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生活并且急速地传递到伦敦！"于是他们想了一招："让那位无家可归的列甫琴柯来守电话，凡是莫斯科来的电话一律回答说他是局外人，全然不了解情况，谁也没有开除。西方记者真地打电话来，跑来核实，并且开始在西方电台播送辟谣声明。可是就在11月5日这一天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处还是把我开除了，还是没有让我参加就把这件事情办完了！

这件事情我有两天蒙在鼓里，除了《申诉》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想书写和散发。知道这一消息之后，我怒火中烧，不能控制自己，我说了些极其恶毒的话，这些话我还从来没有对苏联作协说过呢，这是自然形成的，这不是我的意图，不是我的方式（意图只是顺便产生的：保护受到威胁的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和科佩列夫……）。

11月11日我下了火车后直接去了《新世界》编辑部。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坐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一个人的面前放着我的《申诉》，他们刚刚宣读完，正在进行讨论。所有的人像接到号令一样都起身离去了，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这已是习惯成自然了，等级制度的特点，从来人们都不等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我们单独谈谈"时才离开）。特瓦尔多夫斯基要了茶、饼干和面包干，这是《新世界》编辑部待客的最高级形式了。

估计到特瓦尔多夫斯基饮酒不多，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

来不及去作协书记处,说他们甚至没有送来召我去的通知,只是间接地发了一个通告,而且是事后发出的。然而,并不需要用这些去说服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自己也认为去开会是卑鄙的,所以没有去。(人言可畏。传言太可怕了!莫斯科到处流传说他去参加了会议,而且激烈地为我辩护。)

他说的是什么呢?他惊恐地(已不是第一次)说起了西方的钱:我接受西方出版我的小说的稿酬,这难道是真的吗?

苏联的诅咒真讨厌:谁如果和他们的想法不同,他就一定卖身投靠敌人获取金钱;如果不付给你苏联金钱,那你就满怀爱国主义的感情死去吧,但是不要接受西方的钱!

我说:"不知道收到几本小说的稿酬,挪威人也寄来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稿酬,但是我都没有拿。只是作协的一群败类不能够理解一个人也可以清贫地生活。"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心情很好。他夸奖《申诉》,但是又吃惊地问:怎么会昨天就有读者把这份申诉拿给他?

"是我发出来的。"

他多少有些害怕:怎么可以呢?会勃然大怒的(指最高层)。

写好的致书记处的《公开信》正在我的皮包里呼之欲出,等待自己的时辰。要知道,他心胸开阔,同情我,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可是我怕把《公开信》给他看,根据过去的实践我了解他的克制和禁忌。但我毕竟向他吹了吹风: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您爱我,希望我好,但是在苏联您依据的是另一个时代的经验。例如,如果当时我找您来商量:要不要发出给代表大会的信?发不发《癌病房》和《第一圈》?您肯定会使劲地劝我住手……而事实上我做对了!"

我又说:“请理解我。应当如此!劳改营的经验是:和告密者打交道态度越激烈就越安全。不要制造和谐的假象。如果我缄口不言,他们在几个月以后就会悄悄地扼杀我,以‘未合法登记居留’、‘寄生生活’、以任何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如果我大声呼喊引起轰动,他们的态度就变软了。”

他说:“可是您希望得到什么呢?要知道这些‘读者’们只是故意作出一种支持的姿态而已。虚伪地为您的被开除而长吁短叹,然后马上就转而谈别的话题。我相信,在您谈到您准备慷慨赴死时,你不是在装腔作势。但是,这是无益的,您什么也不能向前推进。”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根小小的平衡木上较量了。只是今天谁也没有动肝火,都怀着一种哀怨的善意。也许比这种善意还更多些,像今天这样推心置腹还从来没有过。不,推心置腹也曾有过,只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等。我们结交8年来第一次真的像是平等的人,像是朋友之间交流。

我说:“既然如此,也只好如此,也就是说牺牲暂时还是无谓的,但是这种牺牲在遥远的未来总归会发生影响。而且我想今天也会找到支持。”

(是的,我是这样想。100名作家对我致作家代表大会信件的支持使我受宠若惊。我这个人通常乐观精神较重,在没有成就的地方常常预感到会有成就,所以现在也等待大规模的作家运动、斗争,可能的退出作家协会,而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真正的压迫,没有反抗,没有雷鸣,但是疲惫的人们已经失掉了抵抗的任何激情……)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说:“现在是退潮,树根、水藻全都露

了出来,是一幅狼狈不堪的现象。"

我说:"哪儿有水,哪儿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终于该谈到他了。对于我,失去作协会籍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是使人获得轻松感的形式。对于他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因为涉及到了核心问题:他不可避免地抛弃自己的骄子《新世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他认为开除我是对这件事情的最后推动。在最后一次之前则是党中央的指导员想要来"充实"编辑部成员(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也许要把拉克申、希德洛夫、康德拉托维奇排挤出去)。

如同所有的深思熟虑的人在整个一生,尤其是在一生的高潮时刻要考虑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知多少次地同我谈起过他的退休,还是在没有颁发给我列宁奖金的时候,还是在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赫鲁晓夫的浪峰上的时候。每一次,尤其是今天,我都起劲地使他相信:《新世界》保持了文化传统。《新世界》是现代性惟一的忠实见证。每一期有二三篇好文章,哪怕是只有一篇也会使一切得到补偿,例如像利哈乔夫写的《文学的未来》。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马上心情愉快了,精神振奋了,满意地谈起了利哈乔夫的论文。

他说:"我不能在列凯姆楚克的统治面前低三下四。我尽最大的努力坚持了,现在我有些支持不住了,我要垮了。我快被打垮了。"

我说:"您还要坚持住,还没有被打垮。为什么您要送给他们一块蛋糕呢——自愿下台?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件肮脏的工作吧。"

我们谈定:如果他们不触动拉克申、希德洛夫、康德拉托

维奇，他就坚持住；如果撤掉这几个人他就离开。告别时我对他说：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一般地说，如果他们迫使我采取某些过激的步骤，您不必介意。您可以回答他们说：您并没有拿脑袋替我担保，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

我又去见了拉克申，为的是缓冲一下：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请求您尽最大努力说服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不要太发火……"

拉克申透过度数不深的眼镜直盯盯地望着我，点了点头。

不，他不会去说服。他，面临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薄弱点。难道在这样的时刻他会逆着怒发冲冠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吗？我不是针对他，我不是他的同盟者。

第二天，比原来迟一周，打击终于来了！书记处宣布了决定。

我也毫不动摇地进行了一次还击，把公开信发了出去。

鲍利斯·莫扎耶夫（这些天和《新世界》处于危难的时日里他表现极好），以其乌什库尼克[1]的自由风格，在这些年里已经习惯了寻求变通的出路，他紧紧抱住我不放，告诉我："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干吗要砍断缆绳呢？把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处的决定形式上上诉到苏联作协，到苏联作协去要求审理岂不更好？"

"不，鲍利斯，现在就是火车头来拉也不能拉住我了。"

---

① 乌什库尼克，14世纪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和商人装备的民团成员，乘乌什库船在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抢劫、经商。——译者注

他笑着说：

“你像一个好斗的波兰小贵族，就是想吵架。”

在我看来这是纯粹俄罗斯人的心态。大喝一声，然后跑掉！在这样的时刻只能自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优秀儿子。我难道是勇士吗？我是一个十足的懦夫：写好了《古拉格群岛》，我一声不吭，对现代劳改营我了如指掌，我还是一声不吭。发生了捷克事件，我依然缄默……

信寄出之后，心神马上安定了。虽然这一天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有两个跟踪者尾随在我的后面，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跟踪我到城外，到罗斯特洛波维奇提供给我的良好栖息地。我觉得我已经隐藏在此地了，谁也不知道，我哪儿也不去，也不打电话。就让我的信在外间喧嚣吧，而这里可以摆脱一切，宁静，收音机特别清晰，可以收集对我的信的反应，安排自己的一切。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不记得这一生中有谁赠送给我的礼物是能够超过罗斯特洛波维奇提供给我的住所的。还是在去年即1968年时他就约我去，我担心使他感到不方便。而现在这里万籁俱寂，树木清新，繁星点点，很容易感到自己是坚强的，是稳如泰山的。

我仍心存一线希望，既然我“没有抱怨西方”，既然特瓦尔多夫斯基同书记处的人“不能共事”，那么会不会突然对我的信采取良好的态度呢？最好能打开理解的真正通道！

但是我想从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里要求的东西太多了！在自己的重建、发展、接受和理解中他早已把秋千荡到了极限，而我的信，那封对神圣的阶级斗争表示粗暴态度的信，那封宣布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已患“重病”的信，以实际的重量用力地把他拉向低处、拉向后退。

编辑部里乱成一团，摔椅子，大喊大叫："卖国贼！""这下子可毁了！"（指《新世界》毁了……）当然了，把他找来！！当然是找不到我，而且"谁也不知道"我在那里。特瓦尔多夫斯基急忙打电话给维罗尼卡·图尔金娜，对她也讲了一大堆侮辱性的话。她静静地听着，并且顶嘴说：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写的全是真实情况啊！"

"不对！"他对着话筒吼叫，"这是反苏传单！这是谎言！我会向上级报告的！！"

昨天还准备离开《新世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不准备离开了，他还要像老母鸡一样扎煞一下翅膀，希望保护一下自己的小鸡雏不被老鹰吃掉。有人间接打来电话到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别墅找到了我：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处境困难！要求见到我，准备等我到深夜。

难道我的处境轻松吗？如果我去了，我们再对骂一阵，谁会轻松呢？反正信已经发出了。我不会拒绝他。而且我也不是救护队。我被安全委员会追得东躲西藏。我不愿意到莫斯科去显魂，把尾巴引到这儿来。

我没有去。

几天后，当他怒气已消时我给他写了一封措词缓和的信：

……现在已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您不幸地度过了大部分您文学生涯的时代了，所以需要另外一些技巧。我的技巧是流放的技巧、劳改营的技巧。我毫不做作地对您说，我更多的不是属于和依赖于俄罗斯文学，而是属于和依赖于俄国的流放，我在流放地受到教育，并且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当我决定

重要的生活上的问题时，我首先是谛听我流放的同志们的声音，一些人已经死去，因病或被处决，我忠诚地倾听，看他们处在我的地位该怎样去做……

……我以这封信表明：1，我将抵抗到最后一息，如我所说的"献出生命"绝非戏言；对于接下来的任何打击我都予以还击，而且可能还击得更猛烈。所以，如果他们明智，就会提防一些，是否还要继续迫害我。在这样的立场下我可以自卫，而不必去考虑"文学界"的立场如何。2，我在利用时不再来的机会：我已不受章程和术语之类的约束，可以自由行动，我还有权和他们打交道，而作协书记处是很合适的对象。3，这一生我都感受到我是从下跪的状态逐渐直起腿来，我是由被迫缄默到逐渐自由自在地说话的。例如致代表大会的信，还有现在的这封信，都是巨大的享受的时刻，是心灵解放的时刻……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逐渐态度缓和了。秋千荡着他向后，然后又重新向前荡去。他叹了一口气说："是的，他有权这样写：当我们坐在编辑部里的时候，要知道他是在劳改营里呢。"

我们有3个月没有见面了，这也是儿童游戏。有一部分向我祝贺生日和祝贺新年的信件寄到了编辑部。他吩咐不要转寄给我，我请求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从他那儿把信取来，他不给："不一定直接来见我本人，但是他应当亲自来取信。"为什么要亲自去？是因为他想同我和解。……

由于埋头写作《1917年的革命》，我忽略了，没有从远处发现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新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感受是准确的：迫害不是插曲，它是有计划的行动。

《播种》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未完成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这是一部招致不幸的、当局和公众都不接受的作品，是诗作者晚年的骄傲和痛苦。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震惊、沮丧、压抑，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没有向外寄送过，甚至没有散发过！

1970年1月，上面开始不断地打搅他，要求作出解释、发出抗议和否认，像一个诚实的苏联作家所做的那样，他当然不会反对这样做，但是单纯的否认当局已经感到不够了，他们甚至不想刊登否认的声明，他们需要摧毁不共戴天的杂志！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地位由于这一过错而被削弱了，因为他的长诗竟成了敌人手中的武器！又像去年春天那样，建议他撤换编辑委员会，撤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成员！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数不胜数的作家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某个奥甫恰连科（这是一只善于追踪的狡猾的狼，只不过姓氏是有点羊的味道[①]）作了发言，并且说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富农诗人。沃伦科夫每天每日像上班一样把这位诗人召去个别谈话，而心情压抑的、驯顺的、怀有负罪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要应召前去。而且还建议把这位奥甫恰连科吸收到编辑部里来……

现在，在临近结束之前，特别使人痛苦地表现出来的是这家自由主义的杂志[②]的内部构成也是官吏式的，和产生这个

---

① 奥甫恰连科这个姓的词根有羊舍、牧羊……的含义。该人为前苏联文艺批评家。
——译者注

② 拉克申根据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很是恼火："我们的杂志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也就是说相当左倾的。不论怎样反常，他是一个《十月》杂志派分子，但不是强盗式的柯切托夫的人，而是革命前俄国的术语的含义：他们希望这个制度要存在下去，只是要遵循自己的结构。——作者原注

杂志的整个体制是一样的：生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特瓦尔多夫斯基也需要在自己的机关内部把自己相信的人员（编辑委员会）同其他人区别开来。而《新世界》里的“其他人”也不是平庸之辈：这里没有为金钱而工作的无所谓的工作人员，这里每一个普通的编辑、校对员、打字员都与整个杂志方向的利益休戚相关。但是，在美好的日子里主编及其亲信们并不同这些其他人分享功绩，同样，现在在苦难的时刻这些人也根本不考虑事情的进展如何，总不能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朋友们！我和你们共事达 12 年之久，我不想让大家表决，但是我很想了解你们是怎样考虑的：如果编委会有几个成员被撤掉了，我们所有的人是都留下来工作，还是不留下来？我们是不是坚持下去？我，是退休？还是等待他们把我撤掉？”不，不能这样做！特瓦尔多夫斯基心不在焉地向别人还礼，一声不响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编委会的成员们也都聚集在那里，他们关起门来一连几个小时讨论各种新闻、各类计划，都说不要扩散出去！而普通的编辑们，所有的妇女们，他们的个人命运还没有决定，他们也为杂志的命运担忧，这些人集合在秘书室里，透过门偷听说话的声音，捕捉住只言片语，并且加以议论。

2 月 10 日，撤换拉克申、康德拉托维奇和维诺格拉多夫一事已经决定，这时我来到这个嘈杂的地方。所有的安乐椅上都堆放着作家们的大衣，所有的走廊里都是一群群作家。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自己办公室里，冷静地、愁肠百

结地坐在那里，完全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①。这是 11 月的风暴之后我们的第一次会见。我们握手、亲吻。我前来说服他，我说包括他在内编辑部里还剩下了 4 名成员，可以在编辑部内继续斗争，再过两三个月才会准备新的各期杂志，到那时才需要签发令人讨厌的新的杂志，那时候就可以走掉了。他回答我说：

"一连串的屈辱已经使我疲倦了。还要同他们坐在一张桌旁，正正经经地谈话……派来的一些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不知道他们是深黑发还是淡黄发。"

（还要糟些：他们甚至根本不是作家。委派了一些没有握过笔杆的人来领导文学杂志。特里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是我处在那个地位上，我早就离开了……）

"怎么可以自己申请退下来呢，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基督教的世界观禁止自杀，党的意识形态禁止退休！"

"您不了解党内的规矩：让我申请，我就申请。"

这一天，大家都在等待明天出版的《文学报》将会刊登什么。传来各种各样的情况：一会儿说要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反驳的信，一会儿又说不会印行，一会儿说会有歪曲事实的说法（说他同意编辑部的人事变动），一会儿又说没有这么回事。

如果不搞鬼，《文学报》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第二天，当然有歪曲事实的说法，也不可逆转地宣布了撤消 4 位编辑部成员的决定，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他已经等了很久，希望见报，但是这封信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光荣：

---

① 无所事事，如果说做了些事，就是他一直使劲吸烟，一支接一支，是那种劣质的劲儿很大的烟。——作者原注

"……我的长诗……绝对以我不知晓的途径在流亡杂志《播种》上发表，……这显然是违背我本人的意愿……进行了歪曲……这一行动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地说谎……挑衅性的标题……似乎长诗在苏联被禁。"难道没有被禁吗？

超过了屈辱的限度、坚韧的限度，2月11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下了"我请求解除我的工作"，这是许多年来一直迫使他做的事……

12日我又来到编辑部。一切已完全变了样：编辑部不再是等待厄运降临，作家不再试图去战斗。人们在擦桌子。许多作者蜂涌而至，讨回了自己的手稿（后来有人又送了回来）。有些手稿扔进了纸篓、塞进了麻袋，地板上全是些碎纸片。好像是编辑部遭到大规模逮捕，或者是流放、撤退。到处都有人拿着伏特加酒，作者们和编辑们喝上一杯散伙酒。然而，和往常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里是不允许作家们涉足的。有几位作家拿着伏特加酒和香肠来到拉克申的办公室，希望请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干一杯，但是拉克申代表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示歉意并且拒绝了。看来卸任的主编以非党性原则的身份出现在不满的作者当中是不得体的。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仍是他一个人，但是他站在四敞大开的书橱前，也在整理书稿文件。他说，由于提交了声明，他感到很轻松。我表示同意：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但是在昨天的信里有个句子（只有一句就好了！）好像说禁止这部长诗发表？

他激烈地反驳，甚至为我分析能力差而叹息：

"这是您不理解！这是很微妙的一句话。正因为有了这句话，他们才不想刊登我的信！要知道我是向全苏联宣布了

有这样一部长诗，它迟迟未能出版。”

我没有再劝说，回避了紧张气氛。

他提起了即将到来的60岁生日。他算出领导《新世界》前后两次总共16年，任何一本俄国杂志的存在时间没有超出过10年。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您完全可以写到70岁！”我安慰他说。

“莫里亚克[1] 85岁了，还写作呢！”他斜眼看了看我，又说：“蒲宁一生中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再没有夸奖过别人，可是他夸奖过莫里亚克。”

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担心地问：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大人物无所谓，像拉克申、康德拉托维奇已经给安排了职位，还会赚钱的。小人物可怎么办？”

“是说维诺格拉多夫吗？他的安排会更好。”

“不，我是说机关里的其他人。”

他没有听清，没有听懂！不懂得什么是机关里的其他人，他们还有20多人呢……

“作者们吗？他们不会再在《新世界》刊登作品了。”

次日，他开始在三层楼房的所有房间里巡视，这些地方他从来没有去过，他是来告别的，他饱含热泪，激动万分，而且深受感动，对所有的人都说些善意的话，拥抱他们……可是为什么过去他从未召集过这20几个人呢？为什么人们今天不再

---

① 弗朗西斯·莫里亚克（1885—1970年），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主要代表作有《和麻疯病人亲吻》《蝮蛇结》等。——译者注

斗争了呢，而是如此动人地、如此悲剧般地和悲哀地投降了呢？[1]

后来，编委会的成员们在拉克申宽敞的办公室里喝了些酒，稍坐了一会，又散去了。还有少数的人在这最后的一天里仍然不愿意就此散伙。每人凑了一个卢布，有的一般的作者也加入了，又买了葡萄酒和下酒菜，而且想出来一个办法：走，我们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公室去。天色已晚，点起了灯，摆好了盘子、杯子，在他们很少来，尤其很少一起来的地方纷纷落座。谁也没有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座位上坐，在那里摆了一杯酒："我们原谅他的不公正的迫害！……"

第二天，人们都在等待新主编的到来。但是没有新主编，这又是苏联式的作法！卡在机关要害部门的公文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发出来。扼杀的速度很快，以小时计，忽然扼杀的手松了，一切都停了下来。作协的书记们一共需要从5个房间里跑到一起做出决定，但是看来最高当局表示同意的电话没有打来，机器就停摆了，办公室的人也全停止了工作，连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在自己的普希金广场上等待判决。这样过去了一些天，过了两个星期。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过，很清楚，很警觉，等着电话铃声，等着派人来撤掉他，但是没有人打电话来，也没有派人来。终于他自己打起了电话，但是……沃伦科夫不见了，不来

---

① 我在小说中准备描写萨姆索诺夫与军队告别时，人们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情景。这中间何其相似乃尔。相同的心理的和民族的类型，相同的内在伟力、恢宏和纯洁，还有相同的事实上的无力和落后于时代。还有，在萨姆索诺夫身上自然存在的贵族性（而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是矛盾的）。我于是通过特瓦尔多夫斯基解释萨姆索诺夫，或者反过来通过萨姆索诺夫解释特瓦尔多夫斯基，于是我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解都更加深了。——作者原注

接电话，苏联官僚们的这种技术可谓高超已极：安上两个翅膀飞去，用头撞破屋顶也比绕过秘书通过电话了解清楚一些事要容易：如果这个人还活在世界上，他什么时候能上班？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打电话？有一天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离去，秘书还在（可能是准确地计算这时间！），沃伦科夫亲自打来了电话，用故意装出来的演剧的语调说："怎么，他已经走了？唉，太遗憾了……他大概是生我的气了……可是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事。我全都呈送给了中央委员会。我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没有中央委员会，我什么也不是。"……

我的孤独，应当说并不是孤独，我在卓有成效地创作《1914年8月》。不在作协里我并没有变得软弱，没有杂志出版我的作品我也没有被削弱，正好相反，我变得更加不依附人，更加有力量了：现在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这是最大的力量，没有软弱的同盟者，孤独的人的手更自由些。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孤独充满了十足的悲戚，还有他感受到的叛卖：多年来他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而现在谁也不愿意为他作出一点牺牲：《新世界》的工作人员没有离去，只有少数的作者退却了。"影子编辑部"也和现实的编辑部一样，不停地讨论，这只能更加折磨他、使他的病情更加重。

他的60大寿临近了，重新使我们又有可能和他交流了。我打了一封电报：

"我们亲爱的特里丰诺维奇！祝福您生活自由自在，充满精彩，壮年创作幸福！在频繁的争论和严重分歧中仍忠贞地爱着您并且感谢您的索尔仁尼琴。"

听说收到我的电报他非常高兴，手拿着电报单独待在办公室里好一会儿。他本来可以不回电，受祝贺的人是很困难回答的，但是他拍来了回电：

"谢谢，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谢谢您在我60岁生日时说的亲切的话。尽管我们观点有所不同，我还是始终不渝地对您这样一位艺术家高度评价并且热爱您。您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根据我们关系的速度，再过几个月我们会见面。我写了·封信给我，请他允许我在10月份时把我写完的小说带给他看。我知道这·一定会带给他愉快。

但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了解到他得了癌症(没有告诉他本人)。癌症，所有情绪激怒、悲痛、压抑和受委屈的人都容易得这种病。人们你挤我我挤你地能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会因受辱而死去。我们就有许多人是这样死去的：一次大的社会震动之后再去看，人已经死了。肿瘤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癌细胞--·生都伴着我们每个人，只有当人的精神软弱下来躺倒时，癌细胞才繁殖扩散。尽管克里姆林宫的庸医们犯了许多错误，特瓦尔多夫斯基由于身体强壮还是又活了许多个月，当然是在病榻上。

杀死诗人有许多方法。

杀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方法是夺走了《新世界》杂志。

1971年2月

于儒可夫卡村

补记之三(1973 年 12 月)

诺 贝 尔 奖

"诺贝尔奖"——这不是我的臆想,这是诺贝尔基金会的简写电报地址。诺贝尔奖金的颁奖活动,通常是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或是华丽铺张的演出,一般来说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获诺贝尔文学奖,似喜庆又非喜庆,似痛苦又非痛苦,整整两年我反正是过着慌乱的日子。

无拘无束的国度里,如何对待一位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呢?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呢?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加缪说,他不配获奖;斯坦贝克说,由于自豪,他准备像雄狮那样吼叫;(当然,海明威曾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为领奖这种无足轻重的事而离开,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事在于写作下一本最重要的书。尽管他的这些言词不无卖弄,但也是实话。)

那么,在苏联专制制度的国度里,对于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呢?漫不经心,不予重视,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没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

要想从斯德哥尔摩变化多端的风景了解我们国家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期间谁是真正的作家,这是不可能的。我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是蒲宁,他当时流亡国外,他的作品是在不受书刊检查,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之下发表的,他怎么写就怎么出版。当然,他的获奖除了引起漫骂和轻蔑之外,别无其他。这项制度在苏联不可能受到重视。早已决定了,认为这项奖金无足轻重,不屑一顾,根本不值得在报纸上宣传。而报纸上则大规模宣扬斯大林奖金。突然,从那时起25年以后,瑞典科学院注意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并授予他诺贝尔奖金。可想而知,这件事引起了共产党(赫鲁晓夫)、共青团(谢米恰斯内)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慨。7年以后,又把这个奖金授予了第二个我国作家肖洛霍夫,他的著名作品(只有一部)是在30年代出版的,在蒲宁获诺贝尔奖之前,他的作品就享有崇高的声誉了。而这种匆忙获奖,这种多年延误,各种平缓的形式以及我们官方的满意——恰恰为这第三次获奖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瑞典科学院一向被指责为政治色彩过重,尽管如此,我们的大声叫嚣使得他们不可能采用其他的条件作为评价的标准。这种情况,在第四次得奖时同样又发生了,如果俄国还不猛醒过来,那么第五次也将会如此。

我暂时还找不到强有力的突破口,甚至连微小的突破也不可能。当然,我并不情愿仅在死后才能出版作品,多么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作品能够印刷发行。那时候,即使我死了,也能含笑九泉!当时我在集中营里,这是不可实现的幻想:怎么可能在我活着的时候出版呢?只有拿到国外去。可是,我从集中营出去之后还将被永久流放,自己无法出国,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作品寄出国外。

不过,在流放期间我巧妙地把我在集中营中写的作品装订到肖伯纳的英文剧本的封面里。现在如果什么人把它带到莫斯科,在大街上遇到外国旅游者,把这本书塞到那人手里,那人当然会带出国外,揭去封皮,送到出版社,那里将高兴地出版毫无名气的斯杰潘·赫雷诺夫(我的笔名)的作品,……于是,全世界自然都会关心这一事件,全世界将会惊异,将会愤怒。我们的人会心惊胆战,最后不得不把古拉格群岛撤消。

然而,没有这样可以委托的人,有谁会把我的作品带到莫斯科去呢?! 那些年代,我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莫斯科人也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做客。

1958年我正在梁赞当中学教员,我是多么羡慕帕斯捷尔纳克呀! 于是,我把实现考虑许久的方案寄托在他的身上了。他一定能够完成我这件事! 因为他会立刻动身去领奖,去发表演说,还会出版那些秘密的、在国内居住时不敢冒险发表的作品! 显然他出国的时间不会是三天两天的,显然不能让他回国,不过,就在那个时候他会出乎全世界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会回国,而且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

我在接受了劳改营的教导之后,真诚地希望帕斯捷尔纳克不会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不会抱有其他目的。我运用自己的目标和尺度衡量了他,结果,我为他感到羞辱,仿佛我自己遭受羞辱一样而痛心:怎么可以惧怕报纸的辱骂呢? 怎么可以在放逐的威胁之下怯懦,低三下四地恳求政府原谅? 张口结舌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迷惘",承认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观点"? 他怎么能仅仅为了不被放逐,而背弃自己原本的思想,自己的精神呢? 还有什么"光荣的今天","我

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骄傲!"当然还有"坚信光明的未来"——这些话不是外省大学的教授们信口开河,而是我们的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向全世界讲的话。我严厉地斥责他,决不宽恕。

我愈加明确地认识、思索,为了争得未来的出路,我需要获得诺贝尔奖!把它当作捍卫立场、进行战斗的阶梯!我愈是及早能够获得这个奖金,愈是更加坚定,我也就能够更有力地打击他们!那时候,我将在各个方面争取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反的作法:我坚决接受奖金、坚决去领取、发表无比强硬的演说。这意味着,他们将堵塞我回国的道路,但是,我可以出版全部作品!说出我全部要说的话!

自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为赫鲁晓夫政策的强烈影响而轰动全世界的时候起,使我与诺贝尔奖金接近了一些,虽不能说大大地接近了。凭着臆想,意图与预感在一起交织,我不知为什么相信并期待着这个奖金,它必然会落到我的头上。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拒绝接受奖金以及不久以后的猝死,关闭了下一个俄国作家获奖的道路:因为如果奖金给俄国作家带来死亡的话,那么,怎么还能向他们颁发这个奖金呢?……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一直在进行创作,可是不能出版,他们会杀头的。秘密保存这些作品愈来愈困难,白白地把作品积压着,这也令人愈来愈感到屈辱,可是一个地下作家又有什么其他出路呢?……

好像是一种嘲笑,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阿·库兹涅佐夫逃到西方去了。我们是在皮涅加河畔从收音机里得知的消息。上层人士惊慌失措,而他则心花怒放,他也许在想,立刻会扭

转乾坤,可是逃跑者想错了。如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受了委屈,可以原谅,那么对待作家就不同了。人们会说,你这么做还算得上是我们的作家吗?

至于政府对我是怎样考虑的呢?我相信,他们同我估计的一样:我在这里,如同在笼子里一样,对他们的危险不特别大,他们随时可以把我关起来。如果我从这里出去,对他们来说那就太可怕了,我将会把他们掩盖了半个世纪的一切立刻揭开(在刀子还没有插进我的肋骨、在没有毒死我、没有枪毙我、没有从火车上把我扔下去之前,我来得及做的话)!

在斯大林时期是这样理解的:把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更加牢固地束缚住。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最近几年,某些新的潮流甚至也冲击着他们愚笨迟钝的头脑: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被捕坐牢,在国际上掀起了苏联当局未曾预料的轩然大波,而塔尔西斯被放逐国外,立刻一切风平浪静,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至于我,与塔尔西斯不同,当局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焦米切夫在与不同的作家频频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曾说过:

"我们要把索尔仁尼琴放逐到国外去,让他投靠他的主子们去吧!当他看到资本主义的天堂之后,他会自己匍匐着爬回来找我们的!"

人们把这番话告诉我,我并没有重视,我以为这是宣传鼓动惯用的手法。突然,在我给作家协会书记处提出侮辱性言词之后的10天,即1969年11月25日晚,我收听"美国之音"时听到:"作家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

他们在另一家报纸上对我还有一个暗示。还有一家报纸,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反响。"让索尔仁尼琴把写字台摆到挪

威来!"那些天,我沉浸在这些感受之中。第二个祖国主动在召唤,她张开双手欢迎。北欧,那里的冬季与俄罗斯一样,农民家的装潢、木制器皿与俄罗斯一样。

休止了。最高当局开始缄默不语。我也不作声了。

公开的言论已经平息了。我的秋季危机似乎已经度过,时间拖延着。逐渐地产生了外部与内在的平衡,我急忙赶写《1914年8月》。1970年,那一年,如果在夏初不发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的不幸事件的话,我会无比安静,连哼都不哼一声地默默写作。把麦德维杰夫送进精神病院这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来说远比捷克事件更加危险和更加重要,这是套在我们喉咙上的绳索。于是我决定笔战。

……

1969年11月,人们责怪我对待作家协会的批评所做的回答过于匆忙,急不可耐,责怪我影响了其他作家兄弟们和社会各界对我的袒护,说我口出不逊吓坏了别人。现在,为了不致由于我的激烈言词而使麦德维杰夫遭受灭顶之灾,我克制住自己,我沉住气,给那些院士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只是到了6月中旬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天我才把写的信发出去。就若列斯·麦德维杰夫事件而言,我的信也许是多余的了,因为没有这封信,政府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但是,关于精神病院的事,我粗略地提了一下,总归还是使某些人心惊胆战。

由于这封信他们不可能宽恕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在6月份他们已经决定把我驱逐出境。地位显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好像和信徒一样正好12个人),他们准备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把索尔仁尼琴这个坏蛋从我们神圣的祖国驱逐出去。这倒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只

是为事件的进程增添了官方形式。马尔科夫，还有沃伦科夫这一搭档也毫不拖延，他们把请愿书立即交给《文学报》，还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作出了关于剥夺我苏联国籍的决议。

然而，重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机器运转失灵了，插销在什么地方卡住不好使了。我想是这个原因：与麦德维杰夫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过于明显，不便由于这一理由驱逐我，再推迟两三个月，也许我还将会犯一些什么错误呢……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愿天国赐他幸福）开始为我奔走，准备推荐我作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于是我们的当局重又慌乱起来，如果现在放逐我，那么意味着是对莫里亚克的答复，这不明智；如果先让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发给我，然后以这作为借口再放逐我，这也不明智。他们暗中预谋：首先抵制得奖，尔后再放逐。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恰好我正在赶写完《1914 年 8 月》这部作品）

抵制获奖——我们善于这样做。召开一个重要作家委员会（以康士坦丁·西蒙诺夫为首，他是一个有多种面貌的复杂人物——他既是一个受迫害的、光明磊落的自由分子，又是一个面面俱到的、颇受尊敬的保守分子）。委员会必须到斯德哥尔摩去，以苏联的立场指责瑞典舆论界，告诫他们不应为世界反动的黑暗势力效劳（在西方任何人都不支持这些论点）。为了节省出差费，规定委员会成员恰好在 10 月 10 日准时到达。可是瑞典科学院提前两周就宣布了，不是在第四周的星期四，而是在第二周的星期四！啊哈！我们的人气极败坏，大喊大叫！……

1970 年是我需要诺贝尔奖金帮助解脱困境的最后一年。

再往后我就不借助于它而开始战斗了。

诺贝尔奖金竟仿佛是令人愉快的雪花飘落到我的头上了！这时距离我结束《1914 年 8 月》还有两个星期！……后来我勉勉强强才把它赶写完……

奖金！获得奖金，这是成功，但实际上为时尚早：因为我的作品中当时问世的只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和删减过的《第一圈》，而其余的作品还都保存未发呢！现在嘛，我可以借助这个高潮，把写好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地推出去，它们是《古拉格群岛》（三卷）《第一圈》（96 章）《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坦克了解真情》，以及劳改营长诗……

奖金授予了，它提醒我不能再犯 1962 年的错误，那一次我的行动迟缓，不敢公开，如今，无论如何不能再重蹈复辙。

得奖的消息是向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别墅打来的电话，我们才知道的。打电话的人是挪威人，他叫佩尔·艾基尔·黑格，他的俄语讲是非常好，在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记者中是少见的。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到了我的住宅的电话号码，并且向我提出问题：他问我是否接受诺贝尔奖金？是否到斯德哥尔摩去？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去拿铅笔和纸，他可能想像我惊慌失措了。我暗自盘算：一周之内无论如何我不做出反应，看一看我们的当局如何吼叫，从什么地方下手。但是记者的电话铃打断了我的思绪。沉默、回避——这已经像是滑到灭亡的小路上去了。我按照原来的想法是：我绝不会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一切恰好相反，我该满怀信心地宣布：是的，我接受奖金！是的，我一定要去领奖！这一切完全应由我自己作主！我还要补充说明：我的健康情况极好，不会妨碍这次旅行！

那一瞬间，我丝毫没有怀疑，我一定要去！

后来我给瑞典科学院发了一封回电，电文是："我认为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俄国作家，是对俄国文学（当然不是苏联文学）和我们痛苦的历史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一些出人意料的打击落到我的头上了。尽管力图切断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消息仍然流传得十分活跃：通过间接的途径传到我这里：有的人攻击我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我奖金的。（而我，如果没有痛苦的历史，也就不需要得奖了！在轻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够做好一切的！）后来又通过两个间接途径询问同一个问题：在我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是否需要躲避一下来自周围的骚扰？瑞典科学院和基金会也担心一些极左的大学生会举行旨在反对我的示威，因此他们问我是否不下榻在其他获奖者逗留的大旅馆里，而是到一个僻静的寓所躲避一下？

对于这些小道来的问题我没作任何回答，于是他们开始通过正常的邮政途径，诺贝尔基金会打来一封电报："我们尽量为您的停留寻找一个较为安静和隐蔽的住处。"瑞典科学院也寄来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认为：

"您本人一定希望对斯德哥尔摩的访问尽量安静，"他们将竭尽全力以"保障下榻地点的安全。请允许补充说一下：领奖者一般没有必要与新闻界和广播电台等单位接触。"

"尽量安静"？我绝对不需要！"不与新闻界和广播电台接触"？那么难道要我去见鬼不成？

瑞典人的勇气锐减，已经不如当初决定颁发给我奖金时那样理直气壮了。他们害怕闹事，害怕政治。他们是根据文

学颁奖的，当然他们不喜欢政治。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政治”，这是生活本身。

宣布颁奖之后又过了几天，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思想：我现在似乎可以第一次与政府进行平等地谈话了。那么向什么人谈呢？毫不犹豫，决定写信给苏斯洛夫！原因是这样的：1962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特瓦尔多夫斯基把我介绍给赫鲁晓夫，当时政治局的人没有在场，谁也没有走到跟前。但是休息的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我带到休息厅，向我介绍一些他认为应该介绍给我的作家、电影工作者、艺术家。在电影厅里，有一个身材颀长、瘦削、面孔很长但不难看的人向我们走来，他坚定地向我伸出手并且热情地握着。他说，他看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谈了他认为非常有兴趣的内容，他用力地摇动着我的手，好像最亲密的朋友一样。其他人都通报了自己姓氏，惟独他没有。我说，“请问……”陌生人仍旧没有说出姓名，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轻声责备我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我耸了耸肩膀，又问：“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是什么人呢？……”特瓦尔多夫斯基更加生气地责备我说：“他就是苏斯洛夫！！”有什么可责怪的，难道要在眼里和心里经常记住两打以上的领导人的肖像吗？可是我的眼力不好，我没有认出他来。不过，苏斯洛夫并没有因为我不认识他而不高兴。当时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欢迎我？要知道当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在近旁，政治局的任何人都没有看见他，这就是说，不是出于奉承。那么，为什么呢？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吗？他在政治局里是被封闭的自由派分子？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党的重要思想家！……

这个疑团铭记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但是我想，令人费解

的事也许还会发生，我们的道路还会交叉。其实，没有交叉过。而如今，在1970年的10月，把我推向了苏斯洛夫！

然而，写的信却被束之高阁，没有任何回复。

这期间，瑞典人给我寄来了颁发仪式的通知书，上面写着哪一天在哪里举行宴会，在什么场合应穿礼服，扎白色蝴蝶结，在什么场合应穿燕尾服。在宴会上发表演说不得超过3分钟(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喝着的时候，能谈论我们的悲剧吗?)，希望只谈感谢的话。

我的预感不知有多少次破灭，我的坚定的决心无数次成为泡影，但是我终究等到了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出现，可是如何利用它，我却感到茫然。诚然，可以写出并宣读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演说，但是，如果在演讲中害怕说出激烈的言词，那么我去那里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去领奖，是为了使我创作的心灵得到自由，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以准备创作下一部作品。我去领奖，是为了说服、动摇、推动西方吗?

那么，要是留在祖国并且挣扎到最后呢? 任凭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后来，我想出一个做法：把颁奖时我要说的话录下音来，把录音带寄去，让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听去吧，我在这里。这样做有力量！这比什么都更有力量！

可是在这紧张的一个半月里(家庭琐事也很多)，我还没有能够把讲演稿写好。

……

我们的当局希望我出国，他们正窥伺时机！莫斯科州委书记，以及紧跟在他后面的那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叫喊着：

“索尔仁尼琴先生为什么迄今为止不提出出国申请呢?”

那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正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当人们告诉他我的情况时,他也很为我焦虑,他反复考虑:怎样才能既不出国又能领到奖金呢?他躺在床上,言语不清,右手不能动弹,但是他能够听、读,一直注意观察着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过程。当他恢复言语能力时,他对护士们说,甚至是喊叫: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胜利啊!”

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一直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每天早晨都修改一遍,什么地方修改一个词,什么地方更动一个逗点。我已经选好了最佳日子,比如说在诺贝尔奖金颁发前的两个星期。尽管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国家态度强硬,而内里呢,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自始至终我都坚持一点:置他们于不顾,我故意不理睬他们,我独自决定,宣布说我将要出国领奖,他们并没有来说服我;此刻我又独自决定、宣布说我不去了,我和盘托出了我们警察局的丑恶秘密,于是他们重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再也不会劝说我了。

这封信我该怎样寄出去呢?邮局会扣留的。应该亲自送到瑞典大使馆去,并且与他们谈妥,让他们在莫斯科向我颁发奖状和奖章。我有一个思想:集合50余位莫斯科著名的知识分子,我在那里发表激烈的演说!而且从那里发表演说,将会更加有力,作用会更大!

可是怎样才能进人大使馆呢?万幸的是在瑞典大使馆门前没有民警站岗!那些天瑞典大使亚林格恰好回到了莫斯科。

亚林格大使矜持、果断、身材颀长、面色黝黑(不大像瑞典人吗?),他接待我时颇有些拘谨。我却自如地坐在大使的安

乐椅上,手里拿着我的信,但是没有让他展读,我说:

"现在我给瑞典科学院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有关我去领奖的问题,我深怕这封信会被邮局扣留,而他们现在应该知道我的决定。您能否替我转交?"

大使谙知俄语,可是还是经过翻译——文化专员伦德斯特列姆向我提出问题:

"您是怎么决定的?"

"不去。"

立刻现出满意的神情。他镇静多了。

"明天早晨,信就会到斯德哥尔摩的。"

就是说,信由外交信使带走。很好。我把自传也一起寄去。那么奖状和奖章怎么办?能否在瑞典大使馆举办颁奖仪式呢?

"不能!这样做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可是,要知道,我的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过先例呀!亚林格先生,请您不要推测,还是让科学院去考虑吧!"

亚林格坚定地回答说:或是邮寄,或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就像此刻这样我们亲自交给您,无其他人在场。

不让我发表演讲?那么我就不要了,让奖状和奖章留在科学院吧!

我在那里时没有让他读信,把信留下了,在取得许诺之后我离开了使馆。

瑞典科学院给我打来电报,他们只希望在宴会上宣读我的信,我觉得太晚了,我应尽早让世人明白:我不去领奖。后来又接到科学院的第二封电报,表示抱歉、遗憾,他们问我是否还要寄什么东西以便供宴会时使用?

怎么邮寄呢？还是得通过瑞典大使馆。上一次我担心受阻，没有打电话径直去了。现在手里有了电话号码。

“喂，您是伦德斯特列姆先生吗？……我收到瑞典科学院两封电报，很希望和您交谈……”

可怜的伦德斯特列姆双手明显发抖。他在莫斯科担任外交官员已有14年之久，他一向沉着稳重，与各方面保持较好的联系，可是此刻他竟在我这个劳改营分子的压力之下，冒着断送仕途的危险，他难以拒绝我的要求。他一面擦着汗，一面神经质地吸着烟，他的体态、声音、言语都充满歉意，他说：

“索尔仁尼琴先生，如果您允许，我想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过我必须以外交家的身份……您的贺词里包含着政治内容……”

“政治内容？哪一些？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惊讶。

“这一句，这一句。”他用指头指点着我的贺词中的最后一句话。

“这并不特指哪一个国家，也没有指哪一国家的哪个组织！世界人权宣言纪念日并不是政治性的措施，而是纯道德的。”

“可是这种话……不适合颁奖仪式的传统。”

“如果我亲自出席的话，我一定要讲这一句话。”

“当然，如果您能出席，那么自然会讲的了。可是您不出席，主持人有可能不同意这句话……也许，他们要请示国王的。”

“让他们请示去吧！”

“那么您从邮局寄去吧！”

“晚了，赶不上宴会了。”

“打电报吧！”

“不行，会泄密的，而对方希望保守秘密。”

他左右为难，大约迟疑了15分钟，终于带着几分歉意收下了我给大使馆的申请书(关于致送贺词的)。他说，也许不一定办到。他又说，这是最后一次，至于转交在诺贝尔奖金颁奖会上的演说词一事，他无论如何难以从命……

我无动于衷地把贺词留下就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牺牲了周末，自费去芬兰，从那里把邮件发走的。

瞧，他是欧洲人的性格：不轻易许诺，但是他所做的要比他承诺的多许多。

颁发诺贝尔奖金的晚上，是我的绝非寻常的时刻。我和几位亲密的朋友是这样度过的：我们大家一起坐在罗斯特洛波维奇别墅的阁楼上，餐桌古老，油漆已经脱落，桌上摆着奇形怪状的酒杯，枝形烛台上插着蜡烛，我们不时地听着各个电台播送的有关诺贝尔奖金颁奖的消息。终于听到颁奖仪式的宴会上演说词，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删去了我的最后一句话。我想等候最后新闻节目时再听一次重播，但是，没有那句话！

哼！他们不知道俄国的“地下出版物”的实力，明天清早印着我的宴会贺词的全文就会传向四面八方。

又掀起了攻击的浪潮：“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继续留在这里危害社会，千方百计破坏苏联政权！”不过这一次报纸舆论没有掀起更猛烈的高潮。

我企图找到某种和平途径，这种企图失败了。诺贝尔奖金曾威胁过我，把我闹得底儿翻上，把我抛向异国他乡或是埋葬在土层下面，这种危机在经过微弱的恐吓之后已经平息了。

一切都依然如故，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

我一生中不止一次走近深渊，而结果原来是个小水沟。最大的山隘或者最大的深渊都还在前面。

1971年2月，正值《新世界》杂志被击溃一年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从克里姆林宫医院出院，由于治疗不当，他患了射线病致残。我和罗斯特洛波维奇一起去探望他。

我们本以为我们去时他正躺在床上，而他却坐在安乐椅上，他是专门为我们来而这样做的吗？他身穿紫罗兰色和绿色相间的条布住院服和裤子，盖着毛毯。我俯下身子想去吻他，可是他却自己想站起身来，他身边的女儿和女婿从两侧扶他站起，他的右侧身子不好使，右手浮肿严重。

"我—老—了，"他清晰地说着。

他的夫人把他的全集第5卷（最后一卷）递给了我，我说我记得正是在这一卷里记载着他坚持写我的一些段落，绝不让步（我没有问他现在大概全都让步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点头、理解、赞同。然后我拿出已经装订好的《1914年8月》的打字稿本给他看，我不由自主地减低语速、简化词句，对他像对小孩子一样指出并讲解着，这只是整部大型作品的一部分，而且还附有地图。

……三个月以后，5月底我再一次去看他，令我惊奇的是他的状况大为好转。他的左脚左手都很灵活（左手可以拿着点好的烟），面部表情也很自如，几乎与从前一样，最主要的是他的语言流畅，多半是谈我的书的事（读过了！明白了！），"好极了！"有时还用头的动作、眼神以及哼哼声音来加强他的语意。

就在这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对他仍有所隐瞒,正如过去也经常这样,我没有告诉他再过两周《古拉格群岛》一书将在巴黎出版。

1971 年 12 月举行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

毗邻的各条街道被大批民警阻拦。至于在墓地,军队(诗人的葬礼!)则用喇叭筒对驶向墓地的大小汽车发号施令,非常令人厌恶。在文学家中央俱乐部的前厅门前也设有岗哨,但是他们没有敢阻拦我(后来也许后悔了!)。死者头下枕着一块不伦不类的红绸(他死后的最初时刻他的脸上现出了童年时代善良的、温和的表情,使他变得好看多了),他的身躯占据了整个棺材、作协书记处的人们凶恶的和呆板的嘴脸、虚伪的话语——这一切都促使我要为诗人辩护,为他鸣不平。

为了不给家庭带来灾难,我决定不在那一天晚上把我写的悼词交给"地下出版物",而是一直等到第九天,他的祭日那天才发表了悼文。

遭 遇 战

遭遇战在战术中与进攻战和防御战不同，交战双方或进攻或处于行军状态时，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意图而突然交火。这种未经计划的战役被认为是最复杂的：它要求军事长官指挥更迅速、更机敏、更果决，而且手中要有预备队。

……

在罗斯特洛波维奇别墅居住逐渐受到了损害。罗斯特洛波维奇同我邂逅相遇，马上就盛情勃发提供给我住所，当时他还没有经验，还不能想像对他施加的压力将是如何长久和令人不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写出了公开信，又经过大约一年时间我曾颇有成效的抗击政府的数不胜数的侵害，终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变得疲惫和衰弱了，这是发生在长期的毫无希望获救的围困面前，在丢掉莫斯科大剧院心爱的指挥权的威胁之下，在禁止他在莫斯科举行最好的音乐会的压力下，在停止了他已习惯的出国旅行之后（过去半辈子他是常常出国的）。产生出一个问题来：为了让另一位艺术家成长，而让一位艺术家枯萎，这是否正确？

从警察方面我的生活也受到了损害，已经不只是文化部渴望消除这块污点了。而且所有的高层人士都把我看作是肉中刺，因为我住在他们的禁区，舒适的有特权的专门的禁区里。根据苏联法律把我赶出这里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在政府禁区里有24小时也就足够了。但是我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名字连接在一起，这两个名字使他们欲行又止。有过几次尝试，在获诺贝尔奖金之前民警局的大尉就来造访过，我说我在这里做客，他也就没有再纠缠。

1971年的3月，不知为什么这一天我文思犹如泉涌。这是一年里难得有的幸福的日子，这时思绪万千难以抑止，各种题目，原先没有想到的方面全都呈现开来，只要把它们记下来，哪怕是不完整，哪怕是写在任何草稿纸上，然后再加工。现在需要捕捉住它们。在这种美不胜收的状态下我去滑雪，滑雪时又把一些思想写到了本上。回来之后阿尼契科娃喊我到别墅的二层楼上去。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请来一下，民警局来人让您搬走！”

这件事我等待了很久，已经不再等待了。虽然为了应付这件事我准备了一份材料，放在一个蓝信封里，装在一个防火的小匣里。难道他们真的敢在24次党代表大会以前采取行动吗？还是他们不懂得将会引出什么样的乱子？

他们来了三个人，大尉，以及比大尉头衔更高的人。逐渐弄清了其中主要的一位叫阿诺索夫，是莫斯科州公民证登记科科长，人很机灵，富于幽默感，他们也是有些人才的。处于幸福轻松的状态之中我愉快自由地同他们攀谈起来，所向无敌的样子，毫不拘束，而且言词得体。

我到我住的厢房里去取来了证件，一共用了5分钟时间……不，不，看来今天他们不会赶走我，他们只是对我施加压力，让我有几天的时间为居留登记的事寝食不安，或者干脆走掉，去梁赞，落入设好的圈套。

很自然。任何一个苏联人，没有高层人士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呢？乖乖地屈服，没有别的出路。但是，上帝保佑，我已经从你们的队伍中走了出来，直起了腰。

一开始我的谈话表现了对他们个人命运的巨大关怀：

"同志们，我请你们做记录。但是要谨慎小心！我非常希望你们不要犯个人的错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会受苦的。我请你们首先到最高层去核实一下，是不是那里已经决定了，要我从这里搬走。不然以后要把责任推到你们头上的。"

一位迟钝的少校说："如果我按照法律行事，而且是在自己管辖的区域里，我不需要去问任何人。"

"唉，少校同志，您服役期还嫌短了些！……你太自以为是了。我的情况非常微妙。"

州科长说："可是我并没有使用暴力啊！"

"你们如果使用暴力那就更糟了！就是最和颜悦色地打交道，也会出大乱子的。"

我讲得信心十足，就好像我马上可以从隔壁房间里把勃列日涅夫唤来一样。有经验的宫廷侍臣明白：要小心，要伪装，我的信心大有来头，于是就退缩了。

对于我来说争取几天的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要通过他们告诉上头，这事情很严重，对此我有充分准备。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别墅是我生活和工作的疆域，要让我们了解我不会平平静静地离开。

在谈话有了新的转折时，我瞪起了有些吓人的囚徒的眼睛，断然宣布：

“让我自己去梁赞吗？不去，我不会去的！法院判决吗？我不服从！除非给我带上镣铐！”

就是这样，我轻松些了，完全轻松了。我不让他们把我淹死在小水洼里，还是到大海里吧！我感到自己年轻、有力，重新投入了战斗。

他们走时客客气气，有些六神无主。出乎预料。

“会出大乱子的！”临别时我像是在表扬他们。

因为下一次，当他们做记录时，我还会同他们玩一些小把戏，我会核实记录中的每一个纰漏，为自己要求记录副本，而当要签字时，我将出其不意地拿出自己的文件并且签上自己的名字，换下他们的记录：

“对强迫我迁出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在莫斯科郊区的住宅遣送我去梁赞——我的居民登记地一事

我所做的回答

农奴制在我国已于1861年废除。十月革命扫除了这种制度的最后残余。因此，我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不是农奴，不是奴隶，也……”

半年后，他们又来了。还是那个阿诺索夫，带了一个穿便服的斜眼人。我见他们时手里拿着蓝信封，把信封放在他们

和我之间。可是阿诺索夫却说了些应酬话，同时顺便提醒说："居民登记问题该怎么办呢？……这样不太好……瞧，已经住了两年(有的地方两天也不成，有的地方莫斯科的居留证也无效，等于零！)"……我也以类似的腔调说：您瞧，只要把家庭的事安排好，就……那您就安排吧，快些安排好！他在催促。可是我就是登记结婚了也仍然不会给我莫斯科的居留证明啊。您说什么呀，按照法律，您必须登记！

为了预防万一，还有另一种说法："要知道我们对于房主罗斯特洛波维奇也可以提出要求。也可以没收他的别墅。"

我提出了要诉诸公开性。

斜眼人说："什么叫公开性？法律就是法律。"

我(斩钉截铁地)说："公开性吗？这就是说根据记录我哪儿也不去，法院也不去，请你们判处我流放好了。"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他们说服我说："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的蓝皮信封没有派上用场。我又在罗斯特洛波维奇这里住了一年半。

离婚之后，我同住在莫斯科的妻子登记之后，我合法地提交了取得莫斯科居住证的申请，于是莫斯科市公民证登记科长阿诺索夫(由州登记科长提升)脸上扮着同样的讨人喜欢的微笑，代表部长向我宣布说："民警局一般地说根本不决定居民证问题"，这一问题由莫斯科市苏维埃所属荣誉退休者协会(全是斯大林主义者)处理：他们审查申请人的政治面貌，看他们有无资格居住在莫斯科，我应当向他们提出申请。

我同样面带最迷人的微笑请求他们给我一个上面的拒绝我申请的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把蓝信封派上用场，只是在

等待具体的时间)。他比我笑得更迷人,像老朋友一样对我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您真是需要一份什么样的材料吗?"

从1973年6月起他们使用了新的推动手段:伪装成暴徒写来匿名信。最初这样写:我们是一帮匪徒,您给我们10万美元,作为交换"我们保障您的安宁和您的家庭不受侵犯",如果表示同意,我应当在中央电报大楼的台阶上出现。第二次,已经不提任何要求,只是公开地威胁:"不会有第三次警告,我们不提供对您的信任,已经不能对您给予任何保障。"他们是在恐吓,好让我为了逃避这些"暴徒"而跑到国外去。

收到第二封来信之后我也采用了新招,把"内部"信件公开地致送安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此类信件中止了。7月初来了第三封信:"狗东西,你终于没有来,现在就只能怨你自己了。我们要给你一点厉害瞧瞧的。"他们什么也没有要求,只是在恐吓:快离开吧,恶棍!

这一年夏天我们过得非常困苦,失去了许多。许多重要的事情吹了。我把孩子们和即将临盆的妻子留在费尔桑诺夫卡村没人保护的别墅里一连许多个礼拜,自己跑到圣诞村去写作。因为在费尔桑诺夫卡村飞机低空飞行,震耳欲聋。是伪装的匪徒还是真正的坏蛋,是故意显示一下,还是真地要攻击,我和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应付一切形式的考验,无所畏惧。

如果回首往事,那么从被捕时起我的一生几乎全是这样度过的:这一周,这一个月、这个季度或者这一年不知为什么不舒适,或者有危险,或者没有时间写作,需要推迟、改变计划。如果我一次、两次、十次地屈服于这种慎重,我将写不出

可以与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相提并论的作品。但是我不停地写作，在石堆上，在住了许多人的简陋棚子里，在没有铅笔的押解途中，在因癌症而濒临死亡的时刻，两堂课之间休息时在流放地的小草房里。我不眠不休，不怕危险，克服阻碍不停地写下去……

那么，除了手稿我还有什么物质财富呢？我还有1200公顷的小小的庄园圣诞村。8月中旬在离开这里参加战斗之前我巡视了所有各处，走遍了它的每一寸土地，我和圣诞村作了最后的诀别。我不想隐瞒：我哭了。伊斯基耶河湾的这块土地、我熟悉的森林和近处的狭长的林中旷地，对于我来说正是俄罗斯的现实体现。过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这样顺利地创作过，以后也不会有了。不论我怎样备受折磨，心潮难平，六神无主和孤独，只要来到这里，接触到这绵芊的绿草、清澈的河水、白桦和垂柳，还有橡木的长椅和小河沟上的桌子，经过两个小时，我就又能够写作了。这是奇迹，这是别处所没有的……

退出战斗时，我一直都注意瞄住敌手：现在他们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我，采取什么步骤？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已经发生的一切，而是可能和应当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是把我写的一切全都倾盆大雨似地发表出来。他们总是对我估计不足，我想就是在他们想像力驰骋的时刻，他们也不能想到我还能写出什么样的危险和有害的东西。现在，他们抓住了《古拉格群岛》，他们应当找寻的是怎样才能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扼制住它，而不是怎样向我复仇。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以下的方式：

1. 捉我的孩子们作人质，当然是让“暴徒”们去干(他们不

了解,会作出超人道的决定:我们的孩子不会比几百万受难者更宝贵。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停止出版这本书)。

2.在西方准备出版这部书的地方抢走手稿,进行强盗式的袭击(他们怎么能够指望掳走所有的书稿呢?怎么能够指望制止其他一些出版商呢?)。

3.从法律上压制出版,公开施加压力说出版违法(我的律师赫勃预见到了这种攻击,已经为我草拟了《全权证书》——专门用于出版《古拉格群岛》,甚至在有什么协定之后)。

4.……

(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且根本不会阻止出版。甚至相反会加速出版……)

5.败坏我个人的声誉(举出刑事的和生活上的理由),以便使人们不相信我提供的情况。

6.恐吓。

7.谈判?

最后一点我画了一个问号,他们的傲慢态度不会允许使谈判降低到政府级水平以下。焦米切夫竟然说:"和索尔仁尼琴谈判?妄想!"(我可是想会等到这一天的。也许对于事情的解决,对他们、对我都迟了。)

我终于写到了"谈判?",结束了猜想,我不相信谈判会实现,我不能想象会谈判,也不愿意: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既没有什么乞求,也不做任何让步。

而且他们会用什么途径和我打交道呢?我早已经使所有可疑分子、中间分子、传闲话的人和甘愿效劳的人没有发挥作用的可能。我和这些人没有共同的熟人。

9月23日我作了以上的7点估计，24日我过去的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就激动万分地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要求见面，话里有话。但是我没有猜到。

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过得很糟。那些年里我向往女人、为自己的书担惊受怕，也担心女共青团员出卖我。经过4年战争和8年监狱生活之后我弄坏了、糟糕了、窒息了自己获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于找到一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托付给她的值得信赖的女人，把全部书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头颅都托付给这个女人。可是从流放地回来之后我屈服了，我又回到过去的女人身边。

现在，经过了17年之后，这个女人又来找我，而且她毫不隐瞒自己就是安全委员会的信使，她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在喀山站站台，合法地从个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进入了我现在写的这本书……

“你同意和某些人会见吗？”

“有什么意义吗？”

“比如，具体地说就是讨论出版《癌病房》的可能性。”

“我感到吃惊。这儿不需要任何会见。俄国的书籍自然由俄国的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这是谈判！他们来谈判了吗？这一下我打得他们很重！超出预想。）

“你去出版社签订合同吗？他们不知道你会突然干出点什么事情来，怕你。应当好好谈谈条件。”

（他们想争取时间！嗅到了《古拉格群岛》，想要让我放慢速度，麻痹我。可是我也需要争取3个月的时间。麻痹他们，对我也很有利。）

“不可能有任何条件：要一字不漏地出版全文。”

“除了出版社之外，还和别人会面吗？”

“这位别人，身穿便装，本来就会坐在主编办公桌旁的。”

"例如,'匪徒们的来信',是吗?"

(她激烈地说)"安全委员会与这些毫不相干!"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迟钝懒惰,我时常犯错误。而她挑衅似地信心十足: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新朋友们!

"你什么时候拿给我一封这样的信看一看!他们不会攻击你,谁也不会触动你!"

"他们把我排挤出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家,不发给我居留证,这该怎么说呢?"

"你不要再在居留证的问题上固执了!他们是不能一下子就发给你的!要慢慢来。"

"又抢走我的书稿……"

"这是他们的功能,要搜寻!"

"搜寻文艺作品吗?"

我只有惊诧,我不再争论。是的,同安全委员会的持久的斗争已经使我疲倦了,要是能休息一下我将非常高兴……我不充当这个角色了,完全不了。

"你宣称主要的作品还没有拿出来,在你死后将要发表,这样你就迫使他们来搜。你在信中说有一篇《坦克了解真情》,现在他们也在搜寻这部作品……"

(可是你从哪里知道他们在搜寻和搜寻什么?你向他们补充了哪些作品的名字?难道这部《牛犊顶橡树》也说了吗?)

"……他们不得不搜寻……"

就是说她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我第一次义愤填膺地说:

"除了你之外,别人谁也不会说出去!……"

"你提出离婚,你就应当预见到一切后果。"

（我早预见到了。所以很久以来你就不了解很多的人和事了。可是过去的熟人呢？）

“但不是预见到卑鄙勾当。”

“别担心，我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

（是的！要尽可能快地出版《古拉格群岛》。不要让他们在黑暗中消灭掉任何一个人。他们需要黑暗，而我要把暗处照亮！）

“……你发表一个声明吧，说全部手稿都在你一个人手里，说你20年什么也不出版。”

（想要达到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为他们在争取，他们非常需要！……）

“如果触动谁，我会立即为被侮辱的人辩护。”

“如果只谈劳改营的事，那么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帮助做什么事……那就不好讲了。”

“我将保护每一个个别的人，立即全力保护！”

（曾几何时我们彼此都很单纯……但是我很早就已经觉察到你是一个演员，不，我不是立刻发现的。可是今天在我生命的主要道路上你在玩弄我，和所有的导演在一起。）

“总而言之，如果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大家都会好些！”

“我自己从来不发起攻击，他们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是一个狂人，自己的孩子们也不可怜……”

另一次又谈到了孩子们：

“也许安全委员会会在孩子身上打些主意吧？”

“是的，现在当然是你们胜利了！可是如果现在就发表《癌病房》，你不会公开声明你取得了胜利吗？”

“永远不会。而且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我几乎已经不需要发表它了。”

（是吗？究竟需要，还是不需要？怎么能够不希望达到最首要的目的：在祖国发表作品呢？可是太反常了，太晚了，已经不值得作出牺牲了。印数是象征性的，为的是宣扬我们出版自由的废话，是吗？卖给莫斯科的知识界吗？这些人的书架上早就有了地下版本。或者是在书店里摆出来？全都是动过大杀大砍的。就是这样的情形，我自己也不喜欢……）

“1967年12月《癌病房》没有刊出，这全是你的过错！”

“为什么??”

“记得吗，你装病，没有去，是派我去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希望你写一封措词婉转的信给报纸。”

“这本书发表后，你将得到一笔钱……但是你必须作出某种保证。你不会把这个建议向记者们宣布吧？有关我们的谈话你会捅出去吗？这次谈话应当严格保密。”

我超乎了他们和她的愿望：

“谈话不会超出这个站台以外。”

（这是一个又长又窄的站台，处于梁赞列车两条专用线之间，我们经过这个站台来来去去，12年了，带着物品、新闻、希望……阳光明媚的10月的早晨在这个长长的站台上，我们边走边谈，被拍入电影，被录了音。我也是在这个站台的范围之内描述这次谈话。）

我了解到了她是怎样努力做对我有利的事情了。她说：

“我寄给某人的一些谈话内容和回忆录的某些个别章节，我认为我已经解释了你的性格、维护了你，减轻了你的不幸……”

她竟敢解释！她从来没有理解过我，从来没有认真听过我的意见，从来也没有预见过我的任何一个行动(现在亦然)，可是竟解释起我来了，秘密警察！

总是这样吗：被刺伤的自尊心要求充分满足？满足得愈充分，观众就愈多吗？自尊心作祟时，大概总是如此。但是追随秘密警察吗？不是每个女人都会这样。

书信频频往还，写光了多少个纸簿？这难道不是我和你吗？他也教我懂得了这个谚语：追随狼的不可能是羊。

"注意，不要轻易接受黑翅膀提供的效劳，这是规矩，它们会忽然飞起来，把你带走的……"

"不必操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在这一条路上她还会为这些主子们做些什么(今天她和我的谈话中并没有迫使我和安全委员会的人进行个别接触，我们将"等待"出版社方面提出的建议，但是谈话中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我不会发起攻势，我不会出版《古拉格群岛》，还证明了我的情绪平和)？不论她将来还会做些什么，我永远都不会自行解脱并且抛出"这是你干的！"这样的话。既然是她，那我也……不论将来被什么样的毒药毒杀，它都是由过去组成的，我自己有错：在监狱里我刺伤了刚刚走进牢房的人的心，我一次也没有仔细观察自己身边的女人。我允许了它慢慢燃烧，并且酿成大火。

我们就是这样在被人轻视的次要领域里即在所谓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

1967年春日我写完这本书的主要部分的文字的时间和我的情绪和我现在结束这部分补记时的情绪有共同之处，也

许就是永远这样了,应当知足,一辈子也写不完。当时和现在我都解开了记忆的束缚,为的是在打击面前,在攻讦面前轻松些。当时觉得更可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处境不佳,信心不足。现在,打击会很多,那是互相对打,我已经很有力量了。我第一次出发去战斗时挺直了腰,放开了喉咙。

我给诺贝尔文集写的我的履历就是这样结束的。我作了暗示,我说,甚至于连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我们几乎从来都不能立即作出评价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未来事件的进程就更加难以预料和令人吃惊了。

对于我的一生来说,这是伟大的时刻,这场战斗拼杀也许就是我生存的目的(而当这些战斗的喧嚣过后又怎样呢!我要离开几年到荒凉的远方,在原野、天空、森林和群马中,而且要从容地写小说……)。

但是,对于他们会是怎样呢?是不是终于快到了那一天,俄国开始从睡梦中醒来呢?

我的预见和我的打算可能还会有错误。我还有许多事情就是在近处也看不清,上帝会在许多方面纠正我。但是这不会使我的心怀变得模糊起来。它会使我畅快,会确定地指出:不是我计谋好了这一切并且实现了这一切,我只是磨得非常锋利用来对付妖魔的宝剑,会砍杀魔鬼、驱走它们。

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的你手中跌落!

1973年12月

于别列捷尔金诺

补记之四(1974年6月)

英雄末日

补记之三已经完稿,剩下的工作是打字、照相、送往西方,藏好底稿。12月28日那天,在别列捷尔金诺村楚科夫斯基的别墅里(自从秋天起这里成了我猫冬的住所),我如同往常一样一边吃着午饭,一边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午间播音,我猛然听到我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第1卷在巴黎出版的消息。真是出乎预料,因为不久前我才提出这个要求,我预料在1月7日圣诞节时才会有答复。由于联系中断,我的要求没有及时传递过去。可是那些出版家们却在忘我地工作和劳动,不顾星期天,不顾晚间休息,而且人手又非常之少,少得可怜,就这样他们竟然赶在我的预料前出版了。总共提前10天,但正是这些时日决定了地下文学的命运——由于没有装粮的簸箕,历经许多月份才成熟的庄稼白白糟踏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受到震动,我的叉子仍继续不停地往嘴里送着白菜。这些年来我采取了许多行动,而且每一次都是无所顾忌的,每一次政府都没有作出什么干预,没造成什么后果——那一堵墙或者那一棵无比坚硬的橡树(实际上称

不上橡树，只不过借用这个谚语而已）的软弱无力，缺少弹性简直使人惊异。既然许多次都平安无事，何尝不可以再试一次呢？……

我的一只手被煤气灶烧伤，一小时以后，我不得不带着伤到莫斯科去，我暗想：是象征吗？我同所有的密友们感觉到像节日一样，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个夜晚。这是一种解放，因为我曾经回避、躲藏，把书稿到处转移，而今不必再转移了。沉重的石头落了地，一切忧虑都已消逝。过去连把书稿放在家里都不敢，而现在，朋友们，如果愿意，你们就来读好了！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出版《古拉格群岛》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此，他们不砍掉我的脑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则他们将不再是他们自己。……现在，趁着正在顺便审订、校阅从前作品的旧稿的空隙，最好是把《牛犊顶橡树》大体上写完（也正是由于我及时地抓紧写补记之一、之二、之三，才得以结束全书。如果未能及时写完本书，今天也就毫无意义了。今天，地下活动的整个紧张气氛已经冲破，我被抛向一个与以前迥然不同的生活境界。我的石砌小房的窗外是瑞士这个国家起伏的群山，这里阳光无比灿烂，我的手稿已经不必再隐藏了，今天在室内谈话可以毫无顾虑了。这是另外一种生活）。《古拉格群岛》一拖再拖，最初定的出版日期是1970年1月，一直延期，延到了1975年5月。现在，突破了原定期限，在1973年圣诞前夕出版了。

十分明显，凡是能够看见的人都会看到他们是何等软弱！他们用合同这样一个脆弱的栅栏作围墙，来抵挡飞奔而来的牛，他们想用合同阻止《古拉格群岛》。12月23日文化狱卒——全俄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潘金曾经威胁说：“合同将被认

为无效……还有法律方面的其他责任。"当军刀挥舞,咄咄逼人的时候,有谁还会害怕山猫爪子抓人呢?全苏作家协会面对《古拉格群岛》所做的声明表达了这样的意向:我们的人认为对国外的一些出版社施加压力比在这里摧残我本人容易一些。但是这个估计又错了,《古拉格群岛》不是法律行为。他们能够阻止出版我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比如我的《1916年10月》,他们的无理要求或许还会提供一些口实给法律工作者们去考虑,理由是否充分。但是,假如他们利用像头发丝一样细的法律套环去勒死《古拉格群岛》,则表明极端露骨的无能为力。美国的出版家们匆忙发表声明,甚至提出请求说,他们亟愿苏联当局与之进行较量,最好诉诸法律(半年以后,就在不久前,潘金像一只没有能够偷喝到罐子里的牛奶的猫一样,舔了一下嘴唇,然后说:西方曾经极力希望我们运用法律手段反对《古拉格群岛》,但是我们使他们大失所望)。

奇怪的是,早在8月份他们就拿到了这本书,仔细地阅读了。看到了烧红了的并且已经熔化了的料块,但是仍在考虑:也许温度还不够高,金属流不出来呢?他们没有准备任何容器——注入钢水的槽、沟、钢锭模,没有地方注入钢水。我在喀山车站哄得他们昏昏欲睡,我蒙骗了可爱的部级机关。整个10月他们在酣睡,11月仍在酣睡(只有到了12月他们才开始微微活动)。……可是在年底以前我超过了他们!

……

第一个星期里完全沉默。从1月4日起塔斯社开始紧锣密鼓地接连发表前言不搭后语的声明,但只是向国外发送,没有译成俄文,没有在国内刊载。声明中说:"似乎是整个国家都被秘密的侦探网所笼罩……似乎到处都有精神病院……捏

造苏联的现实,把它诽谤为资本主义的痈疽——书中诋毁性文字换取了外汇……"这些内容贫乏的论证表现了他们的惊慌失措和惶恐不安。只不过如此吗?毁掉数百万人的生命,不也仅仅是出自防范吗?法国共产党员拉罗什于1月7日通过莫斯科电视大放厥词,他认为: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没有反映出最近一年的创纪录的粮食收成,并且根本没有考虑到苏联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此类的仓促的、无力的、不痛不痒的攻击接踵而来。

在新年伊始我又拟定了一份预测——"他们将要做些什么?"预测的内容是:

1. 杀掉我——暂时不会。

2. 逮捕并判刑——未必如此。

3. 不经过逮捕而放逐——可能。

4. 驱逐出境——可能。

5. 为出版事件而传我出庭——是我最希望的,而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愚蠢的。

6. 利用报纸论战,以破坏对这本书的信任——最为可能。

7. 损害作者声誉(利用我的前妻)——最为可能。

8. 谈判——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为时过早。

9. 让步,使我与世隔绝如同1956年以前——不是完全不可能。

设想最后两项,是我对他们的估价过高了。他们还未能成熟到这种程度。我的那封《致领导者们的信》自从9月起就一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可以对比,可以思索一番(他们,是否有什么人读过那封信呢?……)。我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利用《古拉格群岛》予以直接的、歼灭性打击——以信中的诱人前景使他们困惑莫解，诱使他们选择第 9 项。12 月份我向我的律师和发行人寄去一份计划：《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出版后的 25 天，自动出版我的《致领导者们的信》。也就是说，给领导者们 25 天的考虑时间。

……

我还确信，有可能引出各种做法。总不会上层人物中谁都没有考虑《致领导者们的信》。（哪怕是那些企图上升的人，以此作为自己升迁的可行途径，作为使领导者们摆脱困境的出路。）

由于《古拉格群岛》提前出版，《致领导者们的信》的出版时间也相应地由 1 月 31 日提前到 22 日。当塔斯社如此气愤地喊叫、辱骂之时，信中有意和解的语气在这紧张的情态之下可能被看作是我的让步，好像我已被吓得失魂落魄了，他们不会去注意写信日期——9 月 5 日。我的意图是从《古拉格群岛》开始，立刻并且直接推开我们的国家巨石，看来我是力不从心，考虑不周。是的，我设想只要《古拉格群岛》一出版，就会改变历史，我坚信这一点，但是不会这么快，看样子也不会从莫斯科开始。1 月 10 日，我通过意外的方便机会急忙制止《致领导者们的信》的出版。在最后的瞬间打电话办妥了此事，要知道这封信很长，而且已经送去排版。印刷中止了。

……

其实，从出版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书开始，紧接着现在又是其他一些积累的作品，连续不断，一般地说是否需要我采取这样一些战术步骤和韬略呢？干脆出书，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该有多么好啊！（我至今仍然就幻想这样的生活方式，从

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我来到欧洲已经4个月了,今后还不得不需要耗费许多个月的时间,用于澄清事实,把话讲清楚;打退跟踪而来的抨击。而我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躲进静谧的角落,进行写作,然后让作品流水般地源源不断地出版。人们的社会行为由社会状况作出解释,可是要知道还有年龄的规律和我们内在变化的规律又为我们的社会决策提供准备条件。)

《致领导者们的信》停止出版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让他们吱吱哇哇地叫吧!让他们公开地挖苦嘲弄吧!而我趁这个时候已经做完了我自己的事情。他们会来逮捕我吗?——请抓走我吧,我做了坐牢的准备,被动的防守状态。不过,说老实话,我和妻子并不希望这种迫害真的降临。从前许多次都已幸免,而这种免遭惩治,起初总是一直拖延,难以判定虚实。这一次,妻子特别相信,除了在报纸上谩骂以外,不会再有什么了,将会平息下来的。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也采取了如下行动:我不再把自己关在莫斯科那套不见阳光、空气不好、狭窄的住宅里(为了怕人窥视和拍照,我们室内的全部窗帘昼夜都遮挡着),而是安然地搬到别列捷尔金诺村去,在松林里舒缓地吸着新鲜空气,以我平时从未有过的慢速度写完《巨石周边》论文集中的文章。(啊,我是多么怀念这些美好的日子啊!)现在甚至难以置信,1月份我们的生活过得那样有条不紊、安适恬静、平淡无奇。(在报纸猖狂攻讦的日子里,朋友们到我们家里来时说:"惟独你们家里这么安静。")阿丽娅把《牛犊顶橡树》的最后几章打完字,我们把它拍照,准备送出去。虽然住在城郊,我也照常多听无线电广播,《古拉格群岛》好像富有生命力一样,从广播里传了出来,它饱经风霜,创巨

痛深，它从来就不是我所能创造出来的，它也绝不可能成为创造品——它使我深受感动，不禁潸然泪下。在国外用俄文出版这本书所引起的世界性反响就其力量之大和数量之频繁，超出全部预料之外。当然，人们把群岛上的事件与自己较为熟悉的搅和在一起："把野蛮的古拉格群岛上骇人听闻的消息同解除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星期日汽车旅游禁令加以比较，把群岛上难以理解的生活与英国的一周三天工作两相对比。燃料危机席卷着生产优裕已级的西方世界，就连这初步的、微不足道的限制都会使西方惊恐不安。不过西方可尊敬的是他们对汽油的忧虑绝没有对那些灭绝种族的土著人的忧虑更为强烈。

只有现在，不，只有今天我才领悟到上帝怎样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在1962年整个一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萨姆伊兹达特（地下出版）传到基辅，传到敖德萨，来往穿梭，一年之中一份也没有飘流到国外，真是怪事！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害怕这一点，我可丝毫不怕，甚至出自急躁心理，我倒希望《伊万·杰尼索维奇》保持原样地冲出去，我完全不能理解，如此而已，别无其他。我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用普通手杖把克里姆林宫的墙捅了一个窟窿。在列宁格勒的那一份《古拉格群岛》没有烧毁。尽管我催促过，告诫过，书稿最终还是落人克格勃分子手中了。他们在气极败坏的狂吠声中迅速印刷，正是这一方法，使《古拉格群岛》成了不容置辩的证据。目前，在这里，在西方我才获悉，自从20年代起，由索洛甫科夫首开先河，描写古拉格群岛的作品在这里出版的近40部，翻译出来，引起轰动，然后消逝，犹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没有使任何人信服，甚至没有唤醒任何人。根

据吃饱肚子和自满自足的人的本性：话已说尽，但是一切都被当作耳旁风。

半个世纪里，苏联的报纸没有增长一点理智，甚至还从20年代灵活的共产国际倒退了，报纸只擅长也只知道一点——迎头辱骂，野蛮中伤。1月14日，《真理报》首先向我发难，文章的标题是《背叛之路》。这是指导性材料，次日所有各大报及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印刷了约50万份之多。又过了一天，《文学报》针对我创造了一个术语——“文学上的符拉索夫分子。”[①]几天之内，各个印刷厂纷纷印刷攻击文字，报刊栏上比比皆是。主要之点被故意歪曲——监狱、集中营作为题材根本没有提及，指责全书是对缅怀战争中牺牲者的凌辱，而主要之点，用美丽－模棱两可的词汇写道，这个卑鄙家伙好像（留有后退的余地）有3辆汽车，把这个做为抛给群众的一块美味食品，以此挑逗起更大的不满：“畜牲！他还缺少什么呢？！”

从《真理报》发出信号的第二天起，向我们的莫斯科住宅展开了3周的电话攻势。这是20世纪的新式武器：你可以用不通报姓名的电话铃声闯人关门闭户的住宅，吵醒睡梦中的人，弄得人家心惊肉跳，而你自己却在写字台旁或安乐椅上连站都不站起来，悠然地喝着鸡尾酒。

攻击开始了。电话传出强盗般地吼叫声：“叫索尔仁尼琴听电话！”“您是谁？”“叫他来接，我是他的朋友！”妻子把电话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德军的原苏联将军符拉索夫领导下的反苏军事武装部队的成员。
——译者注

挂上了。接着又是一阵阵电话铃响。她拿起听筒，但不说话（不说“是的”，也不说“喂，我是啊！”），对方仍旧是那个强盗般嘶哑的声音喊叫着：“我们也在劳改营里呆过，但是我们不出卖自己的祖国，明白吗？我们不许他这个畜牲乱说乱动。行了！！”（党中央的报告员在12月份讲演的内容与这一段话一字不差，只是没有说“畜牲”二字。）电话的攻击，出人意料，也很不习惯，它要求神经健全、反应灵敏、回答善于随机应变，声音强硬果断（你们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不要枉费心机）。阿丽娅很快就掌握了对付的办法，她灵活自如，她先是一声不响地听着，听着，然后，轻轻地说：“请告诉我，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月付给您两次薪水还是像在军队一样只付一次？”在这种场合下对方常常惊慌失措。或者，先让对方说完，再用感叹词回敬他们：“您都说完了吗？那么，请转告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同这些愚蠢的干部一道工作，他将会倒霉的！”就这样，电话铃声像有人指挥似地不间断地响着，不给我的朋友们以打电话的机会，要是不拿起听筒，又怕万一是朋友打来的呢？不过，自己总算把这些猛烈攻击的情况告诉了外间（恰巧在同一晚上西方的广播电台，愿上帝保佑他们健康！也广播了有关电话攻势的消息）。电话里的声音有男的，也有女的，清一色的谩骂、威胁、猥亵性话语，没完没了直至深夜1点钟，间歇一段时间后，清晨6点钟重又开始。少数人往别列捷尔金诺村的楚科夫卡娅家的别墅打电话，侮辱了莉吉娅·科尔涅耶夫娜，扬言要叫我听电话（“妻子难以对付”）。幸好，事先在我们家的电话机上安装了录音电话机，电话的内容都可以录下来。我打电话给阿丽娅，（国家安全委员会监听）指示她应该怎样录音，她复述并操作起来，

她在电话里说，我们把那些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都录到磁带上吧……文明产生了武器，文明也产生了反武器。真的奏效了，他们开始收敛，讲话温和一些了，扮演同情者的角色（他们说："我们是担心他可能被捕！"）。

就在那天晚上，他们闹得比电话铃响还更厉害，似乎是要表示人民的义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集在院子里，而且还招惹来几十名民警——保卫，可是，既没有砸碎玻璃，也没有执行"保卫"，显然是改变了命令，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的。

电话攻击持续了两周，虽然已经没有第一天那么频繁，但是，内容更加五花八门了。

"……那个符拉索夫分子还活着吗？"

"……我读了他的全部作品，我为他祈祷过，可是如今我看清楚了，我崇拜的偶像原来是个败类。"

有时，也传来失望的喊叫（在我向报界发表新的声明以后）：

"他这个坏蛋，他干什么呢?!！他怎么不停止作恶呢?!"

由于命令不时变化，花样也在不断地翻新：一两天前刚刚威胁说要打死我，紧接着又变成了"失望的崇拜者们"，后来又出现了"劳改营的难友们"，最后又是良言相劝的好心人：不要出门，或者说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或者说不要在商店里购买食品——为了害死我们，来得及在食品里投毒的。但是，奇怪的是，在这几百个电话声音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演员般的那种熟练的声音，他们伪装出的腔调不论内容如何，只要一开口，说出第一句话，就会原形毕露。在这种情况下电话中对方只发出一声讥笑，他们立刻就茫然失措了。还有，他们为了不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都是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干扰。

他们的图谋是摧垮我的家庭的精神，进而再挫伤我的精神。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我第二个妻子施加压力没能得逞。阿丽娅不仅抵挡住这些攻势，而且还没有放过日常工作和家务。工作照常进行，家庭生活和睦，就连孩子们也不会很快意识到他们的童年非同寻常。

与电话攻势进行的同时（自然还有报纸的抨击），还使用了邮政攻势。经过邮局寄送含有敌意的信件按照准确的地址纷纷投到我们家里，只不过都是匿名信件。有一些信件是朋友们写来的（书刊检查机关的失误：德意志电波电台广播我们家地址时没有门牌号码，于是这些信由其他线路分检，才没有被扣留），有一些信是“乌拉尔的工人们”寄来，有一些信是劳改营死去的难友们的子女写来的。

苏联报纸大肆鼓噪，言词激烈而又语无伦次；在国际舞台上几天之内就输了理，真是愚蠢已极。《纽约时报》曾经警告他们：“这种宣传给苏联带来的危害将比出版一本书要大得多。”《华盛顿邮报》也指出：“如果谁敢动索尔仁尼琴一根毫毛，就立即中断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说到中断倒是不会中断的，只是夸大其词而已，决不可能放弃缓和。

……

那么，这些吠叫为了什么和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报纸的考虑不周，枯燥乏味的风帆飘浮向何方呢（我在报纸的攻势中看到了我这一方的胜利，他们醉心于向全世界叫喊时，竟放过了普通的、常见的、不声不响的咬人办法——牙齿咬住喉咙，然后塞进袋子里。）？但是由于受挫，恼羞成怒，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开始动手了，伤害了我国上百万不知姓氏的人们……在西方国家，好像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申

辩？为什么哑口不言？是不是对我的诽谤也有正确之处呢？

好吧，你发誓——在争斗中默默不动。我的脾气可做不到这一点。

我两次反击：1月18日的声明和1月19日对《时代》周刊的简短的答记者问。在声明中我反驳了苏联报纸那些极端刻薄和侮蔑凌辱的指控，总共写了两页；在答记者问中我发展了自己的立场：对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观点我在11月份没有发表看法，现在阐述了意见；此外，还谈到了我自己、萨哈罗夫以及所有在大肆鼓噪和打击迫害之时丧失分寸感的人已经醒悟：认识到无论西方怎样支持我们（谢谢！），但是，我们需要尽快自立。不管上面如何折腾我的《不靠谎言生活》，趁我的嘴还没有被堵塞，我还要把我对青年们的重要忠告公诸于世，这是我的惟一的、现实的希望。至此才可能轻松地叹一口气，正如我的心灵所感受的那样："我在死亡难友的面前，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真理报》发出展开全面打击的信号之后一周，我们坚持不动！我们坚持住了，甚至连塔斯社也不得不作出反应，而这一次，当我号召青年人不要说谎话，应该勇敢地发挥坚定不移的精神，对我的这一号召将作出何种反应呢？反应是这样的："索尔仁尼琴污蔑苏联青年，说他们没有勇气"。但是这已经是1月22日的报道了，那一天正值华盛顿的全国出版俱乐部大厦门前举行了示威，参加者有美国各界知识分子。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他们读了《古拉格群岛》的片断以后，大声呼吁："不要干涉索尔仁尼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1月22日《古拉格群岛》的德文版出版，第一版仅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这一周我们坚持度过去了，这也是这部作品出版后整

整一个月里的最后一周。多么困难的一个月啊！当时，滩头阵地还很狭窄，而且，世界还没有读到它就已经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它了！而今阵地扩大了，西方国家中很多人开始阅读，一旦已经加速传播，那么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了。1月23日我在札记中写道："如果敌人坚持不住，向后撤退（开始承认过去），该怎么办？我毫不吃惊。"（更早一些时候，作品用俄文版出版以后，理应立刻在美国出版，我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有两三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把事情全部弄糟，在1968年圣灵降临节期间才发出。美国的出版商就这样耽搁了半年，在我跨越深渊时没有投掷绳索来支撑我，因此我想，该收场了。）

我当时这样理解：如果第一个月就决定如何处置我的话，那么会立刻把战斗引向深入和广泛。现在议论的是：宣传机器会再次扩散到全国还是半途中止？报纸上的谎言一次再次地肆无忌惮地随意扩散，还是终于遭到反击？我曾相信，可能出现有利的转机，从而更理解了我自己处境的意义，于是我作出的以下声明不是面对西方国家，而是针对国内。

1月末报纸上的叫骂变得激烈，数量也骤然增加了，强制拉拢一些人——现在已经都是著名的人物了——签名，在高尔基大街上向群众陈列出招贴栏：我的书，上面画着黄色的颅骨和黑色的骨髓，但同时还有毫不畏惧的青年人一个个像迎接死亡似地挺起胸膛……，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然而，西方却敏锐地从远处发现：我的声明具有"明显进攻的性质"，政府当局似乎在后退，耗尽了大量的力气，结果仍是枉费心机。

鸭子吹笛，蟑螂敲鼓，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卖命似地干

了。在报纸叫嚣之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正在给维特凯维奇乔装打扮，准备向西方国家的某一人士发表答记者问。情况急转直下，令人不胜惊讶：国家安全委员会指责我反对他们不够顽强，不是刚一认识时就打他们的耳光，如同今天这样。尽管我自己估计到可能会对我的名誉进行败坏，我料想他们会利用我的前妻干这种勾当，万万没有想到竟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们给我扣的帽子应有尽有：伪警察、盖世太保，现在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探。我本以为对于这一切不予回答为好，因为过于频繁了。又一想，既然已经参加了战斗，那么就应该主动出击，好吧，既然回答，那么就大张旗鼓地回答吧！

我觉得，我还打赢了又一个回合的战斗。发动了新的炮轰，而他们的进攻仿佛正在平息或者停止了（如同9月份那样）？我是否还要继续加强自己的力量呢？2月7日我写道："2月份预测如下：除了破坏我的声誉以外，未必还会有什么事，多半会暂时休战。"我写的这份预测是不明智的，我自己并没有忘记一生当中1月末2月初是我最不吉祥的一段时间，这些日子里很多危险都集中在一起：被包围、被逮捕、押解、手术以及一些更琐碎的事。只要度过这一难关，情况立即就会好转。我最希望暂时休战：噤口不语，返回自己的巢穴去，像以前多次冲突之后那样——安然无恙，一声不响。虽然，在战斗进行时暂时休息未免有些遗憾。

人的特点是，当他经历生活中可怕的、灾难性阶段时，也和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一样，忙于平凡的日常工作，只有到了很久以后再回首往事时，才会发现，哦！脚下的土地已经碎裂，哦！原来处于雷鸣电闪之下！

我自己没有觉察到任何转折，倒是我的妻子还是在2月初就预感到会有不祥的骤变：往我们的住宅打电话的攻势停止了，就连报纸的宣传运动不知为什么也偃旗息鼓了，这一切都掩盖一个事实：当局领导至今仍在举棋不定(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归来，我对此没有予以重视，其实人们是在等待他回来，好对我采取措施)。

这个月里有许多报道包含着一些先见之明，只是没有被注意，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当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的时候，预见可能被忽略。现在，重新翻阅那个月的广播简报时，我惊奇地发现：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1月18日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说："出现了一些暗示，倾向于驱逐出境。"1月20日侨民格·斯维尔斯基称："将会把索尔仁尼琴强行装进飞机。"真是不幸而言中！要知道，我认为驱逐是可能的，但是用这种最简单的形式，即使用武力强行装进飞机，而且只身一人，不许带家眷，我当时是没有想到的，忽略了(对，当现在我把书交出排印时，我重又浏览了一下这本书，我这才恍然大悟：1972年3月时已经发出了警告，说会发生以后确实发生的事：先临时逮捕，然后驱逐出境。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时候也没有想起来！……)。我极少想到人们对我的关注。2月1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对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党员们说："倘若索尔仁尼琴在西德，他会自由地生活和工作。"(他们如果为此而对勃兰特不满，那我可真的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他作了这样的表示，如此而已。

驱逐，这有可能，从前也不止一次有过这种可能，但始终没有落到这个地步。万一要驱逐，我和妻子设想：首先包围我们的住宅，把大家封闭在室内，切断电话，然后命令我们收拾

行装——可能是匆匆忙忙地或也可能是略微从容地。假如我们仔细地周密考虑的话,我们会考虑到上述的形式不会合乎当权者的心意。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可能仔细周密考虑任何问题,因为总是匆忙地处理许多日常事情。我们手里拿着这个纸单已经快三年了,上面写着"地震"及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突然闯入时我们在一起、分散在不同地方、在途中——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周密的应急措施。不错,这些年来日程是按每周安排的:每一周都排满了主要工作中最主要的:写些什么、紧急赶写完或是修改旧的文稿、重新打字、拍照、分散保存(方案变来变去:放在家里好还是不放在家里好呢? 要么这样试一试看? 要么那样)这些东西、送往国外、附上说明信件。要忙于这些操心事,还要忙于和敌人周旋,就这样从没有时间深入地把"地震"变成日程表。

2月8日,《古拉格群岛》在瑞士出版了,这增加了支援的力量。挪威外交大臣在议会发表演说之后,向苏联驻挪威大使转达了挪威公众的不安心情。同时丹麦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支持我。我在别列捷尔金诺村泰然自若地工作着。突然,阿丽娅在非规定时间打电话说:最高检察院送来传票,要求我在当天下班之前必须马上到他们那里去(从别列捷尔金诺村去是不可能按时到的,我百思不解的是他们怎么不计算一下时间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我们发现传票极不严密:没有说明理由,没有指出传讯我的原因,没有注明我以什么身份被传,也没有发文号(阿丽娅一眼看穿,一定要指出这些漏洞),因此她认为可以拒绝传讯。

楚科夫斯基家的厨房里,多少年来电话机就放在一个固定地方——雕花的椭圆形小桌上,小桌在窗户的对面,因此在

阴天,尤其是阴天的傍晚显得很昏暗。我拿起电话听筒,听到最高检察院的传讯一事之后,立刻回想起了1965年9月,同样如此令人不快,也是这样薄暮黄昏的时刻,也是在这部电话机旁,我从电话里听到了科佩列夫的声音,他说:“你的案件已经移交最高检察院了。”我的案件当时是指有关《胜利者的欢宴》和《第一圈》等文稿和资料被搜走一事。移交给最高检察院意味着诉讼程序。(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对它做出决定,至今仍是个谜。如果当时他们判决,他们准能成功)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圈》被锁在最高检察院的保险柜里,只不过在那里睡觉呢!可是究竟是什么鬼使神差,经过8年以后,还是那条昏昏欲睡的蛇,仍旧在那个地方,咬了我。

可也是的,我公开声明反对他们已经有7年多了,最终也该轮到他们对我下命令了。

我与妻子通电话总是讲些暗语,故意不露真情,因为一切都要经过卢布场卡,现在也是如此,好像最高检察院的传讯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屑一顾似的(她甚至没有马上给我打电话)。而实际上我们俩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非常严重。不过又缓和了下来,因为想到夏天的时候他们曾把萨哈罗夫传讯到那里,总共不过是进行了规劝性的谈话,告诫他停止“下流无耻”的活动。当然,这并没有完全使我们放松下来,因为当局对待他与对待我的态度不同。从名气大小考虑:他获得过三枚“金星”奖章,国家难道能不利用他吗?他们不会轻易把他一笔勾销掉的。至于我,他们把我看成是端到鼻子底下的氨水,充其量是这种东西,别无其他。他们传讯我去进行规劝谈话,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那么,去干什么呢?而且为什么规定在周末下班以前必须到庭呢?总该考虑周到才是。

不,类似的情况否定了这一点(他们全都预料到了,那么是诱我上钩? ……)。显然,我不能亲自送上门去,好像我还有这个自由,还有时间。

还没过两个小时,突然听到门口有男人的脚步声和猛烈大声地敲打玻璃的声音,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才这样敲打玻璃——神气十足,末日来临的敲打声。可是莉吉娅·科尔涅耶夫娜什么也不知道,我怕打断她的工作,有关传票的事还没有对她说,而此刻在慌乱之时也没有时间向她讲了。我们没有防备,只好放他们进来了! 况且住在别人家里,我也不能提议不让他们进来。

进来三个人。借口极其愚蠢,说是来修理别墅的,(他们无任何修理的活儿)。他们已经来过一次了(检查我和我的房间),那是在两个月以前,借口说"有一本预算簿忘在这里"了。他们来找一找,他们用眼睛盯着我,跟随着视力不佳的莉吉娅·科尔涅耶夫娜在各个房间走了一遍。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于是外来的修理工竟在人家的家里抓起了听筒,听完之后嘴里嘟哝着什么。立刻,丢的预算簿也不再找了,三人扬长而去。莉吉娅·科尔涅耶夫娜跟在他们后面,她只看见大门外面有一辆小汽车,还有两三个人。

显然,他们是为我而来的。不,这样的插曲已经表演过数次了,不实行惩治,而主要的是干扰工作,无论在哪里躲避,无论陷入何种处境,多年来一直不让我安宁,这一次也同样。这种干扰使我放下全部工作,立即有计划地准备于次日早晨赶到莫斯科。星期五结束了,还有两昼夜: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把这些时间用在最紧迫的事情上,安排,全面考虑并且承认:"地震"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没有这样,我在别列捷尔金诺

村的别墅又住了两天三夜，慢腾腾地干着，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仿佛我这个人轻飘飘地悬浮在空中，其实仍然在地上，甚至到了星期一早晨，我也没有急于过早地动身去莫斯科。

11日早晨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已经知道该怎样回答最高检察院了。可是我到达莫斯科时已经较晚了，检察院的通信员从一上班就送来了新的传票（通信员显然是个军官，不过带着腼腆的微笑），这样弄得我来不及与妻子商量应该如何应付，只好让通信员坐在前厅里稍等，我把我的答复在打字机上打成书面材料，把它贴到传票上以代替签字。拖延了很长时间，通信员坐在那里焦躁不安（他是否以为我们准备软禁他呢？）。当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不知为什么猛然起立，挺直身躯。他接过答复材料，表示感谢，没等把文件叠起，就忙不迭地要走，我对他说："请装到信封里，外面有雨。"他马马虎虎地塞进了信封。

搏斗开始了，那么就快一点拼杀把！当通信员还在场时，我们已经给记者们打了电话，请他们来。首先，向他们宣读我的书面答复。可是，感情却向前飞奔，手也开始发痒，话已经说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禁忌呢？既然说出，就说尽吧。于是，拿起《古拉格群岛》第3部，我们从第7卷里印刷一些片断，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没有法律。《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来了，我用扩音器向他们朗读。就这样，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我做了两份答复。多么复杂的情形！

我们并没有着手准备上路和做向亲友告别之类的事情。这种战斗又不是第一次，并不比从前那些次更加严峻。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准确地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在别墅里立即逮捕我？为什么星期六和星期日打了盹？11日早晨我做

了措词尖刻的答复之后，如果一切均已决定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立刻把我抓走呢？要知道，要是星期五那天晚上我按传票规定的时间到检察院去的话（我的性格决定我拖延、折腾了两天，其实检察院就在普希金大街，近在咫尺，步行两分钟就到，那里不是什么誓不两立的安全委员会）——那可真是坏蛋亲自登门，自投罗网了！他们可能会立即把我抓起来，无声无息，没有外人在场。那么为什么星期一、星期二也没抓我，反而给了我向全世界大声宣扬的时间呢？也许，在我的大声反击而前，他们胆怯了。要是我到检察院去了，还意味着我承认他们的权力，就是说还有希望制服我，还可以谈判。

傍晚时我和妻子去散步，在斯特拉斯诺依林荫道上边走边谈，这是我们喜爱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多谈一些，当然如果从来没有人偷听的话，那简直是奇迹了（不错，我们在谈话期间经常改变话题）。这个林荫道几乎是公园的一部分，是它扩展出来的边缘，我们喜欢这个地方还由于它位于《新世界》附近，从前我们与《新世界》杂志社有过多少次的接触啊！今天，很明显，有人紧紧地监视着我们。不过，什么时候完全不被人监视过呢？由于受监视，这一天也并没有变得格外不好嘛！

我们翻阅整理材料，这种全面准备我们以前还从未有过，全部重要书籍都妥善保存万无一失，安全委员会是难以企及的。此外应该为被捕做好准备，整理普通的衣物。然而，疲备、变得迟钝的大脑又在阻拦：把"地震"提到日程上讨论，它真的已经发生了吗？不太清楚，有些拖沓。我像以往那样重复说，充其量坐两年监牢，以便活到全部作品都印刷出版完毕，再长时间我也不敢保险。在劳改营里白天不能写作，而在监狱里可以写作。写什么呢？为孩子们写一些俄罗斯历史简

短故事,用明快的语言表现朴实的情节(从那时起开始思考如果自己的儿辈们成长起来,我还能否着手这项工作呢?)。我们讨论了在探监时怎样交接已经写好的重要书稿。在侦讯时,在法庭上我将持什么态度(早已决定:我不承认他们也不同他们说话)。

那一天,天色阴沉,飘着小雪(地面上是白色的,而树木和长椅是黑色的),暮色降临时教育科学院大楼里燃起怀有敌意的灯光,林荫道两侧行驶的汽车闪出光亮。这一天结束了,他们没有逮捕我。

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很适合工作……我们听着广播,今天早晨我做出的答复已经传遍世界。我们收拾好了最普通的衣物准备去坐牢,可是找不到装它们的口袋,我们也糊涂了:监狱里使用的口袋平时没有现成的!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失眠,只好找点事情做。于是找出《致领导者们的信》,进行修改,全部评价和建议都还保留,删掉了以前的那种劝说语气,现在看来那种语气显得过分软弱。

心里安静了,没有任何预感,没有任何郁闷。我没有急匆匆地去检查、烧毁、向更远一些地方隐藏书稿。要知道,明天,一周以后,我还要工作,这一切还会需要,何必烧毁、转移呢?

从早晨起我们又都照常工作,各自坐在自己桌旁。妻子那里堆了许多违禁资料,都放在桌子上了。10点钟了,昨天传票上规定的时间已到。11点钟,12点钟,没有人来。我们默默地工作着。我们干得多么出色!内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沉重感一扫而光了:他们退让了!我们还将继续生活下去!!……任何一个所谓的爱国者都没有打电话来,任何陌生人没有破门而入,没有什么人在大门口盯梢站岗。也许是因为外

闻记者在我们住宅附近守护着,他们才没有轻举妄动?

我甚至没有认真检查一下我的写字台上面堆放着的一大堆东西,没有发现早就应该烧毁的底片拷贝。更糟的是桌上放着许多封国外来信,写信的是我的代理人、出版商们,本应及时处理和焚毁,也没有时间了。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没有时间,14日晚上我安排与一位西方来的人会面,于是我急忙准备必须在当天晚上发送出去的东西。

如今,我可以公开了,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连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相信,也不能设想的是:我传递到西方国家的全部书稿没有经过中介人,没有通过许多人转手,而是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双手!安全委员会一直监视着出入我们家的一切来往客人以及他们还和哪些人有什么接触。但是,依照他们的显贵意识,以己度人的思想,他们当中无论是少将,无论是少校都不可能想象得出竟然是我自己,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活像个野小子在非工作时间里,在灯光昏暗的角落东钻西窜,而且还时常更换帽子(帽子通常装在背包里),躲藏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把书稿亲手交出去。从来也没有被人盯住,一次也没有被当场发现!多么大的胜利,多么大的收获啊!……当然,我的效外住所帮了我的忙——时而在郊外的圣诞村,时而在儒可夫卡村、时而在别列捷尔金诺,通常在这些地方我与从那边来的人会晤。如果是从圣诞村出发,可以沿着空旷的田野走了5俄里路赶到小火车站,穿着打扮好像郊游似的,先悠闲地穿过森林,然后故意绕道多走一些路,再急忙去接头。从儒可夫卡村可以不乘普通的电气火车(火车站上总有一些磨磨蹭蹭的家伙在值班监视),而是朝相反方向,乘绕道的公共汽车去奥金卓沃村。从别列捷尔金诺村出去时,也不像平

时那样从正门出去，而是通过冬季不通行的后院，来到后街上，然后沿着没有行人、覆盖着白雪的小道，在夜间步行到另一小火车站——米丘林站。在这之前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我平安无事，对她说我马上躺下睡觉。直至深夜一直让窗户里亮着灯光。如果要从莫斯科出发去会面，那么，或是乘坐电气火车到郊外，摸着黑游逛一阵，然后再返回莫斯科，或者，或者……不写了，莫斯科市的行动路线和方法暂时保密，对于一些人还有用处……再有，那就是快速行走。55 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老人呢，甚至由于行走我还变得年轻了，精神爽朗了。那些身体虚胖的克格勃分子从来不会把我看成是走路能手，今天他们读到这一点，会惊讶的。

下午 3 点钟，没吃午饭，我抱着 5 个月的儿子斯杰潘到院里散步。腋下夹着他的小推车。我观察了周围的窗口，过往行人和院子里的人，然后开始不慌不忙地走着，像往常一样边走边读我的文件，思索着，平安无事的一天。这个时候轮到拆阅那些从国外来的信件，在明天以前应该复信。就这样，能够环顾四周，无遮无掩，我在睡着了的儿子身边漫步，读着一封封秘密来信……但是，没有等我读完全部信件，伊戈尔·罗斯基斯拉维奇·沙法列维奇[①]来了，他走到我的跟前。

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公开的时候了呢？再说，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暴露了自己，他肯定已经遭到了劫运，也许上帝已经拯救了他。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很多有关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事，写了他如何为我打开了道路，我如何按自己意愿行动——我与他接近，

① 沙法列维奇(生于 1923 年)，前苏联著名数学家。——译者注

但不能说志同道合。书中还涉及到萨哈罗夫，只是仅仅从远处观察，觉得我和他志同道合，其实，我们俩从来没有一起拟定过任何构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声明中一起签过名字，多么奇怪。出版《古拉格群岛》一事我也没有预先通知他。可是，与伊戈尔·沙法列维奇我们却是关系密切，肩并肩，从共同准备《巨石周边》开始，我们结识已经3年了。使我们接近的既不是往事的回忆（没有共同的往事），也不是现在为了反抗“恐龙”的斗争，不是这些，而是更加坚固的联系——对俄罗斯的未来所持的共同观点把我同他联结在一起了（这个未来，在我们国家绝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的）。

我们是在1968年初相识的……不过，从我们俩第一次谈话中我并没有发现他的睿智，相反却搅入了可笑的偶然插曲：在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亚得里亚海的风景画，他到那里去进行过学术出差，不知为什么他向我炫耀。他这样做极不适宜，想像不出还有什么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用到国外出差来笼络他（其实，恰恰相反！）。这样一类的宠儿，不能指望他们敢做敢为。我对他说，我见过许多科学家，都喜欢高谈阔论，讲得津津有味，甚至讲得很大胆，可是一旦需要行动、需要坚持斗争时，他们之中竟无一人挺身而出。说完我就离开了。并不是刹那间就展示出了使我们相互接近的原因，而是稍后一些时候。到了第三次会面时，我们共同的工作才开始进行。

……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血肉之躯，而不是钢筋铁骨，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人迈出第一步（特别是第一步），在危险面前坚贞不屈，要作出牺牲，都是不容易的。在我们俄罗斯有两千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人，其中很多人名噪一时，大肆喧嚣，远比

沙法列维奇的名气大得多(数学家居住在地球上为数甚少),可是,这些人由于怯懦,作为公民他们很是渺小,在这极少数人当中约有几十个人不顾一切站了起来,起来了,并且成长为大树,其中包括沙法列维奇。在他的身上公民的树干不事喧嚷地在成长,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这一成长,尽管了解的机会不经常,了解得不深入。

……

对于一位不从事人文科学的专家来说获得公民觉悟,这不仅需要增强勇气,而且还是整个思想意识、整个注意力的转变,是成年人的第二个专业,是探讨其他人忽略的领域(顺便提一下,有一些人放弃了自己的主要专业,而有一些人没有放弃,例如强健无比的沙法列维奇至今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卓有成效的数学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事情停留在表面时,我们被认为是门外汉,当事情顺利时,我们发现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士却不知疲倦的、强而有力的抓住机会不放:他们不再囿于各种口号形成的一系列成见,他们挑剔地筛选出精华而除去糟粕。(伊戈尔·罗斯基斯拉维奇·沙法列维奇开始从事这个第二专业完全是依据个人的方式,为了自己,从音乐开始,正是理所当然的——从天才的、悲剧性的和不无遗憾地沉降下来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这位音乐家永远吸引着他。他试图弄明白肖斯塔科维奇怎么会触动我们的灵魂,他使灵魂得到了什么寄托——这自然就要进行研究工作,而苏联的音乐理论研究者们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发表文章么,当然是无处可以发表,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肖斯塔科维奇研究使沙法列维奇扩大了以下研究领域:综合评价世界宗教状况时把无宗教信仰的危机、新的宗教纪元的序幕作为内容加

以评述。)

我在这本文学札记中提到三位举世瞩目的人物,他们对我国历史曾做出过或正在作出贡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科学家,而萨哈罗夫是物理学家,沙法列维奇是数学家,他们两位从事的似乎不是自己的专业,因为在俄罗斯无出其右(至于我自己,我学的不是文学专业,而是数学,在我的经历中我之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数学,没有数学我可能无法忍受并支撑到今天。苏联的条件就是这样)。

另外,沙法列维奇本能地与俄罗斯大地、俄罗斯历史有着筋脉、躯体、内脏的那种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对俄罗斯的热爱甚至过于炽烈,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一代从前疏漏的都给弥补上呢?而且执着地探索如何把自己的头颅和双手都奉献出来,为了这种爱宁肯牺牲自己。在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我几乎没有遇到可以与他相比拟的人,他决心宁愿留在祖国并为了祖国而死,而不愿在西方国家求得生存。这种思想强大无比、坚贞不渝:海外生活愉快,可那是异国他乡,国内虽然痛苦,毕竟是故土。

我同沙法列维奇一起讨论我们共同撰写的论文集《巨石周边》及选用的资料,讨论了两年,在苏联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找一个什么地方能够畅所欲言,自由讲话。为此我们长时间地散步,有时在儒可夫卡村附近,有时在圣诞村附近的起伏不平的丘陵上(圣诞村在莫斯科州和卡卢加州的交界处)。有一次("遭遇战"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那是 1973 年 8 月 31 日,我得知《古拉格群岛》书稿被查抄的前夕),我们在谢列德尼科沃村近旁漫步,这个村庄里一座座小屋断垣残壁,弃置的荒地

十分凄凉(村庄在集体化时期遭受破坏,在战争时期又被烧毁,它再也没有恢复重建起来)。村旁有一座阿列克塞时期的漂亮的小教堂和墓地。我们沿着利加乔夫村与谢列德尼科沃村之间松软曲折的河谷,穿过明净的小溪,站在颜色已经变灰的小桥上,这座小桥每天都有许多到教堂祈祷的人经过,他们穿过小桥登上丘陵,前往教堂。我们望着青草与灌木丛之间奔流着的清澈河水,我说:

“将怎样回忆这一切呢?……如果……有朝一日不住在俄国的话。”

沙法列维奇一贯矜持,从不激烈地表达情感,情感总是适度,他好像从五脏六腑里面发出的声音(好似钓鱼钩从鱼膛里掏出内脏一样)回答说:

“不住在俄国,这是不可能的!”

他非常快地说出“不可能”这个词,仿佛那里空气和水将不复存在似的。

沙法列维奇以客观的、没有先人之见的、符合实际的新颖思想开始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的态度同时又是自由敞开的并且具有讥讽意味,这一点是今天受左派吸引的西方世界所难以理解的。在论文集中只收进了温和适中的文章,沙法列维奇的文章作为《巨石周边》一书的开篇,是详尽的历史概述,从巴比伦、柏拉图、印加人国到圣西门、马克思,很难指望在《巨石周边》一书出版以后,有谁能像他那样对史料详加阐述,写得又通俗易懂。

这本书的初稿放在我这里已经有好几周了,我本应该把它看完,可总是没有时间,另外,打字的字迹较浅,我提出能否再打得清楚一些。2 月 12 日下午 4 点钟左右伊戈尔给我送

来了这本书的另一份打字稿，他把手提包放在我的房间里，亲自到院里来找我，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能不被别人看见，能不被人偷听吗(在我们的院子里，许多晚上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这种无比重要的谈话了，如果安全委员会的无赖哪怕有一次偷听到我们的谈话，他们准会采取措施没收文稿和停止我们的编撰工作)？在这里，由于黄昏光线使我们的口形模糊，我们不时地改变脸的方向，继续不停地讨论有关论文集的事情，讨论得异常顺利。只剩下把原来的那份稿子换回去了，这就需要我进屋去取。暂时小儿子留给大儿子看着，我同伊戈尔进到屋里，伊戈尔把《社会主义》一文，还有我写的另外两篇文章已经装进鼓鼓的大手提包里，我的这些文章不久前才写完，就在此刻门铃响了，妻子打开链锁，转了回来，说："检察院来人了，这一次是两个人。还是送来的传票，据说，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弄清楚。"那时已经快5点钟了，接近下班时间了。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天，一切戒备都已经解除了。弄清楚什么呢？好吧，我们一起去开门。就这样，我扔下没有读完的国外来信，堆在写字台上面，急忙走到门廊，这是一个特殊的小走廊，从书房出来，然后到前厅，那里放着孩子的小手推车。心里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丧失了警觉性！为了把门打开，得先关上，摘下链子，妻子开始开门，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哎！老一套：不能用脚关门。"老一套！"我骂了句，可是老劳改营分子的反应能力哪儿去了？踢了一脚之后，不管怎么不理解，门是怎样打开的呢？太平无事，不习惯了。要知道，我和妻子阿丽娅曾经商量妥当，订了计划：当他们来搜查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不让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放进屋内的人不得超过我们原来在那里的成年人数量(他们假冒各种名堂前来搜查，

人少照看不过来),其次,我们尽量争取给朋友们打电话,如果电话没被切断的话,通知朋友们。可是,现在他们只有两个人,而且为了——弄清……情况使我们不能拖延时间,不能考虑,也就是说服从他们的把戏。……让送信的人进来吧,没什么可怕的!

如果当时我不打算开门,他们也会破门而入,这是不言自明的。也许还会再按一会儿门铃,再敲敲门吧?说不定回去拿撬棍来呢!他们俩在台阶上走来走去,这表明不怕人们看见,也让人听到声音,有时他们放慢动作,这也能察觉出来。也许我们能够沉住气坚持15分钟,那么情形会大有好转,我们可以烧毁某些东西,我们也来得及做些嘱咐、说明些事情……然而,事情的开头非常糟:把门打开了,一下子就打开了!(其实,一切并非如此,后来弄明白了,当时并没发现,当妻子转过身来叫我去开门的当儿,克格勃分子已经把英国锁弄坏了,门已经不能再锁上了!不开门,这就是说一开始就别打开链锁,可是,怎么能料到呢?我们的门上连门镜也没有装……反正认为我们一直处在包围之中。)

第一个人,还有第二个人像平时走路那样走了进来。突然,又从黑暗的台阶角落里蹿出几个人,他们把那两个人挤到后面,我们根本想像不到这种突然袭击(我这个笨蛋,8年的劳改生活受的训练哪里去了?),他们已经站成一排,在小孩推车、衣服架、电话机小桌之间鱼贯而行,逼向我和妻子。我们只好一步一步后退,他们之中有人穿着民警服,有人穿着便服,没有个子矮小,胸膛肌肉不发达的软弱汉子——一共8个人哪!!!

我开始喊叫,喊了一些什么毫无意义的话,并且一再重复

——“啊！你们原来是这样?！……真没料到……”也许，这种喊叫听起来是气极败坏而又束手无策的意味。于是，一个身材粗壮、皮肤黝黑、身穿漂亮皮大衣的人，装扮成一副当官的派头，打开一个硬面的公文簿，里面装着社会主义竞赛的奖状，还有一张白白的、平整的、印着国徽的大幅公文：“检察长兹维列夫！拘传！”他塞给我钢笔让我签字。我当然拒绝了。

这种意想不到的突然闯入好像烈火一样，火焰熊熊燃烧着你的全身，使你刹时间既丧失理智，也丧失知觉——你这个傻瓜！人家教训你那么多年，都付之东流了吗?！是啊，你的那些夸口的狼一般的囚犯经验都哪里去了?！拘传吗？像烈火一样包围着，这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不是么，我没有按传票通知到他们那里去，人家全班人马就来了。时代——合法的时代，政府的行为——合法的行为。拘传我？我服从(我已经说出声音了)，这时我已经被他们挤到门口，这句话是在小“门斗”里说的。同8个人打架吗？我不想。拘传？这两个字很明确，意思是我去一下——然后再回来，检察院就在附近。不，这里有两种可能：当然，我得去坐牢，我们已经做了准备(“算了，不要演戏了，他马上就回来！”他们喊着)。我必须到书房去取蹲监狱携带的背包，我要去。有两个人紧跟在我的后面，无意踩了妻子的脚，我要求他们别跟着我——不行！(我瞥了一眼，只见沙法列维奇高大的身躯呆立不动，紧锁眉头，面色阴郁，手里提着装有代数学与社会主义的鼓溜溜的手提包。)我们走进书房，我去拿背包，那两个人寸步不离，穿着民警大衣的健壮的大尉肆无忌惮地在我的书房乱走，这是只有亲近的人才能进入的保密场所，但是，这是被烈火围攻的时刻！我忘记了，没有想到，没有看见在写字台上堆放许多东

西,全部秘密材料都散扔在那里,只要他一伸手便能够拿到。我真应该把他关在书房门外(可是他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像跟在囚犯后面一样,他的任务是监视我别从窗户跳出去,别把自己割伤、碰破、别自缢身死,他也没有注意我的写字台)。我冷静下来,问:“怎么?有搜查证吗?”回答说,“没有。”“哎哟!没有?那么你从这里赶快走开!”妻子向他们喊着。他们像长在石头上一样纹丝不动。糟糕!背包并没有准备好!有另外一个装套鞋用的学生书包,那里平时总是装着一些我要带到郊外去烧的字纸,也就是最重要的密件,但是没有来得及烧,更糟的是我把纸全都倒在了椅子上,妻子把我入狱准备带的衣物装到这个书包里了。不过在这种紧急(或者说是不守法制吧)的情况下克格勃分子对那些纸片并不去看,他们只求得我本人完整无损而且不逃跑就行。我拿起书包向外走,我们沿着小走廊向外走着,互相拥挤着,我也不落后,甚至还急忙向前赶——多么奇怪,我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向外走呢?现在想起来真该戏弄一下——真应该坐下来吃午饭,吃上半个小时,全家一起商量日常生活琐事,一定要嘲笑他们,这一点我会!我为什么采取了克格勃的速度呢?为的是尽快把他们引走(解除包围:我一离开——他们也离开了,那时住宅才能干净)。我仅仅想到:衣着要旧一些,像囚犯一样,我已经准备好了——一顶破旧帽子,从流放地带回的羊皮短皮袄。克格勃分子递给我一件我的毛皮短外套,说:“给您这一件,穿上吧!”哼!不,我才不傻呢!你们哄骗不了我,不拿破皮袄,我在水泥地上躺着铺什么呢?我没有同任何人告别,我急着走!(很快会回来吗?)——只同妻子,只同妻子告别,而且已经在门口了,周围都是克格勃分子,好像在电车上的拥挤人群当中,我

和妻吻别,不慌不忙,清楚地意识到,也许是永别。然而——我能够回来吗?还能支配一切吗?可是拖延,阻拦,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不会有的,心理和神经过分紧张!

(这一切都是由于起初的失误造成的,由于我的愚蠢给他们开了房门,把他们放了进来。现在,只要我还没有把他们从房内清除出去,我还没有把他们带走,我就一直怒火中烧,在心急火燎时我糊涂了,是谁带走了谁?)

我缓缓向妻子画十字祝福,她也同样祝福我。克格勃分子踌躇了。

"好好照顾孩子们!"

于是,我没有再回头,顺着楼梯,没注意梯级,疾步离去。正如所料,在大门外,紧靠门口(停在人行道上)有一辆小汽车(为了避免我在露天地里行走,因为外国的记者们刚刚走开了),当然,车门敞开着。他们一贯如此。现在还有什么可反抗的,已经走近车旁,就要坐在后排坐位的中间了。两个人一边一个跳上车,车门立刻关上了,司机和领头的自然上车落座,开车了。从司机的镜子里我看见我们的小车后面紧跟着还有一辆,也是坐得满满的。四个人陪着我,四个人在另一辆车上,就是说,我带走了8个人,不错吧?(在慌乱中我没有弄清:司机,还有领头的,似乎我的两侧坐着的警卫,都是新人,我的原来的那8个人哪里去了?!)乘车时间不多,用不着乘车,从我们家后门出去步行就可以了。汽车向普希金大街开去,但是没有沿这条大街一直向下走,而是向相反方向,沿彼得罗夫卡转来转去,眼前是斯特拉斯诺依林荫道。昨天我们还曾讨论过:万一发出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昨天,严寒还没有完全减弱,而今天却是雪雨交加,道路泥泞,雨刷在汽车

风挡玻璃上不停地滑动着，我看到我们正在左侧行驶：我们没有朝检察院方向转弯，而是朝花园的环形地带驶去。

“啊哈！原来是到……”我脱口而出。（由于焦躁，我说走嘴了，好像是我希望到另一个监狱去似的，其实到哪个监狱去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冷静了，在彼得罗夫卡大门附近再向左转一个弯）我把帽子摘了下来（左右侧的两个人颤抖了一下），放在膝盖上。开始镇静起来，恢复了泰然处之的情绪。正如我在前一次被捕时，我自己所写的诗中表达的那样：

任凭触犯我的躯体、骨骼，
保持泰然自若，
有如犯人被押送刑场，
神色不惊，从容不迫。

不知为什么，我的两个手指伸到喉咙那里抚摸了一下，仿佛按摩似的。右边的押解人员紧张地、迅速地命令：

“把手放下！”

我重新抚摸着，并以极惬意的口吻，慢吞吞地说：

“我知道法律。我不使用刺人的锐器。”

我在按摩，不知怎么非常有效。还是右边这个人（左边的押解员沉默不语，暴徒之中通常总是有一个最凶狠的），又说：

“把手放下！”（看样子我能掐死自己吗？）

我在按摩，并说：

“我知道法律。”

沿着花园环形地带向右转。可能要去列弗尔托夫监狱。

我们要给那里增加"收藏品"了。从前,我不止一次去过那里,但是没有在那里坐过牢。

这一切多么简单地结束了:牛犊顶橡树,顶啊顶个不停,侏儒反对巨兽,反来又反去,全世界的报刊都议论纷纷:"当局害怕的惟一的俄国人!……照样在莫斯科市中心自由自在地行走着!"其实呢,总共只需两辆轿车,8个人,押解的牢固程度绰绰有余!

我完全恢复了镇定——我犯了第二个错误:我绝对相信逮捕。我没有估计到他们作出这种决定,敢于冒这种风险,我把他们估计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厉害,不得不承认。对于逮捕,我一向有所准备,毫不奇怪,我们该收场了。

〔妻子看到我刚一离开,还没有等那些挤在门廊里的克格勃分子完全走出门外,她就跑回书房,从我的和她的写字台上把头等重要的材料急忙收在一起,其中无比珍贵的藏在自己身上,其余较厚的一些纸片,她在金属茶盘上烧掉了。这个茶盘一直放在书房里供经常烧毁"书面对话"之用。她跑到电话机旁,果然不出所料电话已经切断了。为什么自己人谁也不到她这里来了呢?没有谈话声,没有脚步声,整个住宅一片死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摸了摸自己身上,东西藏得严严实实,她来到前厅,那里的情况是:来的8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留了下来——粗壮笨拙的"民警"大尉和那一个最早来过的腼腆的"信差"。就是说在等候新的人员,将要搜查。可是,两个孩子还留在院子里。于是伊戈尔·罗斯基斯拉维奇重又闯入书房,他守护着门。他站在那里,挡着门,手里紧紧提着沉甸甸的大手提包。现在,再一次清理纸片信件,已经比较有次序地

分门别类，但仍是快速度地挑选。烧掉，太可惜，在这样的时刻什么都烧，过后会后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可以这样办：把个别的单页纸夹在各个书本里，即使他们找到，也连接不到一起。书房里烧纸满屋里烟，小气窗吹不出去，烟味当然也飘散到前厅，那里的人闻到了，但是没有来！……没有悲痛、没有激动、没有沮丧、眼睛冷冰冰的——无声的愤怒：妻子对书面材料进行分类、重新放好、烧毁，其速度之快是平时所没有过的。还有大量出自不同人手笔的各种资料，加到一起可以编成一部长篇小说！还有全部的半成品，信封、纸夹堆成山，在搜查之前无论如何来不及处理！妻子来到前厅，那两个人不见了：他们俩一直不停地看表，在押走后 20 分钟时，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走吧？"另外一个人说："再等两分钟"。他们悄悄地走了。是 22 分钟以后吗？没有去检察院、没有去卢布扬卡监狱……是去列弗尔托夫监狱？这时才发现，他们走后，已经不能锁门了，锁头给砸坏了。一岁半的伊格纳特爬到台阶上。必须到外面去接孩子，一出门，我的妻子发现满院子都是民警。他们预料会遇到什么样的反抗吗？有什么阻碍吗？……妻子拨电话号码，不停地拨，虽然毫无希望。并不是完全不通，而是有什么人在值班（监视着，往哪些号码打电话？）：拿起听筒，有声音，拨动号码正常，突然又断了，又出现长长的忙音。可是断绝往来——绝对不行，要知道：人被押走了，竟然谁都不知道！妻子一直坚持拨电话号码。把小儿子斯捷潘用小推车推了回来，现在去幼儿园接叶尔莫拉依去，也许从那里能够用自动电话通知记者们。突然，不知遇上什么巧合，电话接通了，阿丽娅急忙一口气地向伊琳娜·若尔科芙斯卡娅说："注意听着，半个小时以前他们把亚·伊强行从我们家里带走。

来了8个克格勃分子,送来了强行拘传的命令。赶快!"她先挂上了电话,紧接着给下一个人打电话!不知怎么的,又打通了两家,然后再次像不久前那样打不通了,大约中断一个半小时。不过三个电话已经足够了,他们会打电话传遍莫斯科。〕

列弗尔托夫监狱熟悉的大门口(在我上升到顶峰——被提名为列宁奖金候选人时——我曾有幸来过这里,为了从表面上研究它,任何时刻都通行无阻)。熟悉的活动大门、院子,还有一排办公室,通常的探视在这里进行。我们一行抵达时,天色已经昏黑,院内照明不足,有几名军官伫立着,是在等候我。可以不必谦虚地说:在列弗尔托夫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如果有党的方面的什么人物在此值班,视察,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是啊,我不间断地辱骂他们,无数次地威胁他们,今天到底被捉了起来。有如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布加乔夫——终于落到了人家的手里!

他们如同在战斗中那样下达命令:汽车应准确地停在什么地方,10个人相隔一定距离围成圆形,忙来忙去的,应该开汽车的哪个门,不应开哪个门,按照什么顺序从汽车里走出。我坐在车里,一动不动,车里暂时还暖和、舒服。"出来!"命令我向监狱台阶方向走!

丝毫没有考虑今后如何,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怎样才能在我刚一走下车时就给他们一些凌辱与蔑视。我背的破书包颜色很深,挎带很长,我把它背在身上活像乞丐的讨饭口袋。我慢悠悠地从车上走下来,径直朝监狱走去。没有几步远就到了台阶,一级一级上去,走到平台。我戴着一顶破旧的羊皮帽,穿着哈萨克斯坦牧民样式的短皮袄("他的那一身打扮好

像是去打鱼。"马里亚罗夫后来说,说得准确),背着装满施舍物的讨饭口袋,大摇大摆地走着,仿佛主人回到自己的陋室去,仿佛周围没有任何人存在。

侦查员办公室已经搬家了,这里现在是入狱检查的小单间:一切都非常沉重,光秃秃的桌子、两条光秃秃的长椅,上面的吊灯极其简陋。两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人坐在一张长椅上,我以为他们是劳改犯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隔壁房产处的见证人!瞧,多么遵守法律!……)。我在另一张长椅上坐下,把背包放在旁边。

不,我没有想到。说真心话,我没有预料到。

他们下定决心了……

被捕兽夹子夹住的狐狸说:时间还早,也许还能睡一觉呢!

这时,进来一个平平常常的入狱检查员,他动作敏捷,面色苍白而且呆板,毫无表情,他警觉地让我把自己携带的东西扔到桌子上。这是最普通的监狱制度,简单又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诚实、毫无欺骗可言,以致我丝毫也不勉强地服从了:制度就是制度,我们是在制度之下长大的,监狱接纳被捕的人如果没有入狱例行检查,这就如同坐下吃午饭没有勺子或没有洗手一样。我把自己的帽子、短皮袄、衬衣、裤子都交给了他,然后等待着,老实说,我希望立刻还给我(一个又高大又健壮的小伙子急忙过来协助检查,衣裤上所有的线缝都摸了个遍,可是我要说他们检查的并不严格)。检查人员并不催促我赶快脱光——暂时就这样坐一会儿吧!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头发斑白的上校,他神气十足,但肌肉松弛。

当我描绘自己未来的监狱遭遇时,我已经是现在的我了,

我以全部获胜的力量和意义，坚定地相信不仅审讯我时，我们听不到一个字，我宁可死去，我不仅不承认法庭裁判，在一开始我就向法庭申请回避，整个审理过程我将保持沉默，只有在最后我将说出诅咒他们的话，而且我坚信我绝不屈从于我们这些政治犯所处的低劣的监狱状况。我在《古拉格群岛》中已写的够多了，早在20年代，青年们就曾捍卫过以往俄国政治犯的高傲传统：例如典狱长进门时，不必起立，等等，等等……至于我现在——有什么可丧失的呢？是不是我可以坚持不肯让步呢？谁还能比我更合适的呢？

然而，当穿过第一道明亮、清洁（卫生制度严格）的监狱走廊，当走进第一个单间坐在第一张长椅上以后，不知为什么就这样轻易地服从检查人员的指挥了——不错，习惯成自然嘛，有如奶牛在挤奶时总是顺从地站在那里不动。我已经开始考虑，我的方针该如何实现？汽车转来转去，不想知道（或者佯装不知道）里面谁是名人，谁是平庸之辈。而我呢，当我吃着可口的饭菜，自由自在地散步、充分地睡眠，而且还备有各种小的器具：头下面放置什么，用什么遮挡眼睛，堵住耳朵——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几乎失去了这一切，由于血压高，头已经发热，不过在典狱长们面前应该根据一些琐事提出原则——最容易抓住的问题莫过于单人牢房，寒冷、饥饿、潮湿、神经根炎，而且我如今已经55岁了，远不是27岁的我了，那时候，面色红润，是前线战士，第1号牢房的什么人问了一句：从哪个疗养院来的？此刻我也感觉到自己是前线战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又反对审讯，又对抗监狱领导机关，也许我的力量不够。看样子明智一些的做法是珍惜全部力量用于第一条战线上，而在第二条战线上立刻让步，见鬼，

就随他的便吧！

此刻，一位狡黠的满头白发的上校春风得意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人。他充满自信，但语气缓和地问：

"您为什么不站起来？我是列弗尔托夫监狱的典狱长，科马罗夫上校！"

从前，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场景，不过今天，这事突然发生在牢房里(在关进牢房之前监狱的长官们通常不到囚犯这里来)。我坐在床上，对这位上校说："您也请坐吗！"或者简要地论战："在旧俄时代，政治犯在监狱首长面前从不起立。我看不出为什么在苏维埃时代要站起来呢？"或者说一些表示不屈不挠意向的话，或者耍一点花招：刚一听到钥匙声响就马上站起来——装作不是面向他们而起立。

但是现在，在这个小单间里我几乎脱得一丝不挂，而且也措手不及，我看着这些随从们，听着正式的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必须起立，况且我已经打算集中全部力量用于主要战线，因此我慢慢腾腾地，扭歪着脸很不情愿地，好像是尽职尽责一样，站了起来。

那么，从本质上说，这是不是第一次让步呢？是否会成为摧毁我的开端呢？他们向上级报告时会不会高度评价我遵守监狱各项规章呢？也许上面会有人赞许和兴高采烈呢？他们非常、非常有可能预谋在第一个晚上就摧毁我——那么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接着，还有一连串的攻势，于是也就有一连串的让步：手持履历表的军官发问：姓名、父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点——可笑吗？不予回答吗？但是我知道，这是对所有的人都问，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程序。我回答了。(摧毁还在继续吗？)

医生是一个典型的监狱婆娘,有什么病吗?什么病也没有。(难道我能向您说出血压高吗?)没什么关系,利用听诊器,呼吸!停止!转过身去!双臂分开!不听从身体检查、拒绝吗?显然是愚蠢的。不过入狱检查即将结束了,又重新发出:双臂分开!(我起初已经顺从了,那么现在该如何是好呢?)转过身去!坐下!……俗话说得好:要是不保护好每一根胡须,也就难以长出一部大胡子来。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超出了常规:又钻出来另外一个医生,是个男人,他根本不是智力劳动者,而是监狱里豢养的一只黄鼠狼。不过他倒非常谨慎小心,他说:我也想为您检查一下,您允许吗?又是摸脉、听诊(我想,您不会听出什么,我的心脏跳动正常,上帝保佑每一个人,我异常镇静,在老家里这一切都很熟悉,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接着,这个坏蛋拿起了血压计,又问:请允许给您量一下血压,好吗?可是能不允许测量血压吗?我的毛病将会暴露,我斜眼看了一下血压计刻度盘,我根据声音暗自听着:160—170,而且这还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在监狱里度过一个夜晚呢!是的,无须用多长时间,他问:"您是否有高血压病?"关于血压问题我们在电话里已经说了多少次了,克格勃分子全都监听过,完全是公开的,在电话里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回答:"没有,没有。"

我倒是服从了规章制度,可是他们呢?他们没有还给我我的破旧什物!为什么?我的表,我的贴身十字架按照常规开了清单,关于十字架我与他们发生了争执,这是第一次争执。"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他们不给,说这是金属!那么破旧什物是柔软的呀,凸纹已经压平,没有隐藏铁器,也没有铁钩,为什么这些什物不还给我?回答说:送去消毒。至于清

单,拿去吧！上面全都写明了,直至自制的眼罩。从前可不这样。不过,也许我落后于监狱的技术了,如今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消毒呢？我指着我的短皮外衣问:“这个不必高温煮沸消毒了!”“我们明白,不必了。”这使我很叫惊,不过我把这一切归功于新的规章制度。发给了一种粗糙已极的背心,穿上扎肉。这很正常。黑色制服,监狱一养老院式的,凭本人意愿是不会买它的。但是外衣却是西装,真正的西装,至于质量好坏,我从来弄不明白。还发了矮帮鞋(不带鞋带的),说不定,也许目前都是这样的衣着？我们在特殊情况时也曾经乔装打扮。过一两个小时将我的全部东西再还回来,把我们带走了,前面,后面各有一名监狱看守。他们弹着手指,走廊、过道、移动式哨亭,这一切依然如故……我们上了二楼。还没等你看个仔细,他们又想出了新花样:在楼层之间网状板上遮盖着灰色的帆布,要想透过网状板从这一层看另一层是不可能的了。真像是在夜间,在两场戏之间,玩弄阴暗又无声的杂技一般。

〔接到电话之后,以萨哈罗夫为首,集合了5个人,他们冲向普希金大街的最高检察院门前,一方面表示示威,一方面在等候我,看我会不会出来。至于到我的住宅去的人则络绎不绝——关系亲密的人和关系一般的人。他们三三两两,有时5人一起来访。每次来人,门打开时都还插着链销,门裂出一个大缝,来回摇动着。我的妻子只向第一个人讲述了所发生的事,然后,听过的人再向其他的人复述。她去拿了一些纸来:瞧,写了多少啊！只有现在才感觉到,身临其境时感觉不到。一切都是那样协调,剧烈的狂怒与泰然自若的工作。一个思想,一个思想仿佛毫不相干似地掠过,并不引起绝望,他

们会如何对待他呢？打死他吗？不可能！可是寻常被捕也不可能！而有些思想则很清晰：应该做些什么，把什么东西送到什么地方去。]

监牢里没有设置单间，我没有发现，可能是没有。我确信，我就独自一人在走着，走进了牢房，按面积是个单人牢房，可是却放了三张床，两个青年犯人正在躺着吸烟，充满了烟味。我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一点，为什么不让我单独住呢？再说吸烟，我曾经吸过，享受过吸烟的快乐，现在只闻了十分钟，头就受不住了。如果按照强硬的路线，则保持沉默，如果按照软弱的路线，则提出要求："我要求换单人牢房，吸烟对我有影响。"陪同我的中校有礼貌地说：他将请示上级。一般地说，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可能这也是如今新的风格？（如果不把这个中校在一进门时粗野地骂了一句我的两个同牢人算在内的话）对于他们的礼貌和我自己的镇定，我全都习以为常，仿佛我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里从来都是这样似的。事情是这样：我所以如此泰然自若，是由于我服从了监狱中的规章制度。否则会由于微小的冲突而毁掉我的一切。尽管没有深思熟虑，但是很明智，检查吧，我的身体，让它转来转去吧！而由于我的镇定，你们会紧张得要死！如果上面，从中央委员会派来个监督人，他怀着某种企望开始乞求我，我会大发雷霆吗？会骂人吗？会大喊大叫吗？丝毫不会！我没有抬高声音，没有加快速度，我坐在床上，仿佛在打瞌睡，我在牢里踱步，有节奏地啪啪响着。而如果他们怀着这样的预谋，希望我突然开始发火，软弱起来，开始提出一些要求或垂头丧气地苟同，那么正是由于我的镇定自若他们的预谋才落空了。

房门锁上了。我的同牢伙伴有些惊慌。吸烟怎么办呢？你们这里怎么把气窗关上了呢？啊，是由于寒冷，取暖设备差，必须盖上大衣，还是非常冷。那么这样吧，吸烟之后，我们打开气窗换一换空气。

一切依然如故。如同人们讲述的那样，牢房没有什么变化：不过这里使用的是肮脏不堪的灰色抽水马桶，而不是一般的便桶；桌子上放着的杯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由于近处风洞管子的震动而互相碰撞，现在安静多了，这是一种幸运。天棚上吊着刺眼的电灯，带着网罩。黑面包还是整的，没有切过。要知道，已经是晚上了。监视孔不断地有声响，说明不只有一个站岗的人瞪着眼睛往里面看，而是有许多人轮流窥视。看哪，快来看，到底给抓来了。

我注意着自己，高兴地发现我丝毫没有新来乍到的人那种感觉。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同牢房的两个青年人（新犯人通常只陷入悲痛之中）。他们俩都很年轻，一个是黑头发黑皮肤的小伙子，样子狡猾，非常好动，他是一昼夜以前被抓来的，还没有冷静下来呢！另外一个是浅色头发，入狱也不超过三昼夜。据说不是逮捕，而是拘留。不过，如果他不是有病的话——萎靡不振、浮肿、苍白——那么许多特征说明他曾长期坐过牢，这种长期坐牢的不乏其人。但是，他们已经开诚布公了，可能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诉说了一切……我没有问："为什么坐牢？"而是问："被指控为什么罪行？"回答说："非法买卖外币。"

他们还没有尝到监狱的滋味呢——在斗室里来回走动，总共只有走 4 步远的空地。我一生中从没放弃过步行，在这里也是有益处的，只是慢慢地走。穿着不是自己的鞋，本想轻

轻地走,可是却像踏在木头鞋上一样。监视孔外面不停地有声响,有动静,有人在监视着,总也看不够。

命运已经决定了……

〔萨哈罗夫等5人在检察院门前,从大街上不时地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平安无事?而回答他们则说:"这里没有什么索尔仁尼琴。"这使得朋友们和自家人更加焦急,宽敞的厨房里挤满了外国记者,而搜查始终未能进行。是否等候搜查呢?妻子举棋不定,焦灼不安。她想:趁此时机是否把珍贵资料分发给朋友和熟人?请他们分别藏到怀里、公文包和手提包里面,行不行呢?说不定这样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他们会立刻个别地抓住每个人,塞到汽车里,尽情地搜查,不给任何书面凭证,不做记录,甚至以后你想证实这件事都不可能……不,不能凭感情冲动而作出蠢事来,不能让无辜的人们遭受痛苦(也许他当真没有被捕?也许,还会回来?他们不是说:"一个小时以后他就回来吗?"可是,已经过了3个小时了,毫无疑问,被逮捕了)。有人提议把3岁的儿子叶尔莫莱带走,以免给小孩子留下沉痛的印象。"让他逐渐习惯吧,他姓索尔仁尼琴"。〕

命运已经决定了。莫非人们还不明白,我就像德国人扔到我们大路中间的装上了炸弹的自行车:它放在大路上,无遮无掩,谁都可以去拿,可是,只要你受它的诱惑,前去动了它一下,立刻就会有几个自己人被炸翻。一切早已在西方知晓,一切早已踏在起跑线上。现在一切都会自动公开,计划公诸于世:我的遗嘱是——《古拉格群岛》还写两卷;还有这本《牛犊

顶橡树》,加上补记之三;电影脚本和电影;《普鲁士之夜》;《胜利者的欢宴》;《十二月党人》;《献身者的公路》;《第一圈》(96章),列宁的篇章;第二节)……当然,他们不明白全部内容有多么庞大。好吧,夺过来!如果我没有这一切,我早就闹翻了,我会立刻自焚,烧得比我的那个可怜的同牢伙伴还更坏。可是现在我得沉着冷静。走向末日,就是走向末日。我希望你们也同样。

伙伴们提议让我吃一点面包和面包干。好像我也想吃东西了。我回想起在家里约定3点钟吃午饭,我说:不,我要带斯亚潘到外面散步去。这样一来,从早晨起到现在什么也没吃,饿着肚子入狱,而且直到明天早上不会送任何吃的东西,该发给的东西都错过去了。在吃过莫斯科中等黑面包以后,这里的面包简直糟糕透顶,像粘土似的,而且故意烤得很坏。没关系,我会习惯的。

怎么回事呢?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可是我的东西还没还给我。"我提出要求"(举起一个手指)。他们立刻严阵以待,打开送饭窗口,他们正在议论着,来了一位军官,又来了一位。我轻声地说着,一点也不吵嚷,不像往常那样得理不让人,而是甚至有些懒洋洋地说(那时候,全部力量表现在声音洪亮上,而现在,力量表现在其他方面——书籍在逐渐地、不停地慢慢发行着):该是归还东西的时候了,晾洒消毒的时间该结束了。突然,门打开了,中校粉墨登场,还有一个当官的给我送来一床被子,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新被子,从未使用过的。伙伴们非常惊异,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呢?……奇怪!算了吧!现在还缺少什么呢?最好是赶快睡觉。我习惯于9点钟躺下,可是8点钟躺下我也并不难为情,而这里是10点钟

正式发出就寝号令,快快睡觉吧!为了迎接明天第一个回合的战斗,第一夜决定一切。夜晚幸福的抑制状态,思想松弛,这样的状态现在最好能够赢得一个、两个、三个小时。没有镇静药物,夜间将会失眠,而现在正该睡觉。可是不行:只允许躺在被子上面,不许脱衣服,不许盖被。伙伴们还在吸烟,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每次都打开气窗把烟味放出去。那个黑发青年在我的头顶方向转来转去,叨咕着:"那么,是谁可能说出去的呢?是谁?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看样子他和妻子把生活安排得尽善尽美,光有家具还不够,这不,还购买了小汽车,而在正常的国家里一个工人只靠普通工资能干什么,于是我们就变得狡猾一些,干点违法的事。在搜查时,从他那里拿走了一些外币,现在应该把这些钱币解释清楚。"小伙子,你听着,一般地说衣袋里少装点钱。这里装有送活器,你不必担心!也许什么都没有,明白吗?你应该动一动脑筋,想一想自己。"他沉思着,我还想把我的狱中经验再讲一点什么,以便消磨时间。突然,锁头响了,正像卢布扬卡监狱一样,每到睡觉之前必然审讯。那么,现在是不是连夜审讯呢?(我在白天还什么都不说呢!)

那个中校,从来没有叫过我,也没有问过我的姓名,他请我去走一遭。要是在就寝之后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的,那么此刻呢?还是去吧。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把我带到牢房时,就没来得及向两旁瞥一眼,一个军官在前,一个在后,而中校——列弗尔托夫的监狱长站在道中间:请从侧面走吧!经过一个前厅,又一个前厅,来到办公室门前。光线很亮,摆着几把椅子,摆出围坐成圆形的阵势,那里已经坐着两个人(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不知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是不是化

了装的人?),和我一起进来的有5个人。主审席后面坐着一个矮个子,尖尖的脑袋,秃头,他低着头,在台灯下面,由于纸的反射他的秃头显得又白又亮。屋子的正中间空着,正常的人是不坐在中间的,恰在电灯下面放着一把椅子,面对主审席,上校和中校让我坐在那里。没关系,坐着总比站着好。我坐了下来。同时感觉到我后面的人也都坐下了,在我的身后围坐成半圆形。我们都默不做声。

主审人用眼睛打量着我,好像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似的。

没关系,看吧!

他用刺耳的声音,甚至极力用响亮的声音问道:

"是索尔仁尼琴吗?"

他错了。他应该问:"姓什么?"……不过算了,既然已经被捕了,就忍耐一下吧:

"正是。"

他又尖声地问: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我镇定地回答:

"正是。"

于是他尽量大声并且强调说:

"我是苏联副总检察长马里亚罗夫!"

"啊!啊!……我听说过。"

我曾在萨哈罗夫写的文章中读到过这个名字。不过,萨哈罗夫没有描写他是如此矮小。根据札记可以想像他是一块标准的巨石,实际上却是劈成的碎片而已。

不过,他倒是一个干将,一点也不繁琐拖沓。也许,与我同在一个房间里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急忙宣布:

"我宣读决定……"

我不记得是谁"批准"的，是他还是总检察长，而做出"决议"的人充其量是那个检察部门的一级官员兹维列耶夫，他穿着考究的皮大衣，几乎像是民警似的不止一次到我的住宅去过，你看，一切都是由政治局操纵着：

"……根……根……根据刑法第64条，提出对你的控告。"

我用低沉的声音，庄稼汉的粗鲁语调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新的规定(要知道，它颁布仅仅才13年)……第64条是什么？"

那还是在斯大林——父亲当政的美好时代，只要坐上10天监狱，就会在黑暗中背诵任何一个法律条款。

马里亚罗夫瞪起了像虾一样的眼睛，说：

"背叛祖国！"

我一动也没有动。

(我的身后坐着5个人，防范着，看我是否会向他冲去？)

"签字吧！"他拿过来一张纸，叫我走到桌旁去签字。

我仍旧未动，把早已考虑成熟，份量很重的话说了出来：

"我将拒绝出席你们的审讯，拒不出庭听你们宣判。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一切！"

大概是在预料之中，因此并不感到惊奇：

"只是需要签字，已经宣判完了。"

"我说过了。"

对方并不争辩。把纸拿过去，自己在上面签了字。

哎！29年以前，侦讯员对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是怎样逼迫的呀，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没被榨取殆尽的部分。而现在

多么高明——我把自己表现成一个顽石，他们甚至不抱希望，不想触及和压榨我，不想试探。审讯并不困难：不必动脑筋。我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预先声明了：你们说吧，想把什么罪过加在我的头上都行，任何时候与我都不会发生矛盾，因为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正需要这样，这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到此为止。仍是原来的程序：我身后的人站了起来，我随之站了起来，我前面一个军官，后面一个军官，穿过两个前厅，让我反剪双手（不很严厉，只是语气缓和地提醒我）！当然，我也可以不把手背过去。可是，我还是把手放在背后了，如果你们知道该有多好，我倒背双手甚至更表现为信心十足：干吗让两只手摆来摆去，让没被打死的自由逃民迈正步行进呢！对于我来说，双手反剪，一瞬间我就成了坚定的劳改营分子，我与成百万人结合在一起了。你们不知道：在人们护送之下如此乏味短暂的行走是怎样坚定了我作为劳改营分子的信念。

不过时间不长，马上到了牢房。伙伴们问我："怎么样？"

说还是不说呢？

我真的记不得：要是在15年以前，这是准确的，当然会枪毙的。

是的，现在他们胆子大了，我没有估计到他们会这样。你也该有不同处理方法。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现在，我不能一分一秒地去恢复当时发生的事情。大约在晚9点之前把我叫去审讯。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的妻子说："您的丈夫已被拘留。"在9点15分钟时，我们的大使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提出于次日上午接见并转交重要声

明，这对于欧洲来说时间已经相当晚了，就是说比这还晚。这种偶合并不排除在我入狱的若干小时以及马里亚罗夫把我叫去审讯时，他们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放逐。(因为如果决定了，为什么还要宣读法令条款呢?)他们尚存一线希望，万一我害怕了呢！那时，可以开始强制我让步吗？如果他们有过这种算盘，那么我的这副铁石心肠，消极对抗，会使他们的计谋破产。

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妻子次日早晨给侦讯员巴拉绍夫打电话问询情况，这个人似乎就是有一次叫我去到他那里的那个人。一切都已结束：我被逮捕了。她挂上了电话，又有一些人打来电话问讯，消息传遍莫斯科。]

终于宣布就寝了。好，现在应当迅速行动，这些我早已学会了：把被子拉开、上衣一扔，裤子一扔，当然也不能扔得太远，因为冷。咳，这帮畜牲，把我的皮袄据为己有了！还有毛线袜子！赶快。此时，他们如此忙于宣判，瞧吧，明天一清早就得急匆匆地审讯。由于大家都忙忙乱乱，慌乱之中把皮靴放到枕头底下！这是老劳改营分子的规矩：为了保存鞋子。而我现在则是为了枕在头下！灯光刺眼，用毛巾把眼睛遮盖上，在卢布扬卡是不禁止这么做的。是不是要求把手露在外面呢？也许不要求吧！睡觉！呼吸，深深地、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在牢房里呼吸什么呢？不是空气，我已经忘记了。)

不行，狗崽子，他们发现我的床底下是空的，从送饭口向我喊着：

"把靴子放到地上！"

没有靴子可垫了，我弄了又弄，垫上个枕头。然后深深地

呼吸,入睡了。

〔孩子们睡不着觉,他们害怕吵闹,害怕光线和嘈杂的说话声。来了一些新的客人,还有萨哈罗夫一行人也从检察院到家里来了(不管怎么说,在被捕者的住宅里集聚了如此众多的勇敢的同情者——这真是一个新的时代!)。萨哈罗夫从我们住宅回答加拿大广播电台说:"逮捕索尔仁尼琴——是对他出版书籍的报复。这不仅是对俄罗斯文学的侮辱,也是对牺牲者悼念的侮辱。"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有: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汉堡、巴黎、纽约,客人们拿起话筒,证实了详细情况。他们在思索:如果刚一开始发言的索尔仁尼琴已被逮捕,那么,现在还有谁被禁止逮捕呢?那么明天将会抓走谁呢?……

没有参加过秘密活动的人,不会理解这些折磨人的痛苦:宝贵资料在什么地方保存最好呢?带走?还是留在家里?现在这么多客人,是否分发给他们?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检查?错过这个机会,到了早晨那一伙人冲了进来,把一切全都搜走!?可是,如果分给大家,就把他们全都毁了。再说,今后能否重新收集起来呢?算了吧!在一切尚未明确之前,还是寄希望于藏在家里吧。〕

晚上躺下就入睡这并不算高明,第一觉醒来以后再次入睡那才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哩!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坏事全都闯入睡梦中,它刺痛着胸口,灼伤着心脏,怎么能睡觉呢!我的同牢伙伴——黑市外币投机犯在我的头顶方向不停地叹气、辗转反侧,彻夜吸烟,魔鬼似的电灯刺痛着眼睛,尽管如此,我的失算、我的疏忽仍是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入脑际,一个

接一个地出现，出现着！

最使我焦灼不安的是家里的搜查情况，阿丽娅怎么样？从晚上起我的印象和事件那么多，或许是迟钝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为家里的搜查而担扰。现在我一直担心这件事，而且一切都是由于我的过错造成的。我何必要去开门呢？我如拖延半个小时，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烧毁材料、整理文件、商讨对策嘛！我为什么急忙被他们带走呢？一切都留在家里了。另外那8个人没有离开，他们肯定是在兹维列夫指挥下搜查我的家呢！沙法列维奇也在场，他也在他们面前暴露了。也许，他不会交出手提公文包，可是他抽出一份《社会主义》文集放在写字台上了，并且已经来不及收藏起来了！幸好，他把我给专集写的文章收了起来，可是其余的全都直接摆在桌上了，还有其他作者尚未全部写完的草稿，哎呀——呀，哎呀——呀！《巨石周边》文集遭殃了，写了三年——毁于一旦。还有呢！许多西方来信，明晃晃放在写字台上，都不用翻找，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从来没有一封信落到他们手里，现在可好，他们可以大读特读了，全部的牌我们都摊开了！……信可能还不少呢……是的！还有我在最后一夜写成的《致领导者们的信》的修改稿。……还有一个半曝光了的底片，它是上一次送出去的东西的副本，本应该烧毁，可是我到城郊去时忘记拿了，而在家里烧又难以处理，这种“猎获物”落到他们手里简直毫无意义，完全是可耻的。还有，在保险柜里放着《牛犊顶橡树》的全部书稿！书的全部，已经是打好字的书稿了！我真想大声吼叫，让全牢的人都听见，我多么想旋转、奔跑呀！要知道，这些年一直是这样，像抽彩似的，总是认为我这里最安全，所以书稿都集中到我这里，总认为我性子急，我们会把整袋子

的书稿拖出去，运送到什么地方，然后埋起来。那部《十二月党人》是否有一份还放在家里呢？至于第二节和列宁的篇章更不必说。这些现在全都落到他们的手里了。我的上帝，上帝啊！我如同山岩一样挺立，25 年的秘密活动，一贯顺利又顺利，而今却遭到这样的惨败。由于胆怯，他们从来没有敢于做的事情，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竟如此轻而易举地直接来找我，于是全都解决了。

同牢的那个可怜的外币买卖投机者还在我的头顶方向扭来转去，焦躁不安，吸着香烟。我对他说："睡觉吧！睡吧！最需要的是保存力量。"他没有睡，"谁出卖了他？"这个问题刺激着他。除了自己的失误，还有朋友的背叛，这永远是令人痛心的。另外那个人却睡得很沉。

〔接近深夜时，阿丽娅的两腿疲弱无力，头和眼睛充血，一切都变得模糊了。而且还不是个别的断断续续的思想，而是某种混杂不清的思绪，她一点也不想睡觉。她想第三次尝试开始检查一下文件资料，然而体力不支。此刻她才恍然大悟，她从早晨到现在没有吃任何东西，丈夫也是没吃午饭就被带走了。从前用于烧毁信件文稿的托盘显得太小了，在厨房里的地上放了一个大盆，就这样放了一个半月。

这一夜进行了搜查：由 14 名克格勃分子前往梁赞市，到我的朋友们拉杜金家里进行搜查，可是我在他们那里从来也没有存放过任何书稿。他们是去搜查比《古拉格群岛》更为有份量的东西，比如寻找这部《牛犊》和他们还没有弄到手的一切。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对妻子保证说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我能坚持

两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坚持两年。为了活着的时候能够知道我的全部作品都已出版，而后死也瞑目，这一点已经刻骨铭心。而今看来，我的保证有些力不从心。我能在任何逆境中固守，但是必须有空气、必须安静，以便能够创作。而这里，在两个月之内我能不能够死掉呢？审讯最低限度得要两个月。毫不畏惧，丝毫也不让步，可是会不会生命终结呢？

如果搜查一无所获，那么一切就可望成功——书稿送出去印刷，而那些正在传递中的书稿，那些草稿、不同版本、构思计划全都放在阿丽娅手里，她坚定而忠实。留给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死而无憾。还有三个儿子逐渐长大，他们会在某些方面继承亲爹的路线。〕

〔整夜没有睡觉。检查、精选、焚烧材料，但是销毁得并不多，要知道这是无法再恢复的。此刻她猛然想起一份草稿，她开始寻找：那是去年夏天，在遭遇战之前写就的关于法庭无权干涉俄罗斯文学的声明，一直弃置没用。她找到了这份声明！马上行动！深更半夜就行动吗？……两只手灼痛难忍！千万不要耽搁！明早6点钟，依照“法律”他们就会来搜走，会销毁它，声明就成了无人知晓的一纸空文了。应该立即行动，就在夜里！立刻给记者打电话，给谁打呢？根据各方面考虑，决定给《费加罗报》的记者拉昆特尔打电话：“您能来吗？我有事求您。”“5分钟以后我就到！”怎么？夜间通过电话找外国记者到被捕的人家里去，竟没有受到阻止？不，不，是布尔什维克疏忽了，打盹了！唉，热情的捷尔仁斯基，你在哪里？）……阿丽娅坐下打字，在薄纸上一次打了10份。记者何尝不要这种

新闻呢？理所当然地需要。拉昆特尔整理一下包好，保证说分发给其他新闻社，他走了。阿丽娅继续整理文件、书稿，有多少封别人的来信需要烧毁，多少位写信人应该拯救！成堆待烧的纸张放在大盆旁边，总的来说，搜查之前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早晨 6 点钟了，他们没有来。现在已经 7 点钟了，孩子们起床了，大人没有时间睡觉了。〕

奇怪，牢房里的这一夜并不感觉到冷，尽管经常打开气窗。那么是不是由于我的呼吸而使牢内变得暖和了呢？

早晨起床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从前敲门敲一次，现在敲两次：谁是牢房里的值日生？拿起刷子，清扫！再没有什么比监狱的早晨更加晦暗的了！依然是那束从天棚上射出的夜间刺眼的灯光。依然是那扇黑洞洞的窗口，现在等候监狱中的常规：面包、开水、早晨点名。而在 9 点半钟以前是不会叫人出去提审的。

事实并非如此！锁头响了，还是那位中校，远处还有一个大尉（对于清早这一时辰来说，他们的军阶过高了一些），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规矩，他们之中谁是专职的，没有什么人喊我的名字，丝毫没有怀疑我的姓氏，语言加上手势表明：需要我**走一趟**！

仍旧是到昨天晚上去的方向，只不过到了马里亚罗夫办公室门前，转向另一方向。去吧，那是卫生所！昨天检查身体的两个医生在场，押送我的军官们向后退了出去。婆娘一点也不忙乱，举止像个护士似的，而那个男人关怀备至，问我自我感觉如何？让我把上衣脱下，卧在床上，问我曾经患过肿瘤的部位。这个该死的家伙什么都知道，他准确无误地摸到了

边缘，这说明他不是伪装的医生。他再次测量血压，对于早晨来说，我的血压偏高。他问："平时您服用什么降压药?"我粗鲁地回答："有现成的酊剂卖，山楂露、益田草精。"医生向护士示意，而她立刻打开药柜拿出小药瓶，真是益田草精！他们给我倒了一些，我喝了，空腹服药，妙极了，再好不过了！

把我送回牢房。伙伴们惊讶万分：我简直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囚犯。

〔对于妻子来说，9点钟以前的时间仿佛无穷无尽的长，她焦急地等待着可以给检察总署打电话的时刻。商店开门了，买了一些食品，以备围困时用。夜间，外部世界的事件好像停止了似的，而早晨却感到心情极度紧张压抑。不知现在从电话听筒里将会得到什么消息？传出来什么话语？两只手从一清早就低垂着，她如同昨夜那样疲惫不堪。终于到了9点钟。她给那个巴拉绍夫打电话。不言而喻，没有人接电话。又打，又打，每隔10分钟打一次，没有人，还是没有人接……现在该如何考虑？他们怎样处置他了呢？完全垮了，电话没有人接的嗡嗡声。她眼前发黑，头脑发晕：她想准是把丈夫打死了。不存在电话，也不存在巴拉绍夫，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摘下过电话听筒，任何时候也没有回答过。因为已经打死了。昨天她怎么没有明白这一点呢？她无谓地瞎忙，东藏西放，不停地焚烧。而今无论她奔向哪里，到处都是墙。旁边有一个声音建议：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按照苏联的逻辑是可以的。但是，怎么能向凶手查明情况呢？无论如何不能！哪儿也逃脱不掉，他们自己会通知的！只不过可怎么等待呢？……再说也没有人来搜查，为什么呢？他们想一昼夜

之间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藏起来了,或者他们认为,我们反正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何必着急搜查呢?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如果被杀害了,他们怎么不闯进来,不把全部文稿直至最后一页全都拿走呢?妻子洗衣服去了,孩子的脏衣服积攒得太多了。]

审讯的时间到了,起先叫走一个与我同牢的小伙子,然后又叫走另外一个,只是没有叫我。那个做外币生意的小伙子在第一次审讯之后有些冷静了。他经过两昼夜的监狱生活之后,已经明白了在劫难逃。他问我在劳改营怎么样?我说,变化很大,我只能够讲一些从前的事情。我给他讲着。他的兴趣和视野迅速增长。第一个征兆是对谈话对方的兴趣,他问我:什么时候坐过牢?为什么?我讲了一些,后来我想,为什么不留下活生生的印记呢?他们消灭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人看见我这个活人了,而这个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会向别人讲述有关我的事,别人会再继续流传下去。

"你没有读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吗?"

"没有,不过听人家说过。那么您就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吗?"

"我吗,我倒不是……有一个索尔仁尼琴,你听说过吗?"

"这个……有人在《真理报》上写过他的事吧?"他活跃起来,可是又不好意思,要知道,那是个叛徒,恐怕听了不高兴。他很感兴趣,回想起什么来,他问:我真的在国外有资金吗?不允许出国去吗?

"允许。"

"那干吗不去?"

“没有去。”

“干吗？干吗不去？”他惊异不止，两腿放到床上。当我告诉他仅一项诺贝尔奖金就是7万卢布时，他抱起脑袋，痛苦地呻吟着，他为我痛苦，我怎么能这样呢?！是啊，用这笔巨款可以购置多少辆汽车啊！多少辆……在他的惊叹中、遗憾中没有贪财之心，他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简直无法把如此荒唐的事容纳到苏联的世界观中去——本来有可能出国去获得7万卢布，但是却不去！岂非咄咄怪事！(为的是让我们的上层人物也明白，不必爬得太高，他们的脑袋里是否总是想着如何利用公款首先给自己修建别墅，然后才考虑修建儿童设施呢？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我大发雷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不情愿出国去?)

连我自己也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在1970年我没有离开……

3年期间，对于此事我从来没有一次遗憾过，因为我狠狠地责骂了他们，我什么话都说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从来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语。如今《古拉格群岛》已经印发，正是最有利的形势——离开这里。

我履行了职责，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原来是这样：不可避免的死亡容易接受，而由自己选择的死亡则心情沉痛。

门打开了。来的仍是那个中校。看样子是来叫我的。一个邀请的手势。现在轮到审讯我了。把我带到楼下，带到从前的侦讯员办公室，现在那里是供会客用的单间，隔壁房间，也就是昨天对我进行入狱检查的那间屋子里的桌子上堆着破烂衣物。而眼前则是：海狗皮帽子，大衣，我不懂是什么面料的；雪白的衬衣；领带；皮鞋带！只是鞋带又细又短，用它连麻

雀都勒不死。这一切都是一个自由人的标志,这些,将代替我身上穿的粗糙刺人的背心——已经沿用了许多世纪的传统的俄罗斯式的囚服。中校像是有些窘促。他说:

"这些……您都换上吧!"

我看见他们把我的短皮袄,还有我心爱的驼毛毛衣卷成一团,我说:

"我要换上这些干什么?你们最好是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晾晒消毒的时间也够长的了,不是吗?"

中校更加难为情了,他说:

"以后,以后……现在还不可以。您现在——要走……"

要走……这句话与旅长特拉甫金在逮捕我时说得一模一样。于是,那时我就从德国回到了莫斯科的监狱。

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没有怀疑,认为是到政府去,到他们的那个政治局去,到那个马雅可夫斯基曾经幻想过的地方去。是时候了,终于我们能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了!有时我盼望这个时刻——他们将受到启发,他们愿意交谈,难道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吗?……

这种交谈是严肃的,也许是一生中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无须拟定谈话提纲,早就胸有成竹了。论据将自然得出,我将是自由人——这就足够了。如果把我作为他们管辖的人,我拒绝与他们谈话。领带?我不戴,拿回去吧。

我换上了衣服。开始忙乱起来:是否把我带走?一些人跑了出去,不见回来……最后中校回来了,他带着歉意地说:

"还要……稍候片刻,"他没有说出"在牢房里"那个倒霉的难听的词,但是从手势和行走路线我已看出是回牢房里等候。

我的同牢伙伴抬起头来一看：衬衣白得使整个牢房都闪闪发光。我本想坐在被子上，可是，又吝惜中校用心良苦，我还是在地上踱步吧。

我走着，思想里开始与政治局谈话。我这么感觉，我会在两三个小时之内，用某种东西把他们向前推动一步，使他们颤抖。我觉得他们可能领悟。要知道，赫鲁晓夫已经逐渐明白了某些东西。

〔赫勃律师从苏黎世给家里打来电话："我能为索尔仁尼琴太太做些什么吗？"起初觉得可笑，尽管深受感动，他能为我做些什么呢?！突然，豁然开朗了，当然有了！郑重其事地在电话中请求说："我请求赫勃博士立即将至今仍保存的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公诸于世！"让克格勃监听去吧！……电话铃响着，响着，仿佛在别人的住宅一样：在这些电话铃声中什么内容也不可能有。电话是从各国首都打来的，从他们那里什么也打听不到，而她自己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奉告。〕

来叫我了。把我带了出来，上帝保佑！我快步走着，离开这个哑然无声的夜间杂技场愈远愈好。把我带到昨天晚上宣布我犯有叛国罪的那个办公室……还是那个马里亚罗夫，是啊，总共就是他马里亚罗夫一个人，干吗要给我这么打扮呢？给我准备的还是房间中央的那把椅子，还有军衔颇高的军官们分坐在我的身后，我一旦冲向马里亚罗夫，他们将立即行动。

如同昨天一样紧张，极其激动地读着，强调每一个词的意义：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①]

这几个字一经说出,我就完全明白了,其余的话我就捎带着听而已,主要是为了核对一下。

他们在这18个小时之内不断地改变策略,时而对我施加压力,时而对我放松。可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始终没有变形:昨天我没有被压垮,今天也没有放松警惕。

这意味着不愿意找我谈话,他们自己一清二楚了。牛犊终于撞上大树了,看来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大树并没有被撞倒,但是似乎有点摇晃?似乎被微微顶伤了?至于牛犊吗,它的头和犄角虽然安全无恙,但是牛犊却撞到一边去了,不知撞到什么地方去了。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过去,我必须迅速抉择。

"我必须和我的家眷一起走,我必须先回家去一趟。"

马里亚罗夫站了起来,他穿着一套黑色的礼服,衬衣比我的白一些,站在房间的空地上像个演员似的,他微微抬起头说:

"您的家眷随后就去。"

"我们必须一起走。"

"这不可能。"

啊,原来如此。这是一个未曾料到的放逐形式!不过,仔

---

① 1974年2月14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塔斯社通告》是这样写的: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容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兹决定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并于1974年2月13日将其强行递解出苏联国境。

索尔仁尼琴的家庭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出境与他团聚。"

——译者注

细思忖起来他们除了尽快尽快地把我驱逐出境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保障何在?"

"有谁想拆散你们呢?"

事到如今，我只好让步了，与他们周旋，一贯如此……我应该写一份声明。

我写着，写着。列出了家属姓名、出生年月。我为什么要写声明，我不知道(错误：他们害怕我砸碎玻璃，可是我呢，却老老实实地在写声明)。应该再想出点什么来。

"我不能坐飞机。"

"为什么?"

"健康情况不允许。"

我当时没有时间仔细分析，他们怎么也不会让我乘火车的，因为万一在途中突然出现示威和其他事件怎么办呢?

把我送回了牢房。

午饭。我们前去领饭。菜汤和燕麦粥。可是我领到的份饭却不同寻常，我没有立即明白。同牢伙伴把自己的饭菜端到桌上，我在小桌旁仅有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我喝了第一勺汤，怎么回事? 汤里几乎没有放盐，我正是喜欢这种淡汤，而在监狱里通常是不给做的。这就是说，这是按照我的口味做的无盐汤。于是我竟然非常喜悦地大口大口地吃着，喝着这监狱中的，普通的俄罗斯式的清汤，全然不是什么菜汤。然后开始吃燕麦粥。现在，我正在以这燕麦粥作为标志向俄罗斯告别，这是列弗尔托夫监狱的燕麦粥，这是我在俄罗斯的最后一餐。

在接待室里把我的表，十字架还给了我，我签了字。

我们走出了牢房。令人诅咒的大门打开了，该出发了。有两辆汽车，一辆车上坐4个人，又是一共8个人。

今天，天气有些解冻，大街上非常泥泞，两辆汽车互相追逐着。我们走过库尔斯克车站。又经过3个车站。转弯、再转弯，驶向列宁格勒大街。是去白俄罗斯车站吗？曾几何时，从欧洲回来，把我逮捕时就是从白俄罗斯车站带走的。不，又走过了。沿着泥泞肮脏的大街，在这晦暗肮脏的天气里，不是去谢列麦捷沃机场，还能去哪儿呢？我对医生说：

"我不能坐飞机。"

医生转过头来，极其富有人情味，而不是像在监狱中那般语气说：

"已经什么都不能改变了，飞机正等着呢！"

（我哪里知道，飞机等的时间够长的了！足足等了3个小时，旅客们已经疲惫不堪，有的旅客还带着小孩子，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耽搁。两组人员，轮流检查飞机的状况。欧洲方面发出询问，这边的人骗他们说：有雾。）

医生又说：

"我同您一起去，我带着各种药品呢！"

押解人员围成半圆形，站在舷梯周围：如果我猛地钻了出去向侧面跑去，该怎么办？舷梯通向前面的乘客舱。舱内7个穿便服的人和一个医生，再就是我。除了医生之外他们又开始换班了（必须有人警戒，有人暂时休息）。指定我一个固定位置——靠过道的中间，我的身边有一个人靠舷窗坐着，我们身后坐两个人，前面坐一个人。过道的另一侧坐两个人，他们身后坐两个人，这样他们布置成带状，把我包围在中间。

终于，飞机在阴湿泥泞的跑道上滑行了。我们旁边及后

面有些什么飞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细节,每一细节都如同整个机场一样使我感到厌恶,进而我在俄罗斯最后看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厌恶。

我第二次离开俄国,第一次是我乘着军车与进攻的部队一起离开这里的。从国外回来只有一次:由3名克格勃分子从德国战场直接押送到莫斯科。而现在仍是由克格勃分子把我从莫斯科押送出境,只是增加到8个人了。逮捕相同,去向相反。

当飞机猛烈震动着离开地面起飞之际,我划了一个十字,向逐渐离开的俄罗斯大地致最后的敬礼。

克格勃分子们惊呆了。

〔这些不间断的电话铃声中不包含任何内容……突然,整个住宅都听到了电话喊声:"他飞走了! 把他放逐了! 到西德去了!"电话里传出伯尔的朋友们的声音,伯尔正在法兰克福迎候客人。真的吗? 可以相信吗? "我只有亲耳听到丈夫的声音,我才能够相信。"但是各通讯社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内务部证实:"西德正在等候迎接"……传来更进一步的消息:"已经抵达,正在开往伯尔的府邸途中! ……"那么说是真的? ……可为什么大家都兴高采烈呢? 要知道,这是不幸啊,这是暴力,并不亚于去劳改营……电话铃声不断,表示祝贺——莫非是对不幸致贺? ……〕

我们飞行着,好像悬挂着一样。

迁徙飞行——作为一种象征:我已经度过了55年,未来在何方,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悬挂着,冥想着:我生活得对不

对？对！如今不要失误，新的世界——新的复杂性……悬挂着，只有这时才恍然大悟：一生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无论怎么理解——都是胜利。牛犊并不比橡树软弱无力。不管我怎么想集中精力思考，都不可能。家里怎么样？搜查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但是已经不像夜里那样紧张了。）现在我的亲人怎么样了呢？

我们已经飞行了将近 3 个小时了，时间不短啊。到维也纳需要多少时间？我什么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兴趣打听这些。现在我们开始降低高度。还有 10 分钟就到机场，我是劳改营分子还是已经不是了？我们正在降落。愈飞愈低。清晰可见：一座大城市，位于一条河畔。河面并不宽阔，但也不是小河。是多瑙河吗？谁知道呢？飞机绕了一个圈子。可是怎么看不见维也纳的公园和城郊呢？更不屑说大工厂，哪里去了？……眼前是飞机场。我们沿跑道滑行。在诸多建筑物中间有一个大厦高高耸立着，上面标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字样。嘿！……我们在滑行、转动着，下面有警察吗？有！还不少呢！如果我对他们的服装没有认错的话！此外，机场上大约还有 200 人，不知在高声欢迎什么人。

飞机停下来了。推来舷梯放在机舷旁。我们的几个人向驾驶员跑去，又跑了回来。这时我也没有沉住气，做了一个旅客的自然动作：去拿我的大衣（列弗尔托夫监狱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国家加工的），是否应该穿上大衣呢？他们立即把我挡住并命令我说："坐下！"事情不妙。我坐了下来。三四个人跑来跑去，忙忙乱乱，其余的人像老虎一样坐在我的周围。我漫不经心地坐着。突然从驾驶舱室向乘客室传来命令，声音很大，语气粗暴：

“给他穿上大衣！把他带下去！”

一切趋向恶化，只有对待劳改营分子才这样大喊大叫。让他们去吧，我默默重复着德语句子，同时我自己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到机舱门口时，8 个人中间的一个向我走来，紧紧地贴着我的身子，面对面地交给我 5 张纸币——500 马克。

怎么办？我既然是囚犯，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呢？可是，我却摆出绅士派头，我问：

“请问，我是否该还什么人的债？”

“不欠债、没有什么人可还……”

那个人溜走了，我甚至没有看清楚他的脸，我没有注意。

总的说，我自由了，可以走了，克格勃分子站在两侧。驾驶员钻出了机舱。传来一个声音：

“下去吧！”

我走下舷梯。旁边再也没有两个人押解，没有人紧挨着我，挤着我。我走了三四阶以后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我茫然。他们没有人下飞机！这么说，魔鬼全都留在飞机里了。

总之，没有人下飞机，因为两个乘客舱里我是惟一的乘客。

于是我注意脚下，可千万别被绊倒了。而且稍微向前看一下，围成一个大圈，显然是被隔在禁止线以外，站着 200 人左右，他们鼓掌、照相或者挥动着笔。他们在等候？他们知道？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最简单的事情——欢迎。

在舷梯下面，一位非常令人喜欢的人，微笑着，说着较为流利的俄语：

“我叫彼得·金亨斯，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

一位女士走到我的跟前,向我献花。

按莫斯科时间是5点5分,恰好在一昼夜以前,他们推推挤挤地闯入我的住宅,不由分说把我带走……对于一昼夜来说发生的事当然是太多了。

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二昼夜了。与我同车而行的人提议到伯尔那里去,我们沿公路奔驰,谈论着这里的生活,它已经开始了。

〔在莫斯科向外国记者们宣布了剥夺国籍的命令。"只要他的家眷愿意,可以与他团聚。"妻子说:"在我没有亲耳听到他的声音时,我不相信。"现在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传来消息:飞机场上欢迎场面的详细报道。这种场面你难以想像:莫非是演员飞来了?《纽约时报》记者打电话说:他刚才给伯尔打了电话并同索尔仁尼琴通了话……最后,他本人打来了电话。〕

傍晚,我们来到了伯尔居住的小村庄。我们从记者们的两排汽车中间挤了过去,车辆沿着窄小的街道排成长行。我们在闪光灯忙碌之下钻进了屋子。直到深夜甚至翌日早晨,记者们还一直在房屋周围喧闹不停。亲爱的伯尔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下来,可怜的人,他为我接待了客人们。早晨,他对我说,我应该出去,让他们拍一些照片,说点什么。

说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终于,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没有斧头悬在我的头顶上,全世界最大的通讯社的十几个扩音器送到我的嘴边——说吧!甚至自然而然

地要说！此刻可以发表最重要的声明，然后由他们广为散发、散发、散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阻碍着。由于迅速转移，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可能准备讲话呢？现在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我突然觉得不太适宜了，因为在大家都能讲话，都允许讲话的地方，说出真话、毫无顾忌地骂人是欠妥的。于是我说出了发自我内心的话语：

“当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现在我需要沉默。”

而今我回想起来，那样做是正确的，感觉没有欺骗我（后来，当我的家眷已经来到苏黎世之后，一些记者又来采访，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会向他们说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什么可宣布的。）

沉默——我指的是不在扩音器前面讲话。至于我来欧洲以后的状况，从最初的时刻起，我就把它理解为终于可以不受拘束地进行自由的创作了。在以往的27年中我写完的作品是放到写字台里面的，尽管国外出版了一些，可是终归与应该出版的作品还差许多。只有现在我能够积极地、仔细地采摘自己的果实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摆脱了列弗尔托夫监狱的死亡，书籍得以出版了。

而在我们那里，在俄国，我的声明可能被作出各种解释和猜测：沉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压制了那么多年怎么能够沉默呢？在那里，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是：强制，我被他们强制，他们实行强制，可是，我沉默了吗？

〔浑身上下穿的都是克格勃分子的衣服……讨厌！被放

逐人的原来的东西放在他们那里了吗？——肯定会弄脏的。怎么才能到列弗尔托夫监狱去呢？它的大门紧闭。打电话吗？电话簿里没有这些地方的电话号吗。侦讯员的电话？某人也许知道折磨他的那些人的电话号码。但是侦讯员可能告诉另外一个号码，再往那里打，没有人接。往检察总署打吗？回答是："我们这里没有列弗尔托夫监狱的电话号码。"——"但是，正是你们把索尔仁尼琴带到那里去的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想起来了：列弗尔托夫监狱里，星期四是探监日，可以送东西。于是阿丽娅干脆直接到监狱去了。拼命地敲打关闭着的小窗口，喊着："叫科马罗夫中校出来！"墙壁里面有响动，锁头有响声，有两个副官（他们疾步走出，一边站一个）的陪同之下，一个肌肉松弛，白头发的人神气十足地说：

"我是列弗尔托夫拘留所的所长彼特连科上校！"

在这个营垒中要想找到他的名字是徒劳的！更何况他的东西呢——化为灰烬了！他说，在当天就烧毁了。说不定他们自己瓜分了呢？或者拿去作为顶替了呢？]

妻子面临的问题不在于那些！摆在她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善始善终：把我在12年当中存储的大量文字资料，用于将来创作的很多素材运到瑞士来：或交空运、或交陆运、或交水运，毫无损失地运出来。在运输中一页纸片，一个封好的信封都不能丢失；完好无损地放在写字台的各个抽屉里运到目的地，沿途不要有任何一页重要文字（我的文字极少有不重要的）受到边防警卫利用金属探测器进行检查，在海关不要让他们用已经装好的复印设备进行若干次的拍照，更不必说让他们没收了。因为只有克格勃机关、只有苏联政权从肉体上不

能容忍他们不喜欢的哪怕是一页纸自由地运送出去。

我妻子的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了。没有这些资料，我在这里，在放逐中，一个切掉肋骨，心灵痛苦的人只能是个残废者，而不能算是作家了。

我本应该把妻子的这一段故事写进这部书里。不过，不行！不行！……

1974年6月
于苏黎世山区

译 后 记

关于这本书: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牛犊顶橡树》,是当代俄罗斯作家、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回忆录(作者称它为《文学生活随笔》)。它记述60年代初至1974年这15年间作者的主要经历、他的荣与衰、飞升和跌落。这是他从苏维埃制度下的一个"地下作家"到"英雄末日"的记录。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苏联文坛乃至政坛的风云变幻。这类作品在前苏联并不多见,作者创作的角度也颇为新颖。本书对于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前苏联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价值和政治历史价值。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一个有争论的人物。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联邦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939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教学系。1939年起又同时参加两年制的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俄罗斯语言文

学。1941 年夏在两所大学同时毕业。卫国战争爆发后于 1941 年 10 月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 年获中尉军衔,1944 年任炮兵连长,晋升为大尉。据他所在部队首长回忆,索尔仁尼琴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遵守纪律,完成战斗任务,曾荣获两枚勋章。

一个偶然的"不慎"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道路:在致友人信中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信件被军事反间谍机关发现,他本人于 1945 年 2 月在柯尼希斯贝格附近被逮捕,被解回莫斯科投入卢布扬卡监狱。同年 7 月被判处 8 年劳动教养,先后在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劳改营中服刑。1953 年刑满,但按照前苏联当时的法律,索尔仁尼琴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流放。1956 年苏共 20 大前夕,为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名誉,他被派到梁赞市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担任物理课教员。1957 年迁居梁赞市,并且实际开始从事"地下"创作。1961 年苏共 22 大以后,他决意争取作品发表,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和帮助。1962 年 12 月,反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终于发表。从此,索尔仁尼琴从深深的水下浮出水面,成为前苏联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颗"新星"。他迅速被吸收加入前苏联作家协会、被邀请参加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与知名人士的会见、被引荐给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被提名作列宁文学奖金的候选人等。《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还发表了他的《小品集》《玛特辽娜一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等。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被废黜,伴随着"解冻"时期的结

来，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拖延数年得不到发表的《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等作品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癌病房》等不准出版；1967 年 5 月他致函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也未被置理。从这时起索尔仁尼琴开始把前苏联文学界的生活片断记载下来，写成随笔、回忆录。这就是现在呈现给读者的《牛犊顶橡树》这部书。

索尔仁尼琴被查抄的作品由当局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印行，在一定范围内阅读。与此同时索氏的某些作品也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并且在国外出版。1968 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的正式出版，使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时《古拉格群岛》的微缩手稿也已送出国外。1969 年 11 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70 年根据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提议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索氏同意接受奖金，但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 年《古拉格群岛》的第一部在巴黎出版，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1974 年 2 月 12 日以判国罪被拘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最初他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4 年 12 月去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奖金。1975 年去美国，在佛蒙特州定居。此后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巨制如《红轮》等，陆续有作品发表，并且曾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国访问。1994 年 5 月全家返回莫斯科定居。还有作品问世。

关于这本书的翻译：《牛犊顶橡树》一书根据 1975 年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的权威性俄文版本译出并参考了其他版本。这本书的翻译凝聚了一家两代人的心血，是一家两代俄语工作者、两代俄苏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辛勤劳作的结晶。

很遗憾的是第二位译者在1996年在俄罗斯去世，没有看到此书在中国的问世。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色，他用词丰富而奇特，犀利而深刻，笔意纵横，语言畅达，思想跳跃起伏（以至于原文中常用括号表示），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多方请教，也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 者

1987年12月译完

1997年12月校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牛犊顶橡树：索尔仁尼琴文集
作者＝
页数＝３８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目录